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中国私学百年祭

——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

李冬君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 / 李冬君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
ISBN 7-310-02065-0

Ⅰ.中… Ⅱ.李… Ⅲ.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Ⅳ.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308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 印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1—2000
定 价 30.00 元

题　记

他是一个智者，与政治保持距离，反而成了政治的先知。

从开特科到废科举，把握变法的“原点”，抓住中国近代化的前提；从参与缔造共和到反袁复辟帝制，真不愧为“共和一布衣”。

他是一个学者，用一生来实验一个思想：将私塾改造为学校。用一生来“会通”一条学理：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守住一个真谛：立国，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义。

凡　例

本书之宗旨，在确立严修新私学，故研究之范式，以个体为经，时代为纬，在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会通”中，来展示严修的文化个体性。

本书之史观，以严修新私学为主线，来贯通近代史，故近代史之开篇，非老生常谈之鸦片战争，而是传教士东来和西学东渐，其结束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本书不是年谱，但采取了编年体的撰述方式，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故称系年。月份与日期，则根据叙事的需要来安排，没有严格的顺序要求。

本书注释，皆取书中注，于引用和叙述之旁，以小字注之。

史料来源主要为《严修日记》、《信草》及其自订《年谱》，凡书中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者，即为此述种种。因引用太多，若一一注明，则满篇皆是，故略之。

序　言

严修，字范孙，何许人也？

周恩来曰：旧社会的一个好人。

张季鸾曰：旧时代的一个完人。

何以皆以“旧”来论先生？二人离先生未远，有隔代之感，故以新旧论之。以新旧论，论故人可，论历史人物则不可。

百年之后，如何论先生？先生早已“盖棺”，“论定”谈何容易！入土易，入史难，何以先生难入史家法眼？

先生之“命”在新私学，先生之志在改良中国。曾几何时，“革命”二字统治史学，改良主义“胡适之”？曾几何时，举国“斗私”，新私学遂被压在了箱底。“而今识尽愁滋味”，再来论新旧，真是“欲说还休”！

先生之于今日，其人已旧，而其命维新。何以言之？

改良主义和新私学呼之欲出也。何谓“新私学”？以时代言之，乃近代私学，非古代私学；以取向言之，乃西化之私学，非传统之私学；以形式言之，乃学校之私学，非塾、院之私学。

传统私学，以孔孟为体，帝王为用，其学不离科举之轨；而先生之新私学，以科学为体，经济为用，其学趋于教育与实业。故先生之新私学，始于开经济特科，成于立南开大学，终于设崇化学会，由用及体，而本于科学，通于经史。

先生之新私学有二：一学校也，二学术也。其学校，由区区一私塾，渐进而成南开大学；其学术亦有“三通”，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

变，通文理之用。先生之学，私学也；先生之行，独行也。

遥想当年，于西南一隅，奏开经济特科，启变法之原点，开士林之新运，置恩师绝交于不顾，而独行其真理矣；袁氏开缺，人莫敢言，先生独抗疏，何也？为国惜才，置生死于度外矣。

袁氏复出，欲以共和得天下，先生以一介布衣，促成南北和谈，参与缔造共和；共和方兴，先生独言袁氏任总统将误己误国；袁氏复辟，先生捍卫共和，独自与袁氏绝交于北海，并劝梁启超戒赌，励其再造共和。

袁氏任直隶总督时，自言其一生之事业，曰练兵，曰兴学。练兵，袁氏自任之；兴学，以先生任之。先生督学直隶，直隶遂执新学之牛耳；先生执掌学部，学部遂成宪政之楷模。

先生之学政如斯，先生之学术如何？先生之学术曰：君主立宪。所谓"君主"，乃孔孟之道；所谓"立宪"，乃自由民主。先生言，孔孟之道与自由民主，并行不悖；先生行，则执两用中也。

其时以兴学名世者，有先生筚路蓝缕创制于前，蔡元培继往开来定方针于后。蔡氏一生事业在北大，先生一生事业在南开。北大，官学也；南开，私学也。"五四"以后，民国政府两次欲以先生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长，均为先生拒绝。蔡氏之于北大，如先生之于南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蔡氏终于挂冠而去，不与腐败政府同流合污；先生终于不入北大，不入官场与官学。

世人皆以"兼容并包"论蔡氏，孰知先生更有甚也？

"五四"以后，恩来出狱，失学失业，先生慷慨解囊，赞助留学。人曰：恩来留学，赤化也。先生淡然，曰：士各有志。

蔡氏南下后，参与北伐和清党，其学终未脱党性与主义的藩篱。其时，能于政治文化中确立文化个体性者，能与党性绝缘而守住自性者，舍先生其谁也？！

今非昔比，先生之新私学也，垂垂已百年矣！其校仍在，其学则非也。然而就先生而言，"私"之不存，学将安附焉？

1860年先生出世，一百年后有继起者，曰：新私学当复兴焉。

天何言哉？我不敢言而不能不言！

目　录

题　记

凡　例

序　言

一、国事与家事　1

1. 清兵南下　严家北上/1
2. 清朝式微　严家初兴/2
3. 学术新运　津沽儒商/3
4. 龙战于野　严修出生/4
(1)“抚夷”与“剿夷”/5
(2)“师夷”与“制夷”/7
(3)科举与国运/8
(4)“师夷”与革命/9
(5)晚清外交与长芦盐商/11

二、西学与中学　13

1. 时务与蒙学/13
(1)租界与洋务/13

(2)天王悲剧:从思想到阴谋/16
(3)"文正":儒学重建与西学引进/17
(4)严修入塾与清廷借债/17
(5)"同文"风波与共和先机/19
(6)一部近代史,从何说起?/20
(7)"文正"劝学与孔耶"同心"/21
(8)天津教案:官绅与传教士/22
2. 入仕与入时/24
(1)湖湘人文精神/24
(2)"同治"时代终结/25
(3)应试教育和启蒙运动/26
(4)文化进化与学术新路/28
(5)曾、李比较与北洋实业/29
(6)严修中举与"张门"问学/31
3. 读书与交游/33
(1)通史致用与格物致知/33
(2)书生误国:谈兵与用兵/34
(3)学术渊源:"为续东莱博议篇"/36
(4)自律与国律——"公"、"平"/38
(5)中兴气象:修园、藏书与筑路/39
(6)天地之刑:汪氏"人口论"/41
(7)政治文化:修园、建庙、救灾/43
(8)帝国小聪明与"大炮上晒裤子"/45
(9)严修"三课"及其文化追求/46
(10)"盛世"危机:根源与导火索/48

三、学术与政治 50

1. 使黔纪事本末/50
(1)严修西南行/50
(2)贵州兴学记/54

(3)严修上书:请开经济特科/65
2. 新政之旅:从江湖到庙堂/70
(1)江湖忧思/70
(2)上海见闻/73
(3)皇帝新政/75
(4)政失求诸野/81

四、从旧私塾到新私学 84

1. 从已亥立储到庚子新政/84
2. 东游漫记:教育考察与文化比较/94
(1)诗心、海魂及国计民生之片断/95
(2)儒学、教育及军国主义的崛起/101
(3)思想家、新私学与教育产业化/107
3. 新私学的实验与商人自救/110
(1)上海逗留:西餐与学潮/110
(2)津门兴学:严氏小舍与女塾/111
(3)从蒙养院到经济特科/113
(4)绅商一体与商人自救/115
4. 二次东游:对日本教育的再认识/118
(1)督办直隶学务/118
(2)工业:立国之本与教育之魂/119
(3)自然、法学、音乐及其他/122

五、乱世兴学与末代宪政 127

1. 从兴学校到废科举/127
(1)私学、国粹、商会自治/127
(2)留学、劝学、废科举/130
2. 末世新政:兴学与立宪/133
(1)主理学部:方针与体制/133
(2)天津自治与北洋实业/139

(3)宪政二重奏:自治与学潮/142
(4)长天殒帝星,宪政之流光/150
(5)五十而知天命/157

六、天命在野之一:改良与革命 166

1. 自治运动与橡胶风潮/166
(1)中原、江南、冀辽万里行纪略/166
(2)"野人"求"缺"与南开学潮/171
(3)上海金融风暴与天津商会自治/175
2. 从天津学潮到武昌起义/178
(1)末世速写:从镇压学潮到打击盐商/178
(2)严氏产业调整与南开教育复兴/180
(3)立宪墓志铭与共和通行证/182
1)立宪墓志铭:皇族内阁
2)共和通行证:武昌起义
3)袁氏组阁及其共和策略
4)严修辞职及论袁氏不可为总统
3. 南北议和——缔造共和国/189
(1)呜呼共和:智者的忧思/189
1)滦州兵变与北京避祸
2)袁氏政治文化:枪杆子与辩证法
(2)早产的民国与幼稚的共和/192
1)北京兵变与民国早产
2)民国一布衣,共和两先生
3)共和新政治与南开新戏剧

七、天命在野之二:帝制与共和 199

1. 欧游札记——走向共和之路/199
(1)民生主义的政治算术:修史与修路/199
(2)民国之悼:国殇与家殇/200

(3)欧游之缘起:塾师乎? 太傅乎/202?
(4)欧游之一:两个君主国的比较/203
(5)欧游之二:国际博览会与英国之政教/205
(6)欧游之三:法国文物与瑞士风光/207
(7)欧游之四:和平大会与市政问题/208
(8)欧游之五:政之患在市政,国之患在游民/211
(9)欧游之六:斯人不出,奈袁氏何/213
(10)欧游之七:"袁记约法"与归国之旅/218
2. 国殇:袁氏"搞共和"/221
(1)《大总统选举法》——王权借尸还魂/221
(2)严修明志:千金买山和万里云游/224
(3)《二十一条》:日胯之下的国运/227
(4)断袍绝交:严修护国失败/230
3. 共和涅槃之一:家与国的轮回/237
(1)西南共和之剑/237
(2)袁氏之死与严修善后/239
(3)从塞外到江南:严修伤感之旅/242
(4)黎、段府院之争与严修社会改良/244
4. 共和涅槃之二:新文化运动/246
(1)北大精神与南开实学/246
(2)共和之鹿,鹿死谁手? /247
1)天津"寓公"政治文化
2)江上风雨和心中风雨
3)国体"剪辫"与文化"剪辫"
(3)洪水与政治中的一个预言/254
八、教育产业化与政治化 258
1. 严修新私学的自由主义来源/258
(1)立共和之心与美国之行/258
1)赴美路线:北京—朝鲜—日本—加拿大—美国

2)美式自由教育法:“自动”与“自治”
3)战争、瘟疫、国民性
4)诗谶与文学预言
2. 南开大学与五四运动/272
(1)实用主义滥觞与南开大学兴起/272
(2)“耳顺”——革命莅临中国/274
1)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
2)“耳顺”之年的亡国之音
3)募捐之旅:从中原到江南
4)蔡元培辞职南下与西湖学潮兴起
(3)南开大学——“立人”与“立国”/282
1)盗泉、粪水之喻与问题、主义之辨
2)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
3)敬告南开:以真理“立人”
4)“立人”之一例:周恩来留学
5)严修养病与李纯自杀
6)社会主义论战与五四运动赢家
(4)“通人”视野中的文化与政治/291
1)周恩来来信:谈勤工俭学
2)南开大学奠基:实学与实业
3)“求通”之学术及其文化视野
4)严修“担保”:劝总统“表示”

九、严修新私学与文化个体性 302

1. 战争·国学·南开园/302
(1)直奉战争与“好人政府”/302
(2)新文化反刍与国学复兴/305
(3)南开学园及其“剥皮主义”/308
2. 从整理国故到阶级斗争/311
(1)国故“三明治”与孔子真面目/311

(2)科玄论战与严修实事求“是”/312
(3)学人、政客、阶级斗争/316
3.“中国文艺复兴”与民族主义觉醒/319
(1)“中国文艺复兴”:国粹与革命/319
(2)严修论战:“佳兵总不祥”/322
(3)中国教育精神的独立:“崇化”与“土货化”/324
4.病夫之忧——民国招牌下的党和军/327
(1)病夫之忧一:民与国有病,谁治? /327
(2)病夫之忧二:家与国有难,谁管? /330
5.据乱世——“严修记曰”/333
(1)乱世绘之一:“枪”与“抢”/333
(2)乱世绘之二:治病与治学/335
(3)乱世绘之三:“不知何处过明年”/338
6.严修新私学:南开与崇化学会/340
(1)乱世绘之四:南开柳暗花明/340
(2)崇化学会:从科学启蒙到文化自觉/342
(3)“党治”主义与文化个体性/345
7.“其命维新”:中国公民和南开校父/348
(1)鸡鸣残梦:王国维之死一解/348
(2)“崇化”之乐与“土货化”之乐/349
(3)“党化”和“自由化”:蔡元培两难/351
(4)北伐之一:金融战与主义战/353
(5)北伐之二:“北平”与“东北易帜”/355
(6)北伐之三:财阀北伐与“五纲总案”/357
(7)中国公民:从善如流与视死如归/359
参考书目 363
后 记 367

一、国事与家事

1. 清兵南下　严家北上

1644 年，清兵入关。

1645 年，清兵屠扬州、嘉定，江南一片刀光剑影。

是年，浙江山阴绍兴学者刘宗周黄宗羲曾从其学，所著辑为《刘子全书》绝食殉明。次年，福建漳浦学者黄道周学术上主张调和朱陆，著有《黄石斋先生集》殉节。

1647 年，清廷兴大狱，杀江南名士陈子龙组织“几社”，起兵抗清，编有《皇明经世文编》，著有《陈忠裕公全集》和夏完淳 14 岁即从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义，夏不仅为少年天才诗人，亦为少年民族英雄。

1652 年，清廷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然而宣武门内新教堂落成，清世祖先后赐“钦崇天道”、“通玄佳境”匾额及御制《天主堂碑记》。次年，又赐传教士汤若望“通玄教师”封号。

1656 年，罗马教廷颁令，允许在华教徒行祭孔祀祖礼仪。

1657 年，清廷改孔子祀号为“至圣先师”。

清世祖顺治在位十八年。期间，严家七世祖严应翘因经商由浙江徙天津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曾于此挥戈南下，一举夺得皇位，此后，新皇帝便设立了天津卫所，以其作为守护皇城龙脉，贯通南北经济的活眼。后世遂为天津籍，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四棵树，宅

后临倭瓜园。严氏凡十一代、约三百年均居于此此前，严家先世为浙江慈溪东乡人。据说其远祖为东汉严光，故严修撰其门联云："临巷四棵树，家江七理滩严光垂钓处"，横匾为"故园瓜好"。后来严氏保姆讲习所及蒙养园、严氏女学初高两部、严氏女子中学、敬业中学堂及崇化学会均创设于此。

2. 清朝式微　严家初兴

1799 年，阮元主持《畴人传》初编成书。

清代学者重天文与数学，并非科学精神的觉醒，而是观天象以知天命，数学则是算天命的工具。学者算命知命，就帝王学而言，乃乱世之前兆。

1801 年，清政府禁止演唱"鄙俚"歌谣即民间流行歌曲。儒家乐论认为，流行歌曲也关乎王朝气运，如"亡国之音哀以思"之类。次年清政府禁毁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已刊播者，令自行销毁，不得仍留原版。先禁流行歌曲，又禁流行小说，王朝气数，已可想而知。

1804 年，钱大昕卒 1728 年生，字晓征，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先生博极群书，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习。凡经史文艺、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官职氏族、地理金石、辽金国语，以及中西历算之法，莫不洞悉而明辨。其论宣城梅氏梅文鼎与婺源江氏江永历算之优劣云："江氏之法，大率主欧罗巴之说而引申之，其意颇不满于宣城，而吾益以见宣城学之高。盖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其学已得西学精髓。

1805 年，纪昀卒 1724 年生，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省）人。生前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著《阅微草堂笔记》，风行文坛。

钱大昕、纪晓岚先后辞世，乾嘉学派已露式微之象。

在对外方面，清政府开始闭关排外，严禁在京传教士私印书籍并传教。下令拆毁教会匾额，禁旗人出入教堂，关闭女子学堂，将在京刻书传教的西方人德天赐解往热河今承德市圈禁。夷教受难，为中西文化冲突之始；王权主义拒绝了"上帝的使者"——传教士，西

方文明又派来“魔鬼的使者”——鸦片烟。

是年八月，严修祖父出生，名家瑞，字宇香，谱名道亨。

据严修《本生先祖父宇香公事略》云：“祖父自少佐人治盐，以义声闻于安平、祁州、博野、肃宁等县。晚而自治盐产，行盐于顺天之三河县。”“祖父天性慷慨，有任侠之风，急人之难，奋不顾身，虽处贫困，赒恤亲族无吝色。”

某年冬夜，严父之友张问青拜谒祖父，祖父语之曰：“若有所需耶？”张嗫嚅不肯语，“祖父则起入内良久，裘而入，缊而出，手持十缗钱券以授张丈，盖裘已付质库矣”。

3. 学术新运　津沽儒商

1810 年，蔡上翔卒 1717 年生，字元凤，江西金溪人。

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书成于 1805 年，时年八十有八。其序云：“世人积毁荆公，几同于詈骂，不啻千万人矣。”故为是书以翻案。蔡公实为得变法风气之先者。

可清政府不知“变”，只管“禁”。先是禁传教，将法国传教士南弥德等以“学艺未熟”为名遣送回国，并申令各省查禁西洋人，禁止人民习天主教。这是轻的，在湖南等地，对传教士的迫害变本加厉，如湖南巡抚巴哈布逮捕西洋传教士兰月旺，以“夷人潜入内地，远历数省收徒传教，煽惑多人”为辞处以绞决。

尽管如此，传教工作依然卓有成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译《旧约全书》成中文付梓，并完成《汉语语法》；又收刻工蔡、高二人为新教教徒，编译出版《华英字典》第一卷，取名《字典》，与助手米怜合译《新约全书》成中文，名曰《神天圣书》。

这些工作不事张扬，因而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关注。

1816 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抵京，因礼仪之争，未见仁宗而去。此时的嘉庆皇帝，既无乃父“十全武功”，又被“邪教”折腾得要命，对于英使“不遵仪注”，竟勃然大怒，命英王以后不必遣使，更遑论扩大贸易了。较之乃父接见马嘎尔尼，未免小气，有失天下观的仪范，虽承盛世遗韵，而衰象昭然。

禁了传教，然后又来申禁私贩鸦片，包括禁种罂粟、禁开烟馆等，定官民服食者罪。无论上帝的，还是魔鬼的，清政府只一个"禁"字了得。嘉庆一朝，传教士和鸦片烟还未成气候，令嘉庆朝焦头烂额的，是所谓"邪教"。

嘉庆朝20余年，治国平天下的功夫全下在白莲教身上，一方面大开杀戒，另一方面又令教民缴经反教，申令地方官既往不咎。又打又拉，"邪教"于是乎稍息。其变种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世教化，由"反清复明"起义，转化为"扶清灭洋"运动，以另一种方式——义和拳，几乎为清王朝送了终。

1829年，刘逢禄卒1776年生，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刘氏为常州学派创始人，以公羊学研究《春秋》，著《左氏春秋考证》，斥《左传》为刘歆作伪，又发挥今文"微言"大义，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等。龚自珍、魏源都是他的学生，后来的康有为，走的也是他一路。

这一年，严修的父亲出生。父名克宽，字仁波。

伯祖道尊，字师范。祖父因伯祖无子，遂以仁波承继道尊。

仁波生子二人，长子严振，次子严修。以长子振承继父祖宇香，故字香孙；以次子修承继伯祖师范，故字范孙。严修著《先父仁波公事略》云："吾父少年治举业，从查果庵先生游，再应童试不售。"后虽因家嗇佐父治盐，但终未弃读书讲学之好。尤"好宋五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周敦颐书"，"晨起，必朗诵经书或宋五子书两小时，声策庭外"。其讲学之友，有王公朴臣，"王公初以孝廉在直隶候补，与吾父讲学，过从甚密。丙子捷南宫，仍分原省，遂知天津县事，倡行乡约保甲，吾父以全力赞助之。王公在任两年，宦囊如洗，殁后几无以敛。经纪其丧者，惟吾父一人"。

严家置盐业，行盐之地为京东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市古洵河。古洵河源出今天津市蓟县北，西南流经北京市平谷县南，自天津市宝坻县东北注入蓟运河。

4. 龙战于野　严修出生

1831年，荷兰布道会的德国传教士郭士腊，在中国沿海地区

从事游历布道活动。当他来到天津时，他情不自禁想到利物浦，他在《中国沿海三航日志》中写道："当我们靠近天津的时候，情景是那样生机勃勃……在中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如在天津的生意有利可图。"使天津城市繁荣起来的是商业，其中首推长芦盐业。

长芦盐区，包括今天津市、河北省渤海沿岸，为北起山海关，南至黄骅市盐场的总称。明初置北平河间盐运司，后改称河间长芦，以运司驻于河间府沧州之长芦镇而得名，1677 年运司移驻天津而长芦之名不改。

1832 年，长芦盐区盐场由 20 家变为 8 家丰财（今天津市东葛沽镇）、芦台（今天津宁河县）、海丰（今河北省黄骅市东南羊儿庄）、严镇（今河北省黄骅市西北同居）、越支（今河北省丰南市东南西葛各庄）、济民（今河北省滦南县西南柏各庄）、石碑（今河北省乐亭县南阁各庄）、归化（今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盐务）。

长芦是离北京最近的产盐区，朝廷贡盐多出自长芦每年办纳 90 万斤贡盐。因此，长芦盐商与官府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长袖善舞，漫卷千金，在京津一带呼风唤雨。

严家在京津一带行盐，得地利之便，家业渐渐发达起来。

因祖父宇香年老怀病，不力家事，父仁波 23 岁，弃儒经商，佐祖父治盐产，终年辛劳奔波于津沟之间。就在父亲仁波成长起来的商旅岁月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

(1)"抚夷"与"剿夷"

1834 年，马礼逊卒 1782 年生。两年后，"马礼逊教育会"在广州成立。又过了两年，英国人台约尔制成第一套汉文铅字，在香港印刷书报，成为风行一时的"香港字"。有了"香港字"，不毛之地香港成了传教基地。

嘉庆一朝困于"邪教"，道光受制于烟毒，烟毒泛滥成灾，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黄爵滋上疏，陈鸦片危害之烈，力主严禁，提出戒烟以一年为期，逾期仍吸食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子孙不得应试。林则徐也上奏道光帝，支持黄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者的主张，强调"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

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于是，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一到广东，就将屁股坐在广州，把脑袋伸到澳门。

澳门是当时中国“看世界”的一个主要窗口，按中国文化的老例——屁股决定脑袋，林则徐的屁股坐在中世纪的天下观里，用脑袋去接触近代化的世界观。就这样，林成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第一人”说，放在道光一朝还可以说得通，如果放眼望前看去，似乎并不确切。不必说明清之际徐光启、李之藻等得风气先，即晚清人士中亦有不少先于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如1832年萧令裕著《记英吉利》和1834年汤彝著《英吉利兵船记》中，都有“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的记述，他们的著述都在林则徐之前。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创办《澳门新闻报》、《澳门月报》。

他一边“看世界”，一边在虎门销毁鸦片20000余箱。此举震撼中外，英人始知林则徐来广州“看世界”，决非作壁上观，看看风景而已。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向美商购买轮船“甘米力治”号，重900吨，改装为军舰。谁知英人避实就虚，竟引轮北上，袭取定海，而后径至天津大沽口。

“天津”，顾名思义，是“天子的渡口”。在“天子的渡口”，竟然有英人的炮舰耀武扬威，于是恼羞成怒的道光帝，大骂林则徐：“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天子很讲究“门脸”，当时的天津其实就是北京的“门脸”。这张天子脚下的“门脸”，比“山高皇帝远”的广州要重要得多。当英人的炮口对准了这张“门脸”时，皇帝再也不敢意气用事，派出了一个擅长面子外交的官员琦善(1790—1854)满洲正黄旗人，字静庵，时任直隶总督，让他来维护自己的“门脸”。

这位官员果然“抚夷”有术，他的原则是先将英人哄走再说，免得皇上在“后院”提心吊胆。他对英夷说，林则徐轻举妄动，有违天意；他对皇上说，英夷动武，是不平则鸣，要请皇帝伸冤。说得两头都满意了，他便要求英夷先回广东，待他到广东去秉公处理。他自以为很圆满，结果却铸成大错。

他一到广东就发现英夷难"抚",英人开出的条件,使他很为难,割地、赔款、加开通商口岸,不给他留一点回旋余地,他无法说服英夷,又不敢禀明皇上,只好自己顶着瞒和骗的恶报;在英夷的炮口下,于第二年与义律私订条约《穿鼻草约》。

在天下观里摇摆的道光帝,眼见"抚夷"失败,又想"剿夷"。

"剿夷"要用兵,用兵要花钱,钱从哪里来?皇帝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受贿,抄了琦善的家。不管这个倒霉的人怎样为自己辩白都无济于事,民间传说他家有番银 1000 万元,其他资产无数。平时小气的皇帝,抄起家来却是大手笔。

皇帝抄了他的家就去"剿夷",后来在广东打了一仗,在浙江打了一仗,两仗打下来,签了一纸《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 2100 万银元,开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虽然丧权辱国,但英夷没有入主中原争夺天下的企图,反倒使帝国放心了,条约只是让利,并未触犯王权,因此,让利之后,帝国依然高枕无忧。

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帝国没有任何改革的新政出台,却全力以赴重修《大清一统志》,来修补崩溃的天下观。而有识之士,则放下了天下观的架子,以夷为师。

(2)"师夷"与"制夷"

1841 年,林则徐谪戍伊犁,著《俄罗斯国纪要》,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编译《四洲志》,该书译自《世界地理大全》,1834 年英国慕瑞著,林据梵典分大地为四洲之说而名之。又委托龚振麟火炮研制家在浙江镇海铸炮局内,造 8000 斤巨炮,并创制磨盘形枢机新式炮架及车载式枢机炮架。

1842 年,林的好友魏源终于发言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来,他的同乡曾国藩将这口号付诸实施,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魏的先知,加上曾的先行,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引擎和核心。

魏编了一部《海国图志》,开始为 50 卷,后来增至 60 卷和 100 卷。这部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不仅时务之儒必读,连经学之儒亦起而效尤。汪文台(1796—1844)安徽黟县人,通经史,阮元服其精博。汪据

《海国纪文》、《海国闻见录》、《明史》、《地球图说》等资料，撰成《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记叙英国地理位置、船舶枪炮及风俗习惯等。追述中英贸易，主张禁绝鸦片。据说这部书还曾启迪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可是在中国，行动反而姗姗来迟。且不论后来"制夷"的效果如何，"师夷"的提出，在当时确实震撼了中国。

在"师夷"的口号下，有两个杰出的人物应运而生。洪秀全"师夷"而有"拜上帝会"，曾国藩"师夷"开了洋务运动的先河。

(3)科举与国运

1843 年，广东发生了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件事：

洪秀全在广州应试第四次落第，回花县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两广总督祁埙奏请开制器通算一科，为礼部议驳，以老病乞休。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件事都与科举制有关。微妙的国运，似乎系于科举制一线。

祁某随靖逆将军奕山南下广东"剿夷"，负责大军的粮草供应，琦善免职，他接任两广总督。当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夷时，祁某作为最高地方官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他表面出来调停，而暗中却以为民气可用，他曾上疏道光皇帝，疏陈粤民义奋，团练可用情状，与奕山的"粤民皆汉奸"论大唱反调，可是道光帝却不予理睬。

道光帝虽有种种弱点，但在如何对待民气可用这一点上，还是抱定宗旨，颇为稳健的，不像后来的慈禧太后，在民气可用的煽动下轻举妄动。祁某的民气可用的奏折受了冷遇，他的另一个建议"开制器通算一科"，也被礼部议驳，他是个想干事的人，事不成便一走了之，而洪秀全则最后一次落第。

洪秀全是个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却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在绝望中发现上帝，认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决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种真正的绝处逢生的感觉。

历史上，我们看惯了英雄末路的沮丧，听够了怀才不遇的喟叹，我们已经习惯于欣赏这种苦涩的美感，这种美感早已构成我们历史观的一部分。还有一个人，也是个科举制下焦头烂额的名士，

时间比洪秀全早 30 多年。当他还是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时，他便大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老天厌倦了科举制，它要把人才降到远离科举制的山中去，他预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他去世不到十年，山中之民洪秀全便揭竿而起。如果他仅仅预言了这个失败的人物，还不足以称为先知。就在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山民的太平天国运动，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林精英镇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的山民又从井冈山出发，踏上了征服中国的革命历程。而此时的士林早已随着科举制的解构而凋零。

这个先知就是龚自珍。

(4)"师夷"与革命

1843 年，广州、厦门、上海开埠；次年，宁波、福州开埠。

不仅地理空间向夷人开放，而且精神空间也向夷教开放。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之后，清政府批准天主教弛禁。

被放行的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设三个主教区，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设立代牧主教区，后来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总部。

而洪秀全在落第以后，从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又读了一部《劝世良言》。这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书，它是启发太平天国运动的《圣经》，是洪秀全宗教灵感的源泉，为了证明它的真理性，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太平天国运动的灵感来源于基督教，而其信念却根植于中国古史，洪秀全以一个崭新的诠释将二者沟通，赋予运动以灵魂：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望上帝也。

坏自少昊时，九黎初信妖魔，祸延三苗效尤，三代时颇杂有邪神及有用人为尸之错，然其时君民一体皆敬拜望上帝仍如故也。自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厉阶，祀虞舜，祭大禹，遣人海术神仙，狂悖莫甚焉。秦政作罪魁于前，历汉文、武、宣、明、桓、梁武、唐宪皆迹效尤于后，至宋徽又更改皇上帝尊号。自宋徽至今历六七百年，则天下多惘然不识皇上帝。《原道觉世训》

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当初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

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天条书》

他认为，文明初期，东西方文化同根共源，皆尊上帝；西方文化将上帝之路进行到底，而中国文化则歧路亡羊，遁入鬼路。如果我们将拜上帝的文化称之为"神化"，将崇拜圣人的文化称之为"圣化"，那么遁入鬼路的文化就一定是"圣化"了。

而"圣人"孔子，竟然僭越上帝，当然要遭到上帝的严厉斥责：推堪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摆列三等书，指主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太平天日》

孔子之后，圣人取代上帝成为文化的主宰者。

通观二十五史，我们发现，其中涉及上帝的条目为1247条，卷数为398卷；而涉及孔子的条目为2805条，卷数为880卷。孔子的内容是上帝的两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说："尔(孔子)声名反大过于朕乎？"

太平天国设添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称孔子为"孔某"，在"上帝"二字之前率加"皇"字。耶稣的原则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教分离，各司其职，洪秀全加一"皇"字，将基督精神纳入王权主义，使政教合一。

对于这场中国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基督教运动，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们，从历史动力的角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评价却截然相反。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在访问天京之后，指出洪秀全生活在梦幻泡影中，洪硬逼着传教士"承认太平王朝是天国，这个天国在世界上独自存在，而南京是宗教和世界帝国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儿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可见的代表"。

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以一种轻蔑的口吻写道：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的、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而整个士林对他的评价，在曾国藩发布的《讨粤匪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曾氏率湘军从湖南衡阳出师，发布此檄，斥太平军“无庙不焚”，“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为鬼神所共愤怒”。

曾国藩号召士林“捐银助饷”，“助吾讨逆”，“以卫吾道”。

于是，士林风起云涌，跟随他去捍卫孔孟之道。

(5)晚清外交与长芦盐商

1856 年，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成书，80 卷，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

编书不过纸上谈兵，而实际情形则越来越糟。是年，广西西林县发生马神父事件，广东沿海又发生亚罗号事件。

1858 年，英法联军故伎重演，又兵临天津，先攻陷大沽口，然后两国军舰沿海河上溯至天津城外三汊河口，驻扎在三汊河口海河北岸的望海楼、金家窑一带。

咸丰帝如坐针毡，他惟恐大沽成为香港，而天津成为广州，“将来何能驱之使去？”在随后开始的缔约谈判中，咸丰帝屡降谕旨，令赶往天津求和的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如天津通商及占据海口，断不可允许。”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以开放登州、牛庄相交换。

天津人心惶惶。是年，严父举家避难三河县。

1859 年，英、法、美借口换约再度派军舰进入大沽炮台。

清政府以大沽炮台设防为由，指定侵略者由北塘进京换约。

英、法决意占领天津，遂挑起事端进攻炮台，守军奋起抗击，击沉敌舰 10 艘，伤毙敌兵 460 余人，联军败退，清军守将僧格林沁遂名噪一时。

在僧格林沁的背后，还有一位长袖善舞的盐商，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名叫张锦文(1795—1875)，天津静海人。1853 年 9 月，太平天国北伐军势如破竹，直逼天津时，他受地方官委托组织城防和筹款；当咸丰帝欲悔约，责令僧格林沁积极备战时，天津地方官员联名给他一封信，请他协助组织团练。

他组织长芦盐商为僧格林沁的军队捐资 20000 两，其中他一人就捐资 10000 两、弹药 5000 斤，还有士兵服装等军需物品。

1860 年 8 月，英法联军再度进攻，相继占领大沽炮台和天津城。联军此次决意占领北京，故天津、通州的谈判相继破裂。9 月，咸丰帝逃往热河，留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议和；10 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城，洗劫烧毁圆明园。因张锦文与英法联军打过交道，且颇得中外各方好评，恭亲王奕䜣请他进京，协办议和事务，对他言听计从。谈判期间，他周旋于清廷和外国使团之间，建议并促成清廷用外国雇佣军对付太平军，于是“常胜军”应运而生。

这一年的 4 月 2 日，严修于隆隆炮声中，生于顺天府三河县。

修字范孙，号梦扶。因其出生前，其父梦人赠玉杖，为其命名玉珪，故以“梦扶”为号。生母王氏。成年后严修本人经常署名，他人为示尊敬，多称其字。严修自谓“生于京东三河县”，“我家自戊午避英法联军之难，迁居三河”。其父时年 31 岁，继承并发扬祖业，为津门有声望的盐商之一。

二、西学与中学

1. 时务与蒙学

(1)租界与洋务

严修两周岁时，祖母尝抚其首曰："此儿满腹韬略。"

不久祖母去世，严修亦患牛痘"几死"。

京畿局势渐安，严家返回天津，严修妹妹出生。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军尚有 7000 余名屯于天津。

英军屯于海河西岸，法军屯于海河东岸，虎视眈眈。

条约规定天津为通商口岸，条件与别口无异。英国参赞巴夏礼乘机提出"欲在天津城南采择地基，为将来英商屯货之所"，并自行在津城东南紫竹林一带勘丈空地。

后来，英国首任驻津领事孟甘(J. Mongon)正式划定租地四至范围。自紫竹林起至大井庄长 315.5 丈，自紫竹林沿河起至海大道宽 115 丈，自大井庄河沿起至海大道宽 71 丈，面积共计为489.025 亩。四至地边各立一石柱，上书"大英勘定地基"六字。

法国亦如法炮制，接着圈定了法租界。租界虽然早已出现，1845 年时英国就通过《上海租地章程》取得了在中国内部划地立界的权力，并建立起第一个租界。但那远在上海，天子可以睁只眼，

闭只眼，难以心安理得，尚能苟且偷安。可是连天津也出现了租界，天子卧榻之侧，夷人已然入室，是可忍孰不可忍！

租界的出现构成了晚清文化的一部分，是天朝上国全面失败的标志，它不仅仅是军事的失败，也不仅仅是政治的失败，它还是文化的失败。对于军事的失败和政治的失败，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承受力，可是对于文化的失败，却没有任何准备。

在《中英天津条约》里，英国人竟要求清政府不许以“夷”来称呼他们，连精神胜利法也不让中国人玩，于是天朝上国的天子，只好放下自我中心的天下观。在天下观里，天朝上国只有“剿夷”和“抚夷”的思路，而《北京条约》却逼着清政府面对西方的世界观，即作为一个战败的主权国家，来承担战争责任，接受战胜国的制裁。这样的规矩，在天下观里是闻所未闻，没有先例的。

按照天下观的规矩，统一是绝对的原则，而手段则是兼并。一般来说，对立双方互不承认主权，战胜的一方从来不会适可而止，他们总是乘胜追击，吃掉对方，进而统一天下。毛泽东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此之谓也。

天朝上国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的，利可以让，而义不能丢。天朝不怕好利之夷，就怕好义之夷，好利之夷浅尝辄止，好义之夷则要你的命根子。天朝地大物博，不怕让利；而王权惟一，决不能让，这便是所谓春秋大义。

好在夷人不懂春秋大义，不明改朝换代的老例，天朝还能苟且偷安。有了避难热河的经历，咸丰帝再也不能像道光帝那样埋头去编什么《大清一统志》，他也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了。

于是，他准了奕䜣、桂良、文祥等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紧接着外国公使就开始驻节北京，咸丰帝如芒在背，不敢回京；他一拖再拖，进退维谷。

拖来拖去，结果拖出个“祺祥政变”。咸丰帝病逝，奕䜣以奔丧为名，赶至热河行在，与两太后密谋。不久，两太后携幼帝间道回京，灵柩由肃顺等另路护送。

两太后车驾抵京，旋即召见奕䜣等，次日发动政变，授奕䜣为议政王，改年号为“同治”，即两宫同治，亦寓母子同治、叔嫂同治、

君臣同治之意。慈禧太后以同治为名结成统一战线，而有后来中兴之气象。当叔嫂反目，母子光绪帝成仇，由同治而独裁时，她便应了《尚书》所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北京政变而有同治格局，南京政变则分崩离析。"洪杨内讧"后，洪秀全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广封诸王，至天京失陷，封王达2700余人，分而治之，使人人自危，自石达开分裂以后，叛变者层出不穷，而清则统一事权，专任曾国藩。

当洪仁玕《资政新篇》被洪秀全束之高阁时，曾国藩等人正兴起洋务运动，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当天国将士到处焚书之时太平天国占领杭州，杭州文澜阁、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藏书皆毁之，北京正在筹建京师同文馆。

1862年，严修3岁。

洪秀全的老师传教士罗孝全，被任命为太平天国洋务丞相，因劝洪秀全皈依基督教无望，离开天京。至此，基督教与洪秀全彻底决裂。

当基督教宣布洪秀全为异端时，西方列强遂与太平天国为敌。英、法两国政府决定助清剿杀太平军，英、法军及洋枪队配合清军攻占上海、宁波等地，大掠，天一阁藏书大量散失。而清政府却命选派都司以下武弁，在上海、宁波学习外国兵法及火器制造法。

洋务初兴，国学被迫做出反应，产生了一种新的观点。

贡生黎庶昌(1837—1897)贵州遵义人，字蒓斋，请开绝学之科，为礼部议驳。其时，所谓"绝学之科"，实为"西学东源"说之滥觞。

"西学东源"说以为，西方科学源于中国《考工记》之类古佚书。因此，西方之科学乃中国之绝学，请开绝学之科，实际上就是要在科举中开西学之科，后来严修在贵州上开经济特科折，乃渊源有自，黎生实为严修之先导者。黎生初学于贵州郑珍，后入曾国藩幕，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先后出使英、法、日诸国，任内，广泛收集中国古佚书，辑刻成《古逸丛书》，共26种。

次年，清廷发上谕：嗣后于应课时文外，兼课策论。承平世，玩时文以饰太平；据乱世，又应之以策论。其实，时文也好，策论也好，都是纸上文章，都无济于事。科举制至此，可谓黔驴技穷。

经世致用，不在文章，而在实业。曾国藩委派容闳购办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容闳叹曰：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西学东渐记》。

(2)天王悲剧：从思想到阴谋

1864 年，严修 5 岁。

洪秀全在天京逝世。不久，清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失败。

历史学家们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局限性"三个字，将历史的本质掩盖着。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农民阶级从来就不是弱者，他们经常是赢家。民本主义的存在，便是他们力量的意识形态。

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农民是运动的主体，而在于整个运动的资源枯竭。拜上帝会不仅打倒了孔孟之道，而且打倒了所有偶像，连西方的基督教也不放在眼里。因此，他们不可能动员和组织新的资源进行更加伟大的斗争。

当洪秀全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创造历史时，他的思想大刀阔斧。当他用思想的三板斧，劈出天国的半壁江山时，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当他放下板斧，开始用王权的刀子雕刻历史和人性时，他留下的却是千疮百孔的败笔。我们可以说他个人江郎才尽，但整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贫乏，却不能归咎于他个人，而是运动所依据的思想基础的薄弱。

洪、杨内讧，不能完全归结为权力之争，思想资源的短缺，也会造成严重分歧。运动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将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里，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渐已枯竭，他对于运动的发展提不出新的纲领。

于是，思想背景比他简单得多的杨秀清，以民间司空见惯的方式，从天父那儿汲取灵感，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指导运动的进程。

当运动的思想源泉枯竭时，运动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丧失了思想的运动，只能依靠阴谋。洪秀全从思想家变成了阴谋家，他借了另一个阴谋家的手杀死杨秀清。从此，运动不再有思想，却不断繁殖着阴谋，而以加速自取灭亡。

(3)“文正”:儒学重建与西学引进

曾国藩不仅要在军事上消灭太平天国,而且要在文化上清除“邪教”影响。他在南京做的第一件建设性的工作,便是设金陵书局,通过收集、整理和刊印图书,重建儒家文化;第二件建设性的工作,便是积极引进并鼓励翻译西学书籍。

他亲自为李善兰校刊其所译《几何原本》,并指导曾纪泽为此书作序,又出资将李善兰所著天文算学著作全部刊刻。当徐寿、华衡芳研制成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的小轮船时,他兴奋之余亲自为小轮船命名“黄鹄”。

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左宗棠在宁波开书局,刻《四书》;继而又奏准在福建设立船政学堂又名求是堂艺局,分前后两堂。前堂学法文、造船,后堂学英文、驾驶、管轮。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画法等。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学校。

李鸿章也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堂。

传教士丁韪良应奕䜣之召,赴京译《万国公法》原名《国际法原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1936年著,为国际公法介绍到中国之始,也是同文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其时,清廷与法国发生外交摩擦,文祥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一部所有西方国家都认可的权威性国际法著作,当蒲得知丁韪良正在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原理》时,就将他引荐给总理衙门的四位大臣,丁说他的翻译尚未完成,并请求支持,恭亲王即命四个饱学之士协助他完成译事,并赠银500两作为刊行费用。

该书译成后,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Klecskowsky)认为丁韪良是麻烦制造者,他对蒲安臣抱怨道:“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视界》第1辑“普遍性的历史结构”。

(4)严修入塾与清廷借债

1865年,严修6岁。

与其兄严振同入私塾读书,师从查帖青先生。

发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明代萧良友撰，夏广文注，后杨臣诤补订，易名《龙文鞭影》，分上下两卷。内容包括自然知识和历史神话故事。按韵部编排，均为四言韵文，念之朗朗上口。清代李晖吉、徐潜续编《龙文鞭影二集》。严修有诗追记云：

> 同治岁乙丑，我时方六龄，始从塾师读，“春王月在正”。谒师三叩首，入座随诸生。塾师伊何人？查叔字帖青。诸生伊何人？二李（茂三、琴轩昆仲）及我兄。师谓余幼小，不必遽读经，为余选一书，习偶兼习声，曰《龙文鞭影》，定为余日程。

又据严修自注：六岁从查师读《龙文鞭影》，不熟，师命案前读之，而以笔管敲我头，随读声为缓急，如木鱼然。书仅两册，读之几一年乃毕，读过亦遂忘之矣。与兄共塾，颇得兄长关爱，“余幼时与兄共塾，每师出，则兄为理课，夜即枕上教之”《诗存稿》。正当小严修摇头晃脑地背书时，中国对外开放中心已悄然北移。

是年，英商汇丰银行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同时开办营业。早在1845年4月，英商丽如银行就在香港和广州同时设分行，此为中国有银行之始；20年后，汇丰银行选择了上海，表明中国南方经济中心和对外开放中心已由广州转向上海。

清廷也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和华夷之辨的面子，开始举借外债。这一年，向英国借款143万镑，规定分两年六次偿还，此为清政府借外债之始。眼界一开，心态也不同，一向自给自足、从不举债的清政府，在略知洋务之后，竟然一反常态，嗜债成瘾，后来又以海关税作抵押，借外商款120万两。

清政府在财政方面渐渐依赖外商，其政治亦潜移默化趋于开放。作为天朝上国的债权人英商有恃无恐，竟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铁路一里许，汽笛长鸣，惊世骇俗，不仅被认为扰了地下长眠的皇灵，而且坏了天朝上国的风水，旋命毁之。英商于是又于上海黄浦江口架设电线，山高皇帝远，则安然无恙。

而严氏家族另一支，与严修父亲同辈的严信厚（1839—1907）浙江慈溪人，字筱舫不久到上海，在宝成银楼任职，于同治初年，由胡光墉推荐入李鸿章幕。

(5)“同文”风波与共和先机

1866年，严修7岁。

从孙竹泉先生习字，仅数十日即易他师《杂忆儿时琐事诗》。小严修换了教师，清政府也换了总税务司；总税务司赫德一上任，便请政府派同文馆学生，随他前往法、英、瑞士、俄、普等国家考察。

更有甚者，议政王奕䜣又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聘洋人教授西学。以理学自命的儒者们终于忍无可忍。大学士倭仁首先跳将出来，针锋相对，极力排斥，其言行“虽迂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致使同文馆招生计划受挫。

同文馆，朝廷之新政；恭亲王，朝廷之重臣。以重臣推新政，当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可结果却恰恰相反，招来一片非议。

当时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又有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翁同龢日记》就连以知夷情自诩的郭嵩焘，在“借读总理衙门原奏”后，也“阅之不胜骇叹”。他“特取所拟章程《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逐条辨之”，认为章程“必不可行”。

官绅阶层甚至集体抗议，“湖南京官会议：有入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郭嵩焘日记》。反对者风起云涌，致使李善兰、邹伯奇等应聘者也迟迟“引疾不赴”。然而奕䜣力排众议，主持奏订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准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进士出身之官员入学，考取者31名。

奕䜣者，满人之奇才也！同治中兴，汉人之代表为曾、左、李、胡，满人之代表则奕䜣也。奕䜣开同文馆，以徐继畬为提调官。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字健男，号牧田，道光进士曾于1848年刊行《瀛环志略》，因书中盛赞美国政治制度和华盛顿，清廷下令销毁书版。徐虽旧官僚，然其见识，不仅高于同时之林、龚、魏，连后起之曾、左、李、胡也难以望其项背，可谓新时代之先知也。

是年，洋务运动节节展开，民主共和思想亦悄然而兴。

在山东登州，蒙养学堂学生11人，学生组织共和会，宗旨为交

换知识、练习口辩、造就共和国民资格。为中国近代系统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之最早记载。以学校作政治启蒙，培育政党，此亦近代之政教合一欤？齐鲁之地于政教合一素有根柢，常能于教育中得政治之先机。

是年，孙中山出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共和之英雄出世，天命将归于民主。

(6)一部近代史，从何说起？

1867 年，严修 8 岁。

改从周玉山先生读书，始试律。

兄学试律，心羡之，遂求教曰："诗文之首句，平仄如何？"兄告之。适时自鸣钟响，严修有所悟曰："'钟响知时候'可乎？"其兄大喜，以为严修已得诗矣。又遵父命，讲解《论语》"生而知之者上也"，父听后甚喜。

次年，小严修学试律。有题为"声在树间"，得"秋"字。严修遂出第二联云："有声皆在树，无处不惊秋。"师曰："句真惊人。"

津门一塾里，小严修以小聪明"一鸣惊人"；而江南一隅，新学一默如雷。本年 6 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馆。该馆位于制造局西北隅，重楼杰阁，门外种竹万余竿，共有楼房、平房 8 座 74 间。馆内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必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

译者有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玛高温等；也有华人：徐寿、徐建寅、华蘅芳、李善兰、赵元益、李凤苞、王德钧、江衡、郑昌棪、钟天纬、贾步纬、严良勋、徐华封、瞿昂来、周郇郁、余世爵、汪振声、丁树堂、朱恩锡等。

译著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航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陆兵法、年代表、新闻纸、造船、国史、交涉公法，共 163 种，附刊 32 种。群星丽天，福祉深远，正是一部近代史，从何说起？

让我们以李善兰为例：李善兰年少时就喜好数学，15 岁读《几何原本》前六卷，为其奥妙所吸引，以为"后九卷必更深微，欲见不

可得，辄恨徐、利二公不尽译全书也”。

1852 年他来到上海，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补齐徐光启译本），罗密士（Elias Loomis）《代微积拾级》，侯失勒（John F. W. Herschel）《谈天》，胡威力《重学》、《曲线说》及棣么甘（Augustus de Morgan）《代数学》。

《几何原本》译毕，伟烈亚力叹曰：“西士他日欲得善本，当求诸中国也。”李善兰在引进翻译西著时，创造了系列中文译词。如代数学中的代数、函数、常数、变数、系数、未知数、虚数、方程式等约 30 个，解析几何中的原点、切线、法线、摆线、螺线、圆锥曲线、抛物线、双曲线、渐近线等 20 多个，微积分中的微分、积分、无穷、极限、曲率等近 20 个，以及几何学中的 60 多个名词。

这些名词以其贴切一直沿用至今。中国近代史最有价值的事业，便是西方近代科学体系的引进与确立。在这一事业中，不仅中国近代科学的先知者们永垂不朽，而且西方传教士也功不可没。

(7)“文正”劝学与孔耶“同心”

1869 年，严修 10 岁。

从沈季平先生读“四书”。

小严修修完“四书”，清廷造出第一艘轮船。

福州造船厂新造第一艘轮船，驶往天津请验。

正洋务方兴之时，直隶总督曾国藩发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以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之学为国粹，为学识之根本。

而醇郡王奕譞继倭仁之后，又向清廷奏陈《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其论时事云：庚申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而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其六条之第三条：令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教堂，公然掀起教案。

醇王的奏折交由内阁集体讨论，曾国藩参与集议，对此竟无异议；奕譞、倭仁共推曾国藩“办折复奏”，曾亦欣然从命《曾国藩日记》。

倭仁为师，奕譞为王，曾国藩以一时乡愿铸成大错。他后来所

谓“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是指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所作所为，而是自责于言行不一，于修身有缺；未能防患，于治国无方。

而教会方面，则重弹自利玛窦以来的老调，《教会新报》五期连载林乐知《消变明教论》，认为儒教伦常观念与基督教教义完全吻合。文章指出：“儒教重五伦，吾教亦重五伦”；“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者君子三戒，与吾教上帝十诫，旨有相同者”。其结论是：“耶稣心合孔孟者也。”谈到安庆教案，他指出：教案之起，实为儒者“口孔孟行盗跖”，不知耶教与儒教“教异心同”，只要认识两者“心同”，就能“息谣言，祛圣惑，消难变，坚信从”。

此前，林的先驱者马礼逊、理雅各等，曾一再强调耶教与儒教“同根共源”。马礼逊指出，中国是完全不同于南洋和非洲的国度，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学就如同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的总和一样丰富”。理雅各则更是大声疾呼：“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不是敌对的，虽然它的体系和实现受到东方社会和时代的局限……在中国的传教士应该完全了解这些（儒教）著作，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顾为民著《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孔子与耶稣”。

(8)天津教案：官绅与传教士

1870年，严修11岁。

父亲严克宽“奉檄”担任长芦纲总。

此前，每有“纲总”转任者，皆荐其接任，然累辞不就。“迨祝公爽泉莅任，以道义敦迫，始勉就职”。后又“屡次乞休，不允”。

严修颇为感慨：“数十年后，乃有行贿以求此缺者，使人有今昔之感”。而“吾父为总商几十年，遇事侃侃守正，无少偏倚，争者平，求者遂，人无间言。”任职十年，热心公益。为抚恤贫孤，四乡察访。严修亦随其父足迹遍及天津西、北郊各村庄，得其父言传身教。据严修载：“吾父遇事不避劳怨，地方长官，知其然也，每有兴举，辄先就商，旋即属之。长年设者，如育婴堂、恤嫠社、施馍社、牛痘局、施材社、惜字社、备济社、灯牌公所、书院值年之类。临时设者，如冬季粥厂，如四乡放赈，几于无役不从。”

6月23日，天津教案发生。教案起于仁慈堂，时严修父任育婴堂堂董。育婴堂离仁慈堂仅里许，严修父不虑己危，冒"戈矛载途"之险，前往育婴堂，"全堂乳妇方震恐欲逃散，闻堂董至，帖然如初"。

天津教案，俗称火烧望海楼。法国天主教会拆毁了建于康熙初年、位于三岔河口北岸的崇禧观，派遣传教士谢福音来主持天津望海楼大教堂的建设工作。教堂的基地在崇禧观的废址上，高10米，长30米，规模宏大。当时已怨声载道，加上教堂附设的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儿数十人，民间又不断有拐骗幼孩之供犯谓受教堂主使及教堂将小孩挖心剖肝以制药之传言，民众遂围攻教堂，要求严惩凶犯。

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往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派兵镇压，归途中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众怒，遂殴毙领事丰大业、传教士谢福音，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属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教士、商人20多人。英、美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出动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

清政府只好派曾国藩、李鸿章到天津查办。查办的结果，最后以杀20人、充军25人、赔款497285两重修教堂，并派崇厚到法国道歉了事。

民众反教，实为官绅引导。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指出："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岂止"从之者稀"，而且"排之者众"。传教士纷纷入境，对中国官绅阶层构成直接威胁。教会与官府分庭抗礼，挫伤了官绅阶层的政治文化；教会在中国殖产兴业，又必然要与官绅阶层争利；教会热心公益事业，则被视为哗众取宠，收买人心。

尤其是传教士主张兴科学，废科举。科举制是官绅的命根子，耶、孔之争，乃科学与科举之争。科学兴，则必废科举；科举存，则科学无立足之地。科举为皮，官绅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凡谋与教会为难者，"非进士，即举人，非举人，即秀才"。

就连当时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说了几句实话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

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也。被官绅阶层群起而攻之，曾国藩被攻而去。斥之者，谓其媚外；惜之者，谓其老成谋国，其势不得不然。

其实二说皆非也！何谓曾文正？文以立己化民，正己正人之谓也。文正议结此案，非权宜之计，亦非迫于压力。倭仁以所谓"苦心孤诣"嘉许文正，以"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为其解脱，此种乡愿的理解，实为最大的误解。对于这充满爱意的误解，他"和血往肚里吞"，什么也不说，真是"天何言哉"！

是年，严修开始习作小讲，每月逢三、八日作时文，逢六作律赋，均能按时交卷。赋试贴诗《小娃撑小艇》，得"撑"字，即对"双桡双腕软，一叶一身轻"。又赋《独坐幽篁里》，对以"居非楼十二，谢去客三千"。上句借黄冈竹楼以形容幽篁，下句则着力独坐，足见思巧。诗雅致，思精巧，可惜天津不是"幽篁"。

谣言起，暴民兴，一把火烧了望海楼，小严修知否？父亲独往育婴堂，他能不提心吊胆吗？次年春，其兄严振应县试，小严修恳请于师，允其与兄一同入场应试。一试落榜，叹曰："一出铩羽还，始知谈何易！"旋大病，废书数月，至冬始愈。小严修病愈了，可是病入膏肓的大学士倭仁，却终于"称疾"而终。

2. 入仕与入时

(1)湖湘人文精神

1872 年，严修 13 岁。

三月江南雨，一片油菜地，优美之国殇也！

曾国藩逝世，谥文正，有《曾文正公文集》传世。

湖湘之人文，王夫之开其山，以英雄之悲愿开山，故具英雄之性格。曾国藩集其成，以圣贤气象，豪杰精神集成，故具圣化之境界。至毛泽东则大而化之，以斗争哲学化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人，曾国藩心仪船山，曾氏兄弟出资刊刻《船山遗书》，使湮没了两个世纪的船山之学得以发扬，而青年毛泽

东则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入冬，祖父宇香病剧，小严修与母亲一直随侍左右。

逝前，宇香召小严修于床前，对修母说："大孙吾无忧，此儿天性薄，可虑也。"又云："马行栈道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严修忆曰："祖父喜怒，略不矫饰。……惟不喜人作尖酸语。吾少时恒犯之，祖父则大不悦。"

12 月 11 日，祖父宇香公病逝。

次年，小严修应院试，取入府学。

耶稣会总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建成，它的宗旨是"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

(2)"同治"时代终结

1874 年，严修 15 岁。

兄严振始入府学，而小严修却后发先至，又应岁试，取一等第七名。复试，有以天津八景赋诗一题，要求作者每景各作七律一首，不作者亦听其自便，小严修落笔成诗，一气呵成。

考场一帆风顺，可家里母亲又病故了。

小严修默默地随父料理丧事。这一年，进化论开始在中国流行。此乃中国不祥之兆耶？太后当家，最怕进化，她怕老，怕死，怕小皇帝进化成大皇帝，因为大皇帝不像小皇帝那样听话。

可是不进化就要挨打，连小日本也开始向中国小试牛刀。4 月，日本入侵台湾，并遣兵船至厦门，声称借地操兵。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海防。沈邀各国领事公议，竟以付日本 50 万两为了结。于是，清廷又向英汇丰银行借款。经此一吓，清廷便觉海防重要，即命沈葆桢筹划南洋海防。

而李鸿章则乘机大肆购置铁甲船及军械，筹建北洋水师。

1875 年，严修 16 岁。

1 月 12 日，同治小皇帝病亡，普天同丧。

小严修在天津观丧礼，"穆宗大丧，阖城文武祭于龙亭，余随众观礼，主祭者李文忠也。公长身黑须，长于他人头地。是为余识公面之始"《记李文忠公师》。

小皇帝死了，慈禧太后又在物色一个更小的小皇帝。

同治小皇帝死了，慈禧太后亦悲亦喜，悲的是丧子，喜的是从此可以摘了同治的牌子。老太太想独裁，在同治的名义下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其实同治早已名存实亡，两宫同治，那一宫不过尸位素餐而已；叔嫂同治，小叔子议政王也被她束之高阁；母子同治，儿子亲政没几年就一命呜呼了。

她最不喜欢变法，变法就是否定她的政绩，就是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些变法者，鼓吹君民共治，她好不容易熬到了独裁的份，那些变法者又要搞个什么议会出来与她同治，这不是存心要与她作对吗？还有洋人不看她的眼色，尤其是传教士，如林乐知等，只管把他们自家的那套政治民主化玩艺儿搬来，在他们自家的报纸上介绍西方议会制度。

儿子当皇帝，不由她选择，这回谁当皇帝得由她来选择，她最喜欢小孩了。她选了个嗷嗷待哺的小皇帝，小皇帝真乖，她喂什么就吃什么。这个小皇帝不是来与她"同治"的，而是她政治生命的光大和延续。于是，她给小皇帝定了个年号"光绪"。

她虽然不愿与人同治，但礼所往来还是懂得的，她知道洋人的厉害，便在8月份，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帮她观察洋人的动向。她认为大使的这一作用也不错，从此，中国开始派遣常驻各国公使。

(3)应试教育和启蒙运动

1876年，严修17岁。

从举人张绅学经史，国学始立根基。到辅仁书院按期应试各课，间或应问津书院月课，所作课艺常名列前茅。

当他还在两所旧式的书院之间跑来跑去，在四书五经里进进出出时，有个名叫李圭的中国人，经由日本赴美国费城，参加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的世界博览会，顺道访问伦敦、巴黎，经地中海、印度洋回国，著《环球地球新录》。

这一年的秋天，恰逢书院会考，他不负亲望，考了个第二名。

他的父亲严克宽，在天津主持牛痘局，推广种牛痘之法是法于1796年由英国医生琴纳发明；1805年，由英国船医皮尔逊引入中国。后来皮

尔逊将此法传授给邱熹，使邱熹成了中国最早的牛痘医生。1847年，邱熹进京推广此法，各地官绅起而响应，设牛痘局，免费种痘。见刘善龄著《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牛痘"。

1877年，严修18岁。

与陈奉周、宋少南游。

奉周博文通西学，少南广蓄书籍，严修获益非浅。

9月，应院试，补廪膳生明代府、州、县学生最初每月都给膳食津贴，称之为"廪膳"。清代则须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的，方能取得廪生名义，成为资深生员。

10月，娶李春玖为妻。妻极贤，婚后40年，严修有诗叹曰：

泰西新语入神州，美满姻缘要自由。
系我惟凭父母命，也成佳耦不成仇。

婚后，严修自律甚严，反对纳妾，身体力行。他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修平日持论，以女重贞节，男子亦然。若男子不入妓院，与女子不倚门卖俏，其事相类。今守此戒者不过我辈三数人，中国之男子不如女子远矣。"

严修一边做他的廪膳生，一边享受新婚燕尔。

而他后来的同事严复，此时却已飘洋过海去学海军。新兴的海军，成为培育近代知识精英的摇篮，后来的张伯苓也从海军出身，鲁迅也学过造船。

虽然各地教案如潮，可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依然活跃。

在上海他们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会上狄考文作了"基督教会和教育的关系"的发言，主张以教育的方式，"使基督教信仰和伦理渗透社会"，从而"使中国基督教化"；同时，又提出以科学为盟友，去推动"真理和正义的发展"。

1878年，严修19岁。

李鸿章在天津经营北洋实业，而上海早已成为西学集散地和新思想转运码头。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以连载的方式，将培根《新工具》，昭示国人。该书译者为苏格兰传教士慕维廉(Muirhead William，1822—1900)1846年来华，在华50年，他"闭门著书，朝夕不倦"，"共

成大小书40余部"和沈毓桂。两人"风雨晦明，一编坐对，或穷晰其理，或详译其词，或衍其未竟之端，或探其未宣之蕴"。费了十年功夫，两人才译完《新工具》一书，题名《格致新机》，由广学会出版见邹正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几何原本》和《新工具》译本，将西方科学的"大本大源"和盘托出，狄考文等对学生进行民主启蒙，又播下了西方人文精神的种子。而此时的严修，仍然汲汲于仕途，埋首于时文。

(4)文化进化与学术新路

1879年，严修20岁。

进化论在中国开花，清政府也在进化。

借债的手笔越来越大，左宗棠西征要钱，李鸿章建海军要钱。老太太还总惦着要修颐和园。于是，对外举债一发不可收拾。刚向德国借了250万马克，又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615万两。反正债多人不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债时不妨拆东补西，以夷制夷。

不过中国确实在进化，中华老骆驼还有硬脊梁：北有同文馆，南有翻译馆。翻译馆里还有李善兰，译完《几何原本》后九卷，又译了《代数学》、《重学》等著作，然后将全副精力投入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翻译中。

他的合作者傅兰雅叹为观止：此书甚深，而李君亦无不洞明……花了约10年的时间，他译出《奈端牛顿数理》初集14卷。未竟之业，半个世纪以后，由留德学生郑太朴续成。梁启超叹曰："闻理太奥赜，李壬叔李善兰亦不能译云。"见《读西学书法》"近译未印各书"

是年，严修应乡试未中，"试前，公李鸿章试决科于辅仁书院，而余第一名，因识余名"。长子智崇出生，严修初为人父。可父亲却病倒了，经冬不愈。

1880年，严修21岁。

5月，父亲病故；9月，安葬父亲灵柩。

祖父、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两兄弟相依为命。长兄如父，大哥严振挑起了父亲留下的担子，辍学经商。

严修治学，开始自辟新路：从清人考据学起步，于经史子集登

堂入室；从中兴名臣奏疏入手，揣摩与历练经世致用的功夫；从天文、算学出发，走向近代科学。是年，“公习天文、算学，得陈奉周之益为多”。

此后，他更加孜孜不倦，“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供职翰林时期，在京寓五老胡同，“每夕与陶仲明、王荣卿同习”；贵州学政任内，“同学者为李莼田”，两人互相启发，“数年蓄疑，今稍豁然”；辞官家居时，“与张伯苓互相探讨，至是乃益贯通”见《蟫香馆别记》。

这一年，他开始记日记，关心国计民生。

7 月 15 日《日记》云：“奉周兄言，北阁内有米面铺某姓，新做一自行磨样，尚未果用，先以泥土小试，大概不如洋人所制之捷，而损坏易于检修，可省两驴一骡，用三骡足矣。又可省骡官一。盖该铺曾受骡官欺，故出此计。”

了解百姓日用，具体而微，其经世之心，于此可略见一斑。

(5)曾、李比较与北洋实业

严修关注米面铺的小生计，而李鸿章却在天津大展宏图。

曾国藩曾说：李鸿章一心要当官。说得不错，可是语焉不详。

曾、李两人都当官，可有一点不同，曾把官当学问做，李把官当生意做。官当学问做，不仅把政治做成文化，连实业也做成文化；官当生意做，不仅把政治做成实业，而且连文化也要做成实业。

曾有圣人气象，而李则更像商人，一方水土，一方人物。

近代湖湘之民，如秦耕战之士；近代湖湘之士，多是子贡、子路辈。其民，非豪杰不能用；其士，非圣贤不能聚；文正兼而有之，故能聚其士而用其民，开洞庭圣化之风，启岳麓帝王之钥，引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

而安徽出皖学，亦出徽商，连学者也带商人气，何况官僚？

故李合肥善与商人打交道，观其兴实业之种种举措，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或两者交替并用，总之不离一个商字。以官为体，以商为用，这八个字，便是他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在天津最有市场，天津本来就是天子码头，官僚商埠。

在北京当官，在天津行商，成为京畿之地一大风水。

连外国人都知道，与清廷打交道，要到天津去。天津不仅是耀武扬威最有效的地方，而且是权钱交易最便利的场所。因此，老外总是在天津放出胜负手，两次鸦片战争，还有后来的八国联军，天津都成为全局的要点。

这样一个要点，其实不需要做学问的圣人，它需要一个会做生意的商人。曾国藩一到天津就被人泼了一盆脏水，天津教案成了他的一个历史污点。清廷让他出局，实在是爱惜这块圣人招牌，因为这块招牌已经成为同治中兴的一个标志。他要在天津呆下去，这个标志必然会玉碎而成为失败的象征。

后来的李鸿章，就是一个失败的象征，他的名字，几乎成为丧权辱国的代名词。然而他的失败，虽令王权式微，却使天津欣欣向荣。北京拒绝了洋务，他把洋务都留在了天津。好在天津近在咫尺，京官们来天津追赶时髦倒也方便。

这一年，他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又奏请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以严复为总教习，设驾驶、管轮两班，培养海军。后来，张伯苓就进了这个学校。

天津机器局还试制成潜水艇一艘，可由水下发射水雷，行动灵活。机器局分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大直沽，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东局以制造火药、枪炮、子弹、水雷为主，西局以制造军需器具、物资和开花子弹为主。其常年经费由天津、烟台两海关拨用“四成洋税”，每年约 30 万两；后来，李鸿章又从户部西北边防饷内争取每年增拨 1 万两，将电报学堂和水师学堂附设于东局。

海防有些模样了，他又开始筹建铁路，实现他将矿山与港口连接起来的梦想。

1881 年，严修 22 岁。

6 月 9 日，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建成通车。当小火车呼啸着来回运煤时，一阵风将鸣笛声刮到东陵，守陵的官员吓了一跳，立即上报朝廷，说火车惊扰了先皇的在地之灵，坏了帝王家的风水。慈禧老太太好清静，马上派官员去交涉，于是，火车改成了马车。马拉火车，成为王权主义下中国近代化的一个笑话。李鸿章的筑路建议，被以醇亲王为代表的京官们做了一个结

论："祸国殃民，莫大于是。"

不过，天津水师学堂还是成立了，天津电报总局也开始营业。到了年底，上海、天津陆路电线通电，近代化的光明已初露端倪。

此时，恰好张佩纶(1848—1903)直隶丰润人，字幼樵，号绳庵，又号篑斋。同治进士，光绪元年以编修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来到天津，主持问津书院，任该院山长。山长是书院主持人，由硕学之士充任，其名始于五代，从宋至清，一脉相承。张是名噪一时的清流人物，对于书院很是热衷，谈起学问头头是道。他是个喜欢当导师的人，很注意发现人才，一眼就看中了严修。他从书院挑选 10 人，往谒李鸿章，严修名列其中。李鸿章也想通过张来改善与清流的关系，因此放下政要人物的架子，来接见这些乳臭未干的小才子们。

这是严修第一次接近李鸿章，他原来远远望见，很有些仰之弥高。不过，他在日记里却以不动声色的笔墨记载了这次接见：

> 辛巳丰润张篑斋师来主问津书院，就所取前列诸生十人，往谒文忠(李鸿章)，余与焉。公一一问姓名，各问数语而出，是为余随班谒见之始。

从此，他一直以李鸿章为师。

对于张佩纶，他更是感激不已。张批严修卷曰：五艺再求典实，可借书更作之，幸勿以征逐之故，荒其本业也。严修如命更作，并屡为人诵此批，谓后日幸获寸进，微师督责之力不及此。

(6)严修中举与"张门"问学

1882 年，严修 23 岁。

元月，《申报》首次刊载新闻电讯。

上海公共租界电灯公司发电，技术改变了历史，物质文明光芒四射。国人以新技术编古籍：用石印技术影印《古今图书集成》。

科学巨星陨落，国人熟视无睹：数学家李善兰卒！

父丧期满，严修再应顺天乡试，结果富于戏剧性。

同考官程午坡先生，阅严修二场经艺卷，叹为典核华赡。

头场首题为"子曰雍之言然"，公以偃陪作起讲，程初阅未荐，

至是复阅，知非恒流手笔，即为补荐。主考官徐桐，阅严修经艺卷后，“击节称赏”，已定首选。然而第二场为《礼记》题：“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严修误将“雨霜”二字颠倒，群相惋惜。副考官孙公力争，毕公亦以为然，故仍列正榜，惟名次稍抑。遂定为第一百九十一名，复试列一等第十六名。

严修日记对此亦有所追忆：“壬午榜发后，余随同年十余人谒徐荫师。”徐一一询问，问到严修，“师作惊讶之声曰，可惜失一解元，非房师力争，并正榜亦不可得矣”。严修始知二场题字误写，“例应被贴而未贴，例不应中而竟中也”。

“壬午秋捷，覆试后旋津”，而此时问津书院山长张佩纶已赴京。严修未见山长，便去拜谒李鸿章师：“投谒公于署，公方以夺情权直督，延见于煤气灯下，温语问讯，并教余陈写殿试策及调墨之法，是为余独对之始。”灯影里，一老一少，侃侃而谈。

1883 年，严修 24 岁。

新年伊始，次子智怡出生。

欣喜之余，他赴京应会试。一鼓作气，考中进士，选庶吉士。

庶吉士，又称庶常，始设于明洪武年间。初，择新进士俾观政于诸衙门；永乐二年后，专设翰林院庶常馆。选进士善文学及书写者入馆学习，其名取自《书经》：“庶常吉士”。在馆学习期间，无俸禄，仅给酒馔房舍及纸笔膏烛之资。三年期满考试，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等官，谓之留馆；次者出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谓之散馆。清初于殿试后举行，后改在朝考之后进行。

次年，为应考留馆课，严修拜谒张佩纶。张为之论学术之要旨云：学人之精力，两事困之：一经学也，二词章也。其言治经，惟《皇清经解》可资，宋元明书万不必看，乾嘉诸老断不能超。又言通经实不足以致用，“在乎博览而已”。经学以小学为入手，小学不可不讲。若夫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史以前《四史》为要，《通鉴》宜读，《明史》宜读，读之则斐然博雅之人矣。

严修初闻此论，颇受震撼，从此治学转入时务一途。其学虽博览，但以实用为主，受张之诱导盖不鲜也。受了张的鼓励，严修意气风发，赴三河，借居盐店读书。临行前他赋诗明志：

世事艰难少不更，悔从纨绔度生平。
宴安况味真无赖，剩窃工夫浪得名。
知耻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虚声。
男儿胆气须磨练，要向风波险处行！

《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口占留别陈奉周"

3. 读书与交游

(1)通史致用与格物致知

1884 年，严修 25 岁。居三河盐店，埋头读书。

这一年，他读书甚多，不仅涉猎古今，而且学兼中外。

史书，他读了《史记》、《汉书》、《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国朝先正事略》、《圣武记》，阅读范围从古史到清史。

小学则以《说文》为主，兼及《尔雅》、《广雅》、《经籍纂诂》，从识字入手，立学术根柢——实事求是，追随乾嘉诸老治学理路。

在科学方面，于数学有《勾股举隅》、《勿庵算术》、《数理精蕴》，医学有《伤寒明理论》、《医学源流》，实学有《梦溪笔谈》、《齐民要术》，又有《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知数理，明生理，通物理，开物成务，裨世之用。

读诸子书则儒道互补，《荀子》、《列子》并读；荀为儒之变者，列为道之变者，荀一变而有韩非、李斯，列一变而有黄老、方士，变则通，通则久耶？又读《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以洋务修齐治平，为近世儒术之又一变者欤？

严修居三河，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有感旧诗云：

二十年前此地生，吾亲犹着彩衣行。
而今霜露增悲感，零落惟存我弟兄。

严修治学，哥哥经商，经商不忘诗书，治学不离实业。

此时，张佩纶风头正盛，向朝廷进言屡中。是年，奏请武科举改试洋枪。不久，潘衍桐又奏请仿照翻译例，另开艺学科，凡精工制

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御史方汝绍请开医学科，清廷不知所措，命毋庸再议。8月，清政府对法宣战，张佩纶投笔从戎。

一面是兵戎相见，而另一面则强调文化和解。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自西徂东》在香港刊行。分仁、义、礼、智、信五集，主张中国跟着传教士"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然后"自西徂东"，与中国"儒教之理同条共贯"。

（2）书生误国：谈兵与用兵

1885年，严修26岁。读书期间，两次游盘山。

盘山位于天津蓟县城西北12公里，为燕山余脉，平均海拔500米，主峰864米，风景有"三盘之胜"：上盘之松，中盘之石，下盘之水。2月，严修第一次游盘山。

盘山万松寺，传为唐代名将李靖所建，原名李靖庵。后来，和尚见一小牛在山坡吃草，草随吃随长，和尚心知有异，于草下掘出聚宝盆一只，投一钱入内，顿时铜钱满盆。和尚外出，将盆埋于松树下。次日回来，满山皆松，不知宝盆何在，故名万松寺。传说不胫而走，来者络绎不绝，该寺遂为京畿之福根。

严家背靠盘山行盐，得江山助，得风水助，可得宝盆之助？

严修携友而来，不问宝盆，却求"清心"二字。登盘山，至十八盘，见荣禄所书"捧日摩天"诸字，皆长六七尺，威风凛凛，炙手可热，可谓书如其人。盘山附近蓟县有独乐寺，相传安禄山在此起兵叛唐，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

与友同游，见苍山负雪，期冰心玉壶，不亦乐乎！从盘山回三河，他结识了世交之子赵元礼字幼梅，两人一见相知，乐莫大焉。

后来，赵元礼为严修序《蟫香馆手札》云："乙酉正月，余十八岁，始于三河盐馆与严公范孙晤面，其时公年二十六岁，故公赠予诗，有'论交君是丈人行，论齿君输八岁强'之句。予时习举业，公则以庶吉士来三河，预备来年考试留馆之课程，同居几一年焉。先君梅岩公与公令祖宇香先生为患难交，故公之尊人称先君为叔。予与公三世交谊，欣戚与共，非他人之比；公待予笃厚，亦非他人之比。"

4月，严修偕赵元礼等二游盘山，一在风雪中游，一在春花中游，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他想起了恩师张佩纶，一种官运无常的莫名惆怅油然而生。

张佩纶学主实用，喜言兵事，好论时政，与张之洞为当时风云人物。张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一时蔚为风气。而"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连枢臣王文韶也被他"两疏劾去"。

其时，日吞琉球，法图越南，佩纶曰："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因请建置南北海防，并招刘永福黑旗军为己用，又荐道员徐延旭、唐炯知兵堪任边事。其后，论兵屡中，为世所重。而枢臣方议和局，虑其梗议，故差往陕西。

不久果如其言，法兵齐集，和议遂成空文，而"越事益坏"。故招归，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其后，朝旨以闽事亟，命张会办福建海疆事。纸上谈兵还行，临战却无方寸。到了船厂，他不顾各舰管带反对，"环十一艘自卫"；又以为越难未已，黑旗犹存，法万无分兵东来之理，故作高枕无忧状。法舰集，战书至，他视若无睹，众闻警，有亟请备战者，则叱出。他盛气凌人，事皆专决，视闽浙总督何如璋等若属吏，何等慑于气势，怯懦无所主。

然而当他看到法舰真的开火时，竟毫无主张，只会逃跑。

他先跑到鼓山麓，被当地乡民拒之门外，他大喊："我会办大臣也！"没人理他。接着跑到彭田乡，不思再战，却干起了舞文弄墨的勾当，饰词上奏，竟得犒赏，命兼船政。何如璋随后也逃到彭田乡，他怕敌兵跟踪而来，花言巧语将何骗走。

他推荐的徐延旭、唐炯，和他一样临战而逃，皆被论斩。而他却"止夺卿衔，下吏议"，特别优待。"闽人愤甚"，群起而攻之，"至是再论戍"《清史稿·张佩纶传》。本来他春风得意马蹄急，没想到跑到海边马失前蹄。这一跤摔下来，不仅摔得他身败名裂，而且摔得他心灰意冷。当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全凭着一股书生意气，哪有半点实战经验?! 经此一跌，始知慷慨论兵易，从容就敌难。

当国人皆曰可杀时，李鸿章伸出手来拉了他一把，"遂得保首

领以没”。严修也很想帮他，据张佩纶《涧于日记》载：“严范孙吉士书来论刻《北学海棠课艺》，并告子涵，欲集赀为余纳罚锾求归。”其时，张以罪遣戍察哈尔，时次张家口。

遣戍后致力为诗，其诗于苦难中大放异彩。多难兴邦也兴诗，就诗之客观性言之，诗得江山助而兴；就诗之主观性言之，诗得苦难助而有神。其诗取法苏轼，而有苏轼之洒脱，兼得李商隐之婉丽，王安石之雄健。时人称其诗“与张文襄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诗笔剽健，所谓精悍之色，犹见眉间，与凄惋得江山助者，兼而有之”陈衍《近代诗钞》。

次年即释还，鸿章延入幕，以女妻之。有好事者戏为联：“北洋赘婿”，“南海冤魂”。有手录之者，严修“促删去之”《蝉香馆别记》。

中法之战后，李鸿章尤重海防，天津遂成北洋重镇。

2月北方，天道肃杀，就在严修于万松寺求见“清心”二字时，李鸿章却在北洋埋下了他的聚宝盆：继北洋水师学堂之后，又开设北洋武备学堂。此后，北洋新军便在这两个学堂里生生不息。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中国文化》刊行，文化比较成为一时之显学。

（3）学术渊源：“为续东莱博议篇”

1886年，严修27岁。任翰林院编修。

是年，与赵幼梅往来书札颇多，言其治学之道：一从《说文》入手，立国学根基；二从《通鉴》入手，通古今之变。

> 《说文》似须将全部九千余文尽数识之。再尽数解之。……不半年可全识。一年之后，可以全解。
>
> 《通鉴辑览》尤责定为准课，排日为之，不可一日间断。……公试为之，三年之后，不可量矣。

对于应试时文，他认为不从经史来，断不能工。“若能从根底上立定工夫，熟于经，熟于史，熟于古文、诗词，其脑中别有一番气象，下笔时便不从人，名世可，传世亦可，不只能掇拾功名而已也。”

对于“无不欲其早成名”的“朋友之望，师长之期许”，他主张

“自己当有一准注意，每日应温经若干，应读史若干，不少间断”，临场更应坚持不懈，“夫温经读史，亦为其少有益腹笥耳，岂有临场之前，反禁止者哉？”又赋《呈幼梅丈》诗云：

周末于今岁二千，春秋通鉴事钩连。
好当红袖添香夜，为续东莱博议篇。

“东莱”，即宋东莱先生。东莱先生有两人，大东莱吕本中，小东莱吕祖谦。其学与朱、陆同时，“皆不甚合”，朱子格物，陆学明心，吕学折中，而归于中原文献之统，全祖望称之为“吕学”《宋元学案》。

小吕虑朱陆异同，故发起鹅湖之会，为思想史留下一段不世之奇缘，为思想者传一篇千古之佳话。其学以人名，则为“吕学”；以地望称，则为“婺学”。当时“婺学”最盛，东莱性命之学，龙川陈亮事功之学，说斋唐仲友经制之学，皆盛极一时。明人杨维桢云：婺学在宋有三氏，东莱氏以性命绍道统，说斋氏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以王霸之略志事功《宋文宪公集序》。

吕学以“正心诚意”为本，其祖吕希哲为哲宗说书，“言正心诚意，天下自化”，大东莱吕本中以为“人君之学，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于本体安身立命了，就能“自作主张”，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

朱熹批评吕学“不能守约”，其实吕学之“约”，恰在“自作主张”四字。严修一生“自作主张”，其学术之根柢，与“东莱博议”相通。

吕学入手处，在由经入史，小东莱作《左氏博议》，“言性命必究于史”。朱熹对于史则很不以为然，他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严修治学，由经入史，此虽由张佩纶启发，亦由其为浙东之裔，天性便易于取法东莱，文化认同中乡土观念也很重要。严修通史致用，与“吕学”如出一辙。

小东莱提出“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当于读史中求之。因此，他对历代“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等进行考察《历代制度

详说》。对此，陈亮推崇备至："伯恭吕祖谦规模宏阔，非复往时之比，钦夫张轼元晦朱熹已在下风矣。"《龙川文集》卷二十"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

严修续东莱之学，续的是调和、实用四字。调和百家学说，却要自作主张；通古今变化，要不离百姓日用。对于传统理学，他持调和朱陆的立场，对于近代文化，他持调和中西的立场。在经世致用方面，他从传统史学出发，走向近代科学。传统史学强调资治，为帝王之学，而近代科学则提倡教育与实业。

严修将治学心得和盘托出，赵幼梅喟叹"感恩知己"！

严修在京居住期间，除应庶常会课、做诗外，还影临皇甫诞碑（全名为"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志"，碑书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欧阳询少年得志，"宜其文采之流丽，而神情之愜适，与其暮年老笔奉敕矜持者不同也"《墨林快事》。严修临摹欧阳询，其心情亦与当年之欧阳询惟妙惟肖。

是年，来往人物以师友相会者有李鸿章、李鸿藻、翁同龢、徐桐，以及翰林院教习陈砚塘等。属同年者有徐世昌、周乐山等。属亲戚者有华璧臣等。

(4)自律与国律——"公"、"平"

1887年，严修28岁。在京，有时难免放浪形骸。

2月7日，严修至清秘阁听戏，酒后欢呼，丑态百出。既回会经堂，复为赌局，大呼小号，通宵达旦。醒后思之，悟"人禽关，生死关"。故凛之戒之：自今日始，饮酒不得逾十杯，不得赌博浪唱。

御史陈琇莹，奏请将通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礼部与总理衙门经再三考虑，认为试士之例未容轻易变更，但准予正场考试之外加试算学，并酌准额外录取。旧瓶装新酒，新事物尽量往旧体制里装。装的方法是一减一加——"损益"，过了就减一点，不足则加一点，因此圣人胸有成竹——"虽百世可知也！"

曾纪泽不是圣人，但他是曾国藩的长子——"得圣人之一体"。他用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提出"强兵"优先于"富国"。此文在伦敦《亚细亚评论季刊》上刚一发表，香港《德臣报》马上转载。

何启、胡礼垣立即撰文《曾论后书》，认为中国尚未觉醒，治国的基础在内政而非外交。内政的根本在"公"、"平"二字，"公与平，即国之基址也"。提出以"公"、"平"取代中国政治的"偏"、"私"，"公"、"平"则民主，"偏"、"私"即专制。

当时在京城的严修，正忙于购置五老胡同新宅安顿家属。

林墨清（1862—1933）天津人，名兆翰，号更生从天津来，居京多日。林十八岁丧父，承父业，以行盐为生历任天津盐商晋德茂店穆家、长源店杨家、吉恒丰店张家、永立昌店崔家、益德店王家、同德店严家等各盐店职务。在严修的帮助下，他行盐不忘读书，其时考入天津县学为生员，县试第一名，院试仍居第一，后来，他成为严修从事实业和教育的得力助手。赵幼梅亦入都小住，故友重逢，相谈甚欢。

是年，严修读书，点《说文段注》，温《诗》、《易》、《论语》，读《史记》、《文选》最勤，阅《明史》、《呻吟语》、《野获编》、《琴普》、《近思录》等。又研讨《数学理》、《数理精蕴》、《九章算术》。

至今《日记》中仍存有严修当时绘制的河图、洛书图、先天后天八卦方位图、十二宫及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征图，又有行星、四时、日月蚀图及几何各图，车舆及《考工记》名器图。其时，严修于《易》义理、象数之学，音律，天文，算学及礼制、器物等，几无不学。

(5)中兴气象：修园、藏书与筑路

1888 年，严修 29 岁。衰世多滑稽，国运如儿戏。

玩了一把马拉火车的游戏之后，清政府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设立水师学堂，专门培养八旗子弟海军人才，并兼宫廷供奉。明明要修园子，偏要先设水师学堂，水师学堂设在园子里，也就算是练海军了，马马虎虎可谓名正言顺。在园子里练海军，虽然可笑，但只要老太太高兴，光绪君臣也就算尽了孝道。

老太太在北方修园子，而南方浙江一带，则大兴藏书楼。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在浙江瑞安建"玉海楼"，藏书八九万卷；陆心源在浙江归安仁寿铺建阁五楹，名"皕宋楼"等，藏书一万余卷；杭州建嘉惠堂、八千卷楼。藏书楼的兴起，与当时图书大量刻印有关。而图书大量刻印，主要使用西方石印技术。石印技术解决了石印机的

动力问题，提高了印刷速度，使印刷书籍产业化。

石印术是捷克发明家塞尼菲尔德于1799年发明的。1816年，掌握石印技术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来到马六甲，协助在那里传教的马礼逊、米怜等人印刷宗教宣传品。1833年，石印技术从南洋传来。在中国成功运用石印技术的是英人美查兄弟，他们在上海创建的点石斋印局，成为石印技术在中国的代表。“石印书籍之开始，以点石斋为最先”姚公鹤《上海闲话》。

美查(Ernest Major)英国商人，报业资本家19世纪60年代初，随兄来华经商。1872年，在上海与三名英人合股创办《申报》；1876年，创建点石斋石印局。此外，美查还建有申昌书局、图书集成书局，致力于印书业务，出版《点石斋画报》1884年创刊，随《申报》附送，也单独发售，吴友如负责编绘，1894年停刊等刊物。

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刷4万部，没几个月就售罄；第二批印6万部，刚好举子北上会试，路过上海，每人买五六部作为自用和赠友，很快又售罄。石印技术带动了中国印书业的革命，石印书局也纷纷兴起。

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也终于修成。其中的曲折艰辛，非今人所能体会。修路之难，不在工程，而在文化认同，据说修铁路会破坏农业文明的风水。自从“筑路风波”以后，李鸿章便一直顶着“祸国殃民”的帽子，准备以天津为起点修路。英国商人想承揽筑路工程，便在紫竹林附近，临时铺了一条铁路，让李鸿章请天津的商人来坐一下火车，此举果然有效，他们发现火车确实比马车快得多。

而朝廷方面，因“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的刺激，加上李鸿章以海军军费助修颐和园，故奕譞等转而支持李鸿章，以“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艰”为由，奏请先修津沽铁路，再延伸至山海关一带。于是，很快就以天津为中心，开始了全国的筑路工程。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亲自指挥了这一筑路工程，在天津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车站——老龙头火车站。

后来，工程南下，修了津浦铁路；工程北上，终于将皇城捅“漏”了。当火车穿透城垣，隆隆地开进北京时，大清朝的“王气”也就随之而泄。经济效益产生了新的文化认同，连慈禧老太太也乘着专列

来赶时髦了。这一年，李鸿章踌躇满志，铁路修成了，海军也练成了，他似乎功德圆满，要成为中兴的代表了。可是福兮祸之所伏，且不说他修的铁路是否泄了大清朝的王气，但他练的新军后来却真的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是年，严修也从众多应试官员中竞得考试差。

考试差是清制选派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的一种考试。清代原各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由礼部、吏部共同保举的翰林、六科及各衙门堂官中遴选派出，后来由于中试之后荒疏课艺之业而不能文者颇多，故将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各部院官员，召集太和殿进行考试，称为考差。从雍正三年起，各时期考试内容不同，嘉庆后定为四书文一篇，五经文一篇，诗一首。试卷密封，由皇上派大臣评阅，然后钦定一、二等，封贮于内阁中，以备乡试差遣。有趣的是，该年竞得考试差、初任考官的严修，后来竟主张废科举。

表兄宋少南去世，他赴津吊丧。吊挽联云："是解人，是快人，是棘手人，是热肠人，真雷霆精锐，冰雪聪明，君一生慕武亿、汪中，《述学》、《授堂》悲命短；能知我，能谅我，能督责我，能护持我，念骨肉关连，腹心寄托，吾两个似巨卿元伯，素车白马恸来迟。"

戊子乡试，总理衙门开算学科，破天荒取中举人一名。

康有为也来京城应试，他来到京城，却给即将亲政的皇帝上书："（日）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好像儿皇帝接的不是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兴的盘子，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大喜临门时，他像乌鸦一样，发出不祥的预言，被严修的的座师徐桐斥为狂生。康长吟"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便拂袖而去。

(6)天地之刑：汪氏"人口论"

1889 年，严修 30 岁。

3 月 4 日，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归政。

严修卯时起身，进宫内庆贺，随班行礼。

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以"现造铁路，其所入不敷养路之用。如接造此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

费”，说服李鸿章。此议一出，举朝骇然，谏止者众，故诏罢其议。

张之洞上书言筑路之利：“有事则以路征兵，无事则以商养路。”然通州近龙庭而扼命脉，加上太后归政不愿生事，皇帝亲政大行婚礼，因此，津通之议束之高阁，“之洞特创卢汉干路之说，调停其间”。李、张遥相呼应，奕譞疏通赞助，浮议始息，其事始定。

李鸿章致书张之洞，谓“宜速开办，免生枝节”，之洞深然之。

5月，严修又竟得考试差。三年前他已由散馆改编修，例得考试差，而此次试毕，即膺选充任会典馆详校官，充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

是年，汪士铎，这个乱世的“铃铛”，作法自毙。

汪1802年生，字振庵，江宁人，道光举人论兴亡，主“人口论”：将“世乱之由”归之于人口太多。人多而“无田可耕”，不仅外部资源日枯，人本身亦“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因而，“天地之力穷，人事之权殚”。“天地之大刑曰杀”：不仅要杀长毛，还要溺女婴，诛九族，斩立决，更要重僧尼，禁再婚，必要时不惜兴灾疫，只要减少人口，可以不择手段。为此，他提出用申、韩之权术、孙、吴之兵法来“辅孔子之道”。

晚年，他深居简出，以种花自娱，曾文正叹其雅洁——“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以理杀人”，不妨拈花微笑；曾文正悠然兴会，不愧为“曾剃头”。

而商人子严修，读书之余，却把一个优美的旋律抱在怀里：

音音音，你负心，真负心，孤负俺到如今。记得当初低低唱，浅浅斟，一曲值千金。秋风荒草白云深，断桥流水何处寻。如今抛我在古墙阴，凄凄切切，清清冷冷。

这一年，他看了很多戏，以至于“连日溺于此事”而“未能自禁”。尽管他也以“非义速已，孟氏所诫；闻义弗徙，圣人有忧”来自责，但他的这一嗜好，却影响了中国新戏剧。

这一年，他读了很多书：《诗经》、《书经》、《左传》、《易消息》、《广近思录》、《庄子》、《文中子》、《汉书》、《明纪》、《平定粤匪纪略》、《经史问答》、《天文启蒙》、《格致启蒙》、《梅氏丛书》、《数理精蕴》、《九数通考》。张伯苓13岁，入北洋水师学堂，习西学，严复任校长。

(7)政治文化:修园、建庙、救灾

1890 年,严修 31 岁。汤寿潜《危言》成书,主张变法。

这一年的风水和气运,竟被他不幸而言中,一个"危"字,可谓画龙点睛。

光绪帝是个悲剧性人物,亲政伊始,他的父亲奕譞就病入膏肓,不久便呜呼哀哉。婚礼之后接着就办丧事,婚礼是政治,丧事也是政治。先要定称号,根据"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的古义,求"尊亲两全",乃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接着定祀典,新赐邸第,建醇贤亲王庙,"祀仪、乐舞、祭器、祭品视天子礼",规定"凡时飨以四仲月朔,袭王承祭。帝亲行,则袭王陪祀。诞辰、忌日,帝亲诣行礼"《清史稿》"礼志五·吉礼五·醇贤亲王条"。

祸不单行,自 7 月 15 日起,直隶地区大雨狂风,连宵达旦,足足一星期,山水奔腾而下,漫溢永定河、南北运河、大清河,溃决堤防,百里之地,一片汪洋。接着又阴雨连绵,旬月不已,京畿一带,水势盛涨,右安门、永定门外数十村庄被淹,房山之水,冲入浑河,东安、武清、良乡、涿州等地,水深数尺,路断行人,灾民嗷嗷待哺。正是"水近高楼伤帝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清廷命顺天府府尹潘祖荫,酌拨银两,雇募民船,速往救济。

又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天津就地征粮,速运京师,平抑京师粮价。然而天津等地灾像亦成,需筹款急赈,清廷又拨银 6 万两,并将奉天运京粟米 12700 余石,本年江北运河漕米 36000 余石截留备赈。天津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号称七十二沽,是个浮在水面的城市,九条大河在天津汇流入海,只要降雨量大,河水必在天津泛滥成灾。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能带来繁荣,也能带来灾难。这场大水使多少人家破财,严修一家也未能幸免。

严修日记载:"连日又雨数次,居室十余楹,漏痕殆遍。春日读书之庐,变为沮洳矣。忧心皇皇,如濒大难。""到月波家始知其居室将倾,全家徙矣,有老仆守门。"

奉太后懿旨发内帑银 5 万两赈灾。于是,严修"随同乡京官谢颁发节省内帑,赈济顺属水灾恩"。感恩,是一种政治文化。

当严修等山呼万岁，以谢圣恩时，老太太自然是风声、雨声、谢恩声，声声入耳。可是另一种声音，却使她恼羞成怒。御史吴兆泰上奏折，请停修颐和园。老太太一怒之下，著交部严加议处。

本来老太太花几万银子，打发一下灾民，虽然杯水车薪，也算是聊表寸心。可这吴御史却当真，竟得寸进尺，要停了老太太修园子，不教训一下怎么行！灾民遍野，又不是老太太一个人的事，不光是老太太在修园子，内阁学士张之万寿辰，京官们不也在福寿堂演戏公祝，弹冠相庆？严修亦步亦趋，凡事跟着走。感恩他跟着去，祝寿他也跟着去，吴御史倒霉了，他似乎无动于衷，并没有跟着去倒霉。此时的严修，在政治上还缺乏自我意识，还不能自立。

李鸿章因水灾严重，赈款难筹，请推广赈捐，下部议行。

赈捐一行，各地赈银便陆续汇来。先是两江总督曾国荃电汇赈银 9 万两，计天津 6 万两，顺天 3 万两；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汇天津、顺天赈银各 1 万两；安徽巡抚沈秉成筹解顺天、直隶赈银各 2 万两。清廷风闻放赈款有发银 700 两到银 200 两，命李鸿章严查侵冒克扣，随时惩办。又命户部拨部库及海关银 30 万两，济永定河工。

水势渐渐平息，灾情慢慢缓解，流民又安顿下来，一切又回到了原样。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文化是自私的，应以基督教文化取而代之。国难当头，光绪帝为父修庙，虽然是祖制，但这制度的原则却是自私；老太太要修园子，当然就更是不折不扣的自私了。这还是登上大雅之堂的自私，至于那些如蛆虫般蠕动的阴沟里的自私，就更是数不胜数、防不胜防了。

制度化的自私，如皇帝为祖宗修庙，那是要提倡的；权威性的自私，如老太太修园子，可以问一问，但问者多半要倒霉。至于那种鸡鸣狗盗的自私，如贪污中饱、克扣赈银等，则不妨揪出一两个来，杀鸡吓猴。中国政治文化的奥妙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上了规模与档次，强盗也能当皇帝。“窃国者”要诛“窃钩者”，对于像马铃薯一样自私的民众，则不妨用一个“大公无私”的袋子将他们都装进来，比如，让自私的民众自愿来救灾是不行的，可是用一个“赈捐”的袋子就把他们都装进来了。

皇帝很忙，丧事要办，水灾要救，外交要管，洋务当然也不能停。驻英使臣薛福成奏请“宜循同治十二年成案”接见各国驻京公使，“若论礼节，可于召见先敕下所司，中礼西礼，假以便宜。如是，彼虽行西礼，仍于体制无损”。光绪帝接受建议，“自是遂为定例”《清史稿》“礼志十·宾礼·外国公使觐见条”。詹事府詹事志锐奏请出使美、俄、英、法、德五国大臣每届酌带同文馆学生两名出洋专习语言，方便之事，何乐不为？于是光绪帝又准了。

中兴名将曾国荃、彭玉麟等先后凋零，中兴时代也随之而去，留下一个李鸿章，“久忧不死，何苦也”！历史翻到了变法的一页。

(8)帝国小聪明与“大炮上晒裤子”

1891 年，严修 32 岁。

光绪帝打算在筵宴藩属的紫光阁接见各国使臣。使臣异议，遂改在文华殿接见，帝国小聪明竟难以得逞。

对于异族，中国人能接受武力征服，却决不对其文化认同。武力失败了，便以精神胜利法来保存国粹，高扬文化的价值。其结果往往是蛮夷小邦能以铁蹄征服中国，却不得不在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前低下头来，不知不觉地被同化。可列强不是蛮夷，他们不仅武力优胜，而且精神优胜，对于光绪帝的精神胜利法，他们先是嗤之以鼻，继而提出抗议。

帝国的精神胜利法，受挫于文华殿，于是年轻的皇帝开始学外语。皇帝带头学外语，在当时可是新鲜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政治，后来的变法，便从这学外语开始。皇帝的立场一变，反映在文献方面，便有《国朝柔远记》王之春编，叙述 1644—1874 年清朝对外交涉史事改名为《国朝通商始末记》。

再说落第秀才康有为，上书未果，愤愤而归，遂开万木草堂广州长兴里讲学，率弟子著书立说。不久，《新学伪经考》问世，提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贾逵、许慎、马融、郑玄之学，踵接刘歆，皆非汉学，宋人所述之经，亦非孔子之经。

此说一出，清学正统派立场根本动摇，一切古书亦须重新审查，兴起“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陈千秋、梁启超“闻有为说，则尽

弃其学而学焉”。梁启超论其师曰：“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清代学术概论》

书出之后，即遭清廷之忌，命毁其版，禁其书。其后有崔适者，“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又有“古史辨”者，继起而发扬之；继有为以辨伪摧毁经学体系之后，又将辨伪的锋芒指向传统史学，从而瓦解了正统古史体系。

浙东宋恕《六斋卑议》成书，以议院、报馆、学校为变法三大纲领。变法之风起于野，而在朝诸公仍做着中兴的梦。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旅顺检阅海军，北洋海军十一舰，广东水师三舰，南洋水师六舰，齐到旅顺会操。经营数年，而有此一举，李颇为得意。

应日本政府邀请，李特派丁汝昌、刘步蟾等率定远、镇远六舰驶往东京湾，在驻日公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陪同下，晋谒日皇，一时军容之盛，举世瞩目。然而东乡平八郎却不以为然，以为中国海军不堪一击。东乡原为刘步蟾留英同学，刘邀请他上中国旗舰定远号参观，当他看见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裤子时，他就发现中国海军不过是一尊漂亮的花架子，一具金玉其外的行尸走肉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为黄海血战平反”。“大炮上晒裤子”，为帝国的中兴事业，作了一个看似滑稽的悲剧性的注脚。

大清舰队载誉归来，国人为之欢欣鼓舞，而清廷却在釜底抽薪：准李鸿章奏，以“目前饷绌”为由，命北洋停购船械。而此前不久，清廷却从海署奏，命颐和园工程用款，由海防捐输项下挪垫。为了讨好老太太，调和满汉矛盾，李鸿章竟自掘坟墓。

这些军国大事，严修未必清楚。翰林本闲职，他除了任考试差外，便是读书。这一年，他校《四书直解》、《大清会典》，点《通鉴辑览》、《法言》、《南有吟亭诗》，还读了许多医书，如《医学源流》、《慎疾刍言》、《回溪医案》、《伤寒明理论》及王世雄的《霍乱论》等。与徐菊人交往最多，荐赵幼梅任乌宅家馆。

(9)严修“三课”及其文化追求

1892 年，严修 33 岁。

陶仲明来京，聘其课艺诸子，并朝夕论学。严修课子曰："吾有三课：曰枕课、辫课、车课，各以一书为程，积日累月，所得甚多。"大儿智崇闻而慕效之，携《曾文正大事记》二册，示曰："此儿之枕课也。"

智崇创十六国世系表，严修批评之："智崇表十六国世系，附以注语，颇有条理。惟涂乙潦草，太不分晰。此虽小节，亦足验人心之静躁。往年余与仲翁同钞《说文》，仲翁之稿，横直班班，余则不然。智崇肖其父而未师其师也。"

致表叔陈竹轩信，言及友人魏苹耕逝世及安置其妻事，云："亟宜妥为筹置"，使"存者意安，殁者瞑目"。他批评宋儒所谓"失节"说："饿死事小之说，宋儒始发其端，诗礼之家奉为科律。然考之古经，稽之时制，俱未尝苛以相绳。"又曰："范文正大贤也，前有嫁母，后有出妇，至今庑祀，世无间言。"然后断言："圣贤之律，不可律儿女之私，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严修信草》

陈炽《庸书》问世，书分内外百篇，主张设议院、办报馆、保护民族工商业。卢慤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该方案以闽南方言为语音标准，以拉丁字母为拼音字母，采用左起横行的书写方法，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汉语拼音和横排书。数学方面，有邹立文《笔算数学》刊行，引入印度数字和西方数学符号。医学方面，有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成书，主张中西医结合。教育方面，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英、法、德、俄、美、日、印度七国学校、报刊、图书馆概况，建议清政府设立教育部，增加教育经费。

后来，严修也主张变法，提倡拼音，赞成中西医结合；对于西式数学，他像学外语一样，活到老，学到老，尽管他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天分卓然成家，但他孜孜不倦，从未间断的学习过程，则代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追求。

至于新式教育，则更是他全力以赴，倾注毕生心血的事业了。

新事物成长在旧的环境里，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则需磨合，有时为了生存，不得不作抗争。专制政府有时也能容忍新事物的生长，甚至用新事物来滋补旧文化。

5月，长沙一带，民间流行"灭鬼歌"及攻击基督教的揭帖、图

画等，长沙候补道周汉推波助澜，刊发大量反洋教文书揭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清廷准张之洞奏，将周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命查禁排外刊物。

(10)“盛世”危机：根源与导火索

1893年，严修34岁。年初，颐和园修筑完毕。

太后懿旨：办理六旬庆典，一切从简，内外臣工例贡免进献。特颁内帑赈顺、直灾区，嗣后著每年发银2万两，普给贫民。

老太太花甲万寿莅临，先表个态以体恤臣民，表示以民为本，臣民感恩戴德，自然肝脑涂地以相报。先是醇亲王奕譞早就挪用海军军费为祝寿准备，究竟挪用了多少，有多少被他借机中饱私囊，那是没法估计的，接着便是举国上下的募捐。

这祝寿工程真是轰轰烈烈，究竟要多少民脂民膏，才能博老太太灿然一笑？从1000万两到3000万两，这一估计不算太离谱吧？唐德刚先生算了一笔账：

此时老太太的私房钱约有纹银20000万两，却舍不得拿出来修园子；她一天的生活费要花国库纹银4万两，一年总计也要花掉国库纹银10000万两以上。

就在祝寿工程铺天盖地，近水楼台者都在盘算如何从中分得一杯羹时，日本却在盘算着如何瓜分中国。日本明治皇后为购买军舰“吉野”，将自己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与老太太的自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

为了孝敬老太太，疲惫的清帝国强鼓起欢天喜地的劲头来祝寿。恰在此时，另一个广东人，不是狂生康有为，而是买办郑观应，将他的《易言》改为《盛世危言》出版了，以一个“危”字为老太太的寿喜“破”了题。

这一年毛泽东诞生了，他便是当年龚自珍预言的那个“山中之民”。后来，毛泽东也读了《盛世危言》，在穷乡僻壤里，他睁着疑惑的眼睛看中国，看世界。

基督教中国教育会则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年会，这年会也不是为了祝寿。会上，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 Parker)提出要在中

国扩大基督教育，以“打破中国人的傲慢和除去中国人的惰性”；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提出教会学校要广开英语课程，用英语取代汉语。这样的文化优越感，分明在与老太太唱对台戏。

本年严修温《易》最勤，每日一卦，算的是天命，还是国运？

点《汉书》，读《方望溪集》、《梅伯言集》、《恽子居集》、《瀛奎律髓刊误》、《三国志》、《曾文正奏稿》、《沈文肃政书》、《左文襄奏议》等。因家起盐商，故凡《明史·食货志》以及清代政书、各家奏稿中有关盐产、盐引等记载者，均录于日记中，条分缕析，详细考察。又作《赠朝鲜徐相国四绝句》，其中之一云：

东海今夸赵灵武，佉卢邪昧异声形。
巍然千岁同文国，犹爱中华孔壁经。

朝鲜问题乃清帝国“盛世”危机之导火索，以当时严修之阅历，他已逐步洞悉此中之先机。

三、学术与政治

1. 使黔纪事本末

(1)严修西南行

1894 年，严修 35 岁。

春天大考，严修考了二等，得光绪帝召见。

日本佛教组织在上海创刊《佛门日报》，宣称“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连出家的和尚都到上海来办报了，要在花花世界里做道场，超度中国芸芸众生？阿弥陀佛！

孙中山来到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李不以为然。

孙中山掉头而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南通才子张謇经四度名落孙山后，终于一举折桂，中了状元。

荣膺状元固喜，不幸却接踵而至。当他与朝官们无论老少、职位高低，均按朝廷礼仪屈膝跪在暴雨之后泥泞的地面上迎接慈禧老太太时，他看到老太太甚至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使他十分震惊和无限悲哀，他无法忍受这种奴性效忠。

为官不多日，他就对舞文弄墨、朝夕问答的翰林职位感到厌倦，认为这于世无补。适逢父逝，按礼制，他辞官回乡，居丧守孝。待

居丧两年，重出江湖时，张謇遂脱状元帽、卸翰林衣，由“四民之首”士，转而为末“商”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7月25日，日舰在朝鲜半岛海域突袭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中日战争爆发。9月17日中、日战舰在黄海激战，双方损失惨重。

然而在京城，慈禧太后照旧举行了盛大的六旬庆典，海关邮政发行九种票面的纪念邮票共624857张，作耻辱之纪念耶？

而此时，清日战酣，胜败已分晓，清勇流尽最后一滴血！日军在旅顺屠城。李鸿章奏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代表中国东渡谈和，被日本拒绝。德人何以代表主权中国？日人拒之在理，四万万人口，而中国无人也！败而受辱，举国哗然。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康有为离粤游学桂林，答问学者，撰《桂学问答》，以公羊学，以倡明改制、大同、三世进化之大义；以西学悟变法之理。何启、胡礼垣撰《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激言国由民立，政因民兴。

严修受命于危难之际，光绪帝先后三次召见，使他颇感知遇之恩。光绪帝敕曰：自古帝王治天下，率以兴贤育才为首务，稽察前制，学政用词臣督率之，任至重也。朕特命尔前往贵州提督各府州县学政，尔当振维新之典，革积衰之弊，毋尚华而遗实，毋避怨以市恩，俾士有真才，国收实用《黔轺杂著》。

中日方战，严修已出京赴贵州学政之任，家眷留北京。

同行者有尹澂甫名淮，字月波，王式金、陆选卿两人任襄校，王荣卿严修表弟司会计，许镜波尹澂甫内弟司会计，陈栗堂办庶务，仆役从行者数人。运输工具由兵部提供：备马七匹，赴任他乡者，可于惯例外多索至十马两车。严修因不携家眷、仆从行李不多，“但用七马。自雇三套篷车三乘，两套轿车六乘。篷车载行李，轿车乘人”。行前严修略知战况，一经上路，路遥地僻，消息阻隔。

官属一行人取道清苑、安阳、郑州、新野、樊城、江陵、常德、沅陵入黔。按例兵部夫马送至良乡而止。至良乡宿餐费用皆由官驿供给，但若于夜宿前不及良乡中途而宿，餐宿资费皆由出京上任者本人承担。于是兵部所派夫马乘机索金，并狮口大张，甚至“有增至十数金意犹未厌者”。若不贿给，则或于途中故意磨蹭延至中途夜

宿，或甚者抗不赴程。虽为官家一脚夫，却颇有难倒大吏之小技。

严修一行，亦无例外遭此勒索。无奈，遂“乃计所应给之数”，并“命老仆用言开导”，竟颇为奏效，仅“给津蚨蚨，即青蚨，指钱十二缗又缗之半”便顺利上路了。

兵部夫马至良乡交接后，良乡发一“传单”，名曰“溜知”。内列“凡酒食几席，马几车几，悉载单内。以下各站，凭单照备，不能再增矣”。“传单”之外，又有“差信”，“传单”的内容为主人所知，而“差信”的内容则非主人所知。因差信中可以任意增写，所以家人难免又要“贿给”。

过河北保定至清苑，清苑的地方“舆夫”与兵部“夫马”截然不同。“清苑之舆夫，皆壮佼健步，马亦膘伟。且锸馓精腆，行馆更鼓终夜不绝。”“舆夫”一路唱和，遇有坑洼之地，则前者高唱以提醒后者。

就这样，严修一行，进入河南境内。渡淇河抵石固驿，经旧叶县至保安驿站，更换驿马，“驿马不足则雇民马以充数”。官驿马少，而民马亦稀。且民马主人须“随马步行，仆仆于道”，雇价低廉，甚是可怜。从郭店受雇的马，直至叶贤，仍未替换。严修一行，无可奈何。

“内一老民，肩背布袋，追随两日，计程将两百里，尤为可悯。嗟怨之声，一路不绝。马亦疲殆，一日数蹶。昨夕至叶，命仆谆嘱差役，毋令更换，并裁一骑马，至夜行仅换其二，其余许至保安驿全换。迫于行也，姑许之。”一行人马极为狼狈，驿马常常落在轿子的后面，而所雇民马又往往出城即逃。

适湖北，宿荆门州试院，始闻旅顺失守。闻之大惊：“果尔，则大沽事在危急，京东一带，亦将震动，奈何奈何？私心祷祝，惟冀所传之诬耳。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出京之初，他没有大局“不堪设想”的心理准备，没有想到新式海军如此不堪一击，“自闻荆门州尊之言，嗒然若丧。虽疑信参半，然思此言果信，则全局瓦解，不止一身一家之私惧也”。

周子瑜来晤，周氏曾任天津道，故相识。“袖一纸见示，云系从英新闻纸录出，略言九月二十九日我师败于九连城，城为倭据，倭人声称十月下旬犯盛京云云。”

严修忧虑万千，继续黔行。弃马改舟，进入湖南境内。观常德繁华，心情略好转："常德衢市整齐，廛货充溢，为荆襄所不及，望而知为富庶之区。荆州尚多麦田，自舍陆而舟，不经田陇，未知土宜如何，惟数日泊舟处，市麦食者绝少矣。"

过陬市出桃源，一路景况，苍竹翠天，每数十步，辄有丛竹一拥，清风微掠，便扶摇交响。有娟秀之美，更有幽深苍古之情……一路饱看。桃源美景令严修目不暇接，忽陆忽舟，蜿蜒间行。舟橹跳波，飞雨惊溅，两岸茶山似簇拥而下，怀揽碧波以观幽美；而山路崎岖，时而仅容足趾，时而疏朗有致。崖壁绝壑，呼之欲出，挥之即去。严修自叹："不虚此行也！"

出桃源后，竹林渐少而松杉始盛；青山远离秀雅而逼近险峻兀然。然虽巨石嶙峋，峭壁耸削，却苍穆古伟，令人生敬。严修云："真山面目于此始见。"湘黔地理之别，"界亭"可谓名副其实。

进入贵州，由玉屏至清溪县停宿。黔省之贫历历在目："玉屏、清溪皆瘠薄，一路所见……有庐井萧条之概。"

离清溪镇五里远，严修登一大山。山不一色，顶为碧蓝，次为黝黑，其下为黄赭相间；山不一形，山峰突兀几欲刺天，其下为平，再下则蜿蜒石锥林立。夜雨凝冻，漫山银装素裹。

晚宿清平县，与刘裕成总戎谈及中日之战，刘言"湘勇散在各省者甚多，立时招集，即可得百数十营，惜上游无齿及者，故朝廷未之知也"。朝廷岂能不知？已命原湘军首领刘坤一督办东征军务。但日军不是太平军，湘军亦非当年勇，败局已然无法扭转。

到了目的地贵阳，严修一行下榻南关内公馆。次日，严修开始"答拜通城"，"凡亲到二十余处"。然后正式到学署衙门交接，仪式庄严。至署门前"降舆"，行"三叩首"礼；复乘舆升阶至仪门，由"前使者"引入，与前学使叶肖韩长谈，商定两日后交接。

接篆之日，严修表示要"严去取以覆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执政伊始，为表尊师重道，严修亲往拜会贵阳三书院院长。

贵阳有三大书院：正本书院，院长徐步銮；贵山书院，院长邓希濂；学古书院，院长熊露陔。熊、徐两院长言：贵州学术，经学以遵义

为盛，宋学以贵阳为盛。

严修治学以经世致用为宗，兼习汉宋，其诗文之风格属清末“唐宋兼采派”，近代河北诗家，以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胶州柯劭忞三家为领袖，而严修、王守恂等羽翼之汪国垣《近代诗人述评》。

会见三书院院长的当日，严修即致信赵尔巽(1844－1927)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请教入黔为政之道。赵曾居官黔省，能道其详。遂复函云：“黔省士习甚详，大略谓黔之民最苦，黔之士甚杂，岁进千余人，而详革之案，无月无之。欲清其源，当自任缺勿滥始。”

严修复信略谈其督学的具体措施，认为学政督学之责不只在于剔除弊端，尤在振兴士气。赵尔巽大加赞赏，并引以为同心。

严修认为，所废之人未必就是当缺之人，黜一劣文不如黜一劣行，黜一劣生不如擢一优生，惩而创之不如激而劝之。在贵州他曾求助于张之洞，却不曾提起李鸿章。大势已去，他人微言轻，“激而劝之”，实难启齿。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伊始，奥委会主席、法国人顾拜旦(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热情地致函李鸿章，邀请中国参加1896年的第一届奥运会。可想而知李鸿章哪有这份好心情？

(2)贵州兴学记

1895年，严修36岁。

下车伊始，严修即发《观风告示》，课题士子以观风。他一改前制，“更定试题”：“凡限策论题四，杂著题二，以课诸生；仍限四书文题一，试律题一，以课诸童。”

又发《劝学示谕》，言“士习之蔽，大要有二”：

> 朝而时文，夕而试律，迂道德而不谈，束经史而不观，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蔽一也。口则诗书，心则货利，身则庠序，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蔽二也。

其言“去蔽之道”，则有四：

童试背诵五经，能全诵者必录取之，不能一经者，文虽佳亦黜；试士发论题，不出《钦定性理精义》及《诸子小学》、《近思录》三书；

凡发诗赋题，不出《史记》、《汉书》及《文选》三书之外；劝行日记法，读书札记，日久积多，遂成著作。

从湖南常德入黔以来，严修还未曾见晴空舒朗之日，终日昏昏冥冥。所见文人居士，气色大半灰黯，抑郁奄奄，少生人洋洋之气。他以为一则天气使然，一则吸食洋烟所致。同时他还注意到，黔地鸦片税收，年逾十余万金为上报之数，实则逾二十万，致比户吸食。

黔地通行货银，曰"街市银"或"罗罗银"，成色甚低；稍居其上者，曰"票银"。以街市银易票银，须加色七八分不等。在这一兑一换中，寄生着一批巧取豪夺者，也勾引起许多辛酸的故事。

黔地闭塞落后，移风易俗，严修义不容辞。

他下朱谕帖交各房，令"嗣后免交上费"，除士子举学繁费之弊端。黔地旧例，士子补廪一名，需费十余金，出贡尤多。一般寒士常因窘据，积阁数月甚至几年而不得"批发"。

减轻了士子出仕的压力，他又深感黔边士子举学之艰，除无名师蒙启外，尤苦无书养读。为开启僻塞，严修将随身携带十四大箱书籍存之学舍，发放士子阅览。凡书六十五种，分经类、史类、子类、集类、丛书类、类书类，其目如下：

经类：石印阮刻《十三经注疏》四函、石印《续皇清经解》四函附《式古堂目录》一函经解出棚，石印《古经解·小学汇函》三十本。《四书摭余说》一函、《四书典故辨证》一函、石印《四书古注辞义汇解》二函、《骈雅训纂》一函。

史类：归方《评点史记》二函最精、石印《资治通鉴》、《续通鉴》六函，读史者除正史外，以《通鉴》为最要，石印《通鉴纲目》四函，温公《通鉴》之外，此书最佳，石印《纲鉴易知录》一函、《通鉴地理今释》一函，读史者必不可少之书；《读史方舆纪要》二函、《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一函、《十朝圣训》一匣、《续东华录》十二函、《同治中兴奏议》一函、《林文忠集》一函、《胡文忠集》一函、《沈文肃政书》八本、《左文襄奏议》二函、《金石萃编》四函（原注：以上五书于时事切近，有志于经济者，不可不读）。

子类：石印《二十二子汇函》一函、《陔余丛考》八本、《世说新语》一函、石印《孔子家语》一函。

集类：局本《楚辞》四本、《正续古文辞类纂》一函、《潮海文传》二函，《骈体文钞》一函、石印《全唐诗》四函、《乐府诗集》十六本、《正读古文苑》二函、《文选旁证》十二本。《学海堂集》、《诂精舍文集》八本、《瀛奎律髓》二函，石印《骈体正宗》一函、《七十家赋钞》一函、《曹集铨评》二本、《庚子山集》二函、《唐四杰集》一函、《王子安集》一函、《杜诗仇注》二函、石印《李太白集》一函、《韩昌黎诗注》一函、《李义山诗》一函、《剑南诗钞》一函、《陆宣公集》一函、《王文成集》二函、《张江陵集》二函、《归震川集》二函、《方望溪集》二函、《孙海峰集》十本、《姚惜抱集》二函，梅曾亮《柏枧山房集》十本，管同《因寄轩集》一函，《铭山堂集》一函、阮元《研经堂集》二函，恽敬《大云山房集》十本。

丛书类：《士礼居丛书》四函、《天琅阁丛书》四函、《天津广仁堂丛书》十八本、《读书举要》，尤便学者，多主义理。

类书类：《渊鉴类函》。

以区区一人之力，所携之书纵贯古今，横及四部。其学术，于考证、义理，无间汉宋；于诗、赋、骈、散，不持偏倚；文章之外，更重经世之学；于版本、金石之类，亦有涉及。他与贵阳知府文仲瀛商定，仿天津书局例，拟在贵阳开设官书局，刻印书籍，发售各州县，劝学士子，并奖励成绩优异者以书资和膏火。

不久，他就离开贵阳，巡视上游地区的安顺府、兴义府、普安厅、大定府、遵义府、仁怀厅等，并主持院试及科考。

途中，在永宁城一带始见悬于两峰之间的“铁索桥”，乘马而过，犹如“履轻舟而踏秋千”，有石刻记云“一线缝云”。

至新场玉屏书院，所见所闻，使严修为之一振。

玉屏书院创始于1840年，1849年重修。严修至该地时，新场绅董拟议，就地募捐，重新扩建。新场一偏镇，而书院之制，却规模宏大。其兴盛，除历任官绅雅重外，盖惠于此地田广人稠，地庶民殷，文风雅淳。

遵义境内山水竹树，色润丰盈；沃田膏地，粮苗葱郁，一望而知乃黔地富庶之区。然米价奇贵，盖因省城久旱无雨所致。人心动摇，谣言四起。在诸生观风考卷中，多言遵义境中通行私钱之弊端。严

修宿于札佐，此地为川黔孔道，地方殷阜，亦有兴学之传统。景阳书院建于1872年，原为龙冈书院，因阳明先生曾在此讲学，重修后遂更名为“景阳”。

巡视数月，严修返回贵阳省署，省诸官员郊迎。与诸官员交谈巡考情况以及地方风俗，并询问中日外交之近况。

在贵阳考试生童时，他开始引入西方数学。其言曰：

> 近日中西大成之刻，可谓善矣，然时有删易，或失旧观。于是，推荐《方程论》、《四元解》、《六术》、《九章》、《开方》、《对数》以及勾股演代，微积溯源等，要求生童仿提要之例，各系数语。
> 《黔轺杂著·纪题》

贵阳试毕，又赴下游地区平越州、镇远府、石阡府、思南府等地巡视。在平越面试士子，试题有《士志于道》。

收到长子崇儿“京字第陆号信”，内附《公车上书记》一本。读罢叹服康有为，心驰神往，慨然有天下之志。

在镇远考优生，试题有《论西学之用与用之之法》。

又考武童步射，有箭试、刀试、石试。武童步射之日，由龙门点名，提调、教官、廪保、参堂列坐，再由稿房唱名，唱其名者入，于案前半跪自报姓名，然后封门升堂，开始考试。

箭试：将弓平悬两木之间，以石坠于弓弦之下，视满弓为止，再以石重衡力大小。石有十斤至六十斤不等，每十斤为一力。再以弓长设箭道远近，或二十弓长，或三十弓长。试者较以中把、拉弓力差及箭道之远近。

刀试：有头刀、二刀、三刀之别。而镇远棚考惟有头刀。

石试：则置之几石不等，试者举之以较。镇远棚考，惟置一头号大石，应试者无一能搬过膝者，偶有离地者便为上乘。

清政府一边维持这种愚而无当的考试，一边办新式军校或编练新军。海军失败了，又建新式陆军。袁世凯在天津练“北洋新军”，张之洞在南京练“自强新军”。这两人，一个是他仰之弥高的恩师，一个后来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

他在巡视途中，于思南铜仁府度岁。辗转贵州境内，观风督学，

他不敢稍有懈怠，虽有披星戴月奔途之苦，然所辖之域，学风为之一振，使他颇感欣慰。

1896年，严修37岁。新年伊始，京城也有新气象。

御史王鹏运奏请"讲求商务"，提出应由绅商主持设立商务局，整顿原官办招商局。光绪帝准奏，命南、北洋大臣总其事，但京师不许设商务所。

在贵州石阡，严修像往常一样，主持生童经古考试，试题有《董仲舒不治产业赋》以修学著书为事为韵、《学者不可不通事务论》、《汉之治过于唐论》。又主持考优生，试题有《拟韩文公进学解》、《拟曾文正忮求诗》。文生科考，出题《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一章》、《问明代学校之制》、《赋得汉武帝贤良诏》得良字，五言八韵。

离开石阡，至思南考棚，主持童生经古考试，试题有《霍光小心谨慎论》、《疏广论》、《拟苏长公石鼓歌》、《赋得食足货通》得通字。又考优生，试题为《论士子好讼之弊》；文生科考，试题为《问明代说经家得失》。

严修按试各府时，均令各地以算学题试士，但报考者寥寥无几。于是，拟选贵阳三书院之一，先设此课，后再普及。征师于省内，却无一应聘者，无奈向湖北张之洞祈师。电报云：

> 胡广督部堂张，芗涛世叔钧鉴：黔省学古书院改设住斋课额，经算兼课。经师已就近延订，惟算学一席，本省中求一粗通者，已不可得。伏思海内通才，大半入两湖书院，其中肄业生，但通微积者，便可主持讲席。不揣冒昧，拟求世叔代订一人，岁奉三百金，程仪半之。如有相当，能于正、二月到黔方妙。《黔轺信草》

思南棚考完毕，由思南启程赴铜仁，途经朗溪司。

此地为贵州产纸区，其纸称"江纸"。该地有梵净山高九十里，为黔山最高处；且泉清而湍急，又为两水合流处，于造纸最相宜。

至铜仁，主持生童经古考试，试题有《项羽救钜鹿赋》以楚兵冠诸侯为韵、《为学大益在变化气质论》、《李广生得匈奴射雕者赋》以号曰汉之飞将军为韵。复试，试题为《伊川先生谓人有三不幸论》、《冯

唐论》。考教、考优，试题为《论洋务》、《广辖轩语戒吸食洋药说》。岁考面试，试题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多闻阙疑》。文生科考，试题为《问通典、通志、统考三书异同》，并考代数。

据"代数术八十四款"演方程式，其题为："有卖果子者，初次买进若干果，其价每两枚一文；二次又买进若干果，其价每一文三枚，及售出均作二文五枚，共亏本四文，求两次所买果文之数。"

严修不愧商人之子，竟将"引车卖浆"之术引入科考。中国传统数学，大抵不离百姓日用，并无纯粹学理，与其谓之学，而毋宁说是应用之术。此术素为士人所鄙夷，从不登大雅之堂，而今却堂而皇之入考场，考生竟也不见怪，何也？一曰西风劲吹，士子竟趋之；二曰政府倡导，重商主义略微抬头。

科童复试，试题为《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遴选第二场，试题为《问历代农政》、《商君论》等。

铜仁考试毕，至思州棚。严修北人，奔波黔地，常为黔省天气多变所苦。三月在兴义热不可支，四月至大定骤寒难耐，去单而棉，犹怯薄也。五月出大定，暖气乍至，抵遵义已是酷暑熏蒸。而到铜仁虽狐裘鼠褂，其寒栗犹不可忍，然越日则畅晴大热，袍褂皆单，而扇仍不离手。"总之，晴则夏、阴则冬，衣备四时。时乎时，无失时，是为识时。"如此天人交感，培育出一种政治智慧和文化个性——"识时"。

他在思州主持各项考试：生童经古考试，试题为《诸葛武侯谓非静无以成学论》、《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文生岁考，试题为《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并有演算立方试题。考优生，试题为《论高邮王氏说经之例》、《论桐城文派》、《曾文正公日记书后》。

考教官，试题为《为其多问也，为其贤也》。文童科考，试题为《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王之所大欲可得闻欤》、《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遴选头场，试题为《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选拔二场，试题为《问董仲舒天人三策其大旨若何》、《赵奢赵括论》。

在思州考试期间，严修听闻有青溪官办机器局，因经营不善停业已久，有上海洋商欲以五十万金顶兑。遂记于日记中。

在黎平，他主持生童经古考试，试题有《舜典二十有二人考》、《韩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数明论》、《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论》等；生童经古复试，试题有《周亚夫论》、《文中子论》等。

严修阅考卷，发现“温兆麟观风卷特佳”，其中语及西学洋事者颇多。于是，召之问答，询其由。温生言其久居广东嘉应，故闻见颇多。严修以为“然非留心者亦不能也”。并摘卷中数条问之，应对无滞，且发挥有余。温生又推荐周宗潢，周生于湖南书院肄业。严修于陋地，能得此两俊，甚喜。本日遂定选拔案，“周正而温陪”，借以兴西学之风。

在黎平“每食米饭便觉异味”，因考棚中有硝井，饮之皆腹痛。

黎平棚考毕，又至都匀，与郭竹居先生畅谈。

郭父任兴义教官时，张之洞父适为郡守，张曾从竹居父受业。张任两广总督时，调竹居同往，使充水陆学堂稽察，兼教习汉文。竹居曾习洋学，颇通算法，居粤后，其学益进。中外情形，泰西学术，大略能言之。“自撰有《勾股细算》，又拟改定《代数术》”据《日记》。

严修与竹居先生交，叹曰：“黔中有此人，庶几一开风气乎？”

又摘录《内经》：“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以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他在都匀考优生，试题为《论东西各国强弱》、《都匀竹枝词》。自察其所出试题，感慨系之：“好争者必不直，好盟者必不信，好怒者必不威，好察者必不智，好服药者必不寿，好著书者必不通。”

文生科考，试题有《问汉代边防》；科考面试，严修兴奋不已：“麻哈文童周恭寿，其叔周诚，叔侄写作俱佳，为全郡所弗及。恭寿器宇轩昂，颇不寒俭；其叔亦魁梧，性近爽直，皆美材也。”

选拔二场，试题有《问董子有言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为治，能引申其说欤》。

严修欲“更化”欤？严修之前莅贵州欲“更化”者多矣，然而有成有不成。成者，执其一端，持之以恒；不成者，千头万绪，几无从下手。

清朝的行政区划以府统州县，而州县所辖地亦属府境。贵州则

有所不同，除所辖州县外，还另设有府属者。于是乎就多有府属之地丁、府属之籍贯、府属之学额、府属之文武童生等。颇为繁复，其尤甚者，有此县所辖远在他县，而他县之境反在此县城下者，有中隔一县而旁县之境交错于左右者。胡林翼属贵州安顺、镇远知府时，因镇压苗民起义曾困于县之隶属繁乱不清之掣肘，遂欲除其弊端而未就。后继者如曾文成、黎文肃几议其变，均未见行。

黔不产盐，皆仰食于川。川省以盐税一年厘金二十余万济黔，应该说黔无盐税之烦，且坐收一岁之厘。但黔贫川富，黔人多欲自采盐以自足。但几任黔督都没有找到盐矿，只好作罢。遵义原与黔省其他郡邑同样贫瘠，乾隆三年，山东陈玉墀为该郡守，见该地适宜桑蚕，遂移民山东蚕师，教住民桑蚕，一年后得丝，但丝不精良。太守以为工未精，复招山东精于桑蚕之师，第二年终于得良丝并远播他省。

严修欲效"山东陈"，行"更化"于贵州。其欲"更化"者，非关"府属"，亦非"采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所欲者，乃学政也。

都匀棚考完毕，启程返省，抵贵阳收诸生札记。有府学廪生杨德懋《春秋解释》一本、贵阳举人王勋《匡时论》一本、贵筑文生陶其淦《八月札记》二本、贵筑增生杨文清《愿学斋读诗札记》二本、贵筑增生石毓敏《札记》八本、贵筑生员刘培良《日记》八本、府学增生金开稚《括地略注》一本、手抄《通考序》一本、贵筑文生姚华《说文便读》初稿一本、《读段氏说文注逐日札记》一本、府学廪生杜运钧《课程日记》一本、府学廪生李其奎《日记》二本、府学附生严侨《札记》一本、贵定文生杨耀宗《点过诗经注疏》一部。

主持贵阳经古补考，试题为《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论》，其欲"变法"耶？文生复试，试题为《养生丧死无憾，五道之始也》、《中国外入赤县神州者九》。

遴选二场题：《问宋神宗时，诏议共举，咸为宜变法便》。

苏轼曰：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王安石曰：诗赋亦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

容无贤。若谓可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之士，正宜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二说孰长？

答案似已成竹在胸：从科举"更化"入手，行"变法"于天下。

贵阳棚考完毕，遂得息读书，点《近思录》，诵《左氏传》，并向裕福田学数学。裕福田时年24岁，丁父忧，奉母居省。期间，为严修讲解演算《少广缒凿》、《开方古义》两书之法，并推荐严修演习《七维捷算》。严修记云："数年蓄疑，今稍豁然，甚矣，口授之贤于冥索也。"

读《杨园集·备忘录》，并摘其中一段："司马温公议改科举法"，范忠宣曰：当清心以俟众议。严修然之，以为"科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使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黔轺信草》。他明知救时之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而作为学政，他又责无旁贷，"虽职思当然，不自觉其兴味之索然矣！"《蟫香馆书牍》

但他没有灰心，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使他为之感奋：

> 寻读康户部万八千言书，忠肝义胆，一掬而出，五洲利弊，了了纸上。康君本东粤奇士，为湘潭王纫秋再传弟子，设帐乡里，生徒若干，量其材质，分遣赴泰西诸国游历观政，札记而归。
>
> 又尝集春秋后历代典制之与孔子合者，以类纂辑，曰《孔子会典》，规模魄力，冠绝古今。今观其书，其说史事，若数其家珍；说洋学，若观指上之纹而操筹计也。惜乎！惜乎！世固犹以不狂为狂也。

对康有为的主张，他认为除了迁都及其试事之法仍不脱科举旧式这两条微有可商，余则横天地，亘古今，开辟以来无是作也《黔轺信草》。在致徐世昌信函中，他称赞"康长素之疏真卓论也！"他的科举"更化"主张，正是要为康长素的"举国之变"导夫先路。

适值秋获之际，严修又施一新举措，成立官书局，亲自拟就《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

> 前修按试上游各郡，于士习文风，留心体察，好学能文之

士，所在多有，惟见闻太陋，志趣不广。每于复试日，叩其所学，则皆以不能得书为憾。盖黔省地居边远，运书甚难，虽出重价，且不可得也。

因此，无论大小，必须设一书局；无论多寡，必须筹一底款。

他提了五条建议：(1)书局设在"资善堂"；(2)筹款经营，以一半发商生息，补贴经费，余一半再二五作分，以五购各省书局之书，以五添刻书版；(3)设董事局管理；(4)书销各州县书院学校；(5)书价从廉，远近士子来购书者，则照原价加一成；(6)各州县所购书须存于学舍，以便士子赴学翻阅。

经抚藩合议，无不赞同，遂于本年开办官书局。

官书局初始，经费捉襟见肘。严修遂捐私资，购置沪、楚书籍运黔，并原价发售，仅捐资垫付运费便有数万金。

书局甫定，严修又改南书院前身为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亲手制订《肄业条约》，令各地保送优秀生员四十人住斋肄业。聘黔省名儒雷玉锋为主讲席，电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协助征聘算学讲师，并亲往督课，解答算学题等。

据黄炎培著《清季各省兴学史》载：贵州学政严修将南书院改办京师学堂按：盖为经世学堂之误于贵阳，讲授以经史、算学为主，还教授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人文月刊》第1卷第8期。

经世学堂开课，严修每日按时到堂听讲，无少迟误，虽学子无其勤也"严范孙先生事略"《河北月刊》1936年11月。

又由贵阳启程前往遵义、大定等地巡学，继续主持考试事宜。

在遵义，主持生童经古考试，试题为《三五之道若循环赋》以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为韵、《教人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论》、《赵武灵王论》。算学题为：有绿、练二营兵不知数，但云裁绿六百人以益练，则练为绿之三倍。裁练二百人以益绿，则绿为练之三倍。问二营原兵各若干。文生科考，试题为《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问书院之名昉于何时，历代规制若何》。生童经古复试，试题为《中国之人以亿计赋》以既庶矣又何加焉为韵、《自强策》、《赋得农不如工》得资字，五言六韵。

遵义考棚毕，起行赴大定。在大定，主持生童经古考试。试题为《郭林宗见茅容因劝令学论》、《胡安定学术文章皆傅经义论》。算学题为：战兵六千，守兵九千，月饷三万一千五百两。战兵八千，守兵七千，月饷三万四千五百两。问战守兵每名月各若干。经古复考，试题为《缙绅之儒守和亲介胄之士言征战论》。选拔第一场，试题为《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大定考棚毕，起行赴兴义。这一年，严修马不停蹄，颠沛于贵州省境内，主持各种科考。

贵州为山地省份，俗有"地无三里平"之谚。穷山恶水，道路乏修，可想其奔学之艰；而消息闭塞，政俗落后，人才难聚，更使严修有孤掌难鸣之感。然而严修不气馁，凡事开头难，他以铁路、电信为例，云：天下事莫难于发难，其机一动，便不可遏。尝以谓铁路不兴，百事不可作，今铁路有成议矣；往者电线之设，议之十年而不决，及（癸未）创始以后，不数年而遍全国矣。

对于国人好议而事难成之恶风，他斩钉截铁：往者之事，患人不言；今日之局，患人多言。对于兴西学、修铁路，执政者和当事者，均喋喋不休，讨论不已。空谈误国，何须争辩！惟亟望京津、芦汉铁路之速成，各省相继而兴办。他认为强弱之几，在此一举。国计民生，言之者众，然铁路不成，终恐无下手处。譬如关卡驿站，漕运仓政，开采制造，凡所当兴当革，当转输而流通者，无铁路则苦口而无功，有铁路则藉手而可为。至于设书局，创书院，立学会，育人材，此又与铁路之举，并为切要者矣。

在给智崇儿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中西会通"的学习方案：总而计之，有当熟读者，有当常看者，有当备检者，有当精习者。《九经》、《语》、《孟》、《近思录》、《史》、《汉》、《韩文选读》，当熟读者也；《通鉴》、《明史》、《十朝圣训》、《经世文编》、西洋格致诸书及近事汇编、岁计政要之类，当常看者也；《通礼》、《皇朝三通》、《五礼通考》，西洋各式之图、各类之表，当备检者也；古文、算学、化学、洋文，当精习者也。准此为之，十年之后，规模亦略具矣。

同时，他又提出四不可学：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

不学亦可也；字则小楷最为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也。

他强调科举有三要：多读宋儒书，多读时务书，多读古文。

以为应试之妙诀，即致用之根底。离开经世致用，而埋头于八股试帖、律赋、小楷中者，皆庄子所谓大惑者也。

然而年近不惑的严修，却于是年负债累累。言及开销，其家信曰：去年弟得差后，借用德丰恒银二千两，至今未还。此次由百川通汇去津平银一千两，下欠一千两并前后利息，一时尚不能还清。

他到黔省至今，所得进项：养廉二千五百两、棚费二千五百两二项，花红银五百两，夫价赢余五百两，约计六千两。而其花销：助饷一千两，还百川通一千五百两，卢选卿搬灵借七百余两，陈栗堂搬灵借一百五十两，崔恩仲搬灵借一百五十两。□、□、□分银一百四十两，一年师爷及各家人挑费约在千两之谱《黔轺信草》。

严修做官本不为发财，然而为官清廉还须有家底才行，否则自顾不暇，遑言兴学？以家财贴补官用，他心甘情愿，从无怨言。然而为士子们省钱，他却锱铢必较，从不放过，为此，他建议再次减掉各种棚考之过站杂费，不令行贿、索贿有机可乘，“是集爱人以德也”。

(3)严修上书：请开经济特科

1897 年，严修 38 岁。

年初，严修在兴义主持经古考试，发生一则笑话：

“有报考算学两生”，以题试之，“其一谦言未能，愿试经古”。其一言自习“九章四元”，而于笔算、筹算、演草以及开方术，均曰不能或未习。问其阅读何书，曰策学；问以梅氏、屈氏书，一概不知。算卦与算学，相去不啻霄壤，该生虽可笑，然其趋时之勇，亦可佳也。

兴义考棚毕，启行前往安顺，途中度岁。

康有为在桂林创立圣学会，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开业。两者同时问世，一为政治的，一为实业的。政治的，如雷又如电，但不久便湮没了；而实业的，平凡如土如路，默默而存在，至今依然。

在贵州，可谓处江湖之远了，可他念念不忘朝政。

在兴义，他以“梅福上汉成帝书”为题试诸生，其欲效梅福上书

之心，昭然若揭；在安顺考场，他又以“商鞅、杨炎之事”为题，命诸生申说“变法”：

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商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杨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尊其法。一或变之，则反使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能申其说否？

安顺棚考完毕，他启程返贵阳，在贵阳递奏折，报告“贵州岁科两试一律完竣”。历时两年，他游考贵州境内大小17个考棚，敦学励士，不遗余力。

严修问学，算学与经史并重，他规定每月有一次算学考试。

第一次算学考试，生监文童共有三十人，他亲自在堂上监考，因考生课卷多有谬误，晚上，他帮助裕福田判卷并逐题推算。每月算学考试，报名者渐多，然不乏滥竽充数者，严修遂拟每人各四题，各自演算，故每次考试所出试题近二百道之多。

由福田介绍，严修聘祁听轩山西太原人而生于上海，为中国最早公派留美学生之一。前后居洋十年，精通机器制造学教授英语，兼译算书，月酬八金，听轩慨允而婉谢束脩。严修从听轩受业英文近三月，同学者“澄兄、荣弟俱肯著力，福田尤敏锐”，惟独自己虽已认得八九百单词，但仍开卷茫然，与不识一字者无异。于是选《聊斋》英译本手抄而读之。

又诵《公羊春秋》，摘其要点曰：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以“尊王攘夷”为名者，多欲行变法之事也。

他信步而至好友陈维彦处，但见广泽明月，苍山乱流，心境顿时豁然。维彦“博洽能古文，通时务，尤留心义理之学，庶乎有体有用”《严修日记》。与维彦言上书开设经济特科一事，相谈甚契，维彦大以为然。又与“澄兄”尹澂甫商榷，“澄兄”亦深以为然。

于是，严修欣然命笔，开始起草《奏请设经济特科折》。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万籁俱寂时，严修要发言了，纤纤笔端欲作“狮子吼”，于无声处，隐隐传来雷霆之声。一夜奋笔疾书，奏稿终于完成，包括“奏草一，附片一，请假片一”。他放下奏稿，兴奋

与隐忧杂陈心头。这时他想起以纤弱之躯，担负沉沦之国运的光绪帝，也想起他那顽固如磐石的徐荫师。奏稿发还是不发，是一个问题，他需要深思熟虑。

两日静思后，他下定决心，遂与澄兄商量修改，并由澄兄誊写奏稿，然后去贵阳府，诣访陈维彦，再商大计。好个陈维彦，义无反顾，闭门两周后，又将其修改誊清的奏折送与严修；严修马不停蹄，即与澄兄商议，竟独自修改奏稿至深夜。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东方既白，奏稿乃定。

严修谢客不见，便衣至陈维彦处，"劭吾陈维彦字以为可用矣"。

《奏请设经济专科折》终于发出，全文近三千字。

奏折提出仿康熙、乾隆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之特科先例，打破常规，另设经济特科，以通今为切要。奏折举要如下：

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选拔人才。

国难当头，急需人才。若应试者多，虽十取五亦不为过。

凡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以及举贡、生监、布衣，均准保送参试，择优录取。仕者授翰林院侍读或编修，未仕者授予检讨、庶吉士，其他可授部署同用，或充出使参赞、随员，或充总署章京，或令赴各省充当教习、学堂领班学生等。

寒士或边远之士赴试，亦宜筹给公费资助。

特科试者一经录用，应与科举出身一视同仁。

与此同时，严修还附请假修墓片一件，准备不惜一切，承担后果。梁启超于《戊戌政变记》中称"经济特科"为自隋开皇七年(587)科举取士以来一大突破，为戊戌维新"变化之原点"，为废科举制度之先声。梁公此谓，乃言其社会之客观意义，而严修并不敢以"先声"自谓。

他不愿为天下先，却有执牛耳之勇。上罢奏折，他备感轻松，将得失置之度外。遂约在黔同仁好友听轩、福田等游蟠桃石、圣泉等地，朝而出，暮而归，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不久，新任贵州学政傅增湘抵贵阳，严修至东门文昌阁迎接。

年末，严修在黔任满，与友人信曰："弟在任三年，寸效毫无，思则汗下。顾承奖饰，益不自容。"而贵阳士子则依依不舍，人去碑留，

他们立心碑、口碑、石碑，思之、念之、铭刻之，今摘其碑文“严学使范孙去思碑”之要，简言之曰：

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二者兼之，不尤难乎？

黔士固陋，务词章者实繁，讲经学者盖寡。津门严范孙太史奉命督学是邦，凡所讲贯，必以朱子学、近思录、性理精义三书为宗鉴，先器识而后文艺，轻著述而重躬行。治事则以算学为入门，以为孔门六艺，数居其一，其学本中国固有之学也。至于公之待士，其体恤周挚也，如父兄之于子弟，其诱掖奖劝也，如师保之于门人。而且推诚布公，洁清自矢，又日月之明，而冰雪之皎也。尤有难者，生平未尝疾言遽色，而僚属吏役，畏之如神，不敢为私，殆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者非也？

明季王阳明先生以理学名臣，讲学龙场，不意历三百年而后相辉映如此。兹此瓜期已届，不获久留。公行矣，黔之人相与讴吟歌咏，勒石纪德。

贵阳名儒雷廷珍又撰《誓学碑缘起》，摘其要者如下：

吾黔自道真讲学于汉季，阳明提倡于前朝，桐野、子尹辉映后光，汉学、宋学得谓无人？然不惟年湮泽斩，来者无闻，即溯其渊源所渐：道真许学也，阳明陆学也，桐野陆王学也，子尹许郑学也。必求通乎古而有济于时，窃以为虽起许、郑、程、朱、陆、王诸贤而面质之，吾知其于中西之学亦将有别所事矣。

津门严太史范孙，通儒也，德行纯厚，学问渊深，督学黔中，既创议开设书局，变通书院，兼业中西，延余主讲中学，而西学则自任其难，孤诣苦心，虽不能为外人道，而亲炙者如饮醇醪矣。

严公之来黔也，初下车即饬各学生员立读书日记，省身札记，月终呈阅而评之，奖给书籍以鼓励之。又以士生今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中学之本在经，西学之本在算，公倡导之，黔士通代数微积者，至今遂彬彬焉。复建议变通书院，捐廉购置中西学书八十余种，创立科条，学兼中西，黔士于中学西学，遂有日进之机，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

从贵阳出发，严修踏上漫漫归路。

黔居三年，他将黔地士人品评在册，以备国急之需：

兴义刘显治，字希陶，好古文，笔下常有奇气；婺川申云藩，聪慧绝伦，治算学，两年尽解其妙，于八股文亦冰释理顺；八寨欧阳朝相，以孝行贤良闻于乡里，且治算学能究其理而达于词；铜仁唐桂香、孙士杰皆为少年即有文名者，而算学与刘显治相仲伯；贵阳熊继先聪颖然缺乏沉毅之气，镇远张希文、黄平、李琳，麻哈周恭寿，贵阳严俨，贵筑张寿龄，皆一时有志之士。普定黄禄贞，心平气定，与人无争，思想绵密，尤精于算学格致：曾据其算学心得自造正弦表，绘自行车图，并以纸制地球仪，其上所绘地图、界线等皆精准如轨；惜其无名师为之前导，无仪器图书以资其用，使之于津、沪、楚、鄂之区，所造远矣。

他走了，带着遗憾走了，从此一别，天地遥遥！

他是一把号角，在西南一隅之地，吹响了近代化的先声，同时，也吹皱了天子脚下中南海里的一池春水：

中国之学，万劫而不可磨灭者，惟义理也；洋货虽极流通，而中国之义理，不能废也；西学虽极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实，两者不可偏执也；孔孟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可用于世也。

他要赶快回去，回到皇帝身边去，他知道皇帝在等着他。

还有一个人也在等他，那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这一年，张伯苓21岁。是一名清朝的海军战士，随同济舰到威海卫。在威海卫，他亲身参加了“国帜三易”的仪式：

第一天，降下日本国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帝国旗。看见国旗像戏法一样的变换，看见大清水兵的一脸麻木相，他震撼了。他在问自己：这样的战士，船坚炮利又有何用？

出于对同样问题的回答，鲁迅弃医而选择了文学，张伯苓则告别行伍，转入教育救国之路。

2. 新政之旅：从江湖到庙堂

(1)江湖忧思

1898年，严修39岁。严修由贵阳启程返京。

先与省城诸官员巡抚、藩台、臬台、道台、府台以至首县、学官等，于省官厅揖别；又与参将、游击、统带及练营诸武官，于各职所揖别。士子依依，夹道而送者，相接数十余里。

各书院肄业生，亦于归途必经之黄泥哨客栈聚会，与恩师饯别；挥手从兹去，渐行渐远，至贵定，学生李维钰郊迎；至镇远，学生孙世杰、滕学圣、曾应星迎拜。

从镇远走水路，至险滩大王滩，纤缆中断，舟船于急流中回旋，众水手立即以铁椎橹左右撑石，重掷纤缆，岸上置十五人挽缆，船才得以缓行。大小礁石，参差卧水；水遇礁阻，湍急澎湃；船逆激浪，声似暴雨。众篙突刺，或避或就，久而终过。

有惊无险，想必严修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晃州进入曹家溪。该地属贵州玉屏郡辖，却插入湘省，四周为湘人所围。境内直径仅半里多，地无居民，仅居税吏二三十家，管理湘黔边贸。进口税多，出口税少，年税额有三万金。

进入湘界，泊炮台湾，风闻陈宝箴新政而欣慰。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修水)人时任湖南巡抚。以湖南为新政试验基地，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办电报、轮船、枪弹厂，修湘粤铁路，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等，并推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参与新政。

1月27日，准严修奏请，开经济特科。谕内阁：经济专科，一为岁举，一为特科，先行特科，次行岁举。特科约以六事：

一曰内政，凡考求方舆险要、邦国利病、民情风俗者隶之；

二曰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隶之；

三曰理财，凡考求税则、矿产、农功、商务者隶之；

四曰经武，凡考求行军、布阵、管驾、测量者隶之；

五曰格物，凡考求中西算学、声光化电者隶之；

六曰考工，凡考求名物、象数、制造、工程者隶之。

由三品以上京堂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无论已仕未仕，注明其人何所专长，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在保和殿试以策论。

以后或十年一举，或二十年一举，候旨举行，不为常例。

岁举则于每届乡试年份，录送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乡试：初场试专门题，次场试时务题，三场试四书文。

中式名曰经济科举人，与文闱举人同场覆试。

会试中式经济科贡士者，亦一体覆试殿试朝考。

光绪帝以严修"所议特科、岁举两途，询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故命总理事务衙门会同礼部"著照所请行"，其"详细章程，妥议具奏"。又勉励"该生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争自濯磨，力图上进，用副朝廷旁求俊乂至意"《德宗实录》卷414，页4—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上谕恭跋》：今年正月上谕举行经济特科之外，更举经济常试，试时务策论及政治、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学，实为非常之举，已开民智而救八股愚民之害者也。

冰河终于解冻，变法之势，如幽幽潜流，而渐趋明朗，而骤起洪波。康有为继严修之后，再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只手掀起大波澜。接着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又奏请造自强股票，筹借华款，以推动变法。清廷准奏，遂颁发昭信股票，周年以五厘行息，分二十年本利完讫。期间，股票可以自由买卖，每届还期，准抵地丁盐课。自王公及将军督抚以下均须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光绪又旨准开办京师大学堂，于是举国一派变法呼声。

严修穿行在湖南境内，耳闻目睹湖南新政，亦喜亦忧。

继续舟行，从湘西辰州溯辰水而下，有群鸦绕船而飞，船童以肉掷向空中，群鸦争相扑啄，其势有空中搏击而得者，有踏波点水而得者，妙趣横生。

至湖南桃源，有故人登船相见，言及长沙时事。

听说英国人在长沙活动频繁，并欲设码头。又闻去年八月十五，武陵龙舟赛会，游人如蚁，远及数百里。一少年见状，戏言："今

日之人多若许，若打教堂却好也。”恰好为一信西教的“保正”听到，遂扭至“自家之茶肆”。众人闻之愤愤，以为不过一童子戏言，何至于此。于是有数十人喧嚣至“茶肆”，却不见童子。有一人言，童子已死矣。众怒不可遏，遂蜂拥拆毁教堂，事后赔偿九千缗。“打教堂”虽为一童子戏言，却能一呼百应，闻之心惊。

至常德，留住一日，见市面通行纸钱票，而贬抑银钱，若以银兑现钱，每千银短兑百余钱。“以楮为币，济其穷可也，无币之楮可常恃乎？”严修担心通货膨胀。

由湘江入洞庭湖，落木萧萧，月照一孤舟。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严修忧心忡忡。日出江湖，霞蒸云梦，乃天地英雄气凝结。观长江而悲怆，为君忧，为民忧，为英雄祭——水天一色皆碧血。

至汉口，登岸一游。参观湖北织布局，目睹中国近代工业：其中有摇纱厂、花厂、织布厂、纺纱厂、折布房、储布房等等，有工人二千余名，童工居其大半，惟织布车间童工较少，工人按月领取工资，有月薪二千元者。其所处街道，亦因之而命名为纱局新街。

市面上，严修第一次见湖北新造龙洋重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比官钱好。船泊汉口龙王庙对岸，严修上岸至湖广总督署，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谒香帅，须发鬈，非复甲申1884年，时严修25岁，先后拜访过张之洞与张佩纶过津时旧观；然精神充溢，态度依然；自称衰老，殊不然也。”

严修与同行者驾小舟游江汉。

江水平阔，帆樯林立；一水拥戴三镇，瓦屋栉比，阁檐飞抱；一山雍卧尽头，晴川衔郁，云树浴波。真乃揽胜骋怀之最佳处。

改乘江轮，顺流东下。时长江流域，有太古、怡和、招商局三家轮船公司。太古、怡和属外资公司，规定乘客若有随从等附船同行者，可享受免票待遇。而招商局则无此例，且轮船设备亦不如外船，但严修一行还是乘招商局的江裕轮。

严修在江裕轮上，凭窗望江，江风拂面，江雨又起。

此去上海，一来顺路，二为祭祖。他的返程路线是，由黔入湘，由湘入长江，至汉口，乘江轮，顺流东下，至上海，换海轮，沿海运航线，回津门。水路返京，可免敲诈勒索之烦，不受颠沛流离之苦，由

西南而东南，由东南而华北，可谓行万里路。

于上海逗留数日，拜师，访友，观光，然后回乡祭祖。祖籍宁波，故乡慈溪，由上海转轮而下，朝发夕至，极为方便。年近不惑，而欲衣锦还乡，是随俗也。此番回乡，以尊祖敬宗为体，以机器轮船为用，乃中体西用也。

船上，晤赵幼江。赵氏与徐菊人先生为故交，知菊人现状颇可菊人于1897年初经袁世凯奏，调到天津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给以"咨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

沿江而下，直至上海，江裕轮入吴淞口，停泊在金利源码头。

(2)上海见闻

时上海可谓西方物质文明的展览馆，严修等人一饱眼福。

严修乘肩舆赴泰安栈在英租界三洋泾桥，澄兄、荣弟则新潮，辞肩舆而乘洋车。

晚上，严修与二人在上海天福茶园观剧，第一次见到电灯，比江船上的煤气灯，光胜百倍，而且遍布大街小巷。

《申报》、《沪报》午前直接送到客房中《申报》一张十钱，《沪报》五钱，与严修在黔省时信息闭塞大不相同。上街观光，他描述当日之上海：四马路今西藏路最为繁盛之区，礼拜又是闲旷之日。马车人车，轨迹相叠，风驰雷动，震耳骇目。其人则士女溷杂，良贱不辨；茫茫尘海，不知所终极也。

对这种甚嚣尘上的文明，他颇感不适，便寻了个清静处，想偷一时之闲。至格致书室，坐五层楼上，啜茗小食，时方日晡，坐客尚稀。然而司茶者屡谕，司巾者屡沃，卖物者于耳边喋喋不休，何闲之有？有卖上海《花报》及《金瓶梅》之属，缠扰殊可厌。

惟售报者差强人意，有《沪报》、《申报》、《新闻报》、《大公报》、《苏报》、《捷报》等类，每纸或十文或七八文或三四文不等。他买了《苏报》、《新闻报》各一份，便自个儿翻阅了起来。

在上海，他拜会了盛宣怀，称"盛杏师"。其时，适逢盛宣怀主办中国通商银行，严信厚严修称"筱舫叔"为该行总董。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常州)人，早年科第

不佳，以诸生纳资为一小主事。李鸿章独具只眼，延其入幕，一手提携之。李鸿章失势后，盛承其洋务之衣钵，而与张之洞分庭抗礼。

盛宣怀春风得意，侃侃而谈，严修恭听完毕，即告辞，乘船赴宁波老家扫墓。他与严子均严修堂弟，严信厚之子同行，每人船价十元，定来回则十五元。船上，晚饭食西餐，"殊不适口"，始知"盖向所食者，虽洋式而实兼华味"。饭后，茶房来请，言有洋人邀其过谈，洋人不通中语，华人为之翻译。谈次，询知两人俱在宁波纺纱局筱舫叔纠股开立。洋人以吕宋烟、荷兰水红色，亦酒类也款待他，他饮了半杯，舟已至洋面，陡觉眩晕，遂告辞。船抵宁波，登江北岸，住源丰官银号。

次日，严修一行至慈溪东乡宗祠行祭礼。

正午，具衣冠行祭宗礼，奠酒三次，每一次均以三跪九叩礼；次行祭祖礼，先中堂，次右昭，后左穆，均四拜而已；再次行尊长礼，以宗长、族长、房长上座，严修拜之。拜毕，子均告之，宗礼应是一次三叩，共三次九叩。多拜无坏，严修莞尔。

遂返沪，至江左书林，购《江忠烈集》、《三鱼堂集》、《五纬捷算》、《使俄草》、《兵书五种》、《毛诗品物图》等书；转至实学报馆，购《卫生要旨》、《俄史辑译》、《中国度支考》、《洋文书目》、《列国变通兴盛记》、《圆锥曲线说》等书。

子均来请，谓筱舫叔于四马路一品香设宴。席间洋菜、洋酒、刀叉、歌妓灿然，子均指一雏妓侍坐其侧，谓筱舫叔特为其召。雏妓不过十三四龄，骚首弄姿，严修啼笑皆非，好不尴尬，怜之，惜之，遂作老夫子状，望妓而叹曰：可惨也！

应酬毕，稍事休息，严修便去拜访宋则久先生天津人，与严修至交。两人在上海相见，难免感慨系之，论及中国目前金融弊端，宋颇为忧虑。他认为，银钱虽已通行，而物价却以铜钱论价，是银钱以货论，而不以币论也。必使物价照银钱论高低，而铜钱易银钱，定一不易之价最妙。他建议，以铜钱每千钱当一银钱，由官设一局，专门交易。以英国为例。英国专用金币，其制每十二便士易一先令，每二十先令易一金镑，用便士者不过四十枚，四十枚以上则概用先令。先令不过二十枚，二十枚以上则概用金镑。便士与先令不过充畸零

之小数，而正项著重者仍在金也。

今中国金银并用，亦可参用其法，九十九以下概用铜钱，百钱则用小银钱，至九百九十九皆然，千钱则用大银钱。是以铜钱充畸零，而正项著重则在银也。又言铜钱之昂，由于毁铸之多。盖毁钱铸器，价可增数倍。莫如尽毁旧式之钱而改铸之，精其式而轻其质，使销毁者，无可冀之利，则此弊自绝。

严修然之，不胜今昔，话别后，遂启程返津。

江南三月，如诗如画，而他却视若无睹。思虑重重，行色匆匆，返京述职，隐隐有些不安，瞻念前途，难免不寒而栗。

海轮新裕轮，亦为招商局所属北驶，归心似箭。船上拥挤不堪，偶望窗外，见一人堆行李于船栏之内，而徒倚以待。遂开窗问其姓名，曰南海康姓。问其目的地及事宜，答曰进京访人。细问之，方知其为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因伴送梁启超而来也。梁启超带病而行，广仁左右护之；严修等速与船家张罗舱位，安排妥当。随后梁、康二君来访，交谈一小时多。广仁谓梁君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谈兴颇浓，未几乃去休息。

次日，严修至大菜间第四号回访梁启超，坐中遇汪钟霖，言《蒙学报》事。《蒙学报》于 1897 年 11 月创刊于上海，叶汉、汪钟霖主编，由上海蒙学报馆出版。内容系译述西方通俗儿童作品，读者分五岁至七岁为一界，八岁至十二岁为一界，十三岁至十八岁为一界，十八岁以上为一界。畅谈甚久，浑忘卓如梁启超字之病。

新裕轮船行甚快，较常日加速，盖因盛宣怀督办之公子在船，盛督办有吩咐。船行三日，抵达塘沽。按惯例船每次进口不能靠火车码头，停泊后必须以驳船渡之。然此次竟直靠码头，由舟而车，一转移间耳，省便之至。改乘火车，经老龙头、新河、军粮城等站。晚，严修一行终于回家。

(3)皇帝新政

于天津本宅，清算其居黔三年用度。不仅囊宦如洗，而且还负债累累；虽问心无愧，对家人却难免自责。写借据两张，托至戚举债，向天津“益厚堂”钱庄借钱八千缗，又两千金。

债务理毕，晋京候见。接苏拉清代内廷承担粗重杂役者，称苏拉。宫内各处及内阁、军机处、内务府等部门均有之口信，言皇上已驻颐和园。欲赴园，候苏拉不至。后有送信来者，言"李苏拉虽未来，必候于园矣，请即往勿疑也"。乃行，赶至颐和园宫门外，宿九卿朝房。次日入觐，见光绪帝，奏对十余句。

午前即回五老胡同旧所，午后命智庸儿钞奏对语。

述职完毕，稍息数日，去拜谒"李傅相"，李虽势不如前，严修则恭谨有加。贤良寺内，落花无言，两人倾谈，纵论黔中诸吏，皆有详语。

告别李鸿章，欲拜见徐桐师，然因奏开经济特科，已失欢于座师。徐桐命家人曰：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修怏怏而归，然执弟子礼甚恭。后徐于庚子之难，自缢而死，悲悼之余，客有述此事者，严修泣曰：吾师仁人，为人误耳。

又拜会徐艺甫及子静前辈，时康有为亦在坐。心仪已久，相见恨晚。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严洗耳恭听，素敬有加，每言必称"康君长素"也。畅谈良久，严修尽兴而归。

接梁卓如来函，康、梁约严修至江米巷东交民巷办馆见日本公使。康、梁联袂而至，然而公使翻译患病，只好改期再聚。

这一天，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䜣卒1833年生。

这个西洋潮里的弄潮儿，终于两眼长闭，一命呜呼了。

然而他的事业没有停止，活着的人总还要做事。张之洞创办湖北方言学堂后并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武汉大学前身。方言学堂，顾名思义，是把外语作为地方方言看待，仍未脱天下观的藩篱。

御使李盛铎奏请开馆译书，并购寄全部日本所译西书，以便译印。甲午海战后，国人有感于日本西化程度高、速度快，与其舍近求远于西洋异种文化背景，毋宁就近取材于一衣带水之同一文化背景。此前，国人自大，小看日本，而日本却像牛虻一样，紧贴在帝国臃肿的背上，贪婪地汲取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欲壑难填。甲午一战，小日本的刺刀捅破了帝国洋务运动的泡沫，国人如梦初醒，不得不对小日本刮目相看，此后，国人引进西学大都借道日本，拿来日本化了的西学。

新的事物在帝国的体制里不紧不慢地生长，可年轻的皇帝却要只争朝夕。国土沦丧，他椎心泣血，他不愿做儿皇帝，更不想做亡国之君。于是，他当机立断，不惜孤注一掷，要扭转乾坤。

6月11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悲壮的日子。

这一天，年轻的皇帝拉开了悲剧的序幕：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皇帝血气方刚，举措雷厉风行，然而欲速不达。那位口口声声要颐养天年的慈禧老太太，却在幕后翻云覆雨。她不能容忍儿皇帝自作主张，翻出她的手心。

6月15日，慈禧将帝师翁同龢开缺回原籍，断皇帝手臂。

6月16日，无人可用的皇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并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官名，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可直接上奏皇帝书上行走，又详细询问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字菊生，光绪进士在北京筹办通译学堂的情况。

帝后党争方兴，严修无所适从，只好回家。途经小站，他先去看望徐世昌菊人兄。至参谋营务处小营盘，菊人又引见袁世凯，严修称"袁慰亭观察"。次日午后，同菊人到工程营、兵官学堂瞻仰规制，听学生诵德文。又参观小站新军建制，至炮队营，段统领祺瑞竭诚迎待，至学堂看功课册。严修叹曰："段于汉文、测绘、算学、炮操，无所不通，年不过三十许，美才也。"此为严修识段之始。

6月21日，同菊人赴营后校场观新式大操，先步队，后马队。

观后辞别菊人，菊人送至十里之余，又备茶座，小坐略叙终别。

6月23日，光绪下诏，命自下科始，废八股，改试策论。同日，迫于太后压力，又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荣禄为太后心腹，统三军于皇帝肘腋之下，皇帝如坐针毡。

6月25日，康有为奏请奖励工艺创新，并进呈《法国变政考》。

6月28日，旨准将广东举人梁启超在上海集资开设的译书局改为译书官局，官督商办，月拨经费银二千两，着重翻译各国政法史传及科技等书。

6月30日，清廷再次下令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命各省学政奉谕即行，生童岁科试一律改为策论，毋庸候至下届更改。

7月2日，严修已回到天津。下午，御史宋伯鲁来，一见严修便

说："果如子所料，策论归并经济科，本届岁试，一律废八股矣。"然而开经济特科，并非一帆风顺，除座师徐桐反对外，其他守旧大臣也一再阻挠，迁延观望，数月下来，不肯荐人。御史宋伯鲁一再上书，于是皇帝继续下诏催迫。

7月3日，清廷准军机大臣会同总署王大臣奏开设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下诏开京师大学堂，派吏部尚书孙家鼐管理，将所有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并入大学堂。

7月4日，严修赴京。友人"雨农之弟润沅太史来，其车中携有张芗帅新著《劝学篇》，辄借留之。晚看《劝学篇》至终卷"《劝学篇》风靡一时，印销量不下二百万。1900年纽约出版英译本，名为《中国惟一的希望》。

其《序》曰："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吾悲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又云"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义欲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7月10日，皇帝下诏，命改各省书院为学校，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改为学堂由此兴起庙产兴学运动，影响近半个世纪。而在这方面成绩极为突出的是天津，天津则是在严修及其同志的努力下，成为全国兴学运动的典范。与之遥相呼应，湖南士绅公恳巡抚整顿书院：定教法，端师范，改革山长制度。

7月13日，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凡士民著书、制器及振兴工艺等突出者，均应给予奖励。各省督抚须将奖励章程及条例出示晓谕，以动劝听，以开风气。

开经济特科诏下数月，而响应者寥寥无几，众大臣袖手旁观。侍读学士兼礼部侍郎徐致靖上疏请废八股，改试策论。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继续上书，请废八股而改策论。至是再下诏颁布《经济

特科章程》，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府学政，荐举堪于经济特科者；令京外大员保荐精于制造、驾驶、声、光、化、电诸学之才。皇帝性急，再谕内阁：遵议经济特科章程开章呈览一折，所拟章程六条，当属详备，即著照所请行。著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于三个月内，迅速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一俟咨送人数足敷考选，即可随时奏请定期举行，不必俟各省汇齐，再行请旨，用副朝廷侧席求贤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德宗实录》卷420页12。

何以阻力如此大？梁启超云：开经济特科"盖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戊戌政变记》。故张之洞、陈宝箴奏称："宜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

又据康有为《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言：宋伯鲁折上，上即令枢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部议，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乃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

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乃命下之日，欢声雷动。去千年之弊，非皇上之圣武，岂能若此之刚断乎？

催开经济特科诏下后，张之洞、李端棻首举数十人。

于是，举者纷起，旬日内达数百人。又恐有滥保者，御史郑思赞"特科大典请严定滥保处分"一折奏曰：经济特科之设，朝廷原期拔取真材以备贤良之选，非为幸进之徒，开营谋之路。中外臣工，例得保送特科者，务当屏去私心，汲引善类。

为此皇帝下谕，保送经济特科者，不得瞻徇情面，滥保私人。如有言行不符，及干求、奔竞等情，一经查出，定将原保大臣从严惩处《德宗实录》卷420页14。

京城新政轰轰烈烈，而严修回京后却静如处子。他的冷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智慧，而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秉性。君子不党，仁者不争，皇帝于他有知遇之恩，他却不愿卷入帝后党争；他与康、梁观

点一致，却不想与座师徐桐为敌。

从政治中心退居边缘，从台上主角退居为台下看客，他处之泰然，安之若素。然而他的座师徐桐却在帝后党争的漩涡里越陷越深，不仅与维新党人势不两立，而且暗中与皇帝为敌，连严修也被他逐出门墙。

清廷下命嗣后停止朝考及罢试诗赋，以配合推行经济特科。严修送长子智崇赴县试，参与经济特科考试。适伯兄香孙病倒，智崇未与应考，与父同侍大伯。不久，香孙病逝，其侧室金夫人服毒殉夫。

得知菊人现在天津，不日来京。遂修函问其来京日期，嘱菊人兄来京即宿自家处。

期间，内阁学士上折请仿"泰西设议院，以期上下一心"。梁启超在上海设编译学堂，旨准所编译之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9月17日，康有为离京出走，新政岌岌可危。其时，皇帝特擢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参赞军机事，专理新政，时谓之"四贵"。谭、杨等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粪土王侯，又愤皇上受制，不平则鸣。上手诏答之曰：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

20日，菊人来京，严修留饭，与谈颇多。因家兄病故，家务无人主管；又因奏设经济特科得罪恩师徐桐，其翰林院职务一并被免，空一编修，而帝后党争一触即发，实无留京之必要。于是，令夫人回京寓检点，退京寓之房，全眷返津。

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

先是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暗中与庆亲王奕劻谋划，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密疏拟好，杨、庞二人袖疏付奕劻，由奕劻转达颐和园。老太太出其不意，乘光绪帝诣宫门请安时，由间道入西直门，直抵皇帝寝宫，将群臣章疏全部带走。皇帝车驾仓皇而返，老太太召儿皇帝，怒斥曰：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遂传懿旨，以皇帝生病为由，临朝训政。

同治时期，两宫之垂帘也，皇帝坐在中间，孝贞、孝钦两后蔽以

纱幕，左右对面而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时，老太太终于如愿以偿，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连垂帘的幌子也不挂了，与皇帝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皇帝默默不言，全凭老太太作主，有时老太太不耐烦，也让皇帝发表意见，皇帝嘿嘿而已，至多一二语即止矣。某日，皇帝偶读《三国演义》，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见清恽毓鼎撰《清光绪帝外传》

老太太训政，变本加厉，极尽复辟之能事，不仅将皇帝新政全部推翻，而且大开杀戒，使士大夫畏新政如猛虎，谈之色变。

好在康有为早已离京出走，梁启超继而逃往日本，他们要留着性命东山再起；还有一个不怕死的谭嗣同，大声疾呼"我自横刀向天笑"，要血祭新政。

28日，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六君子死难。

(4)政失求诸野

严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期间又很少在京，亦未参与康、梁之事，故能幸免于难。其时，他已在天津料理家务，继其兄任严氏家长，因仍在朝中任职，便把自己作为家长的职责委托给他的一个侄子和两个儿子，由三人组成"当家"来共同管理家族经济，由他定期查账。

10月1日，慈禧下令，销毁康有为著作书籍版片。9日，令查禁各省报馆，严拿主笔，查封天津《国闻报》，禁止联名结社等。又恢复乡、会试及岁、科考旧制，停罢经济特科。

慈禧谕曰：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贴、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德宗实录》卷428页7—8。

11月1日，恢复武场童试及乡会试旧制，按马步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试。2日，慈禧命停办船厂，暂缓造船，经费解交部库。13日再次下诏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停止经济特科。

刘坤一奏，书院不必改，学校不必停，宜兼收并蓄，以广造局。

清政府允许农学商学设会办报，但不准妄议时政。

至此，新政完全失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真正的皇帝，还是没有逃出老妇人的手掌心。这样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有，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此发问和反思。老太太政治我们司空见惯，可我们从来没有研究过“老太太政治文化”。

碰上一位好弄政治的老太太，皇帝的日子多半都不好过，更何况由老太太一手培育成长起来的儿皇帝，当然就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我们不必说老太太如何老谋深算，如何富于手腕，更不必说在历史的进程中，良知常常输给了阴谋，英雄总是受制于妇人。单是老太太对于儿皇帝能废立自主，而儿皇帝连想都不敢想废老太太，我们就知道谁在稳操胜券，主宰帝国摇摇欲坠的命运了。

我们大可不必谴责老太太的无情与无知，扼杀了爱新觉罗氏的最后一点英雄主义，其实真正置皇帝于死地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一个字：孝。在这个字面前，多少英雄豪杰退避三舍，连历史的进程也难以穿透它的屏障而裹足不前。一个孝字，便是老太太政治权威生生不息的源泉。那些支持皇帝新政的封疆大吏们，不能也不敢支持皇帝不孝，面对这个孝字，他们什么也不说，只能默默地保全皇帝以示尽忠。

谭嗣同等说得太多，他们喋喋不休的结果，便导致了所谓袁世凯告密。袁世凯可以说，只要皇帝一声令下，诛荣禄如屠狗尔。但在这个孝字面前，他只能无所作为。谭嗣同还要有所作为，等待他的便只有死路一条。

英雄进当铺，用头颅作抵押。谭嗣同要冲决“孝”的网罗，还我头来！严修不可能像谭嗣同一样，用头颅去碰撞“孝”的铁幕，他像张之洞等人一样，既不敢支持皇帝不孝，又不能不对皇帝尽忠。

对皇帝尽忠，就要将新政进行到底，张之洞等人如此，严修亦如此。他不能在朝尽忠，就在野尽忠；京城血雨腥风，他便回天津老家。我们都知道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是皇帝新政仅存的硕果，有多少人知道南开系列学校更是新政在民间的深化和延续呢？

他要做一个实验，一个伟大的实验：将传统耕读社会的私塾学

校，改变成近代工商社会的公众学校；他需要一个合作者，一个目光远大、志趣高尚的合作者；历史提供了一个契机，他在天津知遇张伯苓。

1897 年张伯苓以清廷一海军小兵，参加了威海卫的易旗仪式。国耻椎心，二十年后，他依然在作泣血的回忆：

> 余时在北洋水师，感触种种国耻，知我之不如彼者，由于我之个人不如彼之个人。故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惟一方法，厥在教育。

1898 年，他决定退役，弃武从文，躬身教育，适严先生亦返津。两人一见如故，一见相知，一个是名满天下的翰林，一个是默默无闻的小兵，一个是远离官场的政治边缘人，一个是为生计奔波而尚无着落的退伍兵。

身份并不重要，贵在心心相印；生计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教育救国如何下手，怎样实行？两人决定，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11 月 28 日，严修在天津家宅设学馆，聘请张伯苓来教授子侄五人：智崇、智怡、智庸、智钟、智惺及故人子陶孟和字履恭，陶孟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另请一位先生教文史，但时时更换，后终于请得老友天津宿儒陶仲明先生陶孟和之父。

该蒙馆半日读经书，半日习英文、数学、理化诸科，中西合璧，中体西用，一缕新私学的曙光从严氏家馆中冉冉升起。

四、从旧私塾到新私学

1. 从己亥立储到庚子新政

1899 年，严修 40 岁。

严修蛰居天津，看似潜龙勿用。

然而他的朋友梁启超，却思想如马达，行动如旋风，凭一支天行健之笔，为洞穴之民送来真理的缕缕阳光，阵阵清风。

梁启超逃亡日本，痛定思痛，作《戊戌政变记》；又游夏威夷，作《夏威夷游记》，提出“诗界革命”、“文学革命”，矛头直指桐城派古文，提倡新文化。富有意味的是，洋务派重镇，几乎都是桐城派古文高手，或是桐城派古文的倡导者，梁的文章，与其说是文化批判，毋宁说是政治宣言。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口诛笔伐，声讨后党；又连载谭嗣同《仁学》，为谭杀身成仁而奠学术之礼，作真理之祭。

梁翩然如鹤，自由飞翔，然而皇帝却被囚于深宫之中，每天看着自己的影子，度日如年。深爱着他的珍、瑾二妃，也被老太太打入冷宫，受尽折磨。可那些老顽固们，还不放过皇帝，他们害怕太后先逝，皇帝东山再起。

他们先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继而向老太太摇唇鼓舌，要公开废了皇帝，另立新君。其领班人物，还是严修那位恩师徐桐。一付老

脸，一张老嘴，一口老牙，必欲置皇帝于死地。“老而不死之谓贼”，此之谓也?!

废立之事，关系到国体，老太太不敢妄为，咨询实力派人物荣禄。荣禄提出，各国政府皆认同皇帝，骤然废君，必然导致列国干涉，不如立储以待，让列国渐渐适应，然后再图废立。

于是废立之事，暂时束之高阁，然而个中消息，却不胫而走，惊动中外。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为皇帝奔走呼号。

各省督抚装聋作哑，静观待变，却有一个商人拍案而起，要为皇帝伸张正义。此人名曰经元善浙江上虞人，字莲珊，在沪经商，1882至1883年间，直隶地区水灾，他全力赈济，获清廷奖励十余次，盛宣怀督办电报时，他以30万两入股，后被任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他风闻废立之事，一时性起，便风风火火地奔走起来。

新政之前浪甫息，革命之新潮又起。何启、胡礼垣撰《〈劝学篇〉书后》，批判张之洞《劝学篇》，宣传天赋人权，阐释民权原理，强调国家主权。连更加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也开始进入中国了。《万国公报》二、三、四月号连载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即英人颉德(Benjamin Kidd)《社会进化论》中译本首次提到马克思，并引用《资本论》的若干观点。

严修的一只脚刚迈入新政的门槛，另一只脚尚在进退两难之际，就遇到戊戌政变的当头一棒，维新失败后，虽不必如康梁那样亡命海外，削职遣返之遭遇却难免。

国事难为，他便回家去处理家务。家是国的原点，“齐家”是“治国”前的历练。他把“齐家”的重心放在教育上，将新式教育引入私塾，将私塾改造成公众学校，新政难以“治国”，不妨先作“齐家”的实验。南开新私学，便在这“齐家”的实验里诞生了。

他除了延续新政，作“齐家”的实验外，还有一笔旧道德的义务要他来承担，由他来履行。他是一个通人，在他的思想里，本来就没有新与旧的鸿沟，何况还有一个在天之灵，需要他来慰藉。

伯兄香孙死后，其侧室金氏殉夫。严修本是主张改嫁的，但金氏既殉，他便按旧道德的标准，为金氏请旌表金孺人请旌表一事，已于年前十二月十三日由礼部题请，奉旨准其旌表建坊入祠，又请文美斋陈

瑞亭来商刊金孺人殉节事略。

不惑之年，严修感慨万千，遂自撰七律《四十自述》：

我年二十失双亲，又作孤儿二十春。
八载京华糜廪禄，一官天末厌风尘。
心伤岛国沧桑古，肠断鸽原墓草新。
除却向平婚嫁事，世间无所用斯人。

宦海沉浮已八年，一腔抱负难施展，吊逝兄，伤烈嫂，论儿孙之婚嫁，伤心人别有怀抱。徐菊人时时来访，他深知老友痛楚，相聚畅谈，不亦乐乎。“世间无所用斯人”！这是一种英雄末世的咏叹。

他不敢像康有为那样天马行空，自命“长素”素者，素王也，康欲超越孔子；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在新的政治文化中作自由泳。

他在新旧交替之际作出抉择，他要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这已经与末世清朝无关，而是与文化传统血肉难分。

他天生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当革命思潮云涌之时，他竟然无动于衷。他也不是埋首书斋的学者，尽管不乏学术慧眼，却无雕龙大手笔。他读书，也藏书，却无意成为藏书家；他读史，也好史，却无意收藏历史，做历史学家。他的个性里没有多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圣人气象，也没有多少基于帝王之学的雄才大略，更不曾受过天赋人权的宗教洗礼，然而他却有着基于商人之子而与生俱来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策略。

当孙中山为革命奔走之际，他在家里办学；当章炳麟基于古文经学而作的革命宣言《訄书》在苏州付梓问世之际，他却在家里为旧道德树碑立传；当天津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字后经罗振玉寻访，方知甲骨系由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这次发现与敦煌藏经、内阁大库档案和汉晋木简的发现同称为近代历史学的“四大发现”之时，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读《说文解字》。

1900年，严修41岁。

新年伊始，严修又忙着为次子智怡完婚娶曹敏斋之长女，与直隶名门曹琨家族联姻。

慈禧老太太却忙着给儿皇帝送终，她先是迫使光绪帝立9岁

的堂侄溥傿为大阿哥，继而准备于旧历元旦废儿皇帝立孙皇帝改元"保庆"，此一举措史称"己亥立储"。

老太太倒行逆施，激怒了一位侠肝义胆的商人，他就是那位以兴义赈、办电报而闻名天下的经元善。他闻讯而动，夜半既致电时在京城的盛宣怀，请其联合朝臣力谏太后，盛复电拒绝上奏，并转告事已成定局，无可挽回。经元善不以为然，他决心力挽狂澜。

他发动上海绅商 1231 人，由他领衔，联名通电，反对立储，恳请光绪帝执政。此电一出，如风雷乍起，震撼中外。各界人士群起响应，各地反立储通电、公告纷飞北京，上海工商界集会决议，如清廷立储改元，即罢市以对抗。

老太太闻之心惊，不敢一意孤行。乃命李鸿章探外使，法使首先反对；又电询疆臣刘坤一，刘复电，称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废立之事，遂付诸东流。

立储未成，老太太恼羞成怒，必欲置经元善于死地。于是，盛宣怀以亏款潜逃罪通缉经元善，经元善乘英商轮船避难至澳门。

废立之事方罢，义和团又起。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由山东北上津、京，聚众灭洋。老太太鬼使神差，竟以为民心可用，洋人可灭。老太太最怕洋人，她倒不怕向洋人割地赔款，却怕洋人支持儿皇帝与他分庭抗礼。

儿皇帝是扎在她心头肉上的一根刺，而洋人时不时的便要挑动这根刺，使她胆战心惊。但愿义和团有神功附体，刀枪不入，替她把洋人赶出去，她好痛痛快快地拔掉这根刺。

还有比老太太更着急的，那就是溥傿的父亲端郡王载漪，他的儿子被立为皇储，他便公然与光绪帝为敌。

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要借助团民的势力，驱逐洋人，打倒帝党，为他的儿子登基、为他当摄政王铺平道路。

还有一个跟着着急的，他就是严修的恩师徐桐。徐桐号称与洋人不共戴天，对于洋务，他嗤之以鼻；只要反对洋人，他便坚决支持，何况他还是溥傿的老师，当然要义无反顾地辅佐溥傿。

当时对于义和团运动，朝廷内部有剿、抚两派，老太太曾经举棋不定，她一度接受荣禄的建议，欲调李鸿章、袁世凯进京维持大

局。然而载漪略施小计，她便铸成大错。

6月16日，是个关键性的日子，这一天的下午，老太太于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对内剿、抚，对外和、战问题。

帝后两党政治立场泾渭分明，帝党代表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主张对内剿匪，对外和谈，后党头目载漪等主张对内安抚利用，对外宣战，双方唇枪舌战，相持不下。为促使老太太下定决心，载漪等人于是日晚即伪造列强"归政照会"四条，其一即是"令皇太后归政"，为了使老太太信以为真，他们故意拐了一个弯，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

荣禄得信，心急如焚，一夜未眠，拂晓即报慈禧。太后闻讯，气急败坏，不问青红皂白，狂呼："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即命各省督抚发兵驰援京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均表示反战。帝党袁昶于是再上《急救目前危局折》，坚持主和。

载漪等为了坚定老太太主战信心，竟不惜弄虚作假，请老太太观看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神功。试以洋枪，卸去弹头，仅以火药射之，表演者以神功附体，而能岿然不动。老太太凤颜大悦，以为民心可用，神功可恃。于是，她撇开儿皇帝，独自召集枢臣会议。21日，慈禧以儿皇帝的名义，颁布宣战上谕。载漪等更是洋洋得意，以为从此可以为所欲为，竟率众进宫，欲弑儿皇帝。老太太见他闹得太不像话，遂出面加以制止。

载漪闹得欢，而荣禄却不动声色。慈禧命他统兵围攻大使馆，他奉命行事。他手下一军官，架起从德国购置的开花大炮，远远地瞄准使馆区，正欲放炮，忽然灵机一动，跑去请示荣禄，请荣禄下令。荣禄不敢下令，遂亦灵机一动，说：你只管开炮，让她听听就行。军官得令，调转炮口，大放空炮。老太太听了，声声入耳，心花怒放。荣禄识时务，又会糊弄老太太，他知道老太太心虚，对于洋人，不能不打，又不敢真打。

"打"是政治，老太太以"打"划线，划出两条政治路线。"打"是爱国主义路线，"不打"当然就是卖国主义路线。她老人家便是爱国主义路线的代表，儿皇帝呢，对不起，只能去当卖国主义的傀儡了。既然是卖国贼，便人人得而诛之，除了儿皇帝，其余一律杀无赦。儿

皇帝是她手里的一张底牌，握着这张底牌，她可以向洋人讨价还价，她对各省封疆大吏也好交待。她毕竟不是武则天，没有儿皇帝，她也玩不转。

28日，老太太突然放出杀手锏，杀帝党成员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8月11日，又杀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

一个"打"字，把军队调动起来了，把民众发动起来了，既显示了老太太的政治手腕，更显示了老太太的政治实力，她要借着这个"打"字，发动第二次政变。

但她还是见识短，东南各省封疆大吏多不买她的账。

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互约，凡6月20日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老太太令他们"召集义民成团"，他们声称"并无拳会之党可招"；老太太要"暂行停还洋款"，他们便以洋款若停，牵动厘金，"京饷及北上诸军饷无从接济"相要挟；老太太再三电令李鸿章来京，李却迁延观望，辞不受命。他们发起"东南互保"，互保范围很快由两江、湖广发展到闽浙、两广、直隶、川陕等地，除了在京城，老太太还能呼风唤雨，大半个中国她早已指挥不灵。她调动的那些军队，真打的不堪一击，假打的望风而逃。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

因事起仓促，严修全家未及逃避，又有亲戚、朋友等48家来投。张伯苓亦奉侍年迈的父母、率领弟妹及夫人等于严宅避难。

伯苓通晓英语，可应付联军士兵入宅侵扰，严家才侥幸逃过洗劫。但在动乱中，因城陷死人太多，不及掩埋，曝尸日久，瘟疫流行。严修第七子及长孙、伯苓一子一女病亡，弟张彭春因煎服其父剩的药渣幸存性命，严氏家馆只好暂时停课。

老友林墨青拟自焚其宅，以示殉国之心。在两位庶母苦劝之下，方消此念。但入侵士兵已窜入林宅今西门里中营小学胡同十六号，以手批其颊，引为平生大辱，以此厉己，终其一生不已。

此次创痛较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更为惨烈，严修顿悟以往在旧式儒学和科举制中兜圈子，只能修补旧制，于世无补。遂下决心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创办新式学校，普及国民教育，培育新式人才。从

养士教育到新民教育，是严修教育救国方案的一个突破性进展。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老太太胁迫儿皇帝一起出逃西安。联军公开抢劫三日。翰林院被焚，《永乐大典》失去307册，珍贵图书毁失46000余本，大量珍宝、古玩、图书字画、天文台古铜仪器被盗往国外。20日，清政府下罪己诏，当然又是以儿皇帝的名义。

老太太的政治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凡成仁取义之事，皆与她无关。大敌当前，她以私心决策；大难来时，她只管逃跑。

她把严修的恩师徐桐留下来善后，这个见了洋人就头痛的倔巴老头，倒还有些气派，他与洋人势不两立，洋人来了，他就去死。严修闻讯，泣曰：吾师仁人，为人所误！其实他何尝为人所误？他倒是误国误民的始作俑者之一。

老太太跑了，虽不免颠沛流离，尚能苟全性命。可有多少无辜百姓能经得起这样的劫难？他们逃是找死，不逃是等死。联军攻陷天津时，在城中心鼓楼架炮，向逃难人群放炮，自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堆数尺；西门也死尸成堆，城内官署、钱庄、商店、工厂、仓库、民宅，均被抢劫。仅长芦盐务署一处，被日、美军先后抢去的银两，就可堆成一座30英尺高、30英尺宽的银山，沙俄军占领造币厂，几百吨存银被抢光。

所幸严宅未遭炮击和抢劫，戚友48家避难于此，虽有染疫而亡者，但避开刀兵之灾，免于流离之苦，加上严修照应俱全，生者衣食，病者医药，死者棺殓，所有开支皆由其应付，亦属不幸中之一幸。严修致兆峰叔父信，略谓："兆峰叔父大人…今年之乱，本是千古奇闻，亦遂为千古奇祸。北京及保定、天津，既已沦陷，此外畿辅所属，不糜于'匪'，以保和约，是以南省俱获保全，而吾浙亦晏然无事，真不幸中之大幸也。"据《信草》

1901年，严修42岁。

年初，《直报》戏登一则刘伯温预言："天津无有刀兵之苦，只透水火之灾。"刘公预言已破，奈慈禧何？奈洋枪洋炮何？

慈禧逃至西安，下令各省应解京钱粮均转输西安。于是南漕改道，经由汉水入紫荆关，溯龙驹寨到西安。老太太奢侈惯了，手里没

钱，心里就发慌，为了弄钱，她在西安大肆卖官鬻爵，上行下效，各级官员也如法炮制，一时聚敛成风。

列强开列《议和大纲》，第一条便是要严惩祸首。老太太惧列强以首祸议己，常惊恐不安。李鸿章为保全老太太，特请俄使斡旋。

俄使最贪，即与李鸿章签订《天津俄租界议定书》，同时又向李鸿章伸手要东三省主权，李鸿章难免虚与委蛇，遂应允之。于是，俄使奔走于各国公使间，为慈禧排忧解难。

列强起兵，本不为打倒慈禧，见有机可乘，便表示谅解。慈禧如释重负，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惜卖国以保全自己。卖国也要有本事，老太太离不开李鸿章。

俄使斡旋成功，要求清政府单独谈判。李鸿章电令驻俄公使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勿误！

俄财政大臣维特约见杨儒，催请画押，杨儒当即表示：私自画押，该当何罪！我惜只有一个头颅耳！维特信誓旦旦：如清廷置罪，俄必出面保护。杨儒严词拒绝：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

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劝朝廷联英、日拒俄。各国公使亦明言：公约未定之前，不得与他国议立专约。以此为借口，李鸿章婉言俄使，请先定公约，再议专约。

9月7日，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此后，俄使即对李纠缠不休，李本精于以夷制夷，到头来却为俄夷所制。国内张之洞等又不时口诛笔伐，掣其肘腋，攻其肺腑，李如临风之烛，奄奄一息。病榻之旁，俄使虎视眈眈。李自料不久于人世，便能拖就拖，以时间换空间，以一死换主权。临死之前，李向慈禧推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其右者。

老太太得洋人赦免，喜出望外，便极力巴结洋人，表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并命督抚大臣参酌中西政要，各抒己见。随后下诏变法，此为晚清最后十年新政之始。

庚子新政与戊戌如出一辙，新政之第一项，即下诏复开经济特科。又下诏整顿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各官以政治学。

列强要求清政府停止洋人被杀之城镇文武考试五年，计有山

西、河南、浙江、直隶、东三省、陕西、江西、湖南十省府州县城等五十处。由于直隶一省亦在被禁考之列，加上八国联军的教训，严修认为科举和他提出的经济特科皆已无济于事，遂决定送长子智崇、次子智怡赴日留学。

禁考促进了留学，而留学则为列强所欢迎。留学之事，始于同治，而蔚然成风，则在庚子。

慈禧下诏，告示天下：自明年始，罢时文诗帖，废八股文，停止武科。虽然重弹光绪老调，可对于严修来说，不啻如望梅止渴，有自然生津之效。

从表面看，他赋闲在家，不动声色，每天读书写字，悠然自得。其实他在等待时机，等待那个他梦寐以求的时机。他忘不了新政，更望不了那个为新政而历尽苦难的皇帝。如果说将严宅的旧私塾改造成新私学，是新政在民间一隅之地的延伸，那么废科举则更显示了他扭转乾坤的手腕和魄力。

他通过徐世昌结识了袁世凯，很快便与袁结成莫逆之交。袁任直隶总督时，适逢庚子新政，袁脱颖而出，势头正旺。严遂劝袁牵头，约江、楚二督会奏，请废科举。

袁本举人出身，其后投笔从戎，素为进士出身者所鄙夷，故与严修一拍即合；刘坤一亦以行伍出身而镇一方，张之洞认中体西用安身立命，他们支持严修的主张，联名上奏，老太太顺水推舟，科举制便土崩瓦解。科举之废，虽因三督重镇，一言九鼎，亦由严修策划，功不可没。

不久，各省书院改为学堂，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

又命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定游学奖励及管制规程，凡学有所成者，分别赐以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以备任用。

新学随新政而兴，严修欣喜之余，深感严氏家馆难以满足众多求新学者，于是想扩建一座义塾，遂根据时局之需要改订了先人所设义塾课程，借老友陶仲明故宅一座，与林墨青建冬季学塾。

林墨青小严修二岁，以一书生追随严修，努力不懈三十多年。

时人为其撰写纪念碑文云：自国家遘庚子之难，人咸谓欲救危亡，莫急于学。严公范孙主此议，林君墨青承其旨而力行之。

严修每日赴育婴堂见客，接洽各事。盖联军未退，地方不靖，津地士绅戚友，往往惟公之马首是瞻，有事来商。

年虽不惑，体却多病，本年做头额及手臂两处肿瘤手术。

老友陶仲明也在多灾多难中病逝，严修悲悼之，其挽词云：

> 经济史乘、金石文字、训诂词章、医方算数、列朝掌故，旁逮海外国书，学胡博哉！我尤服君，居心诚恳，虑事周详，立志坚定。劝谕讽诫、扶持调护、讨论辩驳，讲贯切磋，处世箴言，兼及家庭琐事，较多术矣！君之于我，忘形宾主，异姓兄弟，急难友生。

聘其女陶履兑为五子智开之妇。视其子陶孟和如己出，教孟和如己子。

本年，张伯苓应"益德王"王奎章聘请，兼授王馆，有学生 6 人。每日，张伯苓上午至严馆课业，下午至王馆教读。

严馆与王馆学生共 11 人：严智崇、严智怡、严智惺、王宝璐、韩振华、林静、严智庸、林涵、陶孟和、严智钟、张彭春。

严修亲书誓词，与林墨青等召集学生于严宅北书房盟誓：

> 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龄则向若。尔父若兄，道义相劘，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而诸生所亲见也。
>
> 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劝，过乡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訾笑，毋背毁，毋面谩，同力一心，从事于学问。以绳检相勖，远非僻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是余等所厚望焉。
>
> 陶履恭孟和，孤儿也，当厚自策励，而去其童心。尔十人之待履恭也，悯之，爱之，砥砺之，使无坠其家学。是则今日此举为不虚矣。

宣誓完毕，按严修要求，十一人环相向，行一跪三叩礼。

严修每天写日记，却不著书，常说：多著书者必不通。

可他的朋友梁启超，却常常落笔万言，一挥而就。是年又撰《中国史叙论》，认为旧史皆帝王家谱，要有国民自作之史。进而提出新史学要探讨因果联系，考察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并用石器、铁器、铜器等物质文明，取代帝王年号为历史命名。帝王之家谱可以休矣，而国民之历史又从何谈起？

严修在新政的回光返照中重读《尚书》："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2. 东游漫记：教育考察与文化比较

1902 年，严修 43 岁。

1 月 8 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一行回京。

严修日记言及此事，心情复杂，所欣慰者，新政仍在继续：慈禧下诏，命宗室、觉罗、八旗驻防官学改为学堂；将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毋庸隶外务部；准满汉通婚，并劝除女子缠足陋习。

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后，清政府外务部便正式向各国公使要求归还天津，交涉了 3 个月的时间，公使团方才应允。不久，清政府便从八国联军的"天津都统衙门"手中接管了天津城。

瘟疫虎列剌（霍乱）仍在天津流行。

仅 6 月上旬，天津至塘沽之间，染疫者有 83 人，实死 56 人，其余救治得免；中旬，又死 75 人。驻守各营房军士两日内便死 13 人，法国租界内的华民死 12 人，日本租界内死者 25 人，车站死德兵 1 人。还有贫民苦力死而未经报明私自掩埋者 7 人。

严修一家亦未免于难，其表嫂即死于是疫，侄女几濒于危。

经此一劫，天津士绅痛心疾首。究其根源，在愚昧、顽固四字。瘟疫好治，愚昧难治；列强可化，顽固难化。

治愚昧者惟教育，化顽固者去留学。天津商人王贤宾和"李善人"家的李宝恒有感于严氏家馆的成功，咨询严修助手林墨青，希望以严修的家馆为蓝本，捐资建立两所小学校。可严修对于自己的办学成绩并不满意，随着地方局势趋于稳定，他想出国考察教育，

切实探求教育救国之路。他选了日本教育之“石”，来攻中国国民教育之“玉”。

(1)诗心、海魂及国计民生之片断

8月10日，严修自费偕长子智崇、次子智怡至塘沽港乘船东赴日本。智崇、智怡于前一年曾东渡日本，此次随父再赴日本，除陪同父亲考察日本教育外，决定在日本留学。

早八时从家启程，家人及戚友送行；九时十五分发车，十一时三十分至塘沽，一时登小火轮，行李拥塞，无立足之地，送行者皆去。二时开船，五时至日船立神丸停泊处，六时半开船。

轮船过威海，严修为恩师李文忠公祭，为甲午死难海魂祭。

次日清晨，在甲板遇一华人装货者，为吉冈洋行司事。与之交谈得知，此地出口货为丝、乌鱼、桐木日人制屐用此木、甘草、鸡蛋、草帽辫。一路与轮船管事福士君交谈，福士指着威海一带群山对严修说：此地山皆秃，曾有日本地质学家言，北清之地，非不可植稼种禾，是当地人多懒，不自筹植。福士索诗，严修遂口占一绝应之：

海风拂拂海云高，赤日中天射碧涛。
与子当风迎日坐，大东奇气属吾曹。

过刘公岛，见英舰七艘，以望远镜窥探威海卫，遂又成一绝：

风号威海岸边树，泉咽刘公山下石。
终古天青海水碧，不见老臣心血赤。

福士问严修中国教育之方针，严修与言各省方遣人赴日本考察。最近吴汝纶亦奉朝旨正东游日本考察，待其归国，当有建白。福士言，采他人之长固善矣，然必各有其立国之本，故不得尽与人同。又言，泰西极盛难继，今虽虎视东亚，要未可以长恃。吾两国唇齿相球，宜采东西两文明之利器，开我富强，以与之竞等等。

谈毕，严修望洋兴叹。日轮事务部长之职，与清轮船招商局之船办略同，但其言不俗，其论颇高，其志可敬，岂区区轮船招商局之船办所能望其项背？福士又以曾得一提督李添顺所书诗幅示严修，并向严修索诗，严修因其韵而作：

海上风吹一叶舟，酒酣长啸按吴钩；
壮怀易尽吾衰矣，尚欲乘槎问斗牛。

行船风平浪静，严修又与同船而行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谈起教育话题，青柳以地道的北京话介绍了日本学校的大致情况。谈到日本师范学校，青柳滔滔不绝，他说日本师范学校程度与中学相等，但师范生必须庄重老成，有特别美德，可以为人师表，该校专为培养教育家而设。

礼尚往来，福士亦示诗一首与严修，其中云“欲向鲁夷竞国威”。“鲁夷”，指俄罗斯。严修问福士，俄国人也有乘日本船？福士回答说，乘船者大多冥顽粗野，不知礼义，船员多为其苦。前有一俄国女子用餐时，突然发怒，挥舞刀叉餐具，以为利器将斩侍者，其横暴如此。福士又言，待人以平等，遇人以一视同仁，此乃人生之大道，国际之通义也。我与鲁俄罗斯素无恩仇之言，待吾以道，吾亦以道遇彼。吾人之所期，蹈正而不畏，生死于我何有哉。此为日俄战争前夕，日本民间之意志。

随后复论泰西之蓄意吞噬黄种人诸余话。

谈话间，船过梅花岛，丘岛渐连渐多，船长告知，此乃朝鲜也。

傍晚，与一日本木工笔谈。木工问中国木工日做几钱，答之以天津论，大约三角。其惊呼甚廉，谓日本最便宜者也需七八角之多，多者乃至一元有半。工价之贵贱与国之贫富相关，天津之工价，较庚子乱前已增一倍，然视日本犹不及其半，况与西国较乎？岩城日木工名识字颇多，且通浅近算法，天津木工盖不多见，价之贵贱仍视其巧拙为差耳。严修叹曰：欲富国者盖可忽乎哉？

严修有感于福士愤西人侵虐黄种人，戏作一诗以示之：

百万星球地居一，四分且让水三分。
棕黄黑白总同种，南北东西何足云？
儒墨卮言原破碎，佛耶界说更呶分。
争存物竞有时定，至竟终须合大群。

难得有如此胸襟，以博爱平等、宽容共存，为人竞物择的最终结局。严修自己也意识到“虽是戏言，将来必出于此，特今日非所宜

言耳”。中日文化的差异正在于此，日本文化过敏而偏激，易趋于军国主义；中华文化于天竞物择中，自有从容不迫之气象，而崇尚和平。

船近日本马关、门司两港，两岸灯火灿烂，船影绰绰。其背苍山暮然，坦卧昏晓；其前海波清澈，醉衔冷月，潮音涛涛，间闻汽鸣。

这美轮美奂的黄昏海景，使严修沉醉，他似乎忘却了马关对中国人的深意，当福士又督其为诗时，便欣然应之。诗云：

万顷烟波满轮月，多行灯火四围山。
他年编订东游集，第一佳题泊马关。

船行至日本濑户内海，过长崎时遇唐宝锷广东中山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等上船，唐时任长崎领事馆翻译，因公使电召赴东京，故乘船欲往。因时疫盛行，马关至东京汽车停开，所以去东京者均改乘船。

青柳携日人松永祐来访，松永君为严修介绍日本学校情况。

小学学制四年，课程设置为习字、作文、读书、地理、历史、算术、理科（格致）、修身、体操、唱歌。高等小学学制两年或四年，四年者可入师范学校。中学校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校普通三年、法学四年、医学五年。大学分法科、农科、文科、工科、医科、理科。

船到神户，一路得唐宝锷的照拂，过关验讫。严修一行到旅馆刚住下，便有《神户新闻》记者来访，唐君代为介绍此行来意。留唐共饭。饭后，与唐同至神户中国领事馆，见西文翻译官王应珍字绍贤，广东中山人，曾在香港书院就学，三人交谈甚久，严修详细了解日本西化及教育情况。

王言，神户有华商约1400人，其中多数为粤人。经营进出口业务。进口货以我国牛庄的豆饼为大宗，出口则以火柴为大宗。

谈到日本西化，王举一例：日本收回治外法权之初，有一西方人犯法，捕之入狱。此人抗议不就，曰：尔国监狱，非人所居，我是人，故不堪此居。日人问之，如何方为犯人之居？答曰：必如我国之狱乃可。日人遂仿其言，兴工造狱。工讫，终致其人入狱。

严修以为，此例犹如商鞅徙木立信，取信于人，法遂信行。

王又言一事：日本自去年开始，收取个人所得税，外国居民同例。各国领事馆联合起来抗议，致使日本政府严申，外国人既取得在日本内地居住资格，受日本法律保护，必须依法承担居民之应尽义务，不纳税者依法封禁其财产。其势斩钉截铁，没有商量妥协余地，外国商民不敢违，法亦信行。起初，外国人居神户，亦傍海岸为租界。然而日本人却敞开大门，干脆废租界之名，让外国人随处可居，计地付租，均与本国人同。

谈毕，严修一行起程赴大阪。至火车站，观候车室，无论几等，均整洁有序，服务勤敏。至大阪，严修偕子访清水芳吉先生大阪清语学校校长。清水君陪同严修参观大阪商品陈列所，买票入门，每人给一张导游图，图中有陈列所图片、各国货币表、汽车时刻表等。

入外国展品室，有针织、陶器、服饰、金银器等，琳琅满目。就中货物，以英国为极多，触目皆是；其次则美、德两国，亦颇壮观。

中国之产，所见则纸类、漆器类。纸类，如广东制贝岭纸、长江草纸、上南机纸、色付切腊年纸、黄信纸、机器黄粉纸、原垂桶纸等。漆器类，如湖南栗色颜洗、螺钿笔入、汉口描金盒子、描金八角盘、铜油涂革笈盒、广东金花篮、贵州帽立、鸦片具等。

随后，又拜会《朝日新闻》社主笔内藤虎次郎先生，由其导观印报工艺。严修于日记中详记排版、纸型、熔铅、制版、印刷等技术及流程。访每日新闻社，欲见主笔，不料其社遭火灾，人们摩肩接踵，忙于救火，无暇顾及严修一行，严修只好投一名片而归。

转而访田岛君，相约参观日本电话交换局。田岛出示诸种日本法律书，内有《法规大全》一书，厚二寸多，可谓鸿篇巨制，与《大清律例》相类。田岛云：日本立商法时，采用十五国律，荟萃而成，故今日日本商法应为世界第一。又云：商业学校大阪胜于东京。

别过田岛，他去拜访锽子女士。诸儿游日时，锽子曾代为照料。今见智崇、智怡，满心欢喜，问及智庸，知智庸已死，哀惋泣下不已。

锽子在校内淇澳小学设宴招待严修父子，并详细介绍该小学的课程设置。严修均一一记录，今摘其课程表如下：

	第一时	第二时	第三时	第四时	第五时
月	修身	读书	算术	作文	习字
火	作文	读书	图画	算术	习字
水	读书	习字	算术	作文	
木	算术	作文	读书	图画	习字
金	修身	算术	唱歌	习字	读书
土	习字	读书	体操		

清水君相邀，游南海道和歌山。适逢盂兰盆节期，士女如云，花海灿烂。期间，交通车票均减价为半，此虽为商家曲体游人之意，实于商家自己大有裨益，商客两惠，皆大欢喜。

中午，游至鹤鸣馆午饭。清水君介绍其友长坂云在君。观其相貌，鹤发髯苍，神采奕奕，约有60岁许。问其年龄，方知才46岁。长坂工书画，所画松梅屏及诸画卷，均神韵超逸，悠远淡然，题字尤佳。品字观画，严修心旷神怡；闻寺院晚钟，听僧众诵经，严修悠然顿悟：讲学问不必废词章，讲教化不必废僧道，吾观于日本而有所悟。

所谓不废者，待其自废也，自废者，其势顺，虽迟无大损，因本已立也。人强废之，其势逆，欲速反害。"欲速反害"四字，乃光绪帝之写照。盖其身在日本，而心忧其君也！

对于国计民生，严修特别留心。在神户，他发现日本稻米价三倍于中国，鸡蛋价四倍于中国，然米精凿而蛋肥硕，则为中国所不及。他认为，中国应当讲求种稻之法，产米要多而精，以之输运于东国，亦商战之一事，而清政府却坚持米不出口，这既非长策，亦非公理。而实际的情形是，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他从神户报关税册中发现，从中国输入的货物已有大米一项，姑无论其多寡，亦足见禁令之难行。

严修父子三人赴约至田岛家，与田岛笔谈良久。田岛告知，日本人口4500万，除基督教徒五六万外，皆为佛教信徒；又告知，日本政教分立，意识形态宗儒教，而信仰皆皈依佛教。言毕，田岛领他们参观电话交换局。

从田岛家步行，过两个街巷，便至电话局。他们先会晤电话局庶务课长冈本仙治君，笔舌相济谈片刻。

冈本介绍：本局创始于明治二十六年(1894)，管理人员 80 人，接线员 350(男性 80 人)人。除总局外，下设支局、分局、所等机构，全国合计有 24 个所。总局还建有东京邮便电信学校。已安装电话之家全国有 5600 家，申请安装者有 3500 之多。

又言近有日人川烟笃雄劝袁制军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兴办电话，袁遂招募日本有关工程师诸人，其中有警务学堂川岛浪速(1865—1945)，生于日本长野县，1914 年收肃亲王女金璧辉为养女，改名川岛芳子，多次策划满蒙独立。随后，由冈本引导，参观电话接线机房等，并做了详细记录。

中午便当后，参观阿部制纸会社。理事人阿部房次郎、职事人松本行政君负责接待、介绍等事项。严修详记其资本总额，管理方法，造纸过程以及出品种类等。

又参观金巾纺织株式会社，见其主事者八木小三郎，参观澄棉、轧卷、断条、成纺、挑纱、折叠、包裹、压紧等制造工序，历数十车间，目不暇给。该社创办于 1889 年，资本金 200 万元，职工 1000 人，粗丝输自中国通州棉织就，细丝输自美洲棉织就。

参观完毕，严修父子去拜访张冠三诸君。

乡语乡味醉人，兴正浓，言正烈，谈到日本人，张云：日本法制至善。银行信用，从小儿存储零花钱，到携真金兑币，均规矩从事，丝毫无遗漏；日本人之间少有争斗，若于道途误伤他人，必诚惶诚恐谢罪不已，彼方亦逊谢相酹。然其欺华商却不遗余力，如华商订购日货已付定银，日人无信，既不交货亦不退定，华商无奈，投诉诸领事，领事亦无奈，只能不了了之。言者愤然，听者慨然，国运衰矣。

智崇儿日渐消瘦，日医言，怕是肺部有问题，病虽不重，却易感染。锷子闻讯赶来，其妹大野铃子亦同来看望。

休息了两日，严修按约定去访张星舫，谈到马关条约，星舫言：马关之约太草草，商约中我国受损实多。同一货品，自西洋输入者税五元，自我国输入者或七八元；自西洋输入者有定价，自我国输入者则随时作价。

次日一早，星舫回访严修，纵论伊藤博文的富国之策与日本的取士法、募兵法、操兵法等，言及明治皇帝降尊勤事，日本尊官之简便，可圈可点。对于伊藤，尤其称道。谓其早在明治元年任兵库知县时，便条陈开港通商，请力行设银行、铸铜元、造纸币诸法。

星舫才走，冈本君接踵而来，谈日本的义务教育和交通私有化。日本义务教育要求甚严，百姓生子必报官府，至入学年龄隐匿者，查之以罚，确不能入学者必使习一技，非学校出身但学识程度与之相等者，经文部省应试合格亦可以授予博士。

日本铁路私有，由私人经营管理，但交通价格由政府规定。

随后参观神户控诉院法院、地方裁判所、留置所等。裁判所始建于明治初年，其先之断狱法，与中国大同小异。自改良后，除一切酷虐之刑，与文明法律接轨。至监狱参观，果如所言，秩序井然，已具文明规模。

严修初至日本，耳闻目睹之情形，使其感慨万端。小日本蒸蒸日上，大中华每况愈下，适成鲜明对照。

每念及此，不禁忧从中来，遂赋诗一首：

中年哀感不禁秋，欲借瀛涛暂洗愁。
才过马关神户港，以将此恨付东流。

(2)儒学、教育及军国主义的崛起

9月1日，藤津元君来访，与严修笔谈许久。

两人谈到中国时下之讲新学，多趋形迹而不究根柢，以为学问之根柢，在于正人心，正人心宜从师弟授受入手，师所讲者必实践之。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藤云：对于明治维新，人们津津乐道，而德川儒学，反而湮没无闻；人皆知日本维新之益，而不知实基于德川氏百年间崇儒之功也。

次日，由清水君陪同，参观泛爱幼稚园；由大野铃子陪同，参观爱珠幼稚园。观看幼稚园儿童表演，严修对儿童“唱歌环走，步伐整齐”颇感兴趣，并将其课程及游艺、手工等一一详记。

又参观女校，先参观育英高等女学校，由校长陪同，观摩体操、

美术、读书、唱歌等教学活动，学生从 11 岁至 14 岁，约有 800 人。

接着参观清水谷女学校，由校长大村忠次郎、东京女子大学学监麻生正藏、加道银行女股东广冈氏陪同，观摩其校教授理科、英文、数学、图画、裁缝等课程。应校长之请，严修为学生作一演讲，清水翻译。

随后，便由神户赴东京，大野铃子与严修父子三人同行。

至东京，严修先去拜访正在日本访问的吴汝纶先生。严修称其为"挚师"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曾门四弟子之一，与挚老谈话许久，并留早饭。适日人小村至，邀请挚老参观麦酒制造公司，遂同往之。该公司资本 350 万元，每日出酒 35000 瓶，严修为之惊叹。

又陪同挚师参观东京法院，观摩了一起强盗杀人案的审理全过程。对于犯人不服判而重新上诉一事，两人还进行了讨论。吴认为允许上诉，会开罪人侥幸之风；而严修则以为，上诉之法规具有深意，未可厚非。

得知严修赴日考察教育，黔地门生弟子在日留学者黎伯颜、毛邦伟、蹇季常等，均来拜见恩师。还有湖北刘豫生、广西周骏甫皆成城学校学生，前后来访未遇。

次日，严修冒雨回拜刘、周二生，二生正上课，在学生接待室见严师。甚慰。告别刘、周二生，又赶赴吴先生之约。

挚老为其介绍日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二者均受聘于京师大学堂，任仕学馆教习。又陪吴先生参观慈惠医院及医学校，院长高木兼宽导观并讲解卫生学。高木早年曾留学英国，学医八年，又居英五年。归国后，以医学开化民智。起初，人皆不信，并嘲笑之："子不有三男一女乎？待其长大果健康也，则子之说信矣。"如今其子女均长大成人，且健康无碍。其次子年方 19 岁，独自漂洋过海，观外洋风俗，探山川之险，胆气尤壮。

挚老问其致效之方，曰：不外饮食、衣服、居室三者。

以衣论，日本之旧制甚不良，袖太肥，风易入，且不利做事，前胸敞露亦非宜。又常人不著裙绔，女子防襟之开也，行步则两足前敛，亦未善也。故论燕居之服，日本不如支那之良。以食论，食麦胜食稻。挚老亦云：吾国南人食稻，北人食麦，北人差健于南人。高木

叹曰：吾素持此论，人恒不信，今又得一佐证矣！以居室论，宜通空气，而日本之屋太低，凡此之类，皆当变革。又曰：日本人屈膝坐，故下体恒短于上体，而长人绝少。

严修一行，风尘仆仆；智崇病情，亦未见好转，一路劳顿，反而恶化起来，不得已严修携智崇访桥本男爵于诊所，求诊肺病。

智崇早慧而体弱，使严修为期望与焦虑所困。期望者，如俗言之望子成龙也，虽未免于俗，却也是人之常情；焦虑者，崇儿体弱多病，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崇儿能持否？

张孝栘字棣生，张裕钊孙，同文书院高材生，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来访严修，留饭。饭后，由棣生陪同往同文学院参观；又同访黎伯颜，棣生劝严修移居与伯颜同住一寓，严修同意。崇、怡二儿另居下宿。

由伯颜陪同参观清华学校，该校原为梁启超于1899年逃往日本时由横滨旅日华侨支持所建，名为东京大同学校，后来由驻日公使蔡钧接办，改名清华学校。

严修在日本一直未见梁启超，是有意，还是无缘？两人曾经一见如故，曾经惺惺相惜，而今却咫尺天涯。

梁的思想如雷如电，是时代的发动机，但要论到意志坚定，他还缺少严修那样的大山一般的定力。严修的定力来自实学和实业。为求实学他来到了日本；不厌其烦地参观访问，还去拜访那从未谋面的岩谷博士。岩谷建议，考察教育之法，宜求详，不宜贪多。学校应考察一最优者、最劣者、中等者，尤应考察私立学校。严修深以为然。

午饭后，由清水君陪同参观众议院和贵族院。

众议院，议员350人；贵族院，议员380人。巡视会场及各休息室一周。贵族院议长近卫公爵接见严修父子一行。其时国内正酝酿立宪运动，而日本君主立宪早已完成，故严修对日本立宪情况，一一询问，详细了解。

后访熊慕蘧，未遇，偶遇其同寓怀宁陈乾生重辅即陈独秀，时陈正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读书，又与留学生祝惺元、邢之襄、夏爽夫相见。忙碌之余，得闲便往挚甫师处，唱诗论学。

挚甫师出示日人与其论国学之往来信函，严修叹其博大精深。随挚甫师往东京府，听府知事千家尊福男爵介绍东京市政建设规划。又见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伊泽向严修介绍美洲及日本教育近况，推荐三所学校即东京府高等师范学校、富士见小学校、渡边学校供严修考察。

日落时分，严修告别挚甫师等，晚上将一天的活动写成日记。

清晨，黎伯颜等来访严修，邀他一同参观东京警视厅。

午后，赴养育院参观，该院分养病、健康、儿童、医药诸室；还有聋哑班，给予特别教授。从幼儿至百岁老人，共815名。对于聋哑人的教育，严修尤为关注，问之甚详，欲效法之以为中国社会之福利。

得一日之闲，严修父子三人赴浅草寺游玩。

登楼远眺，山水迢迢，隐约入画；近观四围，柳绿千行，花潮如海。然而楼内展示的照片，却刀光剑影，一片杀气。其中写真之景，多半为台湾、澎湖列岛一带山水之胜与官署之形。

好山好水，皆我故土，念之思之，不禁怆然。其余则为日清战争之场景，皆日军所向披靡得意之举。

日本之教育儿童，其方针必先告以日清战争，日何以胜，清何以败，以此作军国主义启蒙，故人人脑筋皆刻入战争，刻入吾神州国土，自幼已然。

游毕，严修悲叹：余游览数处，无不触目伤心。

游琴平寺，观日清战争图，惨不忍睹；游浅草园，吾国大好河山，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任人指点、评说，以此激发日本国民觊觎、掠夺之心；登十二重楼则有战争诸照片扑面而来。

大凡繁胜之区，无不以此为点缀。

伤哉，吾国之人其何以为心乎！无逃于天地之间也。

京都古城，洁净幽雅。细雨飘来，牵动诗心禅意，淡化了伤心之旅。富士见小学校长山崎彦八恭候严修一行。富士见为私立学校，4岁入幼稚园，6岁入小学，四年毕业入中学，总计学习十年方能从本校毕业。山崎以为，日本教育之改良也，先立小学校，渐增女学生，次立幼稚园，次立女学校。又云，小学校必须私立乃广，东京小

学校三百余，官立者才八十余耳。

严修深以为然，对该校学制、建校规划、课程设置、试验设备、私立捐资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并与山崎校长进行了深入探讨。

回到东京，严修一行去参观巢鸭监狱署。他们会晤了该署典狱长神野先生，神野先生谈兴颇高，严修等人闻所未闻。

该监狱建于明治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竣工，耗费40万元。犯人16岁以下，必须接受正规教育，师资来源于自愿寺僧。西方监狱里有神父，日本监狱里有寺僧；神父传播上帝爱，寺僧昭示吾佛心。日本西化，真是惟妙惟肖，可谓入其神髓，得其真谛，而又能植于传统之中。近代文明监狱的主题是拯救与关爱，其落实则为教育与劳改。

巢鸭监狱的教室在楼上，教学内容、课程安排均与普通学校相同。20岁以下者，也要加以各种精神及科学教育，不过，重点却在生产培训和劳动改造。当然，政府难免也要从中渔利。监狱里面还设有工厂，犯人在工厂里从事成本极低的强制性生产，因此他们制作的各种产品，工艺精湛，价格低廉，倾销海外市场，可以获取暴利。这样的监狱东京共有四所。

此前，严修已接到日本外务省知照，表示正式接待严修一行对日本的教育考察，请严修与湖北派来的候补知府双寿字松如，满人一起参观各级学校。于是，严修与双寿一同拜访木野村君，商定参观各学校的日程安排。

木野君安排严修等的参观日期从9月20日至9月30日。

按照木野的安排，严修一行先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参观。

该校分本科、专修科、选科、研究科四种，有物理机械室、化学实验室等，其规模与格局，规划与管理，皆属一流。匆忙中，严修等商定智崇先入该校附中，以为留学该校之预备。

智崇为长子，按华北地区民俗，长子须承父业，智崇入学师范学校，表明严修此时已矢志于教育，欲以教育为家业。

随后，参观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路考察，皆由智崇记录。该校内设国语、英语、家政、裁缝、史地等科，学生280人。学生于本校毕业后，五年内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前两年必须服从文部省的安排，

到文部省指定的学校任教，后三年可自由应聘。

木野君安排的第二所学校是东京府师范学校，据校长泷泽菊太郎介绍，该校本科学生约106人，专修科学生有215人。严修在此意外见到关本幸太郎先生著名化学家。关本先生受袁世凯之聘，将赴保定任教，亦来考察化学教室桌椅之尺寸。

从师范学校出来，严修又往深川印刷株式会社东京分社参观，智崇对整个印刷工艺流程作了记录。该社成立于1874年，为日本第一个私立印社，社长星野锡留学美国多年，专攻印刷技术。

晚上，同黎伯颜等谈天，论及王肖航省笔字即简化字之妙。

王肖航(1859—1933)名王照，号小航，直隶宁河人，光绪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因参与变法逃往日本、在日本从事文字改革活动。归国后，与严修一起倡导汉字拼音化和汉字简化，严修在自家私塾首先推广使用。

次日清晨，严修一行冒雨参观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为之导观绘画、雕刻、漆工各室，以漆工作品为最精。

午饭后，他们又赶赴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手岛精一，为他们导观七室，七室中，以染、漂二室最出名。

至第一高等学校参观，双寿请免除观摩课堂讲解，只观学校各室建制。严修从其言，遂参观图书馆及物理、化学各室。

校长狩野亨吉言由此校毕业者，可直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该校可谓帝国大学预科班，言下颇为自豪。

于是，严修一行又往帝国大学参观。

帝国大学太大，木野君安排了3天的时间参观。先参观帝大工科电气、建筑、造船、土木、机械及应用化学等部。次日参观理科动物标本陈列室、地质标本陈列室、物理实验室、人类学仓库、各国考古室及地震学教室、化学实验室等。一路走马看花，也难求甚解。

从帝大理科大学出发，严修等又前往医科大学参观。至解剖室，观看解剖过程，严修与双寿掩鼻急出，一时难以接受。自觉失态，感到不好意思，又重新参观。导观者言，日本自由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立下遗愿，死后即捐献遗体给医科大学，作解剖学实验。闻之，严修自惭形秽，叹服日人西化之彻底，其民族之科学精神已

然确立。又观眼科、妇科、儿科、皮肤霉毒病科、产科及病院等设备，智崇一一记之。

第三天，严修等参观帝大农科大学之农、林及兽医等科。

观毕帝国大学，严修一行如约走访渡边小学校。学校虽小只有70名学生，一个21坪教室，但渡边教授法却名噪一时，连日本文部大臣都亲往视察。严修观摩之后，感觉其教学法和教学形式类似中国的村塾启蒙，对幼童颇有成效。

渡边小学校面向平民子弟，而学习院创立于1877年则是日本皇族与华族子弟学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校才改成不问学生出身的私立学校，其时有王子数人在校学习，张之洞孙亦在此留学。

严修等至学习院观摩，该校课程设置有几何、汉文、欧文、代数、日文等，并设有博物室、图书馆、法德文室、理化学教室等。

次日，如约参观华族女学校其前身为学习院女子教育科，现独立出来，校内分小学、中学两级，并附设幼稚园。因系贵族学校，故设备特精，每一学生所用桌椅，均以该生身材为准，因人定制，适宜于各人发育状况。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细川校长陪同他们参观幼稚园食堂，严修记一：

> 至食时，诸儿童入，各就各位。保姆立居正中之案，宣口号，诸童皆立，向保姆为礼，然后就餐。诸童各解其裹，或开小木盒取箸取饭，或手持糕饵徐徐咀食，从容而有条理。

以四五岁童子，又多出贵戚之家王子、大臣之子，如此自立自律。严修叹曰：甚矣！幼稚园之为益大也。他看见那些接送幼童的女仆们，聚于一室，两行对坐，默做女工，感慨系之：日人“不肯须臾废时如此，亦愈见学校之计划周密也”。随后严修专访下田歌子，探讨女子教育问题。

(3)思想家、新私学与教育产业化

外务省安排之参观完毕，严修依然马不停蹄。

随后数日，他们先后参观了聋哑学校、东京音乐学校、弘文书院、大同学校、同文书院等。

期间，严修请唐秀丰做翻译，拜访了明治思想家大隈重信。至大隈私邸，严修请教“小学教育法”，伯指大隈言：无非德育、智育、体育。严修又问：人言智日进则德日退，然乎？伯曰：大不然！是固兼进，无退之理。严修以为大隈此说“与余私意极合”。

其时，有一美国记者亦在坐，问日本之文明，但取诸欧美乎，抑兼用本国乎？伯曰：取人之文明，则己之文明自进。

严修闻之，喟然而叹曰：其言简括得体，贤者固不可测。

又与唐秀丰参观早稻田大学，该校为大隈伯爵私立，前为专门学校，始升格为大学，图书馆有薛福成门人钱恂捐书 5000 册。

该校有“学生三千人，附属中学一千人，呜呼盛矣！”然“论宫室之美，器具之精”，则远不如帝大，“盖私立与官立往往不能同”，则财力终有限也。但是私立之精神，则可谓启动近代社会之支点。

应吴汝纶之约，严修一行同往庆应义塾参观。

庆应义塾是福泽谕吉于 1858 年创办的私立西洋学堂，1868 年改名为庆应义塾。为日本著名私立大学，本部设于东京港区三田。塾长镰田荣吉导观大学、中学、小学等部。

大学 500 人，学商科者 300 人，此塾以商科闻名。中学 800 人，小学 200 余人，小学毕业入中学、中学毕业入商学。

课程设置，大学：心理学、海商、货币、历史、英文、德文；中学：英语、国史、算学、物理、代数；小学：寻常国语、唱歌。

学费标准，大学每年 36 元，中学每年 30 元，均分三季收缴。中学寄宿每月 8.5 元，小学内宿者每月 15 元，外宿者 2 元。中小学所收费用暂敷，大学年亏 2 万元。

教育是思想者的产业。明治思想家们以新私学为原点启动新政治，以商学为核心建构新私学，将新私学导入教育产业化之途，严修观之，悠然心会。作为商人之子，对于商业本就耳熟能详，此次观摩，他发现了新私学的真谛，与明治思想家们，真可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

此前，他还参观了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主要观摩实务模拟教学。其实务模拟教室有银行、店铺、仓库、商场等。

他带着智崇、智怡顺便参观了日本银行，为回国做准备，严修

开始购买教学设备及各种仪器，如三球仪及助力器具模型等，同时请旷生帮助着手拟定中学课程，并代为寻觅各式讲义寄往天津。

利用空闲时间，他们还参观了日本教育博物馆。

博物馆里陈列着课堂教学用具及实业教学用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学教育博物馆，严修在此大开眼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其中还设有孔庙。孔庙三重门，一重入德门，二重杏坛，三重大成殿，均于秋风秋雨中肃立。冷眼一观，在西学那华丽的皮囊里，依然静穆地寄存着儒学至圣孔子的灵魂。

参观完毕，严修等人便开始向各界华友、日友一一辞行。

日本友人中村正树闻讯，前来拜访严修。中村谈起日本政府将扩张海军舰船 1200 万吨，以每吨 1000 元计，政府每年须增筹款 2000 万元。日本政府拟将此项筹款摊入地租，然而 5 年前日本已增加地租 700 万元，他担心政府以扩展海军为由，延期增加地租，引起民众不满，从而导致政治变动。

山雨欲来，严修闻到了日俄战争的气息。日本举国上下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增加地租不过其中之一项而已。

10 月 15 日，严修辞别东京。崇儿留日读书，遂携怡儿回国。

次日，抵西京京都。西京，禅风寂寂，古刹悠悠，并无俗众香客烦扰；山石错落，间有茂树繁花点缀。虽然小巧，却有素面天籁之安适。松尾芭蕉之俳句飘然而至：青蛙跃古池，扑通一声响。

严修奔波数月，而今释然；“扑通一声响”，新“私学的惊蛰！

从京都，抵广岛，游泉邸浅野园。

浅野园，有日本第一园之称，为侯爵浅野长勋(1842—1937)为原广岛藩主浅野长训养子，幕末曾致力于王政复古；维新后历任元老院议官、驻意公使、宫内省华族局长官和贵族院议员等职的别墅。其园林仿唐建筑，兼有中国江南山水树石之胜，其古朴精致，浑然如天成，却另有一番天人相恋的感动。

冒雨游岛至山麓旅馆。房屋依山取势，或悬空攀挂，或凿池曲构；引石廊木栈结屋栉比，连绵错落，茂林掩映；间有红叶摇曳婀娜，似颔首拜客；而泉石偶激，如钟磬相搏乐然回响；小瀑直下，流水潺潺，犹古琴之缠绵，牵天地之情而潸然不已。

又闻山下丝竹歌起，悠悠袅袅，时续时断，旷邈而悠远。直返山下，市铺林立，竹木器玩，琳琅满目，严修才恍然入世。

他乡游乎？故乡恋乎？但凡天地造化无乡界，惟人界耳。然入俗世必有国界、族界、乡界之蒂，至马关诸"界"并发。

至下关，过门司，晨游马关街。过引接寺、春帆楼不入，因引接寺前立牌，署"清国请和大使李鸿章旅馆"，可谓马关遗恨！

严修有感赋诗：莫过引接寺，莫登春帆楼，恨来天地莫能载，貌尔东海焉能收。一行终于揖别关岛，载恨归来，乘"西京丸"，从长崎出发返回上海。

向日本学习，师欤？敌欤？感受明治精神，爱欤？恨欤？去时父子三人行，归时惟有怡儿伴，百感交加的严修，心中难免有几分惆怅和挂念。10月30日，一帆风顺，船抵上海。

3. 新私学的实验与商人自救

(1)上海逗留：西餐与学潮

严修至上海，筱舫叔严信厚在一品香设宴，一品香为当时著名西餐馆。一栋五层洋楼，确有鹤立鸡群之势，位于车水马龙的四马路上，然而闹中取静，时人有"日中共饮一品香，下不闻车马声，望极远"的记载。室内陈设豪华、待客服务周到，其菜品亦物美价廉，故文人、政客、商贾之流，往来络绎不绝。

西餐至上海，19世纪80年代就已流行，到了90年代，当时四马路上有两家西餐馆竞争，时人以"味甚佳，而直亦不昂"评价一品香，对于另一家海天春则以"粤人仿夷式而已"，"无甚足取"诮之以上均见刘善龄著《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西餐"。

严修至一品香赴宴，此次接风宴不饮花酒。

此后数日，在筱舫叔的引介下，严修先后参观了上海华新纱厂、造纸厂、枪炮厂等，大致了解了上海的实业状况，但他情有独钟的还是教育。他独自前往南洋公学，去拜访任翰林时的同事王凤藻(1851－1918)，其字云章，号芝房，江苏吴县人，光绪进士，时任上海南洋公学

总办，并参观该学校理化设备室。

其时，南洋公学因禁阅新书、开除学生正酝酿学潮。而严修对学潮还没有感性认识，在日本也未遇学生运动，加上智怡又病，所以没有在意。数日后，为抗议校方的决定，大批学生要求退学。为了让退学的200余名学生继续就学，上海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接纳南洋公学退学学生。

智怡喉疾，不能乘船，故改期返津。严修遂决定在上海继续参观学校。公学乱纷纷，私学又如何呢？严修择日，赴澄衷学堂参观。

澄衷学堂由上海富商老顺记五金行铺东叶澄衷创办，章一山(1861－1949)，浙江海宁人，光绪进士，曾任译学馆监督、京师大学堂经文两科提调为总教习。刘葆良为严修导观，并赠严修该校章程、字模等多种教具。新私学大都注重商务教育，严修对此亦颇感兴趣，本欲深谈，无奈智怡病愈甚，只好改日。严修一边守护照顾，一边参观学习，应酬往来，极其疲惫。待智怡病稍好转，严修便再次出访刘葆良，观其商务教科书目录。同时，定妥返津船票，协和船官舱两间，并开始到本家公馆及朋友诸处辞行。

19日，离沪返津，客船驶出黄浦江，奔赴大海。极目尽水，无涯无际；海风拂面，胸抒无碍，精神振爽。

翌日晨起，严修兴致颇高，登楼观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未几，天阴海怒，狂风乍起，白浪滔天，船殊难行。从20日至25日，严修一直晕船卧忍，茶饭难进，行旅之艰，骤发于疲惫之躯。

27日，塘沽码头阴雨绵绵，严修一路颠簸晕船，实在难耐不堪。而协和大船偏偏难以靠岸，等待近一天，终于雇得一艘私家小渔船抵岸，约敏侄等在此迎候，然后换乘火车抵达津宅。

(2)津门兴学：严氏小舍与女塾

返津后，严修立即行动，掀起新一轮兴学之风。

清政府也以推行新政的名义，加紧进行教育改革。

12月1日，下诏自明年会试起，进士授修撰、编修等职者，均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17日，京师大学堂开学，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分文科和艺科至1910年发展成为

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

各地亦纷纷响应，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筹办的农林学堂开学，为最早创办的农林学校；蔡元培、蒋智由、陈梦坡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东京留日学生陆世芬等设立教科书译辑社，编译中学教科书，供各省学堂采用；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严修亦召集林墨青、赵幼梅、华硕甫、王寅皆等商议。众人均以为，庚子以后，兴办小学为当务之急，作为商绅应大力提倡改义塾为小学的运动，首先开办"冬寄学社"即"严氏小舍"。

然后又将王贤宾、李宝恒于春天创办的两家私塾与长芦盐商纲总王文郁捐资兴建、林墨青筹办的另一所私塾合并，在旧学署设斋招生，延师课读。课程分为中西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

由于班级增加，又分为东斋（东一、东二）、西斋（西一、西二），为天津第一所私立小学。但因《钦定学堂章程》已颁行，故按时行，总称蒙养学塾。校址几经周折，先移至育婴分堂，后又迁往汇文书院地址，此为天津有正式小学堂之始。

转年初，该校便被命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她不仅是天津、也是直隶全省第一所私立新式小学堂，被誉之为"为黄河以北之创举"《清季各省兴学史》，台北文海出版社。

在严修的鼓励下，卞家的卞宝廉和张家的张炳等，捐资在育婴堂设立蒙学。有学生 60 人，校址亦几经变迁，中经文庙，又至问津书院。至 1904 年时，该校被正式命名为天津民立第二小学堂。

与此同时，严修开始试验日本式的新学教育模式。

首先，在家宅设女塾，这在天津是开风气的事。动员女子上学，先从自家做起，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女塾学生有女儿、侄女、儿媳、侄媳以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年龄从 10 岁到 20 几岁。聘日人川本教授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织布。同时，还设有国文、算术、英文、日文、音乐、手工、织布等课程。

严修亲自讲授作文课，并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

> 五龄女子吞声哭，哭向床前问慈母：母亲爱儿自孩提，如何缚儿如缚鸡。儿足骨折儿心碎，昼不能行夜不寐。邻家有女

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

少小学生向母提，儿后不娶缠足妻。先生昨日问儿道，缠足女子何太愚？书不能读文不识，困守闺门难动移。母亲爱儿自孩提，莫给儿娶缠足妻。

严修在天津既开私立小学之动议，就必然要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准备。创办学校资金是一大关键，但师资更是关键之关键。鉴于此，严修又创设天津师范讲习所，聘陈宝泉、刘芸生、陶硕甫、李琴湘等为教师，为直隶师范之发端。

(3)从蒙养院到经济特科

1903 年，严修 44 岁。

刚过完新年，老态龙钟的帝国就枯杨生花：

2 月 5 日，张之洞奏设三江师范学堂。

10 日，钟佩萸在上海创办文化女学塾。

3 月 1 日，天主教徒马相伯创办上海震旦学院。

更有帝国两大政要人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请递减科举，以兴学校。同时，提出幼儿教育问题：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智。如暂时缺乏蒙养院园舍，可以将蒙养院设在育婴堂或敬节堂内；暂时缺乏幼师，可由“节妇”照顾儿童，由“识字妇女”宣讲官编教科书。于是，蒙养院先在长沙、武昌、上海等地兴起。其后各地纷纷仿效，为一时之新潮。然而知行合一者，还是严修。

值蒙养院章程出台之际，正严修之小学、女塾、幼稚园、保姆所建设之时。蒙养之难难在师资，严修先行一步，其严氏女学，已开始了专业幼师的教学与培训，这岂是“节妇”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兴学之风劲吹，津绅得风气先，驻津之列强亦被感染。德国政府因德军侵占天津中西学堂，向该校赔尝了海关银 5 万两。与此同时，清政府亦将天津西沽武库全址及所有房屋拨作该校校舍。至是毁于八国联军的天津中西学堂重振，改名为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

就在严修夜以继日，与津绅共谋兴学之时，南方张謇于是年初，自负使命，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亦著有《东游日记》归来。

北严南张，各领风骚。在他们的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无论官立或私立，兴学建校皆已蔚然成风。如今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学校，几乎都是那个时期的遗产。经百年而不衰者，盖系于教育救国之一念。

张謇从日本考察归来，便在江苏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具有浓厚的东瀛风味儿，不仅学堂的各种规章制度多仿自日本，连教室的宽度、桌椅的高低，均以日本的标准为参考。

教育救国风行于世，学校建设亦渐具规模，然而清政府这架老牛破车却还在经济特科的轨道上运行，7 月 10 日，经济特科恢复考试正式在京举行。经济特科之试本发端于严修一折。然而六年已过，大势已去，经济特科已成强弩之末，以之作为新政之引导，好似喜庆之日放了一挂鞭炮。

特科两场俱张文襄主持，其宗旨不离中体西用。

特科首场题：《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直；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27 日复试题：《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这些题目都与教育和实业相关，于此可见当时政治文化的热点。

张文襄初定取百余人，奕劻传旨不得过三十人。盖内廷畏革命党混入京僚、散诸各省。革命已来临，特科甫行，便奄奄一息。

张一麐的考卷本列第一，然而张为江苏区区一举人，以煌煌大典之特科，首列不能无官阶，乃以原定第十名之袁君易之袁为云贵总督王文韶保荐，又系新科庶吉士，授职编修，免其散馆。张乃以第二名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

文襄时以湖广总督留京定学制，接见特科门生，兴高采烈，开口即云：你们阔极了，康熙、乾隆鸿博数百人，现只二十七人，名贵之极。又谓张曰：愿从余往湖北乎？

张曰：从师学习公牍，固所愿也。或闻香师门生夏某，入幕十余年，而以咯血终，意下颇悔之。幸文襄奏定学堂章程久未脱稿，延至

月余，文襄遂允其先往直隶。直隶总督袁世凯一见，即令入幕下，不三日而委札下矣。张一麐因经济特科而入袁幕，又是张之洞的门生，自与严修有学缘。

可严修已经告别过去，他不再让他的后辈们步其后尘，而是亲自送子赴日留学。虽然袁世凯、张之洞奏设递减科举，但对于1903年的人来说，科举已无所谓了。

(4)绅商一体与商人自救

而学校却方兴未艾。

是年，严修建16所男子小学和11所女子小学。

又设立工艺学堂补习所及研习所，前者设文、理、法、商等学科，聘金邦平、张伯苓、王宝璐等任教师；后者于每周末集各小学教师，共同研究改进课程与教学方法，严修经常去听课，并亲自审阅、编辑出版各种教材。

因工艺学堂学生功课安排过紧，学生求教习核减，王宝璐先生直言不讳，严修反责其贪惰不勤，王敬严修，固不申辩。幼梅亦以日课凡9小时，夜间自修者往往夜半不得寐言之，严修方知错怪王先生而自责不已。于是，赴第一小学堂，亲自录入课程时间表；又赴工艺学堂补习所，亲往课堂听课。

听张云搏讲天演之理，言中国人处今日之时势，一线生机，舍学问别无可望。又听伯苓讲算术，次远讲代数，寿芝讲地理。某日，天大雪，严修早起，冒雪赴官立小学堂视察。教习六人惟一人未到，学生不到者亦甚少。代上1小时修身课，为学生讲司马光“不妄语”的故事。

考虑到小学毕业生的出路，他接办普通学堂，改为天津府中学堂，为天津官立中学堂之肇始。该学堂教员由中国人自任，学生150人，分五级授课，可住宿。

张一麐初至天津，至小学参观，见每校学生俱在300人以上。询诸校长，何以致此？校长曰：此义和团之赐也。受八国联军刺激，津绅已知非兴学不能图存；又京津一带属“拳匪”重灾区，科举俱已停止，旧日举贡生监，不得已均从新式教育另谋出路。

严修设师范讲习所，利用各校晚休时间，培训留学生，或短期师范生，因之师生均努力于学。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1900年以后，绅商阶层是创办私立学校的主体。农业文明对士农工商的定位和以商为末的划分，在绅商一体化中被解构了。以末富之，以本守之，乃是中国商人安身立命的传统。末指商业，本指学业，事商业者为商人，事学业者为士人，合而为一，便是所谓绅商一体。

盐是津沽文明的催化剂，长芦盐商们以其特有的方式打造了津沽文明。据《天津保甲图》记载，391家长芦盐商中，天津城里就居住了159家，他们多聚集在东门外和北门外地区，富甲一方，坐拥巨资，鼓励子弟入仕。他们还通过家族联姻，结成网络，互相照应提携，共存共荣。

因此，当严修试办新式教育时，他的亲家华氏即捐银1000两相助；当严修办学初见成效时，盐商亲友更加积极支持，或争相仿效，一时天津兴学几为天下先。

盐商本有捐资兴学的传统，据不完全统计，自清初以来，天津盐商捐资修建的卫学、小学、文庙、学社、五经馆、义学、府学、县学、书院等达70多所。进入20世纪初，盐商在捐助政府兴办义学的同时，转而投资兴办新式学校，历史的机遇，使他们成为“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前后兴学的目的不同，运作方式亦迥异。前者为盐商子弟入仕，也不排除有为经盐之便而笼络政府的意图；后者则基于“教育救国”的文化自觉。虽然以实业为基础的新式教育，走出了一条教育产业化的新路子，但捐资建学的传统却一以贯之。至本年，盐商捐资兴建的小学、中学、女塾、商校等亦有70所之多。

商战也是兴学的动力之一。比如郑观应就认为，与他国较锱铢——商战，就像披甲执戈，为国家效力于疆场一样，“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糇粮也”。

就连坚持以农为本的梁启超，在本年从美国回来后，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他声称：20世纪以后，铁血竞争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时代方来，商战能否赢利，乃“一国强弱所由分，即兴亡亦系此焉”。

正是基于商战考虑，清政府于本年设立商部。商部因势利导，紧跟着便颁布了以官衔奖励商人投资的政策。

就像开经济特科一样，一旦粉墨登场，戏也就结束了。清政府为了商战设立商部，对于商人来说，真如隔靴搔痒一般，这时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官衔，而是自治。

天津的盐商们自庚子年始，就用自治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起初是不得已，连皇帝都成了丧家犬，他们还能依靠谁？后来便习惯成自然，对自治越来越上瘾，他们发现自治比依靠政府更有利。

1902 年他们联合自治，克服了庚子年后因现金短缺和银价剧跌所导致的天津金融危机。本年初，天津八大家中的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清政府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了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乘此机会，商人们提出解散商部下属的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己成立的商务公所。后来他们又突破官员们的层层封锁，开始启用铁路运输向北京供盐。正是在这自治的“温床”上，天津的新私学运动才得以滥觞，渐成巨流。

日人长尾雨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认为所谓清末兴学热，远不如日本对教育的倾国投入，而其不利的因素主要有：各省督抚铺排门面，常怀观望；官吏先私后公；教育经费难以筹措；巨室富人“宁投财于游冶祷祀，而不用之于教育”；及守旧派不喜新学等。其论切中时弊，但严修在天津兴学却得天独厚。

本年因居家休假，除奔波办学外，在京津一带送往迎来，与辜鸿铭相遇于京津火车中，谈良久辜通英、法、德、日、意等国文字，居张香帅幕 20 余年，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名满天下，而国人鲜知。

严修读《湘抚赵批郴州附生谢敷霖禀》，当其读到：“方今时局日亟，民穷财尽，推原其故，由于愚民信神奇而荒实业，乐怪诞而废人为。九州皆然，荆楚尤甚。泥堪舆之说，而阻挠矿政；争坟山之利，而互结讼仇；种种谬妄，殆难枚举。处外患交迫智力互争之日，不讲求实事，不开拓利源，守此野蛮主义，欲求自立于世界，恐五洲虽

宽，将无厕足之地矣！”不禁拍案而起——以新私学自立于世界，开我中华民族根本之利源。

4. 二次东游：对日本教育的再认识

(1)督办直隶学务

1904 年，严修 45 岁。

1 月，清廷颁布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其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以中学立人心，以西学启新知，开艺能，而归于中体西用。

《钦定大清商法·公司法》亦修成颁行，同时创刊的《东方杂志》，专设“实业”与“商务”两栏目，为“商战”鼓与呼。

“商战”方议，思潮汹涌，然而真正的战争往往一触即发，突如其来。蓄谋已久的日俄战争，终于以日军突袭旅顺爆发了。

清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宣布“局外中立”，任日俄两军兵戎相见，纵横驰骋。这一切虽在严修意料中，但他却无可奈何。

戎事非其所长，清谈又有何益？进化是硬道理。严修偕张伯苓造访严复，讨论天津兴学计划及社会进化诸问题。严复出示所著《英文汉译》稿本，并向二人赠所译《社会通诠》一书。

次日，严修致信严复：我曾涉览公所译《天演》、《名学》、《原富》三书，其“理深文奥，尝不能终卷”，偶遇其中微言妙理，亦往往有所心会。读严复译《名学》，他作了如下评价：“说理明识，措词安雅，断非近译日人《论理学纲要》等书所能比拟，欣赏无已。”在他心目中，严复译文已成经典。

受日本渡边小学启发，严修委托陈宝泉、邓澄波筹设一所私立单级小学堂。所谓单级学校，就是将学生按年龄、程度不同分组，由一位教师授课，内容相同，但每组的深度不同，由程度高的学生组带动低组。这样可以暂时解决各学校学生因年龄、程度悬殊而又不得不混杂在一起的弊病，同时又可以缓解办学经费紧张和师资严

重不足的问题。

在他的推动下，各地庙宇纷纷改成小学堂河北大寺、行宫庙、慈惠寺、药王庙、直指庵、放生院、育德庵、西方庵、玉皇庙、圣慈庵、陈家沟、葛沽村等陆续设立官办小学17处，还设有工艺学堂1所及专为贫寒子弟设立的半日学堂9所。直督袁世凯闻之，深表钦佩，遂修函请严修督办直隶学务。严修《日记》云："王观察来，面交袁制军照会一通，属接办学校司事。"可严修却请王观察婉言，待其赴日本考察回来后再考虑就职一事。袁以大义恳请，请严修先就职，然后以督办身份去日本考察。

严修难再辞，于是赴保定就职，冯国璋受袁委托接风。然后至保定南门外10里许，观练兵大臣铁良训练京旗常备军。烈日下，旗兵3000人阵容，皆穿月白裤褂，头戴草帽，看似"驯雅"。

观操完毕，严修返津，谒袁世凯，商谈赴日考察一事。匆匆准备后，偕张伯苓等11人与亲友话别，乘船赴上海，由上海转去日本。至上海，筱舫叔在聚丰园设宴招待，邀请沪上名人汤寿潜、张謇、吴昌硕等作陪。

彼此相闻，却未曾谋面；南张北严，共叙教育救国之缘。告别筱舫叔，严修一行于东洋码头，乘"永生"轮赴日本。

一船独行，逍遥于天海之间，舱内严修因以往晕船经验，坚卧一榻，风浪肆虐而岿然不动。待风平浪静时，始与张伯苓等闲谈。

(2)工业：立国之本与教育之魂

至东京，智崇、智怡及同乡旧识"来迎者甚多，不能遍谈亦不能遍识矣"。前次东游，以私人身份，而此次则以官员身份，严修于是先去拜访驻日公使、参赞等人。故地重游，老友相逢，严修倍感亲切，而伯苓初来乍到，亦颇觉新鲜。

此次考察重点，本来着眼于小学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中的师范教育。然而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们意识到，教育救国应当以工业教育为核心，以工业教育培育立国之本，即便在师范教育中也应当贯彻这一原则。在观摩高等师范学校附小手工课时，棚桥源太郎一席话发人深省。

以前小学手工为自选科，近则改为必修科。为什么要改呢？他认为，一国财政取决于工业，而工业又根柢于工艺，工艺非从小讲究而不能精，因此，手工课看似游戏，实则关系到立国之本。

以农业立国，往往重物产而轻工艺，然而当今世界，非商战不能立国，而商战必恃工业，依靠农业，“天产虽富而不讲工艺”，仅为原料输出国，“所伤实多矣”。“当幼小之时，即练习其心思手眼”，为“良工”之训，可谓深谋远虑。

日俄战争，日本以“大和魂”、“武士道”胜，而非以工业胜，“工业未至于极盛，故战事不免于困难，近日论者尤注意于工业”。

当时日本正举国欢腾，六年时间里，连续战胜了东西方两个大国，可有识之士却仍在为“工业未至于极盛”而遗憾。

恰好手岛精一校长来电话邀请，严修等前往高等工业学校参观。与校长代理坂田君探讨工业学校之配设。坂田君以为，工业学校非高等不济事，职工徒弟学校若不附属于高等工业学校，效果并不显著。学校分 9 科：电气化学科、机械科、染科等。

然后参观该校附设职工徒弟学校及其实修工厂，手岛君亲自导观。先观徒弟学校，分 3 个年级 3 个班，约有百余人。

第一年级约 50 余人，学算学加减法；第二年级亦 50 余人，习小数；第三年级不足 10 人，习制图，分建筑、机械两门，亦学力学。又至实修工厂参观。实修工场，分金、土、木工场。金工场有钳工、锻工、铸造工；木工场有试验旋床者，有试穿榫机者，有试锯木机者，有试缕边线机者，人力与电气各半；土工场即建筑工地，亦徒弟为之，常为他人营造修建。观毕，至制造品贩卖所买绉布 13 匹、酒杯 10 个，皆该校徒工之产品。

按原定计划，严修一行赴高师附小第二部观摩“父兄恳谈会”。

自八时至九时半各教室上课，学生之父兄旁观。九时半以后，父兄自由上讲堂发言。十一时后各教员入教室，该室学生之父兄与教师谈话。严修等九时十五分始至，授课将毕，乃入教员室略坐，晤本校主事小泉又一君，嘉纳君亦至。

入讲堂听小泉君演说，堂中分男女列坐，男子席在左，妇人席在右。十一时后散，过各教室门外以观，有席地者坐榻榻米也，有坐

于椅者，有父兄与父兄接谈者，有父兄与教员谈话者，有翻阅学生成绩者。听嘉纳君介绍，该校学生家长，大多是有知识学问或有地位身份及有资本者，均开明而有教养，故可以和老师共同讨论如何约束子弟之方法。而町村间之学校，因父兄家长多为粗鲁者，只好将子弟并父兄家长一起听老师开化训导。

伯苓云，彼乃适合于吾国情事也，拟移花接木借用之。

与伯苓等赴富士见幼稚园，事先并无联系，而严修熟路，遂自投刺而来。至幼稚园，目测之，学生约百余人，分为3级，而有大中小3班。小班学生环几席地而坐，中班和大班学生皆坐椅上。初入时，小班学生无所事事，中班亦无课程，大班学生正摆玩积木，或作宫室状，或为水雷艇。从游戏入手，从娃娃抓起，潜移默化，军国主义教育遂深入骨髓矣。

不一会儿，中班、大班学生至室内运动场。一师击洋琴，以音乐引导学生做体操和游戏。集体游戏完毕，学生皆出室外，自由活动，在保姆的引导下荡秋千，天真烂漫之状可掬，观之令人忘机。自由活动约半时许，学生复入室，师鸣琴以节其步骤，各归本舍，上手工课。课毕，稍息之，便至餐厅用餐。严修等旁观。

学生用餐整齐有序，每人将自带食盒餐具置于案前，由保姆一一装好饭菜，预备停妥，师入座，学生起立向老师行礼，然后用餐。全场寂然，既无喧笑，亦无哭闹，更无咀嚼之声。即便是最幼一班，亦悄无声息。严修叹曰："真可法也！"

连日奔波，严修腹疾，更兼风雨凄厉。伯颜来访，畅谈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说，严修颇然之。

一连休息了三天，难得天气晴好，严修身体也复原，遂偕伯苓及三子游上野公园。公园依旧景致宜人，且添一新景，一幅巨大的油画赫然在目：日俄鸭绿江之战。日人观之趾高气扬。

游毕，归寓。高等工业学校化学教习平泽繁太郎君来访，怡儿陪译。平泽君言其发明的制药之法，较德国配方简易百倍，而功用无殊，已向政府申请专利；其论工科，须从实用出发又能依据学理，否则与职工何异？！

严修与手岛君有约，晨7时起，即嘱崇儿电话询之，果已相待。

一行如约至女子职业学校，手岛君兼该校校长。

该校课程设置有裁缝、编物、刺绣、造花、图画五科，是为术科；术科之外有学科，其目亦有五：修身、国语、算术、家政、理科等。兼修术科、学科者为本科生，仅习术科者为专科生。

严修等观女生作业，造花、刺绣皆绝工。连女子教育也渗透了职业理念，日本的工业化可谓彻底。当妇女儿童也被纳入工业化的轨道时，以工业立国也就水到渠成了。从女校出来，云雾流动，雨点飘洒，微雨中，偶然一瞥，无言落花。两次东游，皆为教育求法，其法何在？严修顿悟——工业化。

清风亭畔，风松听铃，泉石生音，草木淡然，杨度、伯颜诸君子邀严修聚会。诸君子者，以天下为己任也，皆谓吾国政法应当改良。

严修试问何以改？则无以对也。于是，严修责之曰："徒终日责政府无已时，非惟不恕，曾何济乎？拟联同志，调查中国内地之实况而研究之。"实况拟分四类：曰政治，曰实业，曰军事，曰教育。严修又提出"当从财政做起"，从容着手，深入调查，诸君子深以为然。

诸君子以为日本成功于明治维新，而明治诸贤亦非从天而降，毫无疑问，他们当然是从日本文化里生长起来的人物，何以日本文化便能造就这般生龙活虎的人物？为此，严修拜访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井上君认为，明治诸贤横空出世，得益于日本教育的发展，而日本教育的发展，又得益于德川幕府之最后三百年。

当时日本文化既重儒学又发明了武士道，武士道的兴起，为以儒学为核心的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直至近三十年，又全力以赴西方文明，攫其所长而用之，促成了明治维新。

明治诸贤首推吉田松阴又名寅次郎，维新前夜，他因批评幕府而被处死，年仅 29 岁。他幼习儒学与兵学，后又师事佐久间象山，向往西方文明，遂创办松下村塾，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皆其弟子。

明治诸贤放胆直进，一往无前，便得益于武士道。井上君一语破的，严修等豁然开朗，终于理解了明治精神的结构：和魂（儒学＋武士道）洋才（工业化）。

(3)自然、法学、音乐及其他

某日，严修与伯苓信步所至一狭巷，见一门挂"国民教育社之

幼稚园”标牌。叩门直言来意，主人也并不拒访，有问必答，十分恭敬。这是一家私立幼稚园，主人既是社长，又是园长。

创立之初，拟招生 60 人，但只有 10 人入学，便将在他处兼职的月俸供养幼稚园。其妻毕业于师范学校，全力助夫，将这 10 人的幼稚园办下去，终致声望鹊起，来者日众。主人又言，目前日本相同规模的官立幼儿园，月均收入百余元，尚入不敷出；而该园则月入五十元竟绰绰有余。

别过主人后，严修与伯苓、伯颜、旷生等远足日光名胜地。

下榻日光神山旅店。依楼面山，注目群岭，绵绵延延，雾霭薄如轻纱飘絮；放眼低去，苍松夹路，古道森森，悠悠牵魂，如神山仙境也；而亭池错落，自有不让群山古径之妙。

翌日，一行人 6 时便出日光町，继续远足中禅寺。出町即见一长桥，曰“神桥”。过“神桥”不久即入山径。曲折而登，严修虽不比伯苓等步履矫健，但兴致最高。

在“神桥”与中禅寺之半，有一小茶屋，此地曰“马返”。大概前行山路崎岖，马蹄不堪，剩下的路只能靠人的脚力了。

小茶屋简而不陋，木制精洁，独居半山，颇似一孤傲自诩、洁身自好的隐者。女店主谦和恭谨，严修一行落店默饮，小茶屋倒颇有处江湖之远的隔世之韵。茶毕，继续攀行，路亦崎岖陡滑，诸君从容而登，惟严修喘汗交加。

好在时而有水声悦耳涤心，振精神、健脚力。待渐行渐近，则轰鸣震耳，相语不闻；仰观山巅白云，忽兀白雪瀑飞，雾水似轻纱幔帐，飘然而至，洗面革心，真乃吸天地之精华。

驻足观瀑良久，严修想起他在贵州观黄果树瀑布，其气象之宏大远在此情此景之上。然造物主意之神来，笔之落处，向无厚此薄彼。赐予此瀑景之秀美，足以令人倾心难忘。过瀑布，路分为二，一大一小，诸君皆选走小路，渴望有奇景再现。

一番迂回曲折，路渐宽坦，此地谓“大平坂”。诸君松口气，从容笑语而行，然顷刻坂尽，一片丛林赫然横阻。据图示，必纵穿丛林。林内方圆，寂然森然，枝叶相拥，遮天蔽日，清风难度，暑闷不畅。

出林，视野豁然舒朗，平旷弥望，放眼无阻，山颠原是一座高

原。蓝天屋顶，绿草地毯；色彩鲜明而不浓烈，安静而不焦躁。一条小溪从视界的尽头蜿蜒而至，轻舔旅人疲惫的双脚。溯溪而行，陡然一转，竟一大湖当前平卧，碧水粼波，犹如天降。真有奇景再现，严修"惊喜不可名状"，为平生所见最美一景。

湖边有一木制结构的旅馆，称"米屋"。女侍恂谨，待客殷勤。

蓝天、高原、湖泊、木屋、女侍，浑然天成一世外桃源。严修决定改变原计划，留宿一日，泛舟湖上，尽享天然之乐。

次日，早起下山，返至神桥，游览东照宫，东照宫为德川将军家之祖庙。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为德川家康，建庙者乃其孙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东照宫整体布局有石华表、五重塔、石灯笼、御厩、鸟居、钟鼓楼、阳明门、唐门、拜殿、本殿、奥院等，金碧璀璨，穷工极巧，乃至一灯之制亦需万金。

某殿有储宝物室，所藏皆德川家历代将军所用之舆服、刀剑、杂佩、编钟及其他乐器等，均为中国制造，可见当时日本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奥院特藏家康生平文札，历石阶 207 级而始达。古木森森，历数百年而依然生机勃勃，仰之弥高，需五人联手方能合抱。观毕，严修等慨叹当年将军何等势力，而今安在哉？昔日之繁华如浮云已逝，惟留此斑斑文物，为历史之存照。

游完东照宫，严修等赴横滨，参观西川风琴制造所。

西川氏自幼习东方音乐，少时能制三弦，闻西乐而美之，如闻天籁，如聆福音。于是，乃学制风琴及西方音乐。且学且制，历二十余年，遂为此业之巨擘，连西方精此业者亦无不服膺西川氏。又遣其子往美洲留学，三年而归。其制钢琴，先从西洋买入零件然后组装；而风琴则完全自制。不但无需借资于西洋，其产品还一直销往西洋各国。观毕，严修为天津学堂订购了两架风琴。

随后，他们参观帝国教育会。会长介绍该会为民间组织，系私立，但日本文部省则经常采用其建议。会长劝严修选 200 人来此留学，严修答曰："容徐思之。"

与法学家根津一君探讨学校设法学科问题，根津一君认为程度低者不宜学法律，中国目前应该将古代法律编一精要教授传习；而国际法、商法为古所无有，以当今通行之法补之便可；法国律例

尤其不适合中国。

其主张无非想保存中国国粹，防止邪说泛滥。

无独有偶，此时张謇在国内刊刻《日本宪法》，以资借鉴。工业与法律，是近代化的两根支柱，如果说工业是立国之本，那么法律便是治国之魂；如果说工业是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那么法律就是人的理性为自身立法，而其根柢，毫无疑问都归结为"自由"二字。

严修当然不是所谓"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对"中体西用"有所超越，但离自由主义尚远。他是实业家，而非思想家，他的思想多从"事"上见，"事"上的思想，比"字"上的思想走得更远。

为了深入了解西方法律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应用，他冒着大雨，专程拜访梅谦次郎留学法、德，回国后参与民法典论争，参与日本民法和商法的起草，对当时中国留学生多有关照。梅谦君讲民法，主张引进法兰西民法，伯颜翻译，听讲者有80多人。

次日大雨，电闪雷鸣，严修同旷生访穗积八束为日本法学专家，"有道气，庄而和"。穗积君介绍日本设立法律学校始末，并将自著宪法书赠与严修。

归期渐近，严修等为归国做准备，而准备之一便是聘请一批日本教师前往国内。小川银次郎拜访严修，交谈近三小时。小川主张教育应以私立学校为主，认为私立学校胜于官立学校，并表示愿意到中国专门襄助私立学校。三角锡女士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留校任教，精于理化，教学颇佳。父母双亡后，终身不嫁，教养两弟皆入工业大学。明年两弟毕业，三角女士了无牵挂，遂打算来中国助兴女学。

严修与渡边龙圣商议聘请日本教习一事，两人发生分歧。一音乐教师口吃，严修坚持换聘；一博物教习，严修观之气质粗野，难以为人师表，亦坚持不聘。

范静生湖南留学生来访，两人长谈约两小时，以为本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速成师范第二期，应当略仿四川新班的课程创意——就普通而别专门。普通者：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编纂教科书法，此为必修科。专门者分数类，汉文优者入国语汉文科或地理历史科；数学优者入数学理化科。其他如音乐、体操、手工之类，各

就所长而分习之，各以一年为期。归国后，可于各地开速成师范讲习所，不过二三年，教员不可胜用矣。

临行前，伊泽修二在精养轩为严修举行饯别宴会，出席者多为日本友人。其中日本音乐家长原春田，携珍稀乐谱一册，名曰《魏氏乐谱》，据说该乐谱传自明末逸民；长原君以自制风琴据魏谱所载演奏三阕，有《昭夏乐》、《关雎》等。严修本好雅乐，又见其未见，闻所未闻，正是其乐陶陶，美从天降。然而欣喜之余，难免扼腕，作"礼失求诸野"之叹；自惜不通音律之学，无从考证。

归国准备就绪，行前与伯苓等人往游汤本温泉浴。下榻旅店名曰环翠楼，环翠楼坐落在两山环抱之坳中，树丛层层环绕，爽气从天而降，不虚"环翠"之名。店内布置精致雅丽，壁悬名人字画。有伊藤博文题额及诗幅，还有道光进士、晚期乾嘉学派著名学者俞曲园为店主之母题寿诗作。

严修浴温泉，以为平生从未有过的轻松，竟一夜连浴四次。一入山林不想出，人或待我花落时，孔颜之乐，可遇而不可求。

次日下山，偕伯苓并19名速成班师范生由横滨登船启程。

至上海，乘泰顺船北上。登船不多时，便风大起浪，颠簸难行，直至翌日，仍未出海口。两日后，风力稍杀，船行渐稳，一船人纷纷走向甲板，可凭栏远眺，观天海一线。严修于早四时便起，在甲板上散步以待日出。时东北水面有一黑影若隐若现，如炊烟，又如小岛；已而渐折为三，中间者俨然一小山，但山形方平。说笑间，山形之上忽现光轮，黑影退去，惊愕间，晨日跃出海面，一片欢呼声，适才黑影山形即所谓"海市蜃楼"。

于是，他想到新政，清末新政不也如这"海市蜃楼"？而那发出新政之光的儿皇帝，却在深宫之中束手待毙。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知不觉，船抵大沽口。

五、乱世兴学与末代宪政

1. 从兴学校到废科举

(1)私学、国粹、商会自治

严修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家馆。

紧锣密鼓，忙了数日，已选定50名官绅赴日，留学法政。

练兵处亦步亦趋，考选108名学生赴日留学，颇似水浒一百零八将。公务之余，严修叹曰：吾安得于吾津试办私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伯苓理解严修，当即表示愿全力以赴。

于是，严修、张伯苓与王奎章商定，将严氏家馆与王氏家馆合并，成立天津第一所私立中学堂。除严、王两馆学生外，又招收新生，共73人，将学生分为高级师范班和中学班两部分。

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后易名为敬业中学堂，旋即又改为私立第一中学堂。张伯苓先生任学监校长，亲自教授英语、算学、史地、体育诸科。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每月白银200两。校舍、校具及学堂建设费由严家捐助，理化仪器及书桌、书橱等由王家捐助。最初，校址仍在严家的偏房，但作了改建和修缮：两间正式教室，一间大罩棚，作大课堂和会议室用，教员休息室一间，会计收费室半间，学监办公室半间。张伯苓就在这半间办公室里，开始了他

的终身校长生涯。

严修亲手书写四十字校规——《容止格言》：

>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是一所很富有的私立中学，在它的带动下，各种官办、私立学堂，相继兴起，纷纷开张。官办者有：天津公立女学堂、保定初级师范学堂、直隶工艺学堂、图算学堂、长芦官立中学堂专门招收盐商弟子，教员4名，分授国文、英文、数学、理化课程。私立者有：罗朝汉、孙洪伊开设的私立电报学堂，设中学课程。

严修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时局不堪设想”，而国人“酣嬉故态”如常，不下教育之猛药，必致病入膏肓，无奈讳疾忌医者众多，为此，他忧心如焚，其信草云：

> 往年在黔中，与二三同志时发忧愤，闻者皆诟笑，谓为无病之呻吟。试问彼岂不知为病，特讳之耳。今讳无可讳矣，而又自护其短，则相率以顽钝无耻了之。平心而论，即我辈所谓忧愤，亦是无聊。毕竟须回实处做去。处今之世，而望有一线之生机，舍学问无他术矣。

“毕竟回到实处做去”，督办学务的同时，严修还创办了《学务报》、《直隶教育杂志》由渡边龙圣和2名学务处官员及3名日本教习负责编辑。而敬业中学堂因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现校舍已拥挤不堪，还需要选址扩建。

1905年，严修46岁。

受各省兴学热的感染，清廷贵胄学堂在北京设立，标榜新学。同时，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两者相映成趣，当京派开始趋新立异时，海派却走向“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看似回归，实则借鉴日本。日本明治维新，虽以西化为目标，然其底蕴则在儒学加武士道。

该会会员均为学界名士：邓实、刘师培、章炳麟、黄节、陈去病、马叙伦、罗振玉、王国维、王闿运、廖平、孙诒让、柳亚子、张謇、郑孝胥、马其昶等。这些名士在国学的名义下，组成一个国粹的拼盘。其实国粹也是双刃剑，有以国粹革命者，如章太炎；也有以国粹保皇

者，如罗振玉、郑孝胥等。

国学保存会发刊《国粹学报》邓实任总纂，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幅；汇集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清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对经、史、文学、音韵、诗赋、金石等进行了钩沉考释，提倡不分门派的实事求是学风。

然而治国不在钩沉考释，亦不在检讨辨析，而在于以实学做实业。严修总理直隶全省学务当然是实业，他筹设宣讲所，创办《学务报》，推荐陈宝泉、高步瀛编纂《国民必读》、《民教相安》二书印行10万册，记述基督教义、源流、传教条约、传入中国始末和重要教案，又编教育杂志、中小学教科书，推行全省，无一非实务。

他的同事张一麐，对他主持直隶学务处评价甚高：

> 学务处总办严范孙修，即贵州人相传二百年无此文宗者也。人品学术，中外推崇。余新进惴惴，除公牍外，买书自修，以补学力之不足。《心太平室集》

与严修兴学日新不已相媲美的是天津商界的活跃。

年初，天津商会成立，40个行业的71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12名进入董事会。他们主要来自天津久负盛名的行业，如盐业、粮业、丝绸业和钱庄。商人自由入会，商会的日常管理分为文牍、会计、庶务、评议、考察五处，每一处设一名专职坐办负责，到6月份，商会会员达581名。商会的权利范围：裁定商业争端及诉讼；促进和保护商人利益；除总理、协理外，商会有权任命坐办；商会提供与外商谈判的业务代理和翻译等服务。

对此袁世凯颇有异议，他担心商会尾大不掉，久而久之，反而凌驾于政府之上，眼下商家自选的十二大会董，就令他心有余悸。然而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多虑，他虽为袁的政治盟友，但站在商部的立场，他倒希望在商部庇荫下的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的权力。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缝隙里，商会自治才曲折地生长起来。

由于商会组织机构为民主设置，不久它便时常与政府的要求相背离。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

《华工禁约》时该《禁约》的核心是排斥华工移民美国，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通过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5万元，商会总理王贤宾声称这是一种争取平等的最佳方式。

这一爱国立场同时得到《大公报》以及由盐商们投资或主办的学校的支持。在严氏新私学中成长起来的学生领袖陶孟和、时子周等，到市民中去发表演讲，这些西化的政治牛犊们，以饱满的热情唤起市民共同抵制美货，但袁世凯明确表示反对，他采取了与满清政府一致的立场，不光是害怕得罪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

袁勒令商会领袖停止行动，但刚刚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商人们毫不畏缩，商会也没有在政府圈定的职责范围内裹足不前，而是继续请愿，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结束。虽然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们的政治参与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不知不觉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这一年，严修除了将自家的旧私塾改造成新私学外，还推动自家的产业向近代工业转型。在宋则久的帮助下，严修之子严智怡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严家拥有该公司股份20股，严修还作为第二担保人向殖业银行贷款，以严家滦州煤矿和北京电灯公司的股份作抵。卞氏天津八大家之一也持有该公司股份。

但严修的精力主要还在教育上，与直接经营产业相比，他更加关注教育产业化。对于商会自治活动，严修虽未做公开表态，但他的立场，我们从他默许学生鼓动市民便可略见一斑。

(2)留学、劝学、废科举

袁督建议，选派公费留日学生，应长短期兼备，50至60人较为适宜。去年所派短期留学者，若有愿改长期者可以照章办理。

经严修考询，合格者有百余人，考试既无固定日期，亦无名额限制，各候选者随到随考，不拘人数，有一次数十人者，也有数人者。不久，学务处迁往天津，严修往来于天津、保定。

严修以为当务之急，还应该立即选派人员赴日本学习印刷术。

他在东京时，参观印刷制版会社多次，深知其在普及教育、推广文化、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派李莲普学雕版制作、陈墨林学制本兼铸字、李云举学新兴石印技术、姚钟琪学习网目写真、陈永平专攻木板雕刻、李振荣学活版印刷、房士珍学配色电镀。

新政措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出台。继开经济特科之后，又举行留学生考试，首场考试合格者 14 人，送往各国留学。自此每岁考试留学生，以出国留学入仕取代了科举入仕，科举制已行将就木。同时，清政府还派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因革命党人吴樾在车站炸五大臣，遂改期出行。不过，宪政问题终于摆到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对于慈禧老太太来说，宪政不过逢场作戏而已，并非真要有一番还权于民的作为。而那个真要搞宪政的儿皇帝，却被幽禁在深宫里，这就是政治。严修在日本时，对于民治政府的三权分立原则就有所了解，但他并没有打着三权分立的旗帜来凑宪政热闹。

他曾以极大热情，投入儿皇帝的悲剧事业，可对于老太太导演的宪政闹剧，他虽未嗤之以鼻，但的确无动于衷。

他认为，与其高谈三权分立，君主立宪，还不如锐意兴学。他推荐随他从日本而来的渡边龙圣担任直隶学务处顾问，并根据渡边龙圣提供的日本地方教育模式，提出一套普及教育方案，在直隶所属各府州县设劝学所和劝学员，《清史稿》卷 107 记载：

劝学所之设，创始于直隶学务处。时严修任学务处督办，提倡小学教育，设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仿警察分区办法，采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法，订定章程，颇著成效，学部奏订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即修呈订原章也。

在直隶试行成功后，清政府要求全国各府州县都必须设立劝学所，由劝学所派劝学员，下到各地巡查，将劝学进行到底。严修在天津首创劝学所，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造，将私塾改造成由劝学所直接管理的新式学校，结果直隶省学校成倍增长。他要求直隶各府还须设中学、师范各一所，并督促各府筹款兴学。

他深知靠官办兴学，教育很难普及，两次游学日本，日本私立学校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以私学普及教育，推动文化转型，始于

孔子。儒家事业其根柢也在此。严修远承孔子，超越时贤的，也正在这一点。

在推广新私学方面，他不仅是一位热情的劝学员，而且是一个认真的投资人。这一年，在严氏新私学系列里，又增添了一所为培养幼儿教育师资而建的保姆讲习所，该所采用日本模式，聘日籍女教师大野铃子主持。专业课程有保育法、音乐、体育等，其他基础课程还有国文、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课。

学生20多人，毕业后大部分在严氏蒙养院、天津河北蒙养院、京师第一蒙养院及严氏女学、官立第二小学、官立第五小学任教，成为中国第一批幼教工作者。

又设严氏蒙养园，为保姆实习之所，按日本幼稚园模式建园。严修在蒙养院中特修一间高大的儿童活动室，从日本购置钢琴、风琴、儿童桌椅及各种教具。学生为4至6岁的邻里、亲友及严氏子孙30多名儿童，教学内容以儿歌为主，大部分由智崇译自日文的有关动植物知识。

同时，将严氏女塾改为女学，校址仍在严宅。设高小、初小两级，逐步增设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为女学之发轫。其建制师法日本，教师也多为日本人。

除此以外，还有天津教育界名流来义务任教，严修只付车马费。严氏家门，因教育而车水马龙。

建设中学堂，不仅投资大，而且维持费用高，私立较为困难，因此，严修督办中学堂，乃以促进官立为主。他接受李祖荫提议，设立北洋客籍学堂一所。该学堂主要集中官吏子弟，施以中等程度的教育。教员12名，一法国人，一英国人，余皆中国人；学生有130多人，分3个学级，全部自费，部分人可住宿。此校虽为官立，但采用私立管理办法，聘卢靖木斋，时为天津候补知府为监督。

与此同时，他还筹设中州学堂、北洋师范、法政等学堂，创办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女子师范学堂，并将原铃铛阁普通学堂改为天津府中学堂，又收回法国人在如意庵所设学堂，改建为官立中学堂，改天津校士馆为师范学堂。

在新私学带动下，新学校遍及直隶，严修认为废科举时机成

熟。于是，偕卢木斋同谒袁世凯，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废科举之议，始于庚子新政，严修为首倡者。

然而庚子新政仍以开经济特科为滥觞，尚未突破科举制。至1903年，袁、张二督奏请递减科举，以兴学校，新学校始蔚然成风，而严修则为新学校之开山者。袁曾对严修弟子陈宝泉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陈宝泉著《严范孙先生事略》因此，当严修再议废科举时，袁遂慨允约张之洞刘坤一二督同奏。于是有袁、张二督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奏曰：窃惟科举之弊，古今人言之綦详，而科举之阻碍学堂，妨误人才，臣世凯、之洞等，亦叠经奏陈。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其中言及设立学堂，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以普胜法，日胜俄为例，"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与严修口吻惟妙惟肖；其断言"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则更似出于严修东游见闻。

从奏设经济特科到创立新私学，从推广新私学到废除科举制，严修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精彩一页，其心情也正如卢木斋堂弟卢弼所云：数百年锢蔽民智之举，一理廓清，最为愉快《严公墓碑》。

为解决不能入学堂的举、贡、生员出路，生员补充优贡于1907、1909年各举行一次，补考拔贡与考职于1909年举行一次，举、贡考职于1907、1910年各举行一次。隋唐以来，网罗天下、绵延千载的科举制度，至此废止，严修疾呼之力，穿透了历史。

2. 末世新政：兴学与立宪

(1)主理学部：方针与体制

在各地兴学推动下，政务处上《奏请特设学部折》。奏折云：公议设立学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

科举既废，礼部、国子监归并学部，"以节经费，兼免分歧"。而

学部人员薪俸，“虽不必如外、商两部之过优，亦未便照旧日定制之太薄”。

学部经费，“拟请应照省分大小，将三年所筹之棚费，每年分提数成，作为学部常年经费。若再益以礼部、国子监两属经费，与部中添筹之款，当足资展布矣”。

清廷准奏。上谕：以各省学堂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特设学部，命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

接京电后，严修即召集林墨卿、刘芸生、胡玉孙等商议，众人“皆趣先生赴京”，然意欲“不赴”，“尚书荣公庆使使敦促，至长跪乃允”据高凌雯《严公行状》。

严修晋京接学部右侍郎篆之前，“聚诸同道而言”曰：予此行身败名裂，举不可知，所惧者，予所私立之各学校、工厂，未知能保存否耳；此后对兴学之事，予只能勉助开办费，经常费多未确定，久则胡易为继？赴京上任，暂寓宁波会馆。

访徐世昌，偕谒袁世凯，向袁推荐卢木斋以代督办直隶学务处。又拜谒庆亲王奕劻、鹿传霖军机等。然后到学部公所拜篆，并见同部诸公；至国子监，同荣尚书行祀圣礼。

1906年，47岁。

严修莅京三月，应酬多于实务，人或疲惫不堪，效率却远不如前。

然而举国上下，大造兴学之势，却似乎感动了上帝。

传教士明恩溥谒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议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华基督教教育事业，此方案后为美国国会通过。这笔钱，数额虽有限，意义却很深远。

各国如法炮制，留学之门大开，遂成洪流。留学日本，本为省钱，有了庚子赔款赞助，留学欧美更加方便。因赴日本留学习速成者太多，恐滥，学部制定《限制游学办法章程》。

规定中学毕业以上者始得留学，即凡入专门以上学校，必有中学毕业程度，习速成法政及师范者必中学与中文俱优。

学部拟就教育宗旨折，谕曰：“学部为通国兴学之总枢，必提挈纲领，而后条目可以扩张；扶植根本，而后枝叶因之发育。考之东西

各国之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尤为各国所注重。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其国民有自立学校者，则以库帑补助之；父兄不令子弟入学者，则以法令强迫之；贫窭不能成学者，则贷公款扶持之。故其国中，无论富贵贫贱、男女长幼、皆能知书通大义，究其所以，亦曰明定宗旨，极力推行而已。”

“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近世持论之士，袭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举吾国固有彝伦而弃之，此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近世崛起之国，德与日本称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章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

“日本之尊王倒幕，论者以为汉学之功。其所谓汉学者，即中国圣贤之学也。近年以来，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足并驾欧美，然犹必取吾国圣贤之名言至论，日进学生而训导之，以之砥砺志气，激发忠义。况孔子生于中国乎？”

“夫学之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历代理学名臣，如宋之胡瑗，明之王守仁，国朝之汤斌、曾国藩等，皆能本诸躬行实践，发为事功，足为后生则效。至若高谈性命，崇尚虚无，实于国计民生曾无毫末裨益；等而下之，章句之儒，泥于记诵考据之末，习非所用，更无实际之可言。”

泰西诸学与“汉儒之实事求是，宋儒之即物穷理，隐相符合。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争，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这与严修十年前在贵州致陶仲明信所言如出一辙：中国之学，万劫而不可磨灭者是义理，西学虽然明备，孔孟程朱之道却不能背叛。义理之学掌握愈深，就愈能充分利用西学的益处；孔孟程朱之道掌握得愈明了，泰西之法就愈见可行。

张之洞督办教育，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有关教育文件多出自

罗振玉之手。学部刚成立，凡重要文件，仍以罗主笔，张元济、李家驹、范源濂、陈宝泉等参与，由严修改定后报荣尚书。

罗振玉拟就各省急办师范电议，严修将罗原稿以科岁考费作经费省去，又有他项学堂暂可以缓二语亦节去，添入游学预备科如未设立可从缓，先请以全力注重师范等。因罗力持不宜设预备科，荣相从其说，严修亦考虑各省办预备科者未必合法，因从罗议。

奉上谕兼署学部左侍郎。谕云：学部左侍郎张仁黼兼署工部右侍郎，学部右侍郎严修兼署左侍郎。严修恳请收回成命，上谕：该侍郎所请各节，着毋庸议。根据他在直隶兴学的经验，建议：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谕曰：著即照所请，各省学政，一律裁撤。此前，各省学政，皆为翰林出身，不受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奏报，犹如钦差之地位。而提学使则与藩、臬同称三使，归督抚节制，故其设置偏低。

新政之际，破格用人，提学使非翰林出身亦可。卢木斋即非翰林，因严修、袁世凯力荐，而坐署直隶提学使。各省提学使上任，上谕：所有编、检、御史署理者，均着开缺，以道员用。以前学政，无论侍郎、九卿、翰苑，在学政任内，既不开缺；三年任满，仍回原任。此次则与布政、按察各使相同，故开缺不回原任。学部限令，已出洋考察者即刻赴任，未考察者先行赴日考察再赴任。又准《各省学务官制折》奏，规定提学使的职责。

学部颁发《各厅州县劝学章程》。规定：劝学所以本地方官为监督，设总董一员，综核各区之事务。各属应就所辖境内划分学区若干，每区设劝学员一人。总董由县视学兼充，劝学员由总董选派。劝学员之事权在讲习教育，推广学校。

又奏准每年八月举行留学生考试。规定：首场试各毕业生所学科目，第二场试中国文与外国文。最优等给予进士出身，优等、中等给予举人出身。至次年春，得进士、举人者，于保和殿举行廷试，分等引见授官。学部、礼部就分清权限事宜会奏，奏准：废科举以前各科第出身者，其考试、引见、解卷、行文，以及改籍、更名、就职、报捐一应事宜，统归礼部，仍照例章核办。由学校出身之进士、举人暨出洋游学毕业生，并国子监归并学部后在学部领照之监生等，考试、

引见等诸项事宜，均归学部照新章分别核办。

又将各省贡院改设学堂，这是将庙宇、私塾改做学堂的继续，其结果使新学堂在各省迅速兴起。

惊闻杭州贞文女学创始人惠兴女士以经费支绌，募集无门，仰药自尽，遂将该校改为官办，更名为惠兴女学堂，继而拟定女学章程。惠兴女士以一死警世，其勇气岂止不让须眉，亦令英雄汗颜！然而历史之眼往往走神，它引导我们去看谭嗣同从容就义，陈天华慷慨蹈海，因为他们是变法和革命的英雄。

而惠兴女士却像灰姑娘一样，行走在历史的边缘，这不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同样是女性的秋瑾，亦曾因其革命活动而获得历史的特别青睐。这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当革命史观垄断史学时，历史之眼便只能看到那些革命化的英雄；而当文化史观渐次醒来时，它就不仅看到那些革命化的英雄，而且发现了另类更有深度的英雄——新私学英雄。对于惠兴女士，我们当作如是观；对于严修，我们亦当作如是观。

学部初立，在严修擘划下，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制及行政机构，在中国第一次雷厉风行地建立起来。

严修认为："兴学为地方要政，实与钱谷、刑名并重。"

他提出，考察各省地方官员，要由过去一贯施行的藩司会同臬司考察，改为由藩、学、臬三司会同考察。学司考察官员，官员的政治前途便与兴学相关联，当官员自身的利益与兴学相关时，各地兴学才能落到实处，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老到的政治眼光。

严修深知，光有官员的积极性还不够，还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官本位的，而政治文化则是民本位的。成事虽然取决于官府，而做事却要依靠民间；官府成事却不做事，民间做事却不得不靠官府成事。于是，他在各省普设教育会，"期于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并鼓励地方士绅，助官兴学或自办学校，以达成"教育之道，普及为先"的目的。

为出版教科书，学部会同商部、巡警部制定《大清印刷物专律》；为编撰教科书，设图书编译局，延聘王国维等为编辑。

在普及教育中，严修尤为重视女学教育，在奏定《各省普设教

育会章程》之后，他又制定了女学教育章程。他从来不谈妇女解放，不谈女权主义，在主义与问题之间，他属于问题派，他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女子受教育的问题。教育改革为新政之先声，如此有声有色，又如此有条有理，令朝野人士刮目相看，也引来那位口含天宪的老太太的青睐，她想见见这位拉开了百日维新序幕的汉子。

当年扼杀新政的刽子手，如今却成了新政的发动者，这应了历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事件一般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儿皇帝演了一出悲剧，她接着来演一出喜剧，这是一出连她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喜剧。

太后召见，"垂问数十句"，便改张仁黼为工部右侍郎，转严修为学部左侍郎，以达寿字荃甫为学部右侍郎，因达寿考察宪政，出使日本，故本年部务，除尚书外，皆严修任之。

严修主理学部，一如其往日在贵州任学政，像发动机一样，高速运转。他每日按时到署，批阅各类文件，处理各种事项，或与同人研究推广新式教育的政策、方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与苟且。他手书应整顿事宜三则，告诫僚属：守时限也，戒喧嚣也，崇节俭也。他说，欲知学堂管理之善不善，先观其时限者准不准，本部员司，或来或否，或早或迟，颇有自由之习，司务厅为本部门户，总务司为各司领袖，此两处事尤重要，而来迟者最众。诚恐相习成风，日久愈难整顿。办公非会客之所，亦非闲谈之地，即有议论，不妨平心静气。若杂从喧呶，哄堂笑谑，非惟体制不肃，亦恐扰及他人。每司俱设叫钟，则指使仆役，自无庸声威并作。近日部用稍侈矣，凉棚不已，继之以冰桶，冰桶不已，继之以风扇。晏安之途愈辟，则勤奋之机愈阻，即为卫生计，亦但取适用，不须美观。他如桌椅箱厨，乃至笔墨纸等类，皆宜核实预算，日计不足，积少成多《蟫香馆别记》。

严修秉公务实，僚属精诚合作，学部草创便成绩斐然。加上有张之洞、荣庆的支持，严修主理学部可谓顺风顺水。

张之洞位高权重，素有威望，荣庆"持躬谨慎"，读《时务报》、《原富》，认为语多可采。其时，荣庆任政务处提调，总揽全国新政之要。

严修到学部后，多方延揽人才，其班底均为受日本教育影响者如乔树枏、李家驹、孟庆荣、林灏深、江瀚、张元济、罗振玉、范源濂、戴展诚、陈宝泉、刘宝和、陈清震等，乔、李、孟、林任丞职，罗任咨议官。此外，又从日本东京调伍崇学等等优秀留学生到部任职。新式学堂的模式，基本取自日本，教育方针及体制，亦参照日本。

严修人在学部，心系天津，天津兴学于庚子国难之后，经费拮据，学舍难寻，遂有废庙兴学之举。庙宇改建学舍，经费除一部分绅商捐集外，主要靠各庙地租和公地地租收入，不免触动庙宇经济，引起"出家人"不满。加上传统意识对庙宇敬悸以及对新学的怀疑，都为办学增加了难度。变卖庙宇财产，或寻求绅商捐助，都难以适应学校发展。于是，又以政府名义向商人征收杂税，税吏贪污，物价飞涨，抱怨不绝于耳。

在袁世凯的暗示下，他游说王益孙给北京的北洋小学捐资，而不是给他自己的中学捐资。山雨欲来，严修一一化解。

(2)天津自治与北洋实业

公务之暇，严修研读西国历史，创刊《学部官报》，编白话教育歌，以为立宪预备；又拜访徐世昌，谈立宪事宜。

在中外各方一再敦促下，慈禧太后下诏"大权总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终于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帷幕。

上海首先起来响应，《申报》、《同文沪报》、《中外日报》、《时报》、《南方报》在张园举行"报界庆祝立宪会"；接着，成立上海宪政研究会，刊行《宪政杂志》；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直隶总督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他一边编刊《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一边通过天津商会及绅商阶层，推动清廷立宪改革和天津地方自治运动。早在"预备立宪"之前，他就建立了市政议会，请商绅议政。他还利用盐商的税款和捐赠，建立了天津府自治局及天津自治研究所，该所为研究地方自治的学术机构，并成为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的基地。

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凡年满 24 周岁的当地居民，只要不是靠救济为生，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年龄、住址

和职业者，都有资格参加选举。但候选人资格有严格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紧接着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有12名绅士参与，其中包括盐商王贤宾、杨俊元、李士铭、华承翰和林墨青，还有20名自治研究所的代表和10名商会的代表。他们以白话报和演讲的形式，向社会宣传自治的目的。

然而袁世凯过于热衷，求成心切，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作为清廷卧榻之下的直隶总督，难免令人起疑。

何况要把那些持怀疑态度的选民动员起来亦非易事。民众对自治反应冷漠，根据以往历史经验，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军阀在以自治的名义搞割据，甚至怀疑政府是否亦以自治的名义打多征税款的主意——花钱可以买官，当然也可以买自治。

袁热衷的自治，决非民主意义上的自治，而是以他为代表的地方政权自治，正如他所理解的民主是源于《诗经》的"求民主"和在戏曲里放大了的"民之主"一样。不过天津商会还是召集会员，搞了一次公开集会，显示民意。袁一方面掀起天津自治运动，另一方面又放手经营北洋实业。有了实业做基础，他的权力才有根基，才能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派长芦盐运使周学熙筹办滦州煤矿，其动议为收回中国的矿产权。开平煤矿是李鸿章为供应北洋海军所需煤炭于1875年奏准开采的，1877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道员唐廷枢主事，1892年唐病故，由道员张翼接办。

八国联军入侵后，张翼乘机将开平煤矿出卖给英国人。

被出卖的财产除全部矿产外，还包括永平银矿、秦皇岛地皮4万亩、新河地皮8万亩、运河15里，以及天津、塘沽、秦皇岛、烟台、牛庄、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码头8处，杭州、苏州、吴淞、胥各庄、天津英租界等地皮各100亩。此外，还有轮船6艘，建平金矿、永平金矿、洋灰厂和津塘铁路的股份，天津总局的房屋、胥各庄煤栈等，张以瞒天过海的骗术，将开平矿务局卖了个底朝天。

上述财产只为清政府换来5万镑股票的现款，而张翼个人则享受到了新股7.5万镑股票，34万两旧欠银，另送2.5万镑酬劳股及督办职位。袁发现骗局，遂派周学熙交涉。周在交涉中声明："卖约"未奏明政府，中国不予承认；矿地是国家产业，口岸、河道是中国疆域，股资是商人血本，不容许私售。

同时，为抵制已落入英商囊中的开平公司，周计划集民间股本自行开矿，在袁世凯和盐商支持下，不到一年时间，滦州矿务公司便告成立。这是完全民营性质的股份公司。初资200万两，后追加300万两，共计500万两。其中"李善人"家占35万两，其他盐商占15万两，严修亦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其目的是要"以滦制开"和"以滦收开"，致使英方以开战相要挟，加上张翼从中作梗，交涉失败。周言："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为'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之局，非吾愿也。"所谓"联合之局"，即滦平联合，虽然产权仍旧各有归属，但十年内滦州矿务公司有权将开平公司的全部产业以公道价格收回。

他寄希望于十年之后，并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周除了利用盐运使的身份以及和袁的关系，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方式如北洋工艺局实习工厂、劝业铁厂、教育品制造所、高等工业学堂、种植园等，还以民营股份制的方式如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厂、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等，创建北洋实业。尤其是启新洋灰公司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李善人"家的李宝诚、李宝谦堂兄弟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洋灰厂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水泥贸易。滦州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是北洋实业的支柱型产业，其中卢木斋、周学熙、李善人家族、袁世凯，时称四大股东，股东中还有名人詹天佑。股东组成，无论官商，皆以个人身份出现。这两大公司代表了北洋实业发展的高峰阶段。

长芦盐商自己创办的规模最大的企业是高线铁路公司，由王贤宾、李宝恒发起，几乎在津盐商都参与了该家公司，其目的是从房山运煤到北京。民营企业的兴起与天津自治运动一唱一和相呼应，商绅成了袁世凯的同路人。

(3)宪政二重奏:自治与学潮

1907年,严修48岁。

年初,严修在北京致函天津知县章师程,责其先行"调查学龄儿童之确数,以渐谋义务教育之普及",以"试行于一县,而递推于全国",作普及教育实验。

学部任职一年有余,在旧体制内推行新事物,难免官僚衙署推诿迁延,难于成事。官场腐败不堪,犹大厦将倾而居之者不自知。

欲辞则势有所不能,欲继则事难望有成,他常常夜醒,辗转难寐",扪心自问:"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就中有益于人、有益于己之事,求一而不可得,呜呼难矣!

此际心情,有谁能知?不如就此挂冠谢笏!严修已有去意。

某日,严修一夜未眠,于凌晨四钟醒,枕上思学务要件:

初等小学改五年为四年,去格致、地理、历史而融入国文课本中,增国文钟点;高等小学分二年、四年两科,高等小学将《论语》读毕,高等二年者将《孟子》读毕,高等四年者将节本《礼记》读毕;中学前二年读节本《礼记》,后三年读《左传》。高等学堂拟入经科大学者读全经,余讲大义。

严修主理学务双管齐下,一管是西学,一管是经学。他认为,求西学者须有经学之根柢,读经学者当有西学之法眼。立国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孔孟之道,一条腿是科学民主,两条腿不必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它们完全可以走到一条道上来,这一条道便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其实就是君权与民权合一,以经学立君权,以西学立民权,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孔孟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实与西方民主制度暗合。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个是理想化的"道",一个是现实化的"制",宪政的目标,就是要将民本主义的"道",转变为民主主义的"制"。

我们且不论这一理念的是与非、得与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理念代表了当时主流思潮,在由严修主持奏定、由学部颁布的各项章程中呼之欲出。

3月8日国际妇女节,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学

堂章程》。章程曰：凡东西各国成法，有合乎中国礼俗，裨于教育实际者则仿之，于其礼俗实不相宜者则罢之，不能遽行者则姑缓之。

中国女学，本于经训，故《周南》、《召南》首言文王后妃之德，一时诸侯夫人、大夫妻，莫不恪秉后妃之教，风化所被，普及民间。倘使女教不立、妇学不修，则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训子，故先圣先王化民成俗所由，必以妇学为先务也。方今朝廷锐意兴学，兼采日本欧美规制……惟近日臣等详征古籍，博访通人，益知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且近来京外官商市民，创立女学堂者所在多有。臣部职任攸关，若不预定章程，则实事求是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图务虚名者，或不免转滋流弊。严修引经据典，证明女学为先王所创，中国古已有之，又以女学为世界潮流，中国要继往开来，迎头赶上，于古制，于时政，均为立教之根本。

为普及立宪知识，严修与王幼章在天津办《醒俗画报》。经过19次会议讨论，天津地方自治机构通过了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的章程。天津县和天津县城也要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外，其他代表均两年一任选举产生。严修以为，天津自治运动之效验，应迅速推广全国，勿需争论不休。清廷遂拟在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

严修力排众议，云：近时政论，莫衷一是。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非有见之实行者，不能示标准而折群言。以前言证之。巡警局也，习艺所也，陈列场也，半日学堂也，诸凡北洋已行之新政，昔何尝不以为诟病；自项城宫保毅然行之，曾不数年，而规仿者遍于全国，此非明效大验欤？朝廷既允于津地试行自治及审判事宜，又得明决精密知公祖者为之规画，成效一见，风气立开，较之以空言争变法者，用力省而成效速，可断言也。

不仅袁督倡导自治被人诟病，严修亦因雇用日本教员费用颇高而遭人非议。然而严修毫不退缩，断言："然不如是"，中国教员无人问津西学课程，"且不如是，则永无可以不用东人之日。故此费不能惜也"。严修与友人谈到普及教育的艰难：各省学务俱无进步，自国民教育之义逐渐发明，办学者以普及为美谈，以强迫为急务。无

如风气闭塞，师资缺乏，财力艰窘，筹款艰难，各省如出一辙，漏卮不塞，又无来源，民穷财尽，思之心悸。而百般新政，非财不举；地不产金，将从何处罗掘？即以学堂论，假令筹万金之款，在偏远州县，已属心力俱疲；而岁息所入，不足供十数学生之用。如此而望教育之普及，其可得耶？

当他听说他的一个亲戚以暴力手段对待工人时，非常气愤，立即发信质问，责以大义：侄闻叔之待工徒也，甚者以军棍从事；父兄之不听传呼者，则拘牒随之。无论本地士绅有无行杖、行牒之权，抑无论东西各国所谓人道主义云云也，但就我国现状而论，欲国强有力，必富国；欲富国，必重实业，此有识者之公言也。欲强国，必教民；欲教民，必重人格，亦有识者之公言也。论者又以为吾国今日欲使人人移其作官之思想，来就实业，必使习实业者之荣与利，一如士大夫无殊，而后可以去彼而趋此。今之设工业学堂也，实业工场也，其用意莫不如是。然则于学堂之学生，工场之工徒，以何等方法招来之，以何等心肠待遇之；而后子弟以学工为乐，父兄亦以子弟之充工徒为荣；此断非桁杨刀锯所能幸而致也。人格两字，虽似新颖，然我国古事，颇有足相证明者。今工场何地，工徒何人，以此施治，如何而可夫？以习工之故，而身犯刑伤，以子弟学工之故，而躬被拘禁，人将望望然去矣。如此而望工业之进步，其可得也？

仁者之心，智者之虑，都在这寥寥数语中。他的教育思想，虽以强国富国为中心，却以人道主义、自治原则为基本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着重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基本点是因，一个中心是果；目标是功利的，而手段却须道德。

尽管在对待性向度上——社会化方面，严修对传统儒学作了某种近代化的调整，可是在非对待性向度上——个体性方面，严修仍然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英雄主义，那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自律，一片仁者爱人的率性，一个屈己从民的铁则。

他鼓吹自治，不为自己谋权利，却要为民众谋福利，这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相去甚远。小我可以牺牲，可以化为乌有，最好以无我融入民众。严修的自治观念仍未走出民本主义的藩篱，在走向民主主义的半道上，他找到了一个立脚点——君主立宪。他在

这个立脚点上歇歇脚，并未裹足不前。

南开中学要兴建礼堂，袁世凯闻讯，立即慷慨解囊，捐款 1 万元，礼堂遂名慰亭堂"慰亭"是袁世凯的字，此时袁与严，可谓兴学之同志，立宪之朋友，两人之相知，为不世之奇遇也。

学部知照严修赴内阁币制会议，于是检书研究货币问题。书目有：《货币论》湖北易奉乾编《经济学》第二卷、第二编、第三章，《法政丛编》本、《法政粹编》本，《中国货币问题》《中国之新民》，《新民丛报癸卯生计类》，《货币政策》刘冕执译，《理财政策》吴兴让稿，其第一款《论铸国币》，《北洋政法学报》第二十四册。会后对币制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又阅《银价问答》，阅《新民丛报》之中国货币及外资输入问题。

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代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 30 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

就像兴学一样，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天津也走在了前列。

然而南方的革命浪潮，却汹涌澎湃，此伏彼起。自 5 月以来，革命党人先后起义，有广东饶平的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徐锡麟在安庆起义杀巡抚恩明，徐被害，秋瑾策应徐锡麟起义，未果，于绍兴大通学堂被捕，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自治与革命，各行其是。表面看来，它们背道而驰，实际上形成了近代化合力。以革命眼光来看严修，严修难免有历史局限性，用近代化眼光来看严修，则可谓之先驱。革命救国固然可歌可泣，教育救国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继续革命的口号将我们导入歧路，教育却以科教兴国、文教安邦指明前途。

玄想离严修遥远。他把理想分解为目标，将目标化为问题。远的不说，眼前就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比如修订大学章程。大、中、小学章程于两年前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奏定，彼时新学初兴，新式学校从无到有，各章程亦属草拟，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补充和修订。修订大学章程要求大学堂总监督不得兼职，不得空缺，必须实莅其位，在其位而谋其政。

还有此前他在学部任职以来所拟及公布的一系列章程，如：各省急办师范学堂办法、拟定国内毕业生奖励出身折、本部办事章

程、各司办事章程、外国留学章程、仕学馆招生章程、各省学务纲要、督学局设学办法、女子小学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除了设章程，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裁撤旧制各省专司考试之学政使，各省设提学使司，专办学堂等。对考试毕业回国的留学生，各科皆授进士、举人，包括医学留学生等。

旧瓶装新酒，此为中体西用之一特例欤？为了强化"体"的观念，也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学部奏准将祭孔由中祀改为大祀，这显示了他的"执两用中"的政治智慧。

旧的问题解决完了，新的问题又纷至沓来，令严修徬徨中夜，刻不自安。他给湖南友人写信，叹曰：每念立宪根基，系于教育，以全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而州县小学，设者寥寥；欲图普及，不知从何处着手？心系国事之余，他一刻不忘严氏私学。在给智崇、智惺儿的信中，他表示蒙养院和女学堂之教师，"学京语最善"。他提倡以官话为教学标准语，要求教师慎用天津方言，尤其要将"本地太俚之语，大加剪裁，如：'艮极了'，'伊行了'，'奏骂'，'改透'，'网著'等类"。他告诫其子"此事极关重要，平日便须注意。能于女学加谈话一课，为异日教国语科之准备，其益甚多"。并准备在严氏私学中率先开设国语课。

宪政从教育和实业入手，为世人所共识，亦为清政府所倡导。

清政府下诏，诏谕各省将军督抚必以振兴实业为要务，不久，又颁布《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凡办一千万元以上之实业者赏男爵，二千万元以上者赏子爵。

为了推动宪政，清政府将袁世凯、张之洞调来京师。袁世凯由直隶总督调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张之洞由湖广总督调任军机大臣，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学部事务。

在学部尚书之上，又加一主管，且以张之洞任之，这意味着清政府将兴学作为基本国策，严修为之欢欣鼓舞。年初，严修欲进有如山阻，欲罢却又似万丈深壑悬于脚边，瞻前顾后，坐公署如坐针毡。进退两难之际，张之洞的到来，使严修甚慰。

乡谊旧知，甚相谐洽，办事颇多维护，主张亦易推行。严修对张之洞钦佩多年，张亦颇重严修。又，袁世凯在京，其幕僚多为严修挚

友。于是严修决意留任。

张之洞约学部同仁游京郊翠微山，在香界寺备饭，在灵光寺预候。荣相、茂翁、于晦老、仲鲁、邓太史先后来学部公齐集。因风势甚猛，主人辞不能往，而仲鲁游兴方浓，不欲中止，于是严修、邓太史甘愿顶风随之。行十八里至山下，有小轿候于此，三人各乘其一，约行七八里至灵光寺。有圣僧出迎，引游寺院，然塔林已毁，仅存遗址。出寺，乘轿而上，至三山庵，庵前一片树林，因地气深厚，扶疏深蔚，风摇树惊，林涛声骇，此大风之日观树之非凡况味也。

有风日，树之英气爽神，严修一行颇为振奋，至大悲寺食斋菜，素味颇宜，胃口大开。饭毕，至龙王堂，有张之洞所派差官候着，引领众人至香界寺后院楼上，凭阑远眺，红叶争艳。红叶尽处，有一洞曰宝珠洞，寺人云丁韪良先生每年避暑于此。狂风涤尽云埃，秋染碧空益高。残阳如血，红叶似火。盛景难遇，天情难却，诸君眷恋不已，叹为观止。直至晚霞渐去，青烟雾霭蔓染天地之色，曛黑矣，诸君乃乘轿而去。自任职学部以来，严修难得有此好心境。

游兴未尽，待风和日丽时，张相再约，同游翠微山。于是，严修同荣相到宪政编查馆会于晦老、宝瑞兄乘车赴翠微山。至灵光寺，严修、邓孝先向张相声明，前次未曾到密魔崖一游，此次欲补游。分道而行，严修等三人游密魔崖。抵崖下，形如飞云岩，有翁常熟师翁同龢题律诗一首，落入眼帘：

衮衮中朝彦，何人第一流？苍凉万言疏，悱恻五湖舟。
直言吾终敬，长贫尔岂愁？何时霜叶下？同醉四山秋。

严修低徘其地良久，思绪万千，游兴全无，遂独自辞返。

令人欣慰的是，敬业中学新校舍落成暨学校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在新校址上举行，校名从此改为私立南开中学堂。孟琴襄和华午晴到校工作，辅佐张伯苓校长。致崇儿、惺儿家信，言其时间苦短而应酬无涯，如虱处京师之烦恼：天短而应酬多，如此度日，殊无意味。汝等虽忙，然有效果之可期，胜余多多矣。中学落成以后，当有改良进步之实际。女学、小学、蒙养院能否日盛一日，甚以为望。余尝思虱处其间，不如在家自办学堂之为愈耳据《信草》。

忙了一些时日，天津各自治机关开始工作了。天津周围的农村发生洪涝灾害，天津商会当仁不让，积极组织救灾。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广泛的服务精神，在当地享有盛誉，自治派头十足。他们天真地认为，作为民选代表，他们完全有权代表天津人民。尽管知县让出了部分管理日常事务的某些权力，如土地使用、城市污水管道处理、粪船和粪厂的管理以及永佃权的界定等，但这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起初，他们以为地方官与自治团体是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当然地方官是老师，他们这些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工作。但那老师已经恼羞成怒了。

本年，袁世凯控制的北洋造币厂，生产出 6.82 亿枚铜元进入流通市场，加上外省和外国流入的铜元，使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在这次通货膨胀中，盐商受到的冲击最大。周学熙作为北洋造币厂的总办，没有接受盐商的请愿。作为商会的头目，王贤宾挺身而出。他向袁世凯的继任者杨世骧提出解决办法。

几经周折，在盐商们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将要付诸东流时，王贤宾再次提出建立真正的银本位制的货币处理办法。这一次他的办法被采纳，商人自保的同时，也稳定了正在蒸蒸日上的天津近代化城市经济。王也因为擅长处理货币问题而被任命为度支部币制顾问。议会还通过地方抚赈局通知天津工艺局，要根据章程对这个机构的腐败和经营无方的控告展开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税金的使用问题。

这样锋芒毕露，使自治机构一开始就陷入自我生存的困境。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每月仅拨给议会 500 两经费，使议会工作捉襟见肘。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土地税或其他捐纳能自主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议会只好要求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

与天津遥相呼应，南方各地也开始了地方自治运动。

可清廷却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干预政事，命制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严修所在学部责任重大，张相、荣相连日入署衙，反复叮咛学部制定办法与措施，不可因小失大。

自苏杭甬路事纠葛两个月以来，各省绅民纷纷集会演讲，致电直达枢机各署，北京以外各学堂也闻风而动，与绅民呼应，直接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清廷命外务部派员与英人商定苏杭甬铁路借款详细章程。江浙铁路公司咨呈两江总督端方，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得到绅商的支持。据《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铁路史资料》二册，863 页。最终引起全国性的绅商和学生抗议，并导致了各省绅商自办路矿的请愿运动。

浙省绅商拒绝苏杭甬铁路借款请愿书，公呈督察院。御使徐定超奏，铁路借款，人心惊疑，请派大员察看情形。同时，苏、浙绅商成立巨款会，公举代表赴外务部议拒英款。安徽铁路公司在安庆集会，反对江浙路借款，要求自办浦口至信阳的铁路。旅京江浙两省八校学生 600 余人，上书力争自办苏杭甬铁路。为修路集资，浙江铁路公司所属浙江兴业银行开业，并在上海设分行。

清廷致电两江总督端方，命其劝谕商民，朝廷于民生乐利，必当极力维持。清廷以苏杭甬铁路借款，舆情未洽，请筹变通办法，下部议之。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斥其危险与荒唐，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曰，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学部压力甚大。于是，清廷再下诏，严禁在京师开会演说。

而严修则坦然处之，面对学潮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指责，他除了以学部名义通行各省禁止中小学堂学生吸食烟草外，暂未发其他文告，且继续抓紧办学事宜。严修正常到署上班，张之洞来了，来得正是时候。谈公事，论学务，一句不涉学潮民愿，均为学务要事，至暮乃散。严修叹曰："张相所论各事多合余意：普通知识之重要，初等小学宜推广，中途改业者皆须略识字、略识道理，教授法、乐歌之重要。言之有序，不胜悦服。"

新式学校于富国强国之目标，可谓渐进，于学潮则立竿见影。帝国视学潮如洪水，如猛兽，而严修办学则不经意的成了学潮的始作俑者。对于革命，严修既不赞成，也没反对，而张之洞则以霹雳手段，坚决镇压；对于学潮导致革命，严修或持顺应自然之态度，而张之洞则始料未及。学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已成众所周知的常

识，而对于无意中成了学潮“第一推动者”的严修，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只字未提。

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中学成了天津学潮的发源地。想当年，他对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如今，他却为学潮兴起建立了自发性平台。在他的教育救国的方案里，并未预设学潮一项，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学潮反而占了教育救国的先机，此正所谓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

(4)长天殒帝星 宪政之流光

1908 年，严修 49 岁。

新年伊始，严修致丁奎野宪政研究所会办、谘议局参议、直隶候补道信，以为本年之大事，应以立宪为首：立宪预备，为目前刻不容缓之事，慈圣尤为注意。“慈圣”，即慈禧太后。

老太太一重视，严修便信以为真。他在信中谈到：前月弟随荣相入对，开首便问，今当宪政预备之时，尔部如何筹备？慈意孜孜求治，即此可知，外间或疑，误之甚也。

老太太听讲西洋史，问了一句罗马在哪里？便将臣子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在世界地图上找不到北的老太太，偶然在地缘政治里问了问路，这样的“慈意”就被当作了政治路标，就要决定着国人的政治前途。为了迁就并服从老太太的政治权威，清政府不得不将政治标准降得低而又低。

当老太太的政治权威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理性便被置之度外了。严修标出“慈意”二字，除了制度性的规定无疑也受了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学部无疑是宪政的发动机，当其发动并运转之时，除了要拉老太太这面大旗，还要借助古史的亡灵。

于是，张之洞、荣庆到学部，电话通知严修同往北京文庙，商议拓筑文庙大祀规制一事。接着，严修到国子监考试顺天高等学堂甲乙班学生，有 57 人。经学试题《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义》，为严修所拟出。又到礼部会考优拔生。

就在严修等为宪政而忙碌时，更为激进的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来到了中国《天义报》刊出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严修等人没

有在意，然而十年以后，它却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当时严修等人以为，惟有宪政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宪政要从教育和实业入手。

五年前，张之洞奉诏拟订《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转年学务大臣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1906 年严修主持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

现宪政编查馆、学部又颁布《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曰：凡在外国高等以上各学堂毕业生，经学部考验合格，奉旨赏给进士、举人出身后，每年在保和殿举行廷试一次。其廷试日期，于八月考验毕业以后，由学部奏请钦定。学部考验是一种“资格考试”，仅授予出身，不授予官职，廷试则系“入官考试”，参加廷试后，即可授职做官。说来说去，“入手”还必须与做官挂钩。

学部奏准关于大学堂及高等小学堂学生毕业后的奖励问题。

以往毕业生据其所学，分别予进士、举人、优、拔、岁贡、廪、增、附生有差。而今学务方兴，各省开办学堂增多，报到学部之人数也日见其多，将来毕业请奖之生员亦必日见其众，现拟定凡各学堂毕业请奖者：

得有进士、举人、贡生出身者，皆由学部发给执照。

凡进士、举人所交照费，全数存学部，拨充分科大学之用。

仅得有廪、增、附生出身者，由学部发给执照样式。

在京由督学局，在各省由提学使司衙门照样式刊印发给，酌收照费。贡生及廪、增、附生照费，或存督学局，或存学务公所，为各地广学之用。

因今年冬，京师大学堂预科学生毕业，必须分科深造专门之学业，张之洞采纳严修等人的建议，以学部上奏，京师大学堂应分科建制。奏云：一般大学应列为八科，经学、法政、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商科。而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弁冕，故规模建制亦当力求完善以树首善之风声，图早收实效。

大学费用动辄以千万计，方此百业待兴，国库艰难之时，虽京师大学堂，亦当量力而行，徐图推广，故开办费 200 万两，分四年拨给，一年 50 万两，或不致为难。

为了加强学部力量，贵州提学使柯劭忞严修任贵州学政时的学

生、吉林提学使吴鲁，同时内调学部，因学部丞、参满员，无缺可补，故以“丞参上行走”名之。自新政以来，各衙门借机多增“行走”一职，学部前无此例，至是开端。

是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退款金额共计 1078 万余美元。清政府立即派员前往商洽，经交涉议定庚款用途为：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的预备学校，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

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国迈出了宪政的步伐，而日本却在中国宪政的进程中占了先机。1900 年至 1907 年八年间，中国留日学生达 25160 名，而留美学生仅 100 余人，不难看出美国忽视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给他们带来的战略利益。

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致美国总统《备忘录》中，对此颇为忧虑：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与德国的商品；中国人民将大量购买欧洲诸国的货物，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样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是给予美国《今日的中国和美国》，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时的《纽约星期报》上亦刊登文章：夫美国退还中国之款，固仍以补助美国学校。然此区区利益，较之中美两国将来亲密合作，不啻如九牛一毛。学成归国之中国少年，一旦在中国教育、商、政诸界具有势力，美国之势力便将取代日本，执中国利益之牛耳。而此中国，乃受训练于美国之中国也《论华人留学美洲之今昔》，《东方杂志》，第 14 卷，第 12 号。

这一深谋远虑之举，对于学部来说，无疑雪中送炭。于是，学部奏准自 1909 年起每年派 100 名学生赴美留学，五年后减为 50 名。从此开了中国学生大规模留学美国的先河，此后不是逐年递减，而是与日俱增。张伯苓得风气先，欲借赴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的机会，考察欧美教育。

学部奏请奖励法政科毕业优秀者，同时严核留日私立法政各大学学生。奏称：近来私立之法政大学日渐增多，其所收中国学生，

程度每多迁就；且往往有名虽在学，而终年在外游荡，实在到堂听讲、归斋学习之日并不甚多。甚有入学一二年，而已自专门部升入大学毕业者，若非严加甄别，准其一体与考，则谬种流传，大有害于后进之人才。于是，学部举行留日法政毕业生甄录考试。

严修于晨六时便到署，与宝熙侍郎一起点名，到89人。然后发题，上午翻译日文一篇。下午，考地理、历史、算学、博物、理化共十题，任选做五题。考试结果即出，及格者仅43人，其余46人均不及格。不久，又举行一次游学生考试，阅卷大臣有唐景崇、梁敦彦、荫昌、达寿。一月后，发上谕对前次游学生考试优秀者陈振先等奖进士、举人出身有差。

学部奏报第一次教育统计年表，各省学堂数：37888所；学生数：1024980人据《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数字虽然聊以自慰，但实际情形却令人堪忧：臣部考察各省学务情形，大都省城则注重高等学堂，而中学或犹未备，府城则注重中学堂，而小学或仅数区；州县设高等小学堂，而初等小学，或竟未设。

好"大"喜功，而忽略基础，尚未普及，便求"高等"，于是规定：凡奏定学堂章程所定分科大学，大学选科，大学实科，高等学堂，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译学馆，方言学堂以及未列专章之邮电、路矿、暨政法学堂正科属于高等教育者，概不得招收未经中学堂毕业之学生，以期深造。至中学以下及各项选科，尚可略宽期限，以待年长失学之人。数年以后，普通毕业者渐多，而高等学科乃有精深之望《东华续录》。

对于东三省学务，他指出：关东风气闭塞，学务始有萌芽。强调破除省界、国界，不拘一格引进人才：晋用楚材，亦自有效。进化之机方动，省界之见遽兴，毋乃太早。办教育要因地制宜，具体而言：若为小学普及计，就地取材，诚有数便，然以养完全师范，虽腹地大省开通最早之地，犹不能不借资于客卿。国界且不能论，又何有于省界？目前最急之务，似须从实业入手，即以学务论，亦以实务教旨为尤要。教育与实业，为近代化之两轮，两轮互动，即所谓"实务教旨"，其实就是教育产业化。

他不光倡导教育产业化，还直接投资实业。农工商部右侍郎杨

士琦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拟招华股 300 万元，并请饬直隶总督杨士骧每年筹拨官款 15 万，预存银行，为保息之用。严修等天津盐商多在自来水公司持有股份。盐商王贤宾、李善人家、华氏、王氏、卞氏家族等，纷纷投资天津华胜烛造有限公司，严修亦积极参与，合计资本达 94000 两。王贤宾、李宝恒发起高线铁路公司，严修参股。这是长芦盐商自办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将京津主要煤炭供应地房山的煤运往各地，年纯利润可达 40 万两。

年初，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与上海德华银行、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于北京订立《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以直、鲁、苏、皖厘金年额 380 万两担保，借英金 500 万镑，按九三折或九四点五折计算，年息 5 厘，期限 30 年。

数月后，津浦铁路北段于天津举行开工典礼，沿线四省各设总理一人，协理二人，帮办四五人。天津总理公推鹿滋老，严修为协理。四省绅商请设立津浦铁路商股有限公司清廷准津浦铁路为官商合办，命四省绅商筹集赎路股，十年后赎回路权。“李善人”家任翰林院侍讲的李士珍和任直隶省咨议员的兄长李士铭，聚集省内名流及盐商富贾建立路权赎回基金会。盐商们在每斤盐中加价 4 文，并把这部分所得用以赎回津浦铁路权。

作为此项基金的总管，李士珍将这笔巨款存入“李善人”家族拥有并经营的钱庄。可谓福兮祸之所伏。严氏家族里也出了这样的“化公为私”之徒。一位颇受信任、经营严家商务 40 多年的“七叔”，却辜负了严修对他的信任。他身故后清查账目时，被发现擅自挪用了 1000 多两白银及其他价格昂贵的物品。严修嘱其子侄不要追究，并付其遗属年奉。严修在京，无暇管理家族财务及产业，他给崇儿、惺侄写信，嘱其“当家”，应定期到盐店检查经营情况。

对于天津的房地产业，他也很有信心：开马路之说，殆不足信。即不开马路，房价亦有日增，无日减，可断言也。又示智崇等信，略谓：国民捐有三种办法，或全数取回，或改为存款，或永作国民捐，以第三法最觉心安。若无处可存，即取回可也。取回或入滦矿股，或入造胰公司股均可。汝兄弟试一筹议之。

严氏私学，终于瓜熟蒂落，严修回津参加南开中学毕业典礼。

南开中学堂中学班第一届毕业，毕业生有梅贻琦、张彭春等33人，其中16人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校，南开学校名声大振。

闲来，究心格致、理化，旁及法政、经济，虽非精通，均能明其大意。对图书局或各省所编教科书，均亲自细读审查，提供意见；又拟定八年教育计划为国家制定教育计划之始，成立京师图书馆、名辞编译馆，变通中学堂课本，分文科、实科，又各分主课、通习两类为我国学校文、理分科之始，绩效斐然。

其时，李提摩太、高葆真在上海主持广学会，正编辑世界名人图册。他们致函严修，告知已将其纳入世界名人谱中。严修复函曰：乃以辑中外巨公图像，遂令鄙人滥厕其间，聊以备数而已。

然而私塾与新学堂竞争激烈，严修亦不敢掉以轻心，致保定中学堂监督张国浚信云：年来会垣扩增小学至一百余所，进步不为不速，而私塾以抗之力未曾减少。近日体察情形，私塾所以为社会欢迎者，非独有洋教之存见也。钟点多一也，学费少二也。办学堂者诚于此两端稍加之意，而略予变通，似亦招来之一法。

对于改庙产为新学堂引起出家人和农民不满，各地以兴学为名乘机强征捐税而引起暴动。不久前，山东宁海州牟平县农民数万人拥进州署，要求废止学堂、惩办绅董及豁免亩捐三事，并围困绅董住宅，罢店罢市。

在天津，据《大公报》报道，天津县议员们与地方官再次发生了摩擦。在早期议案中，议会曾向总督申请拨款5万两白银来扩大地区教育规模，这笔钱来自盐价提高后的税金，但被总督和盐运使严辞拒绝了，因为这笔税金早已挪作他用。议员们代表自治机关再次向政府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长芦盐商纲总向盐运使提交的报告中谈到，每年盐商集资9万多两，其中6.4万两用于新式学堂捐助，其余便作了长芦盐区官员们所谓津贴。同时，还从引盐中，每引抽税0.15两以资助北洋师范学堂及附属小学。盐商们虽慷慨解囊资助新式学堂，但对有些官员们偷漏义款进行明贴暗补等行为，还是怨声载道。

对此严修非常谨慎，他连续给儿子写了四封信，要求与严家有关的各类学校，在炙手可热的利益面前，自觉地退避三舍。他甚至

拒绝了他的继任者提学使卢木斋为私立南开提供的公助款，以免瓜田李下之嫌，诫曰："补助之款，万不可再领，否则颇遭指摘。"自本年起，好友徐世昌每月捐助南开中学常年经费银 200 两。

天津的自治运动在向前发展，各地亦如此。何时开始立宪？群臣议论纷纷，张之洞、宝熙、严修坐谈立宪事，杨度来言宪政编查馆议开国会年限：主五年者七人，主七年者三人，主六年者二人，主十一年者十一人，主二十年者一人，主迟开而未定年限者二人。

国会请愿运动随之而起，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 2 年为限。江苏国会请愿代表到北京，随后湖南、山西等代表相继赴京请愿，联名上书宪政编查馆，请开国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及议院、选举法要领，宣布筹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严修在学部接到御旨，并于是日记曰：奉九年内将预备立宪事宜一律办齐之谕旨。立宪未动，秋风又起，严修等游碧云寺。一行六人乘山轿前往，下榻后，天色已黑，于暗中登塔院。晨起，观日出，朝霞漫丽，云似海波。霞涌云腾，动静皆宜。又游狮子窝于峭壁之颠，曲折盘行而上。盘桓山半，满山红树，迎面扑来，夹道丛林，霜叶如染。山轿悠悠，时隐时现，而人则已全然深入其中。迂回而上，至山顶，山风如水，清凉无比。俯瞰众山小，远望城阙在：万寿山、昆明湖、南苑之平原、芦沟之铁道、北京城角楼等历历在目。至夕阳红树，由山顶弥漫而下，真乃天公织绣，大地屏锦。严修一行，于暮色山麓，曲折而归……

夜观天象，忽见奇景，叹为观止：夜，忽天放明，如乍曙者然。已见一流星，自西北来，过吾辈头上，向东南半途而灭。初见时光极强，如水月电灯，又如元宵灯火中金盘托月，其将灭有黄线一道，此平生未见之奇也。心有灵兮，天人感应如斯！

此乃宪政之流光耶？此乃帝星之将殒耶？严修被诏，觐见光绪帝。先赴外务部小坐片刻，然后往仁寿门外候见。"仰瞻天颜，既瘦且黑，小臣不胜忧悸。"《严修日记》

11 月 13 日，早饭后，严修到学部衙署，其记当日情形谓：

闻言，圣躬疾笃，传言已晏驾，特秘之耳。骤闻此语，如丧魂魄。

电询荣相，言往庆王府；电询瑞臣宝熙，言往西苑门。余亦遂往西苑门，至则寂然无事。有一茶夫，余问之，则曰：皇上病见好，两日未传膳，今传膳矣。因访荣相，知是日奉懿旨：醇王为摄政王，其子溥仪于宫内抚养之。次日，光绪帝病故于瀛台。

严修记曰：汪苏拉来报日内情状，知圣躬之疾，危笃如昨日。晚，闻大行皇帝酉正二刻宾天之耗。第二天，又闻太皇太后于未正二刻宾天之耗。

急往西苑门，门已扃，阒寂无所见闻；往东华门，亦不得入。

16日，太皇太后大敛，奠哭于皇极门内。

大行皇帝朝晡日中，三祭哭于乾清门外。

17日，严修致智崇、智惺家书云：二十一日酉正二刻阴历，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次日未刻太皇太后慈驭上宾，相隔只二十点钟，连遭大丧，为数千年史策所未闻，都市人心不免讹言。睹目前之惨案，思后此之危局，真不知命在何时。都中士民均颇守礼，余见往来行人，帽结无一红者，舆夫仆人皆摘缨，使馆界内巡捕兵亦摘冠缨。廛市帘布皆易蓝白，印章亦全蓝色，即此可见国民程度之略有进境矣。又，国丧二十七日内邮票可用一分之票倍贴之，以避红色。

钦定年号"宣统"。12月2日午时初刻，宣统皇帝溥仪升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及颁诏礼。严修随班跪叩毕，随诏亭出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至金水桥外跪听宣话。宣话先满文，后汉文，行将就木的宣统王朝，就从这"宣话"开始了。

(5)五十而知天命

1909年，严修50岁。

"宣话"开篇："项城开缺。""项城"者，袁世凯是也。

载沣一上台，便向袁世凯开刀。不过这一刀没有砍在头上，而是砍在脚上：不意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体恤之至意。项城奉旨，仓皇出都，旧识皆噤若寒蝉，惟严修作狮子吼：请明示功罪！

严修独抗疏，力保袁世凯。疏上，留中不发。时人有诗云"朝焚谏草欲回天"，盖实录矣。后来陈中岳在《严范孙文挽诗》中亦提及

此事：盎然正气见于诗，偶露锋芒不自知。聚铁六州成大错，异才终古惜袁丝。陈于诗后自注云：严修抗疏救项城，予尝以少陵、房琯、太白、汾阳为喻。严修答诗曰：本为衰朝惜异才，几番铸错事同哀。拾遗供奉吾何敢，幸未人呼褚彦回陈中岳著《转蓬集》。以"惜异才"，而"不惜"见忭摄政王，真豪杰也！

1月3日，袁晋见摄政王辞行，严修候袁未遇；次日，再候袁世凯，仍未遇。袁匆匆离京，严修等还有仲鲁、瑞臣、慕韩、杏城、雨人赶往火车站送行。赵元礼《蟫香馆别记》中有记送行事：

人言项城放归彰德，亲故无敢送者。独严范孙、杨晳子便衣送至车驿。袁曰：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我且被祸，盍去休？严曰：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曰：别自有说，祸不足惧。后来一股悲凉之气，为英雄之华盖，斯美矣！然而事实却很平凡。赵问严修，严曰当时相送者尚有他人，所言未及朝政，即杨度亦未亢论。

次日，严修被诏，带廷试游学生晋见摄政王，"自摄政以来此为第一次引见也"。摄政伊始，载沣欲以开明专制君临天下。他深知立宪乃立国之头等大事，为博取民心，便不吝纸片纷纷——首先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尽管是一纸告示，却令人颇感欣慰。

又下诏令各省于本年内成立咨议局，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接着颁行《资政院章程》及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看上去热热闹闹，煞有介事。清廷摆姿态，民间趁势推波助澜。

原来宪政之中心地，北为直隶之天津，南为两江之上海。袁被开缺后，天津群龙无首，宪政之重心南移，上海渐渐独领风骚。

先是各省咨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接着16省咨议局代表抵沪，商议请愿国会一事，并公推直隶代表孙洪伊严修友，天津北仓盐商世家等进京请愿。严修也同宝熙到宪政编查馆商改由各部院各省督抚选送硕学通儒充议员咨稿。

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文章，其实满汉权力之争，已凌驾于宪政之上。上谕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帅，未亲政前，暂由摄政王代理，并先行专设军咨使。命载洵、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载沣加强集权，满人收回兵权。又任命皇族载泽为盐政大臣。载泽是君主立宪制中央集权主义的首倡者，通过这一职务，他以调整盐税作为剥夺地

方督抚权力的手段，同时打击盐商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首当其冲为直隶天津，矛头所向，直指袁世凯。

严修日记云：袁云台袁世凯之子来，因《时报》诬蔑慰帅袁世凯，愤欲控诉。严修竭力劝阻，并诫勿发议论。小不忍则乱大谋，大谋是什么？是宪政么？本来君子无党的严修，为宪政而卷入党争之中。严修致袁云台信，谓"托带信件，送项城豹皮坐褥一对，香胰两匣，官燕、普茶、蜜饯等物，以为素礼，且报其施"。

老太太死了，摄政王独裁。摄政王是光绪帝的弟弟，他要继承光绪帝的遗志。老太太晚年，对于光绪帝是废其人而用其政，所谓宪政，不过变法之回光，维新之返照，大势已去。皇帝奄奄一息，帝国气数已尽，可他虽死犹恨！孝字当头，他不敢恨老太太，他恨袁世凯！恨袁世凯在关键时刻将他出卖。此一段公案，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是是非非，欲说还休。其实皇帝又何尝知道实情？袁的出卖是政治的本质使之然，而非出于信念和情感。政治是实力的较量，是利害的选择，连皇帝都要向老太太请安，他袁世凯这块政治砝码你说该投向哪一边？母子失和，是皇帝的家务事，臣子谁敢说三道四？

康有为不知天高地厚，几句话引起帝王家轩然大波。纸固然包不住火，但最好还是不要捅破，康有为破坏了帝王家的游戏规则，放出了包在纸里的火。老太太将政变当作家务事，袁世凯挺身而出，为老太太政变提供依据。后来义和团兴起，老太太欲借义和团废了皇帝，袁则反其道而行之，向义和团大开杀戒。这个当年抛弃了皇帝的人，反而成了皇帝变法事业的护法者。辛亥以来的新政，多由袁来发起，无论开特科，废科举，还是立宪自治。

可载沣却视袁为眼中钉，将一个治世之能臣，好端端逼成了乱臣贼子。这还不够，他还恨屋及乌，对严修越来越看不顺眼了。如以立宪大业为重，他本应与袁共济，可他认定袁是政敌，必欲除之。在家国问题上，他先家后国；在满汉问题上，他扬满抑汉。

考察当时之宪政，成绩卓著者，在中央有二部，一为袁主持之外务部，另一则为严修主理之学部；在地方则有直隶和两江，一南一北，交辉相映。尤其直隶地区，宪政编查馆奏陈筹备宪政事宜，称

筹办城乡镇地方自治，以直隶成绩最著；筹办省城商埠审判厅及厅、州、县巡警，亦以直隶为最早。

袁虽然被开缺，但直隶地区立宪风气已开，自治运动基础仍在。以天津县议会为例，其工作就不受官僚人事变动的影响，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们曾就一张日印天津地图将中国土地划入日租界向日本领事抗议。他们还着手调查津浦铁路贪污及在天津站选址时进行的土地投机等事件。对于天津县捐务科的账目，他们列出了详细的查账清单，包括 9 万吊铜钱的牙纪帖费，知县每年从脚行征收来的 2.2 万吊铜钱陋规和滥征等。自治之深入彻底，可谓前所未有，构成晚清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

然而自治与集权不两立，新王上任，明修自治栈道，暗渡集权陈仓。他召见严修，视严修如无。严修入宫觐见，先到兵部报房小坐。随后，入乾清门，出月华门，入遵义门。门内北房三间，其东门军机大臣先在，严修等人入各一揖，乃至其西门少候。军机下，乃入，先向御座一跪，次入东暖阁，向摄政王肃立。王以颐指命坐，开口即言：近日上封事，论学务者大都揣摩迎合，命传谕署中，王实不为所动云云。其言甚长，唠唠叨叨，训人不倦。而严修等奏对约刻许，王即曰：无事矣。

严修等悻悻而退。两日后，闻南皮相国之意，不以小学课本宜与立宪相合之说为然，故叹曰：朝廷日日言立宪，而政府之所见乃如此，将来之结局，不堪设想。

载沣欲见王公百官，行执政之大礼。严修先往文华殿察看地形，看好出入之路及拜跪之地。次日，时辰一到，百官聚集文华门内外，二品以上在甬道上候。先，王公行礼；次，一、二品行礼；以次类推，均一跪三叩。庆邸奕劻奉谕免跪。本日谕免者还有载泽、载振、载润等，皆摄政王平辈及年长者。孙家鼐、张之洞、鹿传霖三相亦奉谕免跪，但必须入班行礼。

严修行礼之后，便到了知天命之年。天命他兴学，他遵从天命的旨意。他召集学部同僚讨论预备立宪九年间的工作计划即“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按要求上报宪政编查馆。曰：

伏查臣部职司教育，大纲分为二端。一曰普通教育，一曰专门教育，皆为国家根本之计，宪政切要之图。盖立宪政体，期于上下一心，必普通教育实能普及，然后国民之知识道德日进，国民程度因之日高，庶几地方自治、选举议员各事，乃能推行尽利，而庶政公诸舆论，使无虑别滋弊端。此普及教育所以亟宜筹备者也。立宪之效，必以富强为轨；富强之政，断非人才不举。中国大利未兴，百端待理，患在专门之学未精，专门之才太少。若不研究高等之学术，即不能得应用之人才，而富强之图，终鲜实济。此专门教育所以亟宜筹备者也。

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学部应行筹备事宜有：

宣统元年，预备立宪第二年，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等18项工作。其中督促地方教育亦应按师范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专门教育四方向努力。宣统二年，预备立宪第三年，颁布高等小学教科书等25项工作。宣统三年，预备立宪第四年，京师筹设专门医学堂、农学堂等12项工作。宣统四年，预备立宪第五年，京师筹设专门工业、商业学堂等7项工作。宣统五年，预备立宪第六年，行各省学司确查全省人民识字者若干人等5项工作。宣统六年，预备立宪第七年，派视学官分查各省学务等2项工作。宣统七年，预备立宪第八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等3项工作。宣统八年，预备立宪第九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等5项工作。

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云：初等小学为养成国民道德之初基，开智识谋生计之根本。因课程过多，师资难得，经费难筹，小学教育实难普及。奏折提出，拟酌量省并，约为五科：修身、读经、文学、算术、体操。

又奏请“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云：中学堂之宗旨，或令其博通古今，以储治国安民之用；或令其精研艺术，以收厚生利用之功，于是文科、实科分焉。文科以读经、文学、外语、历史、地理为主课，以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理财、图画、体操为通习；实科以外语、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课，以修身、读经、文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法制、理财、体操为通习。

严修忙得不亦乐乎，然而载沣却命张之洞传谕严修，责其“礼仪生疏”。严修不明其意，急赴冰相张之洞处，询问其详由。冰相言，摄政王先是连续说严修于礼生疏，然后又叠语重复“生疏”二字，但最终也没说出某处有错。带领引见廷试游学生，乃例行公事，从无所谓“生疏”一说，看来摄政王要借题发挥为难严修了。

果然，他再次出手，毫不留情。某日，严修又带领引见游学生。完毕，即奉上谕：本日学部带领引见，侍郎严修、宝熙奏对错误，殊乖体制，均著交部察议。袁世凯离京时，宝熙亦在送行者之列，载沣岂无所闻乎？宝熙也难逃干系。一周后，吏部察议下来，罚俸半年。“系公罪，应否抵销？奉旨，不准抵销。”

人心惶惶，张之洞、宝熙俱告假。严修独木难支，亦萌生退意。他游宦京城，既不为官，又不图钱，开销用度均以家财贴补。任职学部侍郎期间，他的钱银往来是通过“源丰润”办理的，这是严氏家族经营的钱庄。他以自家盐业作抵押贷款，来应付在京城的开销，成为家族经济的一大包袱。

任职学部，本为立宪而来，立宪无望，不如归去！

一个隐士的幽灵在他心中徘徊，他听到了祖先的呼唤……

又闻南皮相国病剧，颇为忧惧，夜辄入梦。一日，严修正与幼梅谈话，忽闻南皮相国薨逝之耗。人言南皮相国临终情状：改正遗折，处分家事，神明不衰。

严修前往凭吊冰相，哭之甚哀。送张相挽联云：任重似陈文恭，好古似阮文达，爱才如命似胡文忠。若言通变宜民，闳识尤超前哲士。使蜀有《辖轩语》，督鄂有《劝学篇》，余事作诗有《广雅集》。尚冀读书论世，后贤善体我公心赵元礼《蟫香馆别记》。

严修痛哭，他哭英雄凋零，哭哲人永逝，非为一人知己哭，更为天下苍生泣：“吾国危迫已至万分，又丧元老，不能不为天下恸。”

一月以后，严修随王公百官送慈禧棺柩赴东陵。朝发京城，夕抵燕郊，止宿一夜，次日续行，下榻降福寺。一太监呵斥其下，其下亦愤愤不平，喋喋不休，言官任何大，终是奴才。严修厌闻其语，绕道而出。

行程六日，终于抵达东陵。借此机会，严修瞻仰高宗裕陵、世祖

孝陵、文宗定陵，步行 10 余里，当晚“乃觉适畅”。遂于日记云：“运动之有益卫生，此其明验。终年在京，非车马不出门，真非计也。”顾左右而言他，真伤心人别有怀抱！

葬礼完毕返北京，第二天，便有江阴王培元到严修府上拜访。交谈后，知其欲访严复而误，王感不安，严修则以之为趣事而觉可喜。其时严修主理学部，严复也来学部任职。严修请严复为总纂，主持名辞馆，以编定各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并讨论国文必读书。严修于日记信札中常称严复为“家又陵”，可见关系非同一般。二人同寓石驸马大街石驸马大街在学部街之前，横胡同即通学部大门，几为近邻，投信者往往误送。严修尝拆阅后而悟其非，严复亦尝误拆严修信而速遣人回送。《津门史缀》曾登载“严修、严复被张冠李戴的一段公案”，时人传为佳话。

辞职前，他还要做两件事。一是与外务部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办法”规定：自拨还庚款之年起，前四年每年派遣学生游学美国约 100 名，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 50 名；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宗司考选、遣送学生出洋及与美国有关人员联系诸事宜，并专设驻美监督。附设肄业馆一所。在京城郊外择清旷之地建馆，招学生 300 名，聘美国高等、初级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此馆专为已选取各省学生暂留学习而设，是为清华预备学堂之始议。

游美学务处按照“自退款第一年起，前四年每年要派 100 名学生留美”的规定，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直接送美。630 人报考，连考两天。庚款考生发榜，630 名考生中，仅录取 47 人。其中金邦正、梅贻琦均为南开中学毕业生。不久，游美学务处就北京西郊清华园旧址建肄业馆，后改为清华学校。

二是筹建京师图书馆。谕将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陈列书籍、内阁宋元旧刻、翰林院《永乐大典》，无论完阙、破碎，一并送交学部。严修前往文华殿，看殿内藏书，先到大库一看，内藏历代帝王御笔题本极多，“任检一二本皆乾隆前物也。本上有硃批，皆批本处所代写也”。文华殿西配殿，为内阁清理书籍办事

处，有许多书已打好包裹，准备送交学部。严修有幸“得见宋本《文苑精华》、《二程文集》”，以为“《文苑精华》尤精”。

然而有一件事加速了严修辞职。此前，滦州矿务局首次召开股东大会，确认周学熙总理职位。周以开平矿业为直隶公产，因张翼出卖而被英商霸占实属非法。英使则谓滦州煤矿侵害开平利益，并以武力相要挟。清廷震动，命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妥筹办法。所谓“妥筹办法”，除了应付英商，还要算算袁世凯的老账。

陈为光绪进士，其妻认庆亲王奕劻为义父，陈借此而扶摇直上。戊戌变法，他坚决反对；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充当奕劻助手，参与议和及《辛丑条约》签订。他声称，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

本来新任直隶总督为端方，端方到任前由那桐暂署。端方时任两江总督，与袁世凯一南一北，鼓吹立宪，推动自治，为满人中新派人物。袁被开缺之后，他也被御史胡思敬奏参十大罪状，因而调任直隶总督。名曰调任，人实未至，半路便杀出个陈夔龙来，横刀立马，夺了直隶总督。

近代新派人物多是重商主义者，其政治优势在此，其弱点亦在此。在旧体制里，重商主义容易导致腐败，因此，从经济问题入手作政治斗争，是顽固派的杀手锏。

早在3月下旬和4月初，摄政王便下令制定政府官员经商为非法的新法律。他声称，西方全面禁止政府官员经商，正像他不允许精明的商人居有官职一样。在这一纸命令的威慑下，官员经商纷纷转入地下。这一纸命令，合情合理合法，却不合时宜。传统文化抑商已久，近代重商主义兴起，全要靠政府“劝业”。政府“劝业”要靠官员实行，官员要以身作则，敢做吃螃蟹者。

在北洋实业中，袁世凯是个核心人物。这不光是强调他作为地方官员的重要性，还因为他在许多重要企业中拥有股份，这些股份是实实在在的“劝业”投资。严修亦如此，他和袁世凯一样，在滦州矿局拥有股份。滦州矿局股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股，其设立之目的在于不惜以商战手段，逼迫英商交还开平矿局利权。

该股风险极大，不仅冒经济风险，又要冒英商以武力要挟的政

治风险。这两种风险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惟独祸起萧墙之内则为他们始料所未及。载沣一纸命令使严修两难，陈夔龙虎视眈眈更令他不安。袁被开缺回家了，在陈的治下如坐针毡，颇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味道。对于严修来说，他入主学部，非为做官而来。因此，他弃官而去如弃敝屣，弃官一身轻，弃官万事休。

可惜者教育之大体已立，宪政之局面初成，而他却要离去。他家有私学，有实业。礼失求诸野，私学在野，宪政在野，革命在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一年，伯苓受洗为基督徒，而他却再次下野。当他参加南开中学校庆五周年，观看伯苓自编自导自演的新剧《用非所学》时，他看到一边是蒸蒸日上的新私学，一边是每况愈下的旧朝廷。天命在野！天命在野！他听到了天命呼唤。他在知天命之年，下定决心要与旧朝廷决裂。

六、天命在野之一：改良与革命

1. 自治运动与橡胶风潮

(1)中原、江南、冀辽万里行纪略

1910年，严修51岁。

严修以回乡扫墓为名，向荣尚书请假。

荣庆明白严修苦衷，虽惋惜却未坚阻，严修即呈“请假修墓折”。夜入奏，早立准，摄政王即命内阁学士李家驹署学部左侍郎。真所谓人去楼不空，未走茶已凉。挥手从此去，诀别旧朝廷。

这一天，清廷发上谕：俟将来九年预备立宪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必召集议院，召开国会。能拖就拖，欲以不了了之。

但表面文章还要做，清廷拒开国会的同时，准宪政编查馆奏，在京外衙门一律设立宪政筹备处。此前，请愿国会代表团孙洪伊等向督察院递交由福建咨议局书记林长民属稿、江苏咨议局研究会会长张謇定稿的请愿书，请速开国会，清廷不允。于是，孙洪伊等在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设总部于北京，各省设立分会。

2月1日，严修出都返津，游宦学部四年有余，同僚之谊，职事之情，实难一挥而去自记云：余以乙巳冬至前三日入都，今以己酉冬至后四十日始归，在阳历为四年四十日，阴历则四年又三个月也。

到家了，三代同堂，簇拥相见，周视庭院，草木情亲。亲人寒暄完毕，由智崇、智惺陪同，步行去南开中学。在学校食堂用饭后，与伯苓叙话至夜十一点钟才告别去。为表示对他的支持，直隶提学使卢木斋由公款拨助南开中学每月银百两。清华学校代理总办颜惠庆聘伯苓先生为清华学校教务长。受命之际，伯苓先生欣然自谓"保姆"，要照顾"南开"和"清华"两个"婴儿"。

遍访在津亲友后，即又赴唐山往滦矿、平矿考察。期间，接智钟儿信，知其信基督教，不悦，但顺其自然。严修对宗教似无可言者，这与一手《论语》，一手《圣经》的张伯苓迥异其趣。

数日后，严修偕林墨青、长子智崇、侄智惺，取道京汉铁路，赴原籍修祖墓，他舍近求远，专门去看望袁世凯，以慰其苦闷。

由北京启程赴河南彰德府，晚七钟半到，住宿西关外天保栈。袁次子克文来车站迎接，严修因人多，不愿打扰，仍宿客栈。

次日，袁亲派厨丁送来烹饪，小碟四、大盘八、大碗四。饭后又遣四车来接，前往袁宅。

袁宅位于城北之河北洹上村，土墙四周，地广二顷有余。袁在厅堂恭候，车站冷别，同遭排挤，畅谈却欢。袁引严修等遍游其宅东园，名曰养寿园。是颐养天年，还是韬光养晦？顾名思义，两者皆有之。蛰伏乱世，潜龙勿用，静息飞龙在天之机，是养晦，也是养寿。"心"字头上一把刀——忍！

但养寿园还是美丽的。其园中有园的建筑手笔就已经显示出主人的富庶与尊贵。乐静楼、红叶馆、杏花村、五柳草堂诸处别院，其巧思亦令人起兴。袁世凯携严修每游一处，辄坐憩茶话。观林木簇拥，论天下英雄，每至深夜，仍畅谈不休，难舍旧日情怀。

两日后，严修一行由彰德出发，袁差家人以柬相送，内附车票，严修告以已买车票，差官执意严修退票，争让许久，不得已，严修退票。记曰："项城之情意周至，不惟可感，亦可法也。"

到郑州时，有一小贩售纸烟，其商标曰"爱国军"，又有两黄旗交叉于其上。严修以为华人所造，怂趣林墨青买烟。买后细看，方知上当。实是英国制造，烟盒下方有一行小字为"英国烟公司制"字样。严修大有被欺弄之感，曰："外人之舞弄我国人，真无所不至

也。”

抵达汉口，寓迎宾馆，馆临江畔，凭窗倚栏，武昌全景历历在目。旧识好友相约而来，在黄鹤楼设宴款待严修。

黄鹤楼位于蛇山，相传为三国吴黄武二年所建。楼上可以鸟瞰武昌全景，又可遥看汉阳大势，齐照岩学使一一指点。严修叹服武汉三镇之气势，为他处所不及，此乃张文襄公经营所致。惟憾者马路过窄，鹦鹉洲在汉阳上游，却成为湖湘木客的卸货之所。

次日，渡江，登晴川阁望江，自是另一番江景，不在乎阁，而在乎江。武汉三镇，但凡临江远眺之处，江景无不各具其妙。而晴川阁之势在于它位于龟山禹功矶上，与蛇山矶头上的黄鹤楼隔江相望，有“三楚胜地，千古巨观”之称。

该阁由明汉阳太守范子箴创建，取唐崔颢《黄鹤楼》诗“晴川历历汉阳树”之意而命名。清顺治、雍正、同治、光绪年间多次增修，有总督张之洞的题额书联等。严修日记记张文襄壬寅年联：“洪水龙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额云：“翼极雄观”，似皆亲笔。一年后，即辛亥革命时，晴川阁历战火之劫，仅存三间平房，原“飞阁层轩，规模宏敞”之气势已杳无踪迹。严修有幸一睹古迹。

出晴川阁，穿过兵工厂，至月湖阁，登伯牙台。台临月湖，清旷悠寂，琴水自悟，魂牵远古。严修观联：“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时武汉大雪，严修赴临江月华楼用饭，兼观雪中江景。寒江听雪寂寂无声，雪融寒江，从从容容。虬枝临风，依江而立，仍有翠绿含雪，得禅一味。崇、惺儿辈难得一见此情此景，摄影嬉戏，兴致颇浓。

晚，严修一行登轮离鄂，寒江观雪，顺流而下九江。原拟翌日游庐山，因人地生疏，天气寒冷，且雇夫不易，于是改游石钟山。自九江赴湖口，宿玉鹤楼。“湖口县全境烟户万余，人二十余万，县分五团，每团有初等小学，县城则高、初两等学堂皆具。学堂之外，私塾极多。”石钟山位于湖口县鄱阳湖与长江之交汇处，水击山石，声如黄钟大吕。宋苏轼与长子苏迈泛舟此地后，写下千古名篇《石钟山记》，以声定名。石钟山地势险要，控扼一江一湖，居高临下，号称“江湖锁钥”，攻守自如，为兵家所必争。曾文正当年与太平天国兵

战之地，而今已烟消云散。严修凭栏远眺，匡庐五老峰，如拱如揖，祥和之态可亲可掬。

湖江相依，雾锁天际，严修一行恋恋不舍，又逗留数日，方从九江出发。顺江而下，船抵上海，下榻维新旅馆。

稍事安歇之后，严修率儿参观商务印书馆及科学仪器馆。

观毕，登"赤脚财神"虞洽卿所办宁绍江轮赴宁波，到慈溪东乡谒祖墓。同行者除崇、惺儿外，还有族弟严子均、瑞堂、文英，族叔兆峰，族兄懋勤等。"赤脚财神"从小家境贫寒，15岁时经人介绍，到上海一家颜料店做徒工。到上海那天，适逢大雨。他珍惜母亲一针一线赶制出的新布鞋，脱下来赤脚跑到颜料店。因脚湿厅滑，一进殿堂便摔个仰面朝天。店老板看到虞洽卿长得天庭饱满，长面嘴阔，一派富贵之相，跌跤姿势又好似一个金元宝，就认定他是个"赤脚财神"，于是传闻不胫而走，而虞洽卿的财运也如其传闻一样一发不可遏，真真所谓"富贵逼人来"。宁绍轮船公司是虞洽卿与同乡严信厚创办的，因此，严修与虞氏熟悉。

船抵宁波，寓严家源丰银号。至慈溪东乡，首谒始祖墓，有"世、元、宝、富四代"及应翘公墓。次日，拜谒筱舫叔墓严信厚于190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8岁。又谒宗祠，与族人会食，并对贫寒者酌予资助。

事毕，再乘宁绍轮返沪，仍寓维新旅馆。歇息一夜，赴杭州，游览西湖。自涌金门登船，泛舟三潭映月，恍若浮云月宫；乘舟孤山下，登麓赏梅花，瞻岳庙、观鱼在花港，正是苏堤春晓日，恰得暖风熏游人，半醒半醉至南屏。晚钟敲响时，燕宴刘庄。

刘庄，又名水竹居，为晚清刘学询别墅。位于西湖丁家山前隐秀桥西，远望掩映山水之间，有西湖第一名园之称。严修先游高庄、廉庄，均不及此庄之幽之秀。遂即席赋诗两首，皆为今日游兴而发，不为昨日沉浮而叹。

游灵隐寺，与寺僧叙话，得幽竹深涧之清雅，东篱南山之悠然，物我相宜亦相知，豁然而觉然。至灵隐绝顶，俯瞰云水森森，山色苍苍，湖外有山，山外有江，江外有海。

汤寿潜邀严修叙话，拟宴请严修一行。修婉辞，与诸亲友便饮于江干山麓之驾涛山馆。席散，即登车转赴苏州，至拱宸车站下车，

卢少棠等朋友备花船来迎。所谓花船，指船上预备小茶食，烹茶煮酒，为游客消遣助兴。船直赴留园。“留园者，盛杏师盛宣怀，字杏荪之园也。”严修云，留园景致绝胜上海愚园，甚至“自留园盛而虎丘日寂矣”。

从苏州至吴县，游天平山。其山不高，海拔221米。但以枫、泉、石并称三绝。山麓以枫林铺展，行至半山，有白云泉，谓“吴中第一水”。其上则多奇峰怪石，若笔架毫峰，挺秀奇伟，人称“万笏朝天”。山顶可远观太湖水天相接之丽景。山下东坞有北宋范仲淹祖坟。严修下山谒坟，有碑可证，“唐柱国丽水府君之墓”。

晚，盛宣怀拟宴请严修，怕烦扰主人，婉辞。便餐后观坤戏。

乘火车至镇江，中途下车游焦山。下榻文澜阁，阁门板上刻有张之洞书联：“大江流日夜，高浪驾蓬莱。”游自然庵，有僧名涤心，请严修等观赏书画。又游水晶庵、定慧寺。严修有幸得见《瘗鹤铭》刻石，诸葛铜鼓、周鼎、汉瓦炉及清代阮文达至翁叔平等墨迹精品多件。山僧坚请严修题字，严修难却，遂题年月姓名十余字而离去。

返上海，于子均处歇息两日，又乘船游普陀山。眼观古刹佛殿遍布，耳听僧诵梵音不息。青山临碧海，别有一幅“山海经”。

九龙殿殿前有两旗杆，有一僧对严修语，左旗杆比右旗杆高出两丈，是因为左旗杆能自活，逐渐加长，如此奇迹，可戏以为言，可信以为真否？严修遂咏诗一绝以答：

诸天幡盖趋欢喜，绝顶松云访寂寥。
我爱名山人爱佛，买珠买棹两相嘲。

天下名山僧占尽，游山必入寺，严修只好随缘了。下得山来，且回宁波，仍宿源丰润银号。

翌日，游天一阁。阁建于1561至1566年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藏书有七万余卷。阁系木构六开间二层楼房，为防火，阁前凿有水池。阁名取于汉郑康成所注《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水”之说。清康熙时，范钦后人又在阁前增建湖石假山，遍植竹木花草，清朗幽雅，与木楼书香浑然一体。严

修至天一阁，主人范氏衣冠出迎，并示以宋元版书及历代帝王、名臣、名儒画像。阁内有明郡守王君书“宝书楼”额，外檐悬阮文达书“天一阁”额。

观毕辞出，严修登甬兴船返沪，仍宿子均家。连续数日访友、购物、赴宴。期间，严修曾同林墨青乘马车悠然而至小万柳堂，访该堂主人廉惠卿。小万柳堂名不虚传，俯临淞河，景致宜人。主人拿出珍藏的书画犒赏严修，有王建章之山水、恽南田之花卉；又赠严修西湖廉庄摄影画册、吴芝瑛手书《楞严经》印本、南田画印本，并以亲手所采龙井茶款待，使严修一行依依不舍。

临行前，严修设宴，酬谢在沪亲友，与宴者 22 人。一行登新丰轮船返津，同行者还有筱舫叔遗孀婶母率女仆三、男仆二。

过了 51 岁生日，严修又偕林墨青等乘京奉车北游冀辽。

先抵奉天，寓小西门外茂林馆。城内小河沿，夏令荷花开，游人如海，此时虽已临春，却仍是小寒天气。至奉天公园，有揽辔亭、澄心亭，皆挚友徐菊人题额。返至山海关，游海滨、石河等地，严修好石，捡石子一竹篮多。至唐山，赴启新洋灰公司，傍夕，参观洋灰旧厂。

顺路，往公司一德国人家花园一游，主人已归国，园丁守之，园有五六亩，树木花草多自西洋来者。乘骡车赴开平矿，途经雹神庙时，人告其地下有泉甚甘。据传李文忠督直隶时，每天遣人取之为饮料，故当地戏呼为李文忠泉。至陈家岭看煤矿。陈家岭日出煤 300 吨，多时可达 800 吨，合马家沟、印字沟、赵各庄等处可 5000 吨。而开平矿局才日出 2000 吨。商战之势，立竿见影。

(2)“野人”求“缺”与南开学潮

还在由沪返津时，严修便草拟因病开缺折稿，借“病”开缺自己。学部一职，至此遂告结束，为其官宦生涯画上句号。

两度瀛山采药归，渔竿初志竟乖违。
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
推毂徒贻知己累，滥竽敢恃赞者稀？

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间忏昨非。《五十述怀》

此时，清廷方调学部尚书荣庆为礼部尚书，以吏部侍郎唐景崇为学部尚书。范源濂衔唐尚书之命，致挽留先生之意，谈良久。请"开缺奏折"誊清缮就后，即将奏折交于折差晚车入京递呈。

准奏。接姻亲华璧臣时任军机章京信，抄示稿如左：宣统二年三月初四日，内阁奉谕：学部左侍郎严修奏，因病恳请开缺一折，严修着准其开缺，钦此。《清季新职官年表》于此日作：严修因病免。

郑孝胥来访，适严修出门，未遇，留诗一首云：

同日同年更同月，前身有约定同来。
平生早退休论命，却待先生共举杯。

其时严修正陪刘幼樵参观学务公所、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简易小学等。

袁世凯亦遣族侄袁乃宽来访，带来袁的信件。信中言，听闻严修因病请休，不知是否真有病？并称情同手足，愿与分忧。

几番出游后，严修赴账房查阅账目。发现自己欠公账之款银22000余两、银圆18000余元，其中任学部侍郎期间，约计银20000两、银圆10000元。方知在京任职期间亏空如此之大，自责用侈甚矣。

所谓公账，即指严修与其兄香孙两房共有之款项，严修不久遂向交通银行借银30000两偿还账房，以八厘五年息，借款分一年半偿清。从此绝意仕进，不复官场应酬，还清债务，优游自娱。然其拳拳爱国之心，士子天下胸怀，却以"一樽还酹江河"之情，倾注到教育与实业中。二十年来，静观政变，终不复出。

当友人因考职未被录取，自京来津求严修帮忙时，严修即以"举世纷纷，求仕所谓自寻苦恼也"劝之。友人或许不解，当作推托之辞，在严修实为肺腑之言。

徐琢如徐桐之孙持严修同年燮钧的信函求见。函云：琢如引见费阙二百金，拟同门集腋足之。询之琢如，他处并无可指望之人，乃独任之，赠以三百元，即日函复燮老曰：琢如兄志行高洁，识议冠时，至深忻佩。所阙引见费为数无多，已由敝处补足，即日面交矣，

驾赢复蒙赏还，何太客气耶？谨此奉复，祇请台安，馀希垂照不备。年小弟严修顿首据上海图书馆藏《清末十二家手札》。

庚子之难，徐桐一死，其子徐承煜刑部左侍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也被清廷处死，徐家妇女18人，上自80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幼女，全家女眷，集体自杀。慈禧太后只管"结与国之欢心"以自了，哪里顾得上徐家一门土崩瓦解。

可徐之孙却依然汲汲于宦游，因缺二百元引荐费，不得不求助于严修。天命在野，何必宦游？此语与他人可言之，与恩师之孙岂忍言？更何况他是执迷不悟痴心人，初出茅庐伤心人。

送走伤心人，他同赵幼梅渡新开河，参观实业工场。工场分实业及美术两大类：窑业、织染、木工、造车、造纸等皆为实业类；而图画、刺绣则为美术类。全场700余人，秩序井然。

又应南开中学之邀，前往李公祠听音乐会，开场前张伯苓、李石曾分别作演讲。音乐会有军乐，少年音乐，学生唱歌；又有箫笛、洋琴、七弦琴等；有独奏，有合奏，有伴奏；而以十番三套，间之新旧联合，为一场现代音乐会。

滦州煤矿公司副经理周漱泉来访，言及开平煤矿与英人交涉近状：我方意将开平煤矿买回，彼意：百万镑外加七十八万镑，三十年内七厘行息，三十年后还本。我意：百万镑外加四十二万镑，七厘行息，二十年内分年还清。英方的武力威胁论偃旗息鼓，只好坐下来讨价还价，实业救国，此之谓也？严修感慨，能如此，则于公于私，于家于国，均有着落。这场商战，严修是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其中内忧外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与人言说。

严修归来，既非归隐，亦非蛰居，做个自了汉，而是对朝与野的选择。在朝走仕途，在野走江湖，严修选择了走江湖。江湖世界多美啊，美得惊心动魄！商战之美，美在实业报国；学潮之美，美在教育救国。

南开学潮，为天下先，惊世骇俗，震动朝野，其因盖在国会请愿一再受阻受骗。6月中旬，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联合各省商会、教育会、华侨及直省绅民旗籍代表等发动第二次请愿，向督察院呈递请愿书，签名者有30万之众。然而上谕斩钉截铁：仍俟九年

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不得再行续请。

第二次请愿碰壁，各省代表却不屈不挠，准备着第三次请愿。

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决10月间再向资政院上书请愿，并向咨议局联合会提出，如不达目的，不承认新租税，全国议员总辞职。不得已，清廷作出预备立宪姿态，令资政院开院，由监国摄政王载沣临院宣布训词。

请愿团还是由孙洪伊带头，温世霖协助，发动第三次国会请愿。他们奔赴摄政王府，上书请速开国会，以定国是。

十七省督抚、将军联名电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以为声援；连直隶总督陈夔龙亦请先行组织内阁。

资政院通过请速开国会奏稿，由院总裁溥沦上奏朝廷。

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避重就轻，俯允所请。下诏，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先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并称此次缩定年限，不能再议更张，违者按法惩办。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立即将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

江浙两省咨议局致电资政院，祝贺国会缩期召开。然而武汉39个国会请愿团体却联名向湖广总督署递交请愿书，请代奏明年即开国会；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十数省咨议局亦致电资政院或国会请愿代表团，坚持明年即开国会主张。

天津商人和学生开始剪去辫子，欲向资政院递说帖，请赦戊戌党人。资政院请清廷明谕剪发易服，清廷命毋庸议。资政院再次上奏，以军机大臣有名无实，请速组责任内阁。清廷命毋庸再议。奉天请愿代表十余人赴京，发动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被押解出京。南开中学学生愤而罢课，市民罢市声援。

严修立即与南开中学通电话问罢课情形。南开学生代表陈鹤洲、华芷舲先后来严修家，向严修讲明学生罢课请愿之意。陈夔龙亦请严修开导说服学生。

严修认为“开导学生事尚不难，但朝廷宜从根本上著手”。他指出：此次风潮之起，固以请愿速开国会为方，实则本月十七日之硃谕即指资政院弹劾军机一事有以激动之也。他建议“筱帅陈夔龙即宜乘间电请将成立责任内阁期限，于资政院第二次弹劾军机奏上之

日，明白宣布，既可补救十七日硃谕语气之罅漏，且可使海内人心不致嚣动，不特天津一隅学界之关系而已”。虽然“方伯凌福彭直隶布政使极以为然，允即面覆筱帅”，但建议归建议，“筱帅能实行否”？严修于日记原注云：“凌方伯言，璧臣有致筱帅函云，宜速约本地绅士调停。盖枢府因见筱帅二十日电奏，授意璧臣使致此函也。”

作为南开中学的创始人，他为自己的学生自豪。他立场鲜明，以为政府按期立宪，信誉昭明天下，四海自然安定。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去开导学生，反而去开导陈夔龙。

于是，3000 多名学生游行，王贤宾等自治运动的先驱们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前往总督衙门，温世霖、王贤宾和阎凤阁分别代表学生、商人和省咨议局向总督陈夔龙递交一份公众请愿书，一番唇枪舌战后，陈勉强答应代为转呈。

(3)上海金融风暴与天津商会自治

还有一场金融风波，由上海一隅波及全国。严家卷入其中，严修遂以自治运动救国，亦以自治运动救家。

7 月，上海发生橡皮公司股票投机引起钱庄倒闭风潮。一日同时倒闭正元、兆康、谦余三钱庄，市面大震，嗣后有森源、元丰、会大、晋大、协达等数家钱庄相继倒闭；其他受牵累而倒闭的小钱庄不计其数《上海钱庄史料》第 74—75 页。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金融骗局。早在 1903 年时，英国人麦边在上海成立了兰格志拓殖公司，以种植橡胶园、石油煤炭开采、森林采伐为主营业务，但其实是皮包公司。1908 年橡胶股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大涨，麦边发财的机会到了。1909 年上海证卷交易所出现了由瓦特经营的盎格鲁—爪哇庄园有限公司的股票，谎称每季发放股息，股票可向银行押款，当即一纸风行。

许多在上海的外资银行如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均主动承接该公司橡胶股票的押款，使股票价格节节上涨。一时上海许多钱庄、商人及市民涌购这支股票，直到有钱也难买，须八方托人才能购得若干股。到本年 3 月底，该股票价格已被哄抬至超过发行价 20 多倍，其他几家公司的橡胶股票也纷纷涨到 10 倍或 20 倍。纸

醉金迷的上海滩，几乎人人都在为这只股票而疯狂。

幕后操纵者见时机一到，将股票在高价位上全部脱手，攫取了巨额暴利，便回国溜之大吉，从此杳无音讯。整个上海股市大幻灭。在沪各外商银行立即停止受押橡胶股票并追索股票抵押放款！股价跳水，瞬间股票变为废纸！

骗局大白，上海金融界、商界混乱不堪，数十家钱庄纷纷倒闭！家破人亡不计其数！严家却仍在坚挺！其势蔓延，清廷出面干预，命江海关道维持上海市面。上海道为归还正元、谦余、兆康三倒闭钱庄欠各银行借款，与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银行于上海订立《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规定此项借款年息为四厘，半年付息一次，期限六年。

这场金融风暴终于冲击到严家，其直接导火索是江海关道蔡乃煌。蔡同样是橡胶股票的投机者，与源丰润钱庄关系密切。严子均为弥补被橡胶股票所骗而欠下的巨额贷款，曾以南京的房地产作抵押向蔡借贷了 120 万两。蔡不仅是赌徒，而且是贪官，他在办理救市款项时，贪污受贿被革职。清廷另派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负责对上海金融市场的善后事宜。

在盗用国家用于救市的贷款被告发后，蔡被迫从源丰润钱庄撤出存款，一石激起千层浪，严氏金融王国波涛汹涌。

10 月 8 日，在全国拥有 17 家分号的上海源丰润银号，终于抵挡不住这场风暴的袭击而宣告倒闭。严信厚留下的源丰润银号不仅在上海局面宏大，为中外所信用，而且在各省市的分号也是门头响亮、八面威风。源丰润银号倒闭，全市震动，全国震动。

清政府的救济款杯水车薪，向外国银行借款条件苛刻，以商人自治运动以来的觉悟与经验，严家开始自救。源丰润钱庄危机，牵动了天津金融界。严子均打电报给严修，请他代表严家出面调解。经过严修一番周旋，王贤宾很快完成了部署。

10 日，王贤宾以天津商会接管严家在天津的源丰润和新泰钱庄的库存和账目，并向总督陈夔龙提出了一份救助计划和补偿方案。天津债权人和存户取得了严家房地产和股票作补偿。虽然严家在京沪尚有拖欠，但在天津，严家经营的河南引岸和物华楼珠宝

店得以维持下来。在严家的产业自救中，严修的努力卓有成效。天津商会所起的作用充分显示了自治团体的力量。

当然商会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政府的承认，其自治须小心翼翼与政府合作。但他们的作用往往超出政府预期，使政府瞠目结舌。

两天以后，美国民间贸易代表团来天津访问，天津商会热情接待，会长王贤宾自付招待费用，以提高天津商会在经济外交方面的声望。

作为天津商会的会长，王贤宾向参与资政院竞选的同仁们作了一次演讲。他认为中国的资政院与日本的上院一样，正在推动中国向君主立宪制转变，并且担负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要保证中国商人在商战中拥有平等地位。

他强调商人有义务为国家分忧，帮助政府偿还甲午和庚子赔款，为此他发起组织筹还国债会。同时他表示，如果朝廷能答应公众的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将全力以赴协调全国的募捐活动，以达到偿清国家债务的目的。他的演讲使议员们群情昂扬，他们宣称在没有议会审核、监督政府决策的前提下，人民不应当承担偿还外债的责任，在召开国会之前不应产生新的债务。

当李石曾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在法国筹建“欧美豆腐公司”，请严修帮忙筹资时，王贤宾不仅发动天津商会积极支持，而且个人率先投资 5000 元。像严修一样，他看好的不光是项目本身所具有的赢利前景，他更为关注项目所隐含的民族主义目标。

李石曾是素食主义者，在留学法国期间他看好欧美豆腐市场，立即申请了生产专利，随后他把华北豆制品推向世界，并招募工人到法国工作。他劝说岳父、长芦纲总姚学源动员盐商们筹资 120 万两，严修则游说直隶工商业界。投资人来自京津沪，除严修、王贤宾已先后投资，“李善人”家族也积极投资，据《大公报》报道，李士珍还代表“津浦铁路重购基金会”投资 30 万两。

这一年，严修自我总结：今年蹉跎空过，虽与往年无异，而游石钟、游西湖、游虎丘、游普陀，经豫、苏、浙、沈四省会，登文澜、天一两阁，亦足以豪。夏间娶一儿媳，秋冬得两孙，又为娴女缔婚，喜事亦不为少。尤自适者，无官守，无言责，飘然一身，愧怍较少。

2. 从天津学潮到武昌起义

(1)末世速写:从镇压学潮到打击盐商

1911 年,严修 52 岁。

1 月 2 日,清廷下诏,严禁学生参与政治。

4 日,严修在家接到南开中学电话,得知南开学生徐绪平以旷课理由被开除。为配合天津立宪运动,促成速开国会,南开学生坚持罢课、游行,致事态扩大。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以"通国学界同志会"会长名义通电各省同时罢课,要求速开国会,被直隶总督陈夔龙下令逮捕,发配新疆。严修闻讯,甚急!

一早,张伯苓来,商量救援办法,严修当即修书总督,张伯苓递禀督署。午,伯苓自督署回,言制军已传见,谈及温事,无商量余地。

事后,陈夔龙谈到此次学潮认为将温世霖"发往新疆安置",是"为地方除一巨蠹",言下颇为自得《梦蕉亭杂记》卷二中。

严修无奈,不幸接踵而来。智怡妻曹泰龄病故,遗下幼小五子女,号泣不已,惨不忍睹。严修泣曰:昔吾母逝世时,吾父自撰挽联,末云:儿含悲,女含泪,凄凉景况好伤心。此情此景,不惟怡儿当之难堪,为父者亦难免自责:余待子女甚寡情,于其疾痛甘苦,往往漫不经意;于儿妇更不知体贴。因忆吾父病中自责四语:吾父之子,那如吾子之孝?吾子之父,哪如吾父之慈?

祸不单行,橡胶风潮之后,严家元气大伤。伤未愈,又遭盐商之灾。因债累太重,租引地于郭氏,旋作废,更称贷而支撑之。所办学校,或停或并,或由劝学所接管,仅担任初等小学二处,附蒙养园。同时停止对南开中学的捐款。

多亏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将天津客籍学堂、长芦学堂并入南开学校,经费每月增得白银 8000 两,学生增至 500 人,使南开中学得以维持下去。姻亲华氏也慷慨资助严修私学银 1000 两。

一曝十寒,无济于事,严家经济益发窘迫。出租引地,纠纷多日,繁累且终无效果。长芦盐运使以还外债为名,课重税以盐商,每

引新加一两五钱，承租者难负重课，遂于本月退租。

严修所负旧债，到期不能不偿者，每月均有数千以至数万两，林墨青为之奔走周旋，袁少明为之借债。严修虽不便出面，但筹划举债还债，真煞费苦心。不仅所办公益事业多已停顿，每月依赖其接济为生者，亦不得不裁减。被裁减者，不明真情，往往哀求，颇费周旋。严修心情日益沉重，严家经济危机似乎是预告长芦盐商集团衰落的信号。

1911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此前 1900 年至 1910 年，清政府以新政自救，许下立宪之愿，被称为是庚子之乱后的"黄金十年"。然而长芦盐商的"黄金十年"，却在一个名叫张镇芳河南项城人，袁世凯表弟，时任长芦盐运使的政治流氓的手里终结了。

庚子之乱，钱庄被劫掠一空，市面资金极为短缺，盐商被迫寻求新的资金来源，诱使盐商大量借款投机的是外国银行，而为盐商贷款作担保的是清政府和天津地方政府，当然贷款一部分被作为担保的种种名义手续费挪作他用。当盐商们贷款超出偿还能力时，方才醒悟到金融危机再一次来临了。

敏感的外国银行窥伺到山雨欲来的革命风暴，尽可能收紧银根和提前收回贷款。外国领事坚持清政府对此贷款负有全部责任，因为盐商不过是国家盐业专卖的代理经营者。而北京外交部则拒绝介入这场官司。

盐商们当然不会把贷款全部用在国家盐业专卖上，而是更多地投资到私营的近代化企业上。如果没有清政府打压，盐商们逐年偿清贷款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张镇芳却提出了令人吃惊的理由，外国银行通过盐商贷款攫取了中国盐业专卖权。

这一说法引起朝廷重视，朝廷开始关注盐商贷款问题，因为盐税可以说是王朝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财政对于长卢盐商的利用和依赖，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作为袁世凯的亲戚，张镇芳的个人目的是复杂的，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张镇芳在其上司不知情的前提下，也为盐商贷款以公章和签名做过担保。张怕受贿丑闻暴露，因而先发制人，使盐商措手不及。加上盐商在自治问题上和抗捐税运动中与朝廷相抗衡，借机

打压盐商已是势所必然。不仅如此，打击盐商还是打击袁世凯的继续，假手张镇芳则更为居心叵测。

当年袁世凯发起自治运动，支持他的主要是盐商，载沣以“莫须有”的“足疾”为由，将袁开缺回家，理由难以服人，而张镇芳的奏折却为朝廷提供了“正当”理由。盐商向外国银行贷款，为盐商作担保的乃是袁世凯治下的直隶地区各级政府。张的奏折含沙射影，其丧失盐业专卖权之说，是欲以“卖国”为由，置袁于死地。故先从盐商打开缺口。

张镇芳下令逮捕王贤宾及其他盐商，并取缔盐商们所拥有的政府盐业专卖的代理权。简直是当头一棒，整个天津市面陷入无序和困境，城区商业活动几乎停滞。可商会还在努力，外地驻津商会、天津市民、各地自治机构、慈善组织、教育机构及学校纷纷递交请愿书，请求释放王贤宾、李宝恒等。

宋则久、张伯苓甚至单独向总督递交请愿书，说明王贤宾是天津必不可少的人物；《大公报》则直言张镇芳为长芦盐商公敌；李士铭创建的君主立宪促进会、天津县议会也积极呼吁重新考虑对盐商的处理。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在盐商们被勒令交纳了各种附加税后，专卖权及王贤宾等盐商仍旧控制在政府手里。不仅如此，结局更为出人意料的可怕，王、李均被抄家扫地出门，政府没收了 10 位盐商的引地、财产、投资及其铁路股票和债券。

(2)严氏产业调整与南开教育复兴

经营了几个世纪的盐商经济破产了。

盐业专卖由国家垄断，盐商只不过作为国家垄断的雇员而从中分润，没有任何经济独立的意义。因此，归根到底他们不过是依附在政府之皮上的一撮毛，不管他们是否自觉意识到这层卑微的依附地位。

不过，“毛”虽然依附于“皮”，但“毛”还可以选择“皮”。因此，当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再次寻求盐商们的支持时，他们不再具有太平天国时、庚子之乱后的热情，而是冷漠地驻足观望，从容地选择新“皮”。革命推翻了他们依附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失

去依附地位和寄生利润的同时，他们却意外地割掉了与近代化格格不入的封建性的“脐带”，从而获得了向近代产业发展的自由，并由此而得新生。而清廷以盐商为“开劫”手段，正所谓“紧了自己的气，塞了自己的眼”。作为盐商之子，严修适时调整家族产业，加快向近代产业转型的步伐。

年初，清廷便已旨准开平、滦州两矿归并办理，收回矿权。滦矿公司总理周学熙拟定开滦煤矿有限公司招股章程及收回开平息借办法、分年摊还本息之预算表等。对此，严修极为关注，详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却再次复信滦矿公司，提出辞去董事一职，这里面大概涉及严氏家族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此前，严氏家族产业以金融和盐业为主，金融业在橡胶风潮中土崩瓦解，而盐业又面临灭顶之灾，其他产业多以参股的方式加盟，难称家族产业。

于是，严修决定加大对造胰公司的投资力度，使之成为严氏家族经济的支柱产业，他代造胰公司向殖业银行借二千一百金，以滦矿股票二千金、北京电灯股票一千金作抵押，月息八厘，三个月归还。中人武问泉，银行定要严修署名。

经此次调整改造，后来造胰公司成为近代天津包括外企在内的百强企业之一，而且名列前茅。南开中学也在艰难中调整，学校为商界子弟特设优待名额 50 人，免收其学费，并为扩建设施，购校旁华兴公司空地 30 亩，建大饭厅一处及盥洗淋浴房数间。此举大受商界欢迎。投桃报李，商界赞助踊跃，纾南开一时之困。

调整见效，适逢 52 岁初度。严修至有正书局，见一幅东坡画竹上有张文襄公的题记，“其末句有云：余今年五十二也”。严修曾在赵幼梅的居所见过此画，睹物思人，缅怀不已，“故特往购之”，以为昔日悠悠之存念，且留今朝匆匆之心迹。

一边殖产兴业，一边读书养性。读名人尺牍墨迹，他最爱者：陈曼生、汤雨生，次则郭尚先、洪亮吉、张问陶、张绩，若伊墨卿、包慎伯，名虽重，非其所好也。

与智惺、墨青同乘电车，到法界公益茶园观英人演剧。剧凡三幕，自九钟十五分，演至十二钟后乃散。鲜明整洁，歌喉清脆，虽不

能解其语言而自觉悦耳。从此严修观剧入迷，不能自已。

此乃伤心人别有怀抱，大隐隐于剧耶？此乃痴心人情有独钟，大教寓于剧耶？某日，早饭后，严修往广东会馆观社会教育俱乐部演出"潘子寅投海"新剧。

据《蟫香馆别记》：潘子寅去朝鲜过仁川，痛心韩国亡于日本，遂投海自沉，并遗书痛陈朝政。严修曾托袁世凯代奏，并嘱李芹香将此事编为新剧，以示国人。剧中有"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句，即出于严修手笔。

又赴南开学堂观剧，剧名《影》，含沙射"影"，影射中国时事。

(3)立宪墓志铭与共和通行证

1)立宪墓志铭：皇族内阁

严修沉浸在剧情中，可是不如意之事，仍似不速之客。

张伯苓请严修到南开中学，告知周自齐周学熙侄部丞衔内廷之命，托中人张伯苓，婉转游说严修与严复为溥仪授读帝师。

严修对摄政王载沣避之惟恐不及，若被擢为帝师，如骑虎背，其势不得辞退，故闻之一惊，不觉汗下，不寒而栗。严修之天命在野，其修齐治平之志，在教育与实业中，不在帝王学中。

不久，袁氏以诸子教育一事相托，他义不容辞。袁克定遂率诸弟来津读书，严修察看新租之房，安顿停当后，会见毓生袁家诸弟子管理员，商定袁家诸公子英文课程；又晤李芹香，商量为诸公子请汉文讲师一事。然后，复信袁世凯：比年学部诸公勇于改革，又经中央教育会切实研究，朝士迂旧之谈，渐觉失势，但时艰太巨，祸至无日，欲待后来毕业之人才，挽今日垂危之世运，必无及矣。纵言及此，令人不欢，惟有且尽人事而已。

"祸至无日"四字，已将清廷末世盖棺论定；教育能救国，却不能救清王朝。严修刚刚辞了帝王师，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成为袁家王朝的太子傅。

他同样没有想到，面对立宪压力的清王朝，竟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出一张令人作呕的"皇族内阁"的底牌。

这张底牌恰好给"祸至无日"四字做了注脚。

清政府裁撤旧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设立责任内阁，公布内阁官制，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设弼德院，以陆润庠、荣庆为正、副院长，成员多系皇族，故称“皇族内阁”。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以迭次请愿开国会无效及不满皇族内阁，发表告全国各界书；又举行抗议皇族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活动，请求另行组织。

清廷装聋作哑，苟且偷安，而革命的导火索已一触即发。

2）共和通行证：武昌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如电火行空。

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众推黎元洪为都督。

武汉三镇，居天下之中，均在国民军掌握之中。

北京人心惶惶，谣言四起，谓清廷已调兵，专门屠杀汉人。

陆军大臣荫昌奉命督师速剿，他雄赳赳而去，然后像个傻子一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既无听命之军，又无可用之兵。载沣开御前会议，那桐认为“武昌兵变，是一隅蠢动”，不必劳陆军大臣亲往督剿。到了这一地步，王公大臣们再执迷不悟，也能听出那弦外之音了。

过了两天，奕劻提议起用袁世凯督鄂，“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袁世凯接“督鄂”谕旨后，一边准备东山再起，一边装腔作势复奏：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王锡彤《抑斋文集》记有当时王与袁的问答：

王问：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祸鄂，国能救乎？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王：然则公何以受命？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此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袁勃然变色：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作革命党。

一周后，严修座师徐桐孙徐琢如又自武昌取道上海来津。武昌起义时，徐正在城中，因民军严守，到13日时仍未出城，14日开始渡江，乘渔民小船由沪转至天津见严修，将武昌起义以来武汉城中情形详细描述一番。

严修担心袁家诸公子，赶到袁氏子弟寓所。汉文讲师韩步青也到馆讲学，严修与步青交待了武昌起义一事，嘱其关照好袁家子弟，又与管家毓生作了交待。

林墨青、孙子文来，与严修商谈治安一事。林墨青认为组织人力较难，孙子文则以为可以拟办乡团。严修提出现在各城市均有巡警设置，若举办乡团实为多余，即便巡警不可依靠，也没有理由办团练，而且乡绅一动，居民不免惶恐。

王益孙停止对南开捐款。私捐停止，公助亦因国乱难以为继，学校停课。维持费用仍向严修挪借，严修一如既往，一力担待。

不久，严修又闻滦州兵变、潼关告急，大呼"楚歌四面，奈何奈何？"武昌起义后，山西太原首先起义响应，随后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军新军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等联名发出通电，要求改组皇族内阁，实行宪政。驻扎石家庄之六镇统制吴禄贞也正秘密策划联合山西、滦州军队直捣北京。

清政府病急乱投医，连发四道上谕，调荫昌"回京供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

将军权拱手让与汉人，是大清帝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袁利用了革命，在革命的推动下，袁、孙里应外合。

严修赞成张绍曾等所提出的"政纲十二条"，即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等。严修之意：请陈夔龙发电，奏请清廷应允张绍曾等所奏，并推举袁世凯负责改革事宜。陈夔龙置之不理。

于是，严修赴京探问政局。31日，八钟，严修一行至前门火车站，华氏派车来接，乘车至内阁铸印局，华璧臣等在此等候。

严修询问政府近日情况及态度，华氏认为政府系真心改革并言近日清廷主政者，那桐之力最强，而那桐则甚纳璧臣之言。严修"因发表政见，以效壤流之助"。

本月，继湖北之后，山西、云南、江西相继独立。

3）袁氏组阁及其共和策略

严修由京返津，在火车上听说清政府免奕劻内阁总理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协理大臣及国务大臣均辞职，重新组织责任内阁。又听说袁世凯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上谕袁世凯迅速来京，“闻允资政院奏采最良君主立宪主义，颁行信条十九条”。这次是迫不及待，一经确立，即行颁布。

“宪法信条十九条”确认皇帝之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国会修正、皇帝颁行。在共和的风暴中，立宪的破船终于出海。事过境迁，现在连立宪党人也对这破船嗤之以鼻了。当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清廷退位，而能使清廷退位者，惟有共和。袁氏左右亲信虽有劝袁利用机会取清而代之私议，但袁审时度势，以为有五不可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其一，袁氏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其二，旧臣尚多，其势仍在；其三，北洋军将领无此思想准备；其四，清廷禅让，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长江以南则难以问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议和投石问路。

因此，袁氏所定策略及步骤为：先维持清室，次行君主立宪，再论民主共和，以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他不肯冒险，“终由稳着走民国一途”。与清廷“十九信条”针锋相对，湖北军政府颁布由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该约法，以三权分立、天赋人权为根本，坚持民主共和。

上海革命党人起义胜利，占领上海县城，清廷大势已去。

上谕吴禄贞署山西巡抚。三日后，严修即听到吴禄贞被刺的消息，但不知此案乃袁世凯所为。袁为阻止吴赴山西巡抚任，暗派周符麟赴石家庄谋刺吴禄贞。周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于该日行刺。吴死，华北新军起义计划被破坏。

严修感觉事态更为严重，刚到咨议局，李伯芝便带着陈夔龙之命来找严修商量。张绍曾今日由滦州到津，应如何待遇？严修以为当以礼遇。谣传有革命军数百人将于张绍曾抵津时起义，陈夔龙正拟调兵以备不虞。议长邀严修谏阻陈的举动以防动乱，最终因张绍曾不来津，无事。其实张的举措，已被徐世昌釜底抽薪，徐命其亲信

从内部将张逼走，并取而代之，然后，电告严修直隶不可有独立名目。其时，直隶独立风声甚紧。

汪精卫、李石曾等来访严修，一番深谈之后，三人当晚进京。

先见杨度，再由杨度引见袁世凯。关于汪、袁对话，罗癭公致梁启超书云：

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

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这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据《梁启超年谱长编》。

于是，杨度等则在北京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停战议和。严修乘车回津，陪李石曾、汪精卫一同到唐绍仪处，谈了很久。

与汪会谈后，袁氏组织新内阁，取代皇族内阁，推举国务大臣：著命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署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梁敦彦、严修、王士珍、萨镇冰、张謇未到任以前，外务大臣著胡维德暂行署理，度支大臣著绍英暂行署理，陆军大臣著寿勋暂行署理，海军大臣著谭学衡暂行兼署，农工商大臣著熙彦暂行署理据《宣统政纪》。

4）严修辞职及论袁氏不可为总统

上谕一发，人来贺喜，严修当即表示：

> 余自归田后，决不再作出山之想，国务大臣岂余所能胜任，况度支之关系尤重耶？决计恳辞，得请乃已。

随后给内阁发电请代奏收回成命：

> 闻命惊悚，不知所措，伏念修既无专门学识，又无治事能力，身弱多病，精神委顿，万难胜国务大臣之任。新内阁组织伊始，人心之向背，宗社之安危，胥视此为关键。若以暗冗如修者，滥厕其间，必致海内失望，转无以副朝廷励行宪政之意。

又即刻致署度支绍英大臣电云：此任万不能胜，已电阁代奏恳辞。同时接到袁世凯电报：凯夙乏新知，谬膺重寄，昨据信条，组织内阁，奉旨简阁下为度支大臣。阁下夙秉公忠，热心政治，当此事机危迫，诸赖筹策，籍匡不逮。即希迅速北上，共支危局，无任翘盼。

严修辞职信还未发出，内阁催电已到：现在时局危迫，财政尤关紧要，该大臣向来办事具有条理，全国财政方资整顿，著即遵前旨迅速来京任事，毋得稍事推诿。

严修复内阁电：

> 仰蒙温谕，感激涕零。虽至愚，粗识致身之义，非敢意存诿卸。惟念财政为全国命脉所关，必夙精此学，且有应变之才，方足以言整顿。能力既薄，经验毫无，加以衰病侵寻，精神委顿，断难膺此艰巨。惟有仰恳天恩，矜悯愚诚，仍准开缺，另简贤能，以重阁制，而维国计。

李伯芝又来津促驾，传达袁敦促赴任之意，语甚恳切。严修颇感踌躇，遂与旷生商议，仍请伯芝一同进京面辞，伯芝慨允。

21日，接内阁电传本日谕旨：电奏悉，该大臣衰病侵灵，精神委顿，朝廷殊深廑念，著即赶紧调理，一俟稍痊，即行到任，钦此。

两天后，严修亲赴北京，寓长安街北京饭店。度支部代大臣绍英来访，晚，同伯芝拜谒袁世凯，久谈，婉辞重托。

此时，袁世凯手握重兵，为众望所归，而翻云覆雨，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方面攀请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促成与革命党人的和谈，同时又密令冯国璋部攻击汉阳革命军，经六天激战，攻陷汉阳，冯国璋被封三等男爵。武汉三镇，汉口、汉阳两镇已落入北洋军手中，袁遂有睥睨天下之势。就清王朝而言，一战之利，如杯水车薪，难救全国之火本月，上海、贵州、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又宣告独立。就袁世凯而言，一战之利，遂成霸业。

29日，各省都督府和咨议局代表在汉口开会，讨论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一事。严修略知革命军占据上海后的景况，叹曰："余私持中国不能遽跻共和之见，今益信不谬矣。"后李石曾来，二人因立宪、共和各持一见，辩论良久。

当时，“非袁莫属”论甚嚣尘上，不仅立宪派和北洋军如是观，连革命党人也如是观。黄兴表示，如袁赞成共和，决举其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汪精卫也认为，项城雄视天下，元首非其莫属。孙中山则断言：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其实，真正了解袁世凯的是严修。李石曾主共和，以为袁世凯为共和总统亦未尝不可；严修主立宪，以为袁只适合为总理，不可为总统，若为总统，将有害于袁、有害于国。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严修确有先见之明。袁本无共和思想，而为共和总统，实在是借共和之名以行禅让之实，明修共和栈道，暗渡君宪陈仓。共和国不过是一只渡船，它的作用是送袁氏到君主立宪的彼岸。

曹聚仁先生在《天一阁人物谭》里，谈到助辛亥革命成功之因素有三，同盟会只能居其一，立宪运动造成全国绅士阵线亦居其一，北洋新军起义更为重要。在这三大要素中，袁居其二，而孙居其一，故袁为大总统亦势所必然。袁借助这三大力量，形成逼宫之势，先以责任内阁逼摄政王载沣退位，然后以南北和谈逼清帝退位。陈夔龙大骂袁氏为“乱臣贼子”，斥其居心叵测。

袁专差送来急函告知严修，清廷委其为全权大臣，赴南方讨论大局。严修立刻复函，申明自己不任官差，决不受命，仍交原人带回。于是，改派唐绍仪为北方谈判代表，与南方公推议和代表伍廷芳谈判。

次日，凌晨四点钟，又接傅增湘来电，请严修与杨士琦任和谈参赞。电云：“顷谒宫保，甚望公南行，参与会议事。现各会员于二十一日赴鄂，公如能同行，希速到京，先电复宫保。”严修在自订年谱中谓“又奉派充南北议和大臣”，即指此事。

时袁方与南方革命党谈判，此事本由严修中介，故严修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议和大臣人选。

无奈严修已绝意仕途，即刻复电恳辞：

> 北京袁宫保鉴：顷接傅提学电云，宫保盼修南行，参预会议事，本应遵即前往，惟修识浅词呐，置之会场，实非所宜。仍乞俯鉴下忱，免其同往，如人数未足，荐姚侍郎自代。敬希钧

酌，并恳据情代禀。严修，号。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开始。29日，南京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又议决改用阳历。

本月，清廷下旨，人民可自由剪发。

3. 南北议和——缔造共和国

(1)呜呼共和：智者的忧思

1)滦洲兵变与北京避祸

1912年，严修53岁。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受到革命鼓舞的还有袁世凯辖下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管带王金铭、施从云等，在民国成立的第二天，他们就在直隶滦州发动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

直隶起义，比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对清廷震动还大。袁恼羞成怒，全力扑灭；又派幕僚到天津，劝严修暂避风头。

其时，鼓吹独立成为一种政治时髦。各省纷纷独立，惟有直隶省自吴禄贞因曾任徐世昌军事参议，又于去年底赴滦州约张绍曾举兵反清，故与直隶关系密切被刺、滦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寂然无声，殊愧于山东、陕西各省。

于是，某些既想博革命之名，又能得独立之实的人，便想利用严修与袁世凯的关系，拥戴严修为都督，宣布直隶省独立。

袁府幕僚将严修可能被利用为傀儡之危险和盘托出，并劝严修暂避。严修遂拟再赴日本，幕僚谓不必远行，到北京暂避数日即可。

3日，各独立省代表即临时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议的各部总长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海军黄钟瑛、司法伍廷芳、财政陈锦涛、外交王宠惠、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

张謇、交通汤寿潜。

而严修则于该日避至北京，会晤徐世昌等人。在京一月有余，几乎每天赴天仙茶园等地观剧听戏。严修喜欢听戏，但平时也是偶尔为之。如今所以常去，一则表示地方安宁，二则表明优游自在，绝无出山之意。诸位看严修如此，独立之举稍息。

严修居处京津，行走直隶，小心翼翼。他既不作革命党人独立的政治傀儡，也不作袁的议和代表。他致信袁世凯，声称"知我莫若公"，再次推辞南北议和代表一职。他说：代表袁总理名义最为妥当者为唐绍仪。一人足矣，人数多则议论分歧。

此外，他又推荐杨度、范源濂等持君主立宪论者为随同参赞，而他自己则"于中外法律既瞢无所知，而语言呐呐不能出口"，故恳请袁世凯"伏惟见谅"。

2）袁氏政治文化：枪杆子与辩证法

袁与国民军一停火，英国外交大臣即电复英使朱尔典，表示英愿以一切外交手段助袁。袁遂偕全体国务大臣奏请清廷早顺民情，赞成共和。共和本身，对袁来说并不重要，袁要的是江山，而不是主义。革命党人要主义，将江山拱手相让，甚至不惜为袁火中取栗。

清廷开御前会议，讨论共和问题，袁成竹在胸，称疾不至。然而共和国的桃子，势必要落入袁的囊中，孙中山提出议和让位五条件：清帝退位，袁主共和，本人辞职，袁任总统，宣誓恪守民国约法。

对此，袁故意置若罔闻，他重申应以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当他的砝码稍稍偏向清廷一边时，清廷立即以国体问题有待国会公决措辞，命军民勿信浮言，转相煽惑。更有破罐子破摔的鼠辈，不知袁的葫芦里卖什么药，见袁从容不迫地玩着以时间换空间的游戏，还以为袁用缓兵之计，这不有人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来找严修，请严修晋京说袁尽快开战。严修敬谢不敏，跑到滦矿公司去，审阅开、滦合办草案。

期间，严修听说清廷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推辞不受。于是，隆裕太后亲自召见袁世凯，授以全权，恳请保全其母子性命。

袁一手抓清廷，一手抓民国，以枪杆子作天平，准备实行共和。他命议和代表向伍廷芳提出修正优待清室条件，由南京政府参议

院议决通过。随即又命北洋军将士摇旗呐喊，催请清廷尽快接受南京政府的议和条件。为震慑清廷，第一军总统段祺瑞，统制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等致电清廷内阁，斥责有王公阻挠共和，败坏大局，谓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其剖陈利害。

清廷不得已，只好应允共和。袁保证溥仪母子在北京以小朝廷自居。但小朝廷仍不满足，用一句俗话讲，叫"得寸进尺"。隆裕太后再次召见袁世凯，商量修正优待清室条件。袁遂致电伍廷芳，提出新的修正案。即：帝号相承不替，"逊位"改为"致政"等。

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士 60 多人，提出与袁相同的修正案。南京政府最后以"逊位"改"辞位"，其他再无更改作了让步。小朝廷俨然以"君宪"自居了。在这一番来来往往的政治交易中，袁玩清廷与民国于掌股之间。

严修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觉得有必要说几句，于是给朋友毓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对革命党人和清政府都作了批判，也含有对共和前景的忧虑。他持改良渐进之主张，以此为据他批评革命党人，说：比来政策，虽尝取渐进主义，顾渐可也，不进则不可也。党人之谬点，一在不察吾国之情势，欲躐几泰西之文明；一在不肯联络协商，动辄出以暴烈之手段。又以此为据批判复古：以修近日所闻，如复科举，停小学，此最奇之论也；如祀先师、保国教，此鄙人所极端赞成也。然保孔教亦须有世界知识，若犹是往年袍笏诸公，空言从事，而礼必九叩，决不能与耶教争胜也。梁任公、严几道庶几近之。特恐一倡未已，百祸俱作，前清覆辙，可为寒心，公能相机从容进一言乎？

此时袁氏正酝酿立孔教，严修认为，尊孔可以，复古则不可。

2 月 12 日，溥仪下退位诏书；次日，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过建都南京决议。

清室宣布退位，严修正在天津，"晚读懿旨，愀然不乐"。他担心朝廷大让之后，国民能不能称得上"共和"二字？国民能否真正实施"共和"，能否自觉捍卫"共和"？

"今年可谓最大纪念之一年也！"纪念清帝退位，人民共和耶？纪念对过去有所依恋，对未来充满忧虑耶？纪念之锤落在生命的铁

砧上，他拷问自己，也拷问历史。

对于清室退位，袁绝不多愁善感，也无需反躬自问。承溥仪之命，袁急急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发布文告。命文武百官照旧供职，旧日政务继续进行，各地军警合力维持地方治安，各省官吏勿得再缉拿党人，已拿者一律释放，并照会各国公使等。

章炳麟致书参议院，力主建都北京，正中袁世凯下怀。

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百官拜谒明孝陵，行祭告礼。孙此举，将“国仇”改为“家恨”，将主义之争变成华夷之辨。试问：若天下姓朱，为汉家天下，为中华王朝，同盟会便不行共和革命了？其实，孙在潜意识里有着与袁同样的君宪政治意识。其依据并非万世一系之君主，而是绵延千载之道统。道统一脉，孙将其融入党政之中，传至蒋介石沦为以党专政；而袁、严等则欲接续王朝政治，是为君宪也。

君宪之龙脉伏于北京，而共和之风水聚于南京，国都所在，关乎政体命脉。孙中山锲而不舍，派专使蔡元培，随员汪兆铭、宋教仁，偕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而袁则不择手段，制造不能南下的借口。

(2)早产的民国与幼稚的共和

1)北京兵变与民国早产

刚好原陕西巡抚允升借反对共和之名，兴师破礼泉，攻咸阳。

孙中山电请袁世凯速援陕军，合击允升，并致电陕督与袁部合兵。北洋军将领纷纷电告蔡元培，谓袁不可离京，以防兵变。为弭兵乱及开办新政府，袁借外资200万两，拨给南京政府。

29日，第三镇步兵曹锟部在北京哗变，肆行劫掠，举国震惊。30日，兵变殃及天津、保定。袁旋即声明北方不靖，不能南下。

严修不知内情，遂与范源濂等会晤袁幕僚李伯芝。他担心保定已遭焚掠，天津难以幸免。果然，当夜枪声大作，东西火光烛天。“已而南阁前‘德合当’、太平洋‘中盛当’皆火起。郑宅女眷来避，彻旦不寐”。南开中学虽因其偏居一隅而幸免，但兵荒马乱，家家闭户，不得已停课。

蔡遂电告南京，请速建统一政府，其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各国公使以兵变向袁抗议，并决定从天津调兵进京。

3月3日，天津，南阁前之火始息，东方之火亦渐息，北马路估衣街皆被毁。友人来言，市面混乱，非雇用外国兵不能弹压。今夜抢掠，必且加甚。严修遂同伯苓前往巡道署，路经北马路，残破不堪言状。行至铁桥，两岸之人如堵墙，闻枪声不绝，警兵捕拿抢掠之人也。捕获之人，随行于途，有哭泣者。

繁盛市廛，可怜焦土，伤心惨目，视庚子年犹有过之。行至警务公所，各团体及学界、商界之人亦络绎俱至。众人公推严修，与张绍曾商量借洋兵以维护市。张请严修同往日本提督处借兵，日提督慨允借120人，40人搜查，80人巡逻。

黎元洪电请早定国都，以杜外人干涉，并论国都南迁之弊。蔡元培等再电孙中山，以为袁不必南下，政府可设于北京。南北军界联合通电，请袁于北京受命，袁电告严修，大局已定。

张绍曾从北京来，声称得袁总统面许，欲招学生军千人，严修认为此举不妥，可张仍然行之。

7日，孙中山电告袁、蔡等人，同意袁在北京就职。8日，袁致电参议院，宣誓：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严修记曰："袁大总统受任。"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受命之际，袁电告严修，请他为直隶治安会会长。遂至督署，议决：取消治安会，另组官民联合会。公举严修为会长，推辞不允，暂任。联合会议决，取消学生军团。

发学生军月饷，而移交之存款不足，四处挪借，因天太晚，没有结果。学生军不满，众起质问，全场鼓掌和之，喧闹许久。

严修退席，众人追至，纠缠不已，得严修承诺方才罢去。次日，学生军团代表来，为起哄一事道歉，严修莞尔，一笑了之。

为直隶总督任命，袁再派人来劝驾，严修坚辞，故以张锡銮督直隶。

29日，袁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组织责任内阁。

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海军：刘冠雄，陆军：段祺瑞，参谋总长：黄兴，农林：宋

教仁，工商：陈其美。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孙作《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演讲，认为实行民生主义，可避免流血冲突，是以和平手段进行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以实业为基础，他表示要去开发实业，以实业救中国。

民生主义与严修的社会改良思想相近，两人的差别在于：孙以革命行之，故激进；严以实业行之，故保守。孙注重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而严则从事更为实际的产业建设。

2）民国一布衣，共和两先生

天津官民联合会忽告解散，严修默默，如释重负。叹苍云白狗，世变日亟，学说日纷，自己几无容足之区，亦无置喙之地。诗曰：靡所止居。又曰，不知所届。严修何去何从？

共和之下，会党成风，此政党政治之势所必然，奔竞之徒，蝇营之辈，各各以会党人士自居为时髦。对此，他能理解，却难以适应；对于种种邀请，他一概拒绝。“一切会事不敢与闻”。

朋友请他入会，他承认“组织政党为立宪国至要之务，共和成立，兹事尤在所先”；对于执事者的“宏识远猷，率先提倡”，他也表示赞赏。但要“承招入会”，则婉拒以“不足仰赞高深”；又以“国民协进会已列贱名，例不得又隶他会”谢绝。

为入会一事，再致友人信，略谓：“先生发起五族联合会，蒙召与议。惟弟先已入国民协进会，闻政党要例，一人不得兼入两党，此例不容独异也。”连教育会他也懒得参与，蔡元培致信邀请，他复信辞之，曰：思想已近于陈人脑气，又同于枯海驾下之乘，充庭实非其俦，且署月尚拟为欧西之游，势难列会。后来，教育统一会在北京成立。严修未与会。

蔡元培为承上启下之教育家，上承严修，下启北大，以“兼容并包”方针立北大学术。较之严修，严为立宪教育家，他是共和教育家。故其一上任，即改弦易辙，确立共和国的教育体制和方针。

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时，他便制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宗旨，除前清学部所编一体禁用外，民

间通行之本由各学校自行修改，以应急需。北京政府采纳蔡元培建议，改北京大学堂为北京大学，任命严复署理校长。蔡又发表《新教育意见》，否定清末学部所定教育宗旨，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为共和国公民教育宗旨。前清学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出自严修之手，对于这位超越自己的蔡元培先生，他深感敬佩，在后来的几次教育大会上，严修曾多次提出五项教育的落实问题。

民国临时政府迁北京后，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历时一月，议决"壬子学制"。张伯苓出席了此次大会，并当选大会副议长。会议期间，严修去南开中学访张伯苓，表示赞成蔡的教育宗旨。而会议竟将四、五两条取消，严修劝伯苓力争之。会上，张伯苓极力拥护蔡先生对教育方针的意见，会议最终以"德、智、体、美"四育为教育宗旨。

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

而袁大总统对蔡则不以为然，他本无共和思想，君主立宪方合他口味，他对当年严修主理学部念念不忘，还想用严修来做教育总长。

于是，严修决定偕夫人，琳妹，女儿智安、智舒，女婿秩昭、孙仁绪等乘船第三次赴日本。临行，有《偕内子游日本，留别仁安、幼梅、仲远，壬子七月》诗：

闲云终日过，身世两悠悠。只道浮家乐，焉知去国愁。
十年三入海，万里又孤舟。欲识沧桑事，君当问白鸥。

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竹中清、《朝日新闻》记者野冈兰藏先后来采访严修。二人疑严修此行与政治有关，猜测严修此来，有永久不归之意。严修默默，幸亏有赖清水君从旁解释，省话多多。

竹中清问严修此行，漫游耶，抑调查耶？严修以漫游答之。

严修至东京凡三次，第一次可云漫游，第二次可谓考察。至此次察无可察，游无可游，但可谓来看智锺、智开、智娴及送智锺远行。故以终日静坐不出门为适愿。

神户住一日，送往迎来，听不入耳之言，答不由衷之语，是以为苦。落花无言而风吹不已，人淡如菊却官运逼人。

他致信友人，言其在日本，既无考察之心意，又无览胜之清兴，不过"随缘与接，听其自然"而已。

与其逃避被人追问，何如归去直接面对？严修乘船返回天津。

3）共和新政治与南开新戏剧

回到天津，严修敞开门户，往来如常，虽有应接不暇之苦，却亦听之任之。黄兴来访，不遇。严修闻讯，即刻回访。

梁启超归来，严修访之，谈未数语，客络绎而至，言不能尽，辄先辞出。梁至北京，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百人，梁云：日来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

又访菊人，菊人留饭，饭后，菊人匆匆离津，欲往青岛做寓公。

徐为袁之心腹高参，袁练新军，徐为之参赞；袁东山再起，徐为之谋划；袁任大总统，于用人之际，而徐竟要偃旗息鼓而去，此中缘由，颇耐人寻味。徐与严相知最深，两人知袁亦最深，一个离袁而去，一个拒绝袁的所有任命，严修开门见山，而徐则城府很深。

严修另一好友严复，亦与严修持同样观点。他评价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尔！"较之列强之执政者，一乏科哲知识，二无世界眼光；其性格"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严复为之"呜呼！"然而世无英雄，"呜呼"之后，他"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严复集》"与熊纯如书"之二十四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看法。

当然，袁对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严复不论，就徐与严修而言，徐为官场老手，以稳健著称，在袁与皇族之争中，他行中庸之道，取左右逢源之势，而且出任声名狼藉的皇族内阁成员，故袁初出山组织责任内阁时，便将徐搁到一边稍息去。其任总统后，徐只好潜龙勿用了。

袁与徐可以推心置腹，但要论到与袁肝胆相照，则非严修莫属。故袁之于严修，严修越拒绝，他越相求，想方设法，使严修入其彀中。严修不愿任政务，他便请严修为国史馆总裁，严修仍复函不就，乃改任王闿运。

袁亦不灰心，复托严修好友卢木斋为其说项，请严修立马赴京，出任教育总长。严修谒木斋，请他先复一函，告以稍事安排，即来京面辞。

袁之于共和，本为权宜之计，为解除《临时约法》与责任内阁，袁阴使军警围攻参议院，逼走唐绍仪，重组赵秉钧内阁。赵为袁门一走狗，惟袁命是从。

严修赴京面辞。访袁，谈两小时，婉辞教育总长一职，从而未见明令。

教育部定每年 10 月 7 日为孔子诞辰，要求全国各校届时均举行纪念。孔教会应运而生，“以昌明孔子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康有为任会长，出版《孔教会杂志》，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为复辟帝制造舆论。

临时政府又定 10 月 10 日为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是为“双十节”；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亦适用；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城头变幻大王旗”，如逢场作戏。严修不做官，可依然爱看戏，他爱看汪笑侬编的戏。

汪以编《桃花扇》、《党人碑》、《哭祖庙》等剧而著名。汪来津演出时，地方设宴招待，首列汪名，次及严修，有人或病其不伦欠妥，严修则不以为然，与汪谈笑依旧。严修不仅爱看戏，还积极倡导戏曲改良。在他倡导下，南开学校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现代戏剧先驱张彭春张伯苓弟、曹禺等均出自南开。

南开学校第一日演剧，剧目为《华娥传》，凡八幕。他兴奋之至，早早到场，“佩稽查员之徽章，随同照料”。

南开新剧，甚博好评，此后如《一元钱》、《一念差》等，皆严修选定剧名。在剧本创作方面，他除了参与评判外，有时还亲自动手修改。当时出版的《南开星期报》和《南开校风》，对此曾有过报道：今年新剧之内容共分七幕……至今已排演三周矣。并闻此次剧本尚需请严范孙先生再为删改一次，以期完美《南开校风》第六期“纪事·新剧排演”。

后来，南开新剧《新村正》上演，风靡学界，不仅获得陈独秀、胡适、梅兰芳等好评，连不爱看戏的鲁迅，也破天荒和周作人一起，在

一年之内，一连看了两次见梁吉生著《张伯苓思想研究》"北方话剧的先驱"，第135页。

10月17日，严修参加南开中学八周年校庆，并将该日定为校庆纪念日。严修威望素著，加上南开学校成绩有目共睹，赞助者渐多，直隶学务公所也于每月给南开中学补助经费1060元，南开学校的日子渐渐好过。

某日，夜不能寐，思及友人王少泉沉溺于打麻雀牌，实为白圭之玷。于是，起床欲拟劝柬之稿，忽然心有惭愧。

劝人必先自治，严修自省"近来耽恋观剧"，虽出于逃避官场政治，但亦足以陷表率后学之罪。遂矢志今后"非关公益组合及真有关于戏曲改良者，决不涉足剧场"。早起，致信少泉、幼梅、墨卿，谈及觉悟一事。

致少泉信云：

> 修尝谓吾国近日纸烟之流毒不减于鸦片，而好赌之可耻，更甚于吸烟。赌之具固多矣，而近日风靡一时者，尤莫如麻雀牌之一物。商界、绅界、官界、学界、男界、女界，濒染传习，不知所届。当其始岂不曰逢场游戏，无伤大雅；及其成为癖好，蒸为习俗，全国一致靡然成风，于各国博览会中辟一最新之世界，更于各国陈列馆中，增一莫大之垢污。于心思之，非细故也。吾辈方抱矫正风俗之想，而我公尤为当代信任之人，焉可使学界青年，援为口实耶？幼梅常言，吾所不解者两事，王少泉之打牌与严范孙之听戏。修始闻之，不以为意，昨夜枕上，同时觉悟。

七、天命在野之二：帝制与共和

1. 欧游札记——走向共和之路

(1)民生主义的政治算术：修史与修路

1913年，严修54岁。

1月1日，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南北和谈也已握手成交。

孙中山辞了总统，要启动两大工程——修史工程和修路工程。孙相信主义里面出政权，他放下了枪杆子，又拿起了民生主义。

孙将两大工程都放在"民生主义"旗帜下，他以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已渐入佳境，只剩下民生主义有待奋斗了。

他曾与袁氏一起喝酒，酒过三巡，两人兴高采烈。

袁突然振臂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他也投桃报李："袁大总统万岁"。两人是对于清室退位的祝贺，还是对共和国诞生的礼赞？在共和问题上，两人同床异梦，肚里各有一把算盘。

将共和国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孙中山谒明陵，除了表明其"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同时还为了确立新政权的合法传承，而修史就是要获得合法性。

孙还为他的民生主义——富国强兵梦作了一个预算。

他打算在10年之内建造铁路20万里，还希望袁大总统能练

成百万精兵。有了20万里铁路和百万精兵，那时中国就能富强了。

袁氏洗耳恭听，颇有几分天下英雄吾与汝的味道。

孙接着说：鄙人已反复筹算过，铁路告成年可获利8万万元，充练兵及中央、地方行政经费尚有余。可以先组织铁路公司，再以公司的名义借外债60万万元，分40年还清。他表示要专心筑路，不问政治；总统可以10年不换。

而袁氏则老谋深算，他怀疑孙的宏伟计划里藏着革命党人的隐私：拥有那么一大笔资金，岂止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简直可以掀天揭地。但当务之急是权力，只要孙不来争大总统的权力，他便表示同意，岂止同意，还要敲锣打鼓地送孙出国考察去，让天下人皆知孙要搞民生主义。孙对于主义或有独到见解，对于权力则不求甚解，他将新政权的民主建设交给宋教仁去做，而他自己不久便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

当了大总统，便要发号施令，10日，袁世凯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限所有当选议员三个月内齐集北京，俟两院议员皆过半数，即行开会。并令各省行政长官定期召集省议会选举参议员，办法暂照前清咨议局章程办理。

(2)民国之悼：国殇与家殇

孙一走，直隶总督冯国璋立刻通电，主张赋予大总统以解散议会及任命国务总理之权。这通电，是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的宣言。袁氏何许人也，岂能被束之高阁?!而宋教仁则针锋相对，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省长民选、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等。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大胜，于众议院得269席，参议院得123席。他的言行激怒了袁氏，一个暗杀计划在酝酿之中。

不久，宋教仁便血祭共和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身亡。袁世凯立即下令，悬重赏，缉拿凶犯，并从优抚恤宋家。随即，宋案主使应夔丞在沪被捕，凶犯武士英亦缉拿归案。孙中山速速赶回上海，揭穿袁氏阴谋，并与黄兴、陈其美商议对策，主张联合日本与袁速战。黄、陈二人则以为应该诉诸法律，依法解决。

然而刺宋凶犯武士英却在上海监狱暴毙。转天，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公布宋案证据，主使暗杀者即袁氏亲信赵秉钧，国内大哗。为避风头，赵请假15天，袁以段祺瑞代理；又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共借2500万英镑，以盐务收入作担保。孙、黄联名通电，请袁氏组织特别法庭，严究宋案，并反对"善后大借款"。参议院亦通电政府，表示借款违法，国民党参众议员否决"善后借款合同"。

恰于此时，菊人出山，由青岛潜赴津、京，严修在天津为其接风送行。此次出山襄政，表面上赋闲京师，集友结社，实则为袁开辟舆论阵地。经他一番运营，孔社在北京成立，以"阐扬孔学、融汇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为宗旨，他虽为名誉社长，示以超然，而实欲借孔子之名，为袁请命，亦为其入阁作准备。

同时，留日国民党机关刊物《国民杂志》创刊，鼓吹"二次革命"。袁氏痛诋"二次革命"图谋不轨，申明宋案应归司法机关裁决，善后借款确经前参议院赞同。黎元洪亦通电附和：借款案应稽之以议院，刺宋案则应诉诸法庭。并咨请参众两院速选正式大总统。

严修置身事外，既不提倡主义，更不问津权力。但其政治立场已由君主而民主，由立宪而共和。

天津学界在广东会馆开会，追悼隆裕太后。严修以无大礼服，不欲以便衣到会而未参加因时尚民国礼服"中山装"，一般不再穿长袍马褂。但严修对隆裕太后感怀颇深，敬重有加，他在日记中专门记录了统一党本部对隆裕太后的挽联：

> 本来生生世世不愿入帝王家，从黑暗中放绝大光明，全力铸共和，普造金身四万万；
>
> 此后岁岁年年有纪念圣后日，于青史上现特别异彩，同情表追悼，各弹珠泪一双双。

爱侄严智惺突然染疾，虽经多方延请医生诊治，但服药无效，日益加剧。初疑盲肠炎，后杂请中医，均束手无策。拖到5月中旬，最后发狂，神态大变。严修亲至病床前，紧握病人之手直至其气绝。

严修大恸，智惺为长兄严振之长子，兄亡后，严修视之如己出，

爱之深切如父子。故饰终之事，隆重异常。大殓时，送殓者百数十人。南开中学学生举行严智惺追悼会，严修率侄孙仁曾往答礼。张伯苓校长述死者生平历史，学生读祭文。严修《日记》云："惺儿谨厚和易，亲朋多乐近之，故其死也。皆恸惜不置，南开学校学生尤伤悼也。"因智惺任教南开甚久之故。

亲友开严智惺追悼会于浙江会馆，墨卿述死者历史时，哽咽不能成语。卢木斋等相继致词，南开学生读祭文、张伯苓致开会及闭会词，礼尤隆重。出殡时，吊客六七百人，"至僧王祠留灵，留灵处客未散者尚有四百余人。……阿惺与戚友之感情，于此可见"。当晚他"闲步庭院，凄凉冷落，触处成悲，追想阿惺声音笑貌，涕不能止"。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悲可知也。

惺侄去世，严修几乎足不出户，整日在家与孙儿辈戏，为孙儿讲《天方夜谭》及《孤雏感遇记》，以天伦之乐，遣失侄之悲。

(3)欧游之缘起：塾师乎？太傅乎？

袁氏派毓生来看望严修，并偕赠礼金 3000 元。

严修不肯收，但又不能退还，考虑再三，思得一法，劝袁氏以此金送诸子赴欧留学，并毛遂自荐，随同照料。

严修致信袁氏：学堂胜于家塾，出洋留学胜于在本国留学。以为诸公子尤应注意，去骄佚之习，远燕昵之私，其左右近仕之人，皆畏之媚之者，无教之责之师，不可不防微杜渐；建议诸公子已婚者可偕眷出洋，未冠者宜出就外傅。

袁氏喜出望外，遂邀严修赴京，共商诸儿出洋游学事。也许在袁氏心目中，他已将严修当作太傅看待了，当然严修也有自己的打算。严修赴京，张一麐命车来迎，进新华门，乘车先至春藕斋见云台袁克定，略谈。入见总统，谈约一小时，又与云台话片刻，一麐导出，乘船至新华门内登岸，复乘马车归。袁氏请严修为诸公子导师，这一次严修没有拒绝。游学建议为其所出，游历欧洲亦为其夙愿，更何况出游可摆脱许多不必要的纠缠。除了入阁的纠缠，还有入党的纠缠。

此时，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北京召开特别大

会。梁启超主张推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改组内阁，“宋案”以法律解决，借款须严督用途。

临行前严修致信进步党本部，辞参议一职云：三党合并，海内欣仰。稍有能力，自当勉效微劳。惟修衰病侵寻，实属无能为役。上年友人约入国民协进会时，曾经声明，但充会员，不任职事。今兹仍守此志，允将参议名目撤销，仍作为进步党中会员之一人。

袁氏发布《尊孔祀孔令》，要求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中至当，以正人心，以立民极，公然复古。孔子代表帝王道统，袁氏尊孔可谓别有深意。袁氏缔造共和，乃时势使之然，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他一边当共和国的总统，一边还为帝制留着后路，而严修则以为共和已至，帝统难续，袁氏不应脚踏两只船。

对三党合并及“尊孔令”，严修示以默默，不赞一辞，作冷处理；对严复、林纾、梁启超等200余人，联名发起成立孔教公会，他敬而远之。他曾说过，论尊孔，惟严、梁二人可行。但此时，他改变了观点，如复古，虽严、梁也不可行。哲人已逝矣，何必扰之？然而袁氏知遇，他内感莫铭，《欧游讴》云：

> 资装既已具，涂轨既已谙。袁公闻我行，赆我殷且稠。
> 却之未有辞，受之中惭羞。公尝强我出，杖杜歌道周。
> 我敬为公言，知遇难再酬。国务天下公，庸庸赞莫由。
> 惟公家庭间，甚愿借箸筹。公方事公仆，未暇谋箕裘。
> 诸郎森玉立，与我情意投。四五六与七，自居弟子俦。
> 天资并优瞻，所期寡悔尤。何不遣游学，文明恣吸收。

遂率袁氏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游学欧洲。

(4)欧游之一：两个君主国的比较

从天津出发，到长春改由东清铁道，抵达满洲里，取道西伯利亚，横穿欧亚大陆。因为是袁氏诸位公子，过海拉尔关免检。

出满洲里，入俄国境内，火车以木材代替煤炭，车速减慢。满洲里以后，不再见有汉字地名抑或华人，惟见莽原之野，广漠无边。北域原始森林，变化无多，置身其中，难见气象，不免单调乏味。过外

蒙绿洲，忽见山明水秀，心目爽豁。

碧草蓝天，白马红靴，衣饰斑斓，有蒙人探头观车。

严修为之一振，兴致陡高，遂与蒙人交谈，无奈语言不通。

抵达莫斯科，中国驻俄代表、参赞等站前恭迎。下榻尼古拉街旅馆，住第四层楼上。俄于旅客讯察至严，入旅馆先验护照。严修等于本国起护照已写明游历欧洲道经俄国，若护照中但写赴俄，则此后由俄转他国时，又须另起护照，否则出境时，甚难自由。

参观中国驻俄使馆，刘代表等导游各房屋，凡十三间，年租俄币八千。房间仅够敷用，而大门狭隘，与一国使馆不甚相称。盖因俄国京城房价昂贵，使馆经费有限，除官员薪俸外，其他费用年仅三万，只好因陋就简。随后，参观莫斯科博物馆。

该馆为当年皇宫的一部分，其中收藏画品以人物为大宗，均出名家手笔，画框镶金，价值数万不止。另有一室，藏珍宝、钻石镶嵌之物极多，皆为各国元首赠予俄皇之珠宝，等等不一而足。博物馆旁有一巍峨之建筑，乃沙皇常年居住的乡居行宫。宫内规模宏廓，金碧辉煌，又有朝见、会客、音乐、跳舞、办公、休闲、寝浴、外宾、仆从诸室等。亚历山大教堂，穷奢极巧，人称世界第一；彼得大帝故居则院落庳狭，素朴如民居。而俄国的皇家陵地却是一派宏伟肃穆气象，石棺雕刻，标志永垂不朽。大彼得来自荷兰，知立国不能无海军，遂苦心经营圣彼得堡城。

辞别俄使馆，转赴德国，中国驻德代表颜惠庆前来迎接。

一到德国，严修感慨万千，盛称德国人之勤俭，特赞柏林市容之清洁云：柏林街市之整，道路之洁，出人意表。其新造之楼房皆五层，各街一律。路则莹洁如镜，人影可鉴。新自皇宫开一直路，长几二十华里，其直如矢。两旁人行道两条，车道两条，中间土路一条，遍布规矩草。土路之两边，浓花两道，一望无际。规矩草之中，铁轨一条，则电车路也。爽心悦目，几疑非人间所有。

游德皇离宫，颜惠庆言：德皇之离宫，有风车磨盘一具，当建筑离宫时，购用民地，惟此家执不肯卖，德皇弗忍强也，此家遂岿然独存于离宫之中，父殁子继，始售诸德皇，德皇命勿撤此磨，以志不肯拂民之一段故事也。又言德皇建离宫，因某事为民间所讼，经法官

裁判，德皇不直，德皇甘服判断无异言。严修闻之，叹曰：夫德君主国，而其不肯挟势违法若此，可以愧吾国之号称共和者矣！

此时，他已将日记改为民国纪年，清帝退位时"愀然不乐"的心情已然改变。偕颜惠庆等人前去拜访老友梁敦彦，梁曾任清末外务部尚书，现在德国做寓公。一行人乘汽车由旅馆出发，不数里便森林夹道，弥望无际，雨中苍翠，欲滴如秋。约半小时，至梁宅。宅临湖滨，林木茂美，一派郊外田园风光，温馨如梦，梁以10余万马克购得该地。

此间，与嘉定张君劢相识，张君两月前来德国留学。张君盛言德人有运河之利，严修然之，以为德人工商发达而不忽农事，铁路遍设而运河并重，新旧事物，无废无弃，各尽其用，此吾国所当知，且当效法也。

观普鲁士王宫，返回时，路经一处，其中设有浑天仪，系庚子年被德军掠去者，国耻攸关，目不忍睹，故严修不欲入也，愀然而去。由德国启程，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

(5)欧游之二：国际博览会与英国之政教

陶孟和从英国赶来迎接严修，未遇；又赶至旅馆见严修。

游布鲁塞尔市区，又见一伤心处，城中一公园，即以庚子赔款建成。此中滋味非身临其境者难以品嚼。

但观比、德交界处，崇山峻岭，险要异常，铁路却畅通无阻，使严修颇为震撼，慨叹当今谋国者，当依此为法，铺设山城铁路。

观滑铁卢纪念塔，对拿破仑颇为神往；观历史博物馆，始见希腊、埃及出土文物及木乃伊，于世界上古之异域文明大开眼界。游国际博览会，于各国文化，亦略见一斑。

其中，法国馆装饰品居多，德国馆实用品居多，意国馆雕刻尤佳，英国馆瓷、漆器居多，坎那大加拿大馆油画真景及矿山标本最多，万国馆日本出品居多，刚果馆比之殖民地有红十字会及医院等模型，黑种白种人相同。

于布鲁塞尔稍息数日后，严修一行乘船抵伦敦，中国驻英公使刘育麟等前来迎接。一路上，陶孟和向严修介绍英国政党政治。云：

英国政党之争，不亚于我国，其报纸新闻互为辩护，亦不肯相让，但有秩序、范围、界定及制裁。我国则恰恰相反，争之急则肆口谩骂，甚至动辄以武力相加，民不堪其苦。

英国已故首相沙侯之子来访袁氏兄弟，并递交书函，拟于官邸宴请，并邀袁氏兄弟访住其宅三日，诸公子以严修出门不在为由婉拒，并谓待严修归后再予以答复。因两国高层子弟相交往事关外务，严修等一番研究后，决定代克权兄弟拟一回函，云因语言不通，谨辞宴请，改日前往拜谢。

游蜡像馆，见欧美历代王侯将相、名人骚客等蜡像。其中亚洲的有日皇与中国的孙中山及一名身着四品官服的茶商。严修对茶商不得其解，其实是为纪念中国茶叶的输入，对英国文明的改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解茶商情有可原，对于孙中山作何观感呢？

此时，孙中山正在国内发动"二次革命"，革命党人李烈钧以江西一隅之地，抗袁氏举国之兵，老百姓为他们的主义和野心而流血、而牺牲。孙与袁，孰是孰非？严修扑朔迷离。袁氏欲复辟，其罪当诛，但复辟未成事实，只能口诛笔伐，诛其心而伐其意，动辄以革命诛之，则未免草率。对于革命党人的草率，严修一直表示不满；对于袁氏"搞共和"，他也敬而远之；对于政党政治，他不懂，只想躲得远远的。

他本想在日本躲清静，结果反而议论纷纷，于是他躲到欧洲来。政治归政治，友谊归友谊。对于袁氏"搞共和"，严修没反对，也不合作；对于袁氏知遇，严修则倾情相报，从无二心。

他请毓生拟就致袁氏电报稿，主张克权兄弟尽快留学。

又与子璋谈论教育问题，"子璋言英之人口四十兆，平均教育费每人合十五先令，合当中国银元三万万，中国人数十倍于英，则当三十万万矣，以一千五百州县摊算，每县应有教育费二百万。噫，谈何容易！英之强迫教育即义务教育八年，其费地方与政府各半"。

接袁世凯电报，告国内大局渐平，诸儿愿留学者悉准。严修遂与刘公使商议袁氏诸公子留学一事，并致电袁氏："乱事渐平，不胜庆慰。现诸生均愿留英，遵与公使妥筹办法，再行函陈，修。"

刘公使邀请严修一行游英皇室离宫。

宫内有见客室、餐室、寝室、燕处室，陈列各国珍品颇多，亦有清廷遣张荫桓所赠之品。维多利亚女皇自幼至老之像，无一不备。皇宫不对外开放，因使馆介绍，严修等有幸一睹。

从英国多佛尔海岸登船，严修一行横渡英吉利海峡。

(6)欧游之三：法国文物与瑞士风光

至法国加来海岸，转赴巴黎，下榻大路易饭店四楼。

先参观拿破仑墓，然后到李石曾在巴黎开设的中华饭店午餐。

饭后，登埃菲尔铁塔，俯眺巴黎全景。烟雾渺茫，恍若梦中。

又赴李石曾所设之豆腐公司，参观磨面、筛豆、封罐头、提空气各机及烘点心之炉，严修在该公司也有股份。

期间，参观"掳华博物馆"，该馆收藏的中国瓷器多精品，严修以为其中混一色者最佳。而中国画与西洋画相差太远，花卉次之，鸟兽又次之，人物最下。该馆画品收藏有：陈洪绶堂幅二即麻姑与寿星，所谓麻姑献寿也。上有恭王奕䜣题"寿"字，醇王奕譞诗。"醇王时年三十，以其时考之，当在同治初年也"。赵子昂画马横幅，但模糊不真；纨善一面，上画树叶带梗，上有红蓼两朵。三方印，宣和、内府及柯九思敬仲，"画极工，虽旧而色泽犹新，当非赝品"。

另据该馆员讲，1909 年有一位法国人从中国西部获来许多古器、古经捐献至此。观之，皆敦煌传品，故一一记下，以为国故流落国外，国人当惋惜又当记之。严修以年代推断此法国人，"似即由敦煌获古物之白西河伯希和君也"。又以"罗叔蕴、王捍郑所借观付石印者，俱不在内"，而断言"岂白君留其精者以自娱，而以其余捐诸此馆欤？"严修之精于文物，由此可见一斑。

由法国进入瑞士，慕名而游日内瓦城。日内瓦城依山傍湖而居，山顶白雪皑皑，晶莹如玉；山下雪融为泉，汇流成湖；湖水深碧，层色鲜明，水木清华，犹含湿润之气，微风抚面宜人，瓦屋含光吐泽。登阿尔卑斯山，山顶鸟瞰，万壑竞色，奇峰峭壁，雪海冰天，一言难尽其妙。不会滑雪旁观之，非常有趣儿。下得山来，冰山雪峰依次融为悬瀑流泉，汇为溪河，流过城市，穿过街桥，居民日夜闻涛声。

严修依依不舍，改日又乘坐四马驾车，前往观瀑。未至瀑前，已闻瀑声大作，临近登桥，方见对面一巨瀑自一圆石洞中喷出，宛如一把发怒的巫婆巨帚，在帚梢即将扫掠人群之际，突然水雾迷幻，一弯彩虹若隐若现。也许老巫已乘帚归去，留下的可是上帝不经意的奇迹？循桥而下，水势稍弱，蜿蜒流去，上下跌宕，复经一洞又一洞。凭窗远眺，山腰云涌，晨光万千，画兴骤起，欣然命笔作画一幅。

山水之美，使他暂忘了国内纷争，而国耻却咄咄逼人来。观万国邮政纪念像，各色人种共擎一地球，黄种人中有日本人，无中国人。

(7)欧游之四：和平大会与市政问题

在瑞士盘桓数日后，赴荷兰阿姆斯特丹观光和平庆祝大会。

庆祝活动从游行表演到用餐，歌舞不断，极尽太平之乐事。如世外桃源一般，鸡犬之声相闻，天人之舞同观。严修方忧国事，难免感慨系之，故从容赋诗两首：

白首黄童舞且歌，洗兵谁与挽天河？
鲰生艳美平和会，亦逐都人看大傩。

大庆百年才一日，吾侪此日恰来游。
山郊在昔看归鸟，海曲无人肯放牛。
到老不闻争地战，有生谁识戴天仇？
中华此岁方多事，鼙鼓称声继未休！

游和平宫，见宫内悬挂各国君主画像，惟独没有中国君主画像；悬挂各国公使像，则有中国公使杨儒像。又到荷兰王宫，王宫临街楼房仅两层，前有一铜像，占地无多，严修颇为惊讶，以为“若非知者，决不悉其为王宫也”。

回到英国，刘公使已为袁氏三子联系了卡登翰学校刘公使之子即就读于该校，严修偕公使亲至该校与总教瓦达弗尔德接洽入学办法，袁氏兄弟遂入校学习，严修亦大功告成。

袁氏子弟入学后，严修对英国教育和市政进行了考察。

至一小镇，居民不过16000人，男女小学校竟有44所。这使他

充满信心，认为此“并非高远不可及”，“即以吾津论，虽去普及之日尚远，然学生人数亦累数千矣。果教授训练得法，收效亦甚可观”《严范孙先生手札》。他还提出市政与教育并重，主张仿行外国市政——“欲行市政，当自天津始”。

“吾津学务之退步，非讲求市政不可。近时言者，最喜援引法兰西之革命与吾国并论，则何不举法兰西市政与吾国一较量之？”国内情形确如他所言，只有革命，没有市政，只有党争，没有城建。国人更不了解，市政规划与共和国国体、市政建设与国民素质休戚相关，而所谓政治家，大都被政治斗争所驱使而难以自拔。

袁氏弟兄住校后，随行之徐毓生及袁氏管家罗永锦等，自英伦启程返国。而严修则有意回避国内政治纠缠，决定继续逗留英国。国内局势渐已明朗，总统选举在袁的策划下，按部就班。

先是宪法会议公布《大总统选举法》，继而国会组织总统选举，经三次投票，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正式副总统。西、瑞、法、比、丹、葡、日、俄、荷、德、英、奥、意等 13 国驻京外交公使照会外交部，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10 月 10 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职，黎元洪就任副总统。“留英学会开纪念会也。开会之举本早已预定，而是日适际总统正式莅位，又各国恰于数日前承认中华民国，故今日会场格外旺盛”。

但是，国内并没有因新总统上任，而现出共和国的祥和气氛。

袁氏非但不行大赦令，反而在登上大总统宝座后的第三天，便命李纯拿办参加讨袁的江西省议会议员 46 人；北京总检察厅根据袁大总统的意图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许崇智、陈炯明、谭人凤等革命党人。对于宪法草案，袁氏亦深为不满，饬令各省军民长官逐条研究陈复。

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袁氏再次反对，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并命军警追缴议员证书、徽章，而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自行解散，宪法草案归于流产。

于是，黎元洪电致袁氏，请令全国各学校一律崇祀孔子，康有为也被拥为孔教会会长。在一片尊孔声中，袁氏令厘定尊孔典礼，

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袁世凯还接见衍圣公孔令贻，授予一等嘉禾章。

以儒教为国教，以孔子为教祖，袁氏"搞共和"之心安在？将宪法抛弃后，袁又釜底抽薪，另组政治会议机关以架空国会。进步党在京开会，议决"对于国会取绝对维持主义"，"于国会问题未解决以前，不能辞职或离京"，表明了梁启超捍卫国会的立场。而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则宣布脱党，以示与袁氏一致。

各省都督、民政长官亦纷纷致电袁氏，请以救国大计咨询政治会议，为解散国会和修改约法做准备。政治会议即刻开会讨论增修约法咨询案，议决呈请另设立法机关。

国内党争纷纷，严修置若罔闻，他在英国研究市政问题。

他致信陈宝泉，力主徐世昌任天津市长：菊老无意政界，以鄙见论之，似亦不必再入政界。为菊老计，有最相宜最切要之一席，则天津市长是也。欲社会之进步，非讲求市政不可；市政良则社会良，而国始有富强之望。窃以为欧洲程度，吾国数十年内，恐无躐跻之望，而欲学欧美，先学日本；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皆一定不易之序也。

此乃严修一厢情愿为朋友着想，其实菊老早有安排。在菊老眼里，区区市长，何足挂齿？所谓市政，则闻所未闻。他一生所学，全都寄托在修、齐、治、平四字上，思想与学术仍未脱帝王学的藩篱。

而严修则与时俱进，与菊老已不可同日而语。其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为本土阶段，由修、齐、治、平之科举制，而突进于经济特科。其二为东游阶段，受日本启示，其思想由经济特科渐进而至君主立宪。其三为欧游阶段，其思想由日学为中介，转入西学本体；其政治立场，亦由保守主义的君主立宪，趋进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共和。此种转趋，在严修实属自发，其思想之分际与转变，他本人尚未自觉，故有以市政劝菊老之迂而无当之论，真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

严修又以为，凡任学校事既久者，宜出洋考察。他建议，少泉、玉孙、竺笙、伯苓四君子，宜由教育司给以数月之休息，假令至西洋一行，顺道考察，归后仍旧任事，其精神识力，必加倍增进，而本校

受莫大之益。如以同时出游，筹费太巨，或分年行之，每年或一人，或二人，亦无不可。

居伦敦冬季，作有《伦敦秋冬无日不雾，戏为此诗》：

织就烟云淡墨图，蔚蓝天气古来无。
太阳永照英旗帜，偏是都城独向隅。

其时，严修每日阅北京日报，读英文、英史及英译《聊斋志异》等书。每日自造单句，试说英语，就正于女房主，孜孜不懈。

是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此后一直得到严修的资助。

(8)欧游之五：政之患在市政，国之患在游民

1914 年，严修 55 岁。

年初，严修仍居英国，对国内时局并不明了。

梁启超似乎嗅出袁氏的某种异味，进步党召开特别会议，请北京政府务于本年内召集国会，重申宪法由民选机关制定。

更有天不怕、地不怕者，一人独闯中南海。

此人便是章太炎！因“宋案”耿耿于怀，在南方策动讨袁未竟，竟不惧罹祸，直抵总统府，大骂袁氏心怀叵测，祸国殃民。被袁氏软禁起来。期间，他多次拒绝袁氏收买，几次逃跑，均未成功。

于是，政治会议粉墨登场了，呈请大总统重修约法。袁氏准允，布告于民，特设“约法会议”为造法机关，废止国会。

所谓“政治会议者，秘书厅之放大矣；约法会议者，法制局之放大矣；以斯等人员所组成之会议，诚为袁氏之工具，何会议之有耶？”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第 412 页不久，《约法会议组织条件》出笼，以“实现对国家根本大法的改造”。

而严修却沉浸在对英国市政文明的观感中。耳濡目染，不吐不快，他写信给天津警察厅长杨敬林。谈到天津的警政、路政及城市卫生现状，希望能引起注意。

其言路政曰：路之云者，乃百千万人所共由，非少数人所得侵占也。近吾津马路两旁，人行道边，或摆设货摊，或堆积杂物，甚或支架板棚，欲拓地基，徐谋规占，此种种状态，求之于各国都会无有

也，求之于各埠租界无有也，即求之于北京各大街亦无有也。以观瞻言，固觉相形见绌；以患害言，步行车行，杂错于中衢，喧阗阻市，固耗时间，拥挤摩击，尤多危险。电车每每伤人，此亦一原因也。或谓驱逐货摊，有妨小本生计，禁堆杂物，亦于铺商未便。由前之说，则当仿工场菜市之例，另行觅地，决不能以公共之路，作为受廛。由后之说，则任意侵占，何所底止。即可堆积于边道，何不可堆积于途中。

其言卫生云：卫生之事至赜，举起显著者言之，官设厕所，或无障蔽，此宜修治者。至若墙阳之隙地，随意便溺，道旁之水沟，随意添塞，均宜严于禁止。对于淫书泛滥、聚赌成灾，他认为"尤足为警政之玷"，此而不禁，贫民愈多，盗风益盛。

陈宝泉接到严修年前信，知其主张任学校事者宜出洋考察之意，立即与直隶提学使蔡儒楷商议，蔡因经费拮据表示为难。陈即复函告之严修。严修仍不放弃，复信云：主持学务者，其费由本司或本局筹之；管学日久者，其费由本校筹之。虑经费拮据，或系未经核算，否则本不以此举为然耳。

陈宝泉对严修信中讲求市政，及欲举徐世昌为天津市长之意，甚表佩服和赞同，遂拟就说帖，以徐世昌与严修两人为天津市长候选人。然后寄于严修审核。

严修复信提醒陈宝泉云，所以推重徐世昌，是因为：其祖籍天津，但生长在河南，所谓"非但为其津人也，正以其似津人非津人"；亦绅亦官，所谓"绅也而有官之态度与威望，官也而有绅之亲和力"。徐不愿就任天津市长，本在意料之中，若"迫之以责无旁贷，或可发其任事之勇"，今并举两选人，明显给徐留有退让余地，况严、徐为世交好友，徐奈何不逊而避。

严修自称胆怯面软之人，不可居一邑之要冲。"面软"或有之，"胆怯"则从何说起？袁氏被逐出京，徐无言，而严修则敢上书独争；敢屡犯袁颜、屡拒聘请者，其时并世无二，其勇也，时无出其右者，何言胆怯面软？

严修爱袁氏，是为国惜才；爱徐世昌，出于同年至交，推心置腹为徐着想，他以为，遭逢乱世，又无兵权，不如做点实事。但徐却不

这么想，其野心不在天津市，而在最高权力层。

严修不仅劝政要做实事，还劝学者研究实学。他与陶孟和讨论国患，指出：国之患不在兵骄，亦不在农民，而今之患以游民最大。万事非财不举，孔子谓不患贫而患不安，今日时局，将欲求安，必先救贫。

陶孟和对经济学一向研究有素，严修建议他：根据国情，平心静气，析其条目，列其次序，若发现可行之法，即可登报、上书，以求实施。如此，较之逞刺讥之快论，发愤激之危言，或有实济也。

以实学求"实济"，正是严修本人的学术路径和身体力行的生活原则，而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更夯实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背景，绅士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9)欧游之六：斯人不出，奈袁氏何

严修继续他的英国之行，某日，忽接袁氏来电：两年以来，国是未定，不敢强迫高贤。今幸统一，渐可实行，挽救吾华，时不可失。凡为政治，根本教育，咸谓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明知执事高节遐标，不染尘滓；但众论如出一辙，时贤首数我公。教育总长缺席，微管莫属，已于本日发表，以协舆情。务乞眷怀祖国，不忘故人，命驾遄返，同舟共济，使鄙人免蔽贤之诮，国民无来暮之嗟，至为企盼。袁世凯。

为郑重起见，严修亲自拟电致袁世凯：

> 北京大总统鉴：电谕祗悉。知遇之隆，衔感没齿。惟才力本短，近益怯弱，断难再任职事。去岁面陈，蒙允勿强，仍乞始终矜宥，别简贤能。无几余生，悉出钧赐。

同日，袁幕张仲仁来电，由"中华使馆探转严范孙先生鉴"：自公高蹈，论者至以公之去就，卜国之存亡。主座指袁世凯相需甚殷，极盼就职。内阁屡易法制，必须更张。不久即行总统制，事权统一，既无联带之说，更无牵掣之虞，公悲天悯人，可以出矣。

张之所言，俱为实情，但严修辞意已决。即回电"北京大总统府张仲仁先生鉴"：

电敬悉。总统知遇，没齿难酬，自恨散材，不能报效。近则益形怯弱，畏事如虎，强使任职，不可须臾。仰恳鼎言，人求矜宥，感且不朽。修。

又接国务总理孙宝琦电，恳言“公长教育，已奉明令”，时局艰难，务望早日返国，共肩巨任。严修再回孙宝琦电，重申“力弱胆怯，不敢任事”。发电完毕，如释重负，接续游兴，同卞氏叔侄到英国下议院参观。

适遇卞氏之师威尔逊，得以买到特别票，可以不用排队等传唤，几人遂至议事厅对面楼上坐好。听议员们辩论，无灯，无哗，无鼓掌，秩序井然。严修感慨与我国议会之嚣乱大不同，由此，对国内政治更无信心与兴趣。

写信示智怡：忽接总统及张仲翁电，谓教育总长业已发表。又接孙总理电，敦促回华。我已先后电复，兹将原稿寄汝一看，但冀无第二次之来电，可省许多笔墨，盖我心已决，不可转矣。汝欲我调查普及教育事，意非不善，惟英伦经数百年之积累，富甲全球，即使查明，于我何益？果欲学步他人，只可仍从日本入手。

其致赵幼梅信，言其居英国一切安适。虽语言不通，但所幸日行诸事，俱有定程，俱有定理，故久居亦无不便。如无国不可忘，家不可忘，朋友不可忘之道义，终老是乡亦可矣。

英国使他流连忘返，获一佳讯，英驻华公使陈请英政府，仿照美国办法，退还部分庚款在中国设立大学。

然而异国虽好，终非隐居之地，刘公使送阅电稿又到：奉大总统命，改革以来，民德堕落，将欲巩固共和，惟有注重教育。海内人望，无过范孙。前经任命，电劝就职。昨据电复，仍复辞让，高风亮节，太息固深。但共和国之官吏，本是义务性质，贤人伏处，谁任巨艰？勿奄兹土，致拂舆情。等因特达。公府秘府厅。

复电仍称：

据称义务当尽，诚如总统钧谕。惟才力所限，自知已审，前佐部务，缘不胜任，是以辞职。今兹艰巨，百倍往日，愈非所堪。谆代为呈请，务恳收回成命。敦劝再三，意不可转。

蔡儒楷学使亦来电：转严范孙先生鉴，公长教育，国庆得人。铨材暂摄，惧弗克任。盼速东旋，以从民望，国务幸甚，学界幸甚。

电传纷纷，劝声如雨，无奈严修心如止水。回蔡儒楷电，北京教育部蔡总长鉴：电敬悉。修已恳辞，祝公即直。又复颜惠庆公使信，自称"弟才力本短，暮气日深"。

严修不就职是明智的，袁氏继续"搞共和"。先是通令依照政治会议决议，解散各省省议会；又特派李经羲为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长；县知事考试揭晓，所取多旧官僚，学校出身者大都落第。袁氏对旧事物的依恋，由此可见。

民国以党划线，政治斗争扩大化。京沪诸报诬旷生为暴力主义者，使袁氏亦疑其为国民党，严修为之申辩：曾参杀人，慈母犹信，纷纭众口，无中生有。旷生见疑，则修亦可疑矣。修之非国民党，总统所知也。旷生之非国民党，修所知也。

又因流言蜚语，涉及王劼孚公使，他直言不讳：王虽系国民党人，然其稳健平实，岂有丝毫反对中央之意见？修保劼孚，一则为护惜人才，再则虑是非颠倒，既非劼孚所要求，亦非旷生所授意。以使才论，同时固罕见其人；以道德论，又岂僭人者所可比？若旷生果因此而见疑，修之罪为可逭乎？

随后，又致信与旷生一同受谤的王劼孚公使，说：旷生与我公之事，实则报纸之言，本非定论，缘此烦恼，殊不必耳。

张仲仁来信，措辞生硬，多有质询之语。以其二人相知，仲仁未必如此揣度严修，或为袁氏授意，因其中见疑之处，多涉及严修与袁氏。严修复信仲仁，重申君子不党、多为实事的立场，借此向袁氏声明。

此为严修辞政以来首次为自己辩解：前次电复，语未详尽。兹奉手教，意至勤恳，词至悚切，非相爱甚，谁肯尽言若此？感荷不可名状。顾区区下忱，似有未蒙鉴察者，谨为左右缕陈之。

来信以首阳采薇及一姓一国之轻重相责，似疑严修于共和政体尚有异义。严修自明其心迹云：

辛亥以后，事势之变迁，祸患之剧烈，大总统保全清室，保

全中国之苦心，皆修所目击。即以全球之时会论，二十世纪中，帝制决难存在。修虽浅陋，略知其义，岂犹惓惓于君主之国体，而自处于殷顽？且修之乞休，在庚戌以前，而不在辛亥以后，惠教函中，固已代稽年月，似不疑缘此见疑。

来信以局外不察，贤者隐居高蹈，大总统将何以号召名流，共任艰巨责。严修答之曰：

吾国相沿以不仕为隐，遂以不事之为高。前说义已未充，后说弊尤滋甚。巢许洗耳，后世艳称。以修论之，殊无足取。假使在位溺职，知盖不能皋夔，始不得不巢许。业巢许矣，奚洗耳为？人处其劳，己处其逸，既适懒散之性，复攘高洁之名，此修所不屑也。今世果有以修为师者，则其不才无用，必与修等，弃之万不足惜。总之，能任艰巨之人，断无自甘退缩之理，此不敢不辩者又一也。

来信以为个人计，独不为垂绝之国家计责。严修答曰：

此义往来于修之胸中非一日矣，正唯思之已熟，是以确然不疑。夫大总统所以牺牲生命、名誉以支柱国家者，欲国家之存在与安全也。欲国家存在而安全，则必胜任者进，不胜任者退，人才乃有观感，国事乃有进步。若明知己不胜任，恬然就职，其视大总统之生命、名誉不已轻乎？

来信以与大总统相知之深，忧患之时尚不能致责严修，答曰：

此义往来修之胸中尤有日矣。两年以来，对于非议大总统之人，则思力祛其惑。欲其知吾国今日决无第二可以救国之人，拥护犹恐不及，何忍非议。对于大总统，则愿稍广用人之范围，因以吸收人才，赞襄庶政。广之之说奈何，一曰不限旧人。旧时僚吏，非不贤也，然在全国，究居少数，不敷用，则有降格迁就之虑矣。或谓两年以来，亦既极力旁求，破除畛域，无如为时未久，辄思引退。始也三征三聘而姗姗其来，继也三让三辞而望望然去。大总统惩前毖后，始不得不作求旧之想。以上所言，事实诚无可讳，而情势却有可原。前日之去，或苦为议院之

所持；近日之去，或怵于阁制之将变。果此后方针大定，轨辙可循，大总统置腹推心，开诚布公，而谓名流不肯奋兴，英贤不肯久任，无是理也。

一曰速宽党禁。党之害至巨矣。暴烈分子敢于倡乱，敢于助乱，罪胡可逭？惩办之，解散之，不得不尔也。然一党之中，非尽反对中央，主张破坏之人也。即如所电保之王君广圻即王劫孚驻比，年余未与党事，且于党之举动甚不谓然，其稳重持大体，外交界中矫矫者也。修之保之也，非独惜其才而已，以为今日正宜定人心，孤敌助，使人才复为我用，而无蹈殴鱼驱雀之失也。

来信以远涉重洋，非病弱可知，又汗漫外邦，无词以对新闻记者责严修，答曰：

行路远近与任事勇怯，不成比例。修之前电因云怯弱病弱，英京旅客无虑千亿，新闻记者奚暇访此寂寥。纵其来也，亦无答问之必要。且修非欲久居异域也，终修之身，亦不忍自绝大总统也，方将持不完不备之管见，随时而陈，以备采择。不过迫以职事，授以名称，则钟鼓爰居，急思飏去。大总统夙能见谅，公亦爱我最深，伏望委婉代陈，恳即收回成命，不独有造于个人，凡我国人，悉蒙其福。

最后，谈到教育。他说：教育关系之重，诚如公言，但非有英敏奋发之人，难期孟晋。大总统尝举汤、李见询，兹两人者，均有劲气，今次长董君亦异材也。修惟不忍反唇以相报耳。公佐大总统规画学务余十稔矣，吾乡子弟受赐至今，必谓无人，公即其人也。语多憨拙，庶蒙鉴原。因公驳诘层层，不敢不条对详明，无泛无隐也。春寒珍重，藉请台安，临笔不胜惶悚之至。

政治需要表态，袁氏不好要求，老友激之，态度跃然纸上。

辞别晚清，严修比任何人都早，都坚决；他虽主张君主立宪，但在共和到来之际，对隆裕太后退位赞成共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对传统文化及某些旧事物眷恋，却从未以前清遗老自居，对于袁氏大张旗鼓搞“尊孔”活动也不赞一辞。

相反被他尊称为大总统的袁氏，其欲复辟早已是司马昭之心了。义军白朗张贴布告，斥责袁氏“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

而袁氏周围者，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抑或另有企图？推波助澜者有之，助纣为虐者有之，欲借“共和”之船，驶向帝制彼岸者有之，而严修却偏偏不上船。对于严修一而再推托，袁氏装聋作哑，再电“严总长”：前秘书谒诚面劝，谅已接到。如大旌尚须小住，即顺道考察欧洲各校教育精神，归报祖国，必大有造于邦人也。

严修回电，斩钉截铁：“考察之举，并恳另委妥人。”

为摆脱政治应酬，严修绞尽脑汁。却有那不识时务的朋友此时来信，婉求严修荐官。严修回信，告诫友人，时局纷乱，官如驿站，仕退如走马灯，本无喜忧可言。姑且养晦以俟时机，终不至久居郁郁。

(10)欧游之七：“袁记约法”与归国之旅

教育总长，他弃之；教育事业，他却念念不忘。

致陈宝泉信曰：鄙见以为吾国今日财源枯竭，固无大举兴学之望。然于已设学校，加意整顿，正今日之急务。

其中尤言：小学教员之责任，其重可知矣！然而状况令人担忧。

以天津为例，小学教员，有思想者多，肯研究者少，且染于习俗，以赌博、冶游为乐者，亦时有所闻。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于是，他建议设一教员俱乐部，内设小型博物馆、图书馆与各种音、体娱乐之具，使他们能“一面陶冶性情，一面补充学识”，又为小学教员拟出一份应读书目。

严修人在异国，渐悟古今，作《漫成》一律：

七十二沽云水身，五年不踏京洛尘。
生成物竞天演世，焉知无怀浑沌民。
关尹亢仓空尔尔，卢梭笛卡亦陈陈。
愚知花样重翻日，又有新人笑旧人。

花样翻新，旁观者清。当局者虽未必迷了心窍，但名利之诱使许多人不由自主。这不，在政客们簇拥下，袁氏还在继续“搞共和”。

袁氏咨命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大纲，这次他没有遇到五个

月前在天坛宪草委员会那里遇到的麻烦，高兴得大有一发不可止之状。紧接着，他又设立平政院，任命汪大燮为院长，废除了《临时约法》。

就这样，一部按照袁氏"增修"意图修改的《中华民国约法》10章68条问世了。《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政务不设国务总理，仅设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各部部长直接隶属于大总统。外交大权归属总统，总统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不须参议院或国会同意。官制官规的制定和文武官员的任免由总统自行之，不必经立法院同意。大总统有紧急命令权及财产处分权，人民公权的剥夺和恢复，总统自行之。正式宪法起草权归大总统及参议员，其修改权归大总统和立法院。

后人称此为"袁记约法"。因为《临时约法》中参议院、大总统、国务院、法院共同行使的统治权全部集中到大总统一人手中。袁世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已成了中华民国的集权元首，离无限任期及万世一系的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了。

废除国务院，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于大总统府内设政事堂，老搭档徐世昌也不再是闲云野鹤，也不必似严修力主其做天津市长时那样惺惺作寓公之态，而是立即从青岛赴京上任惟一襄赞大总统的国务卿。然后撤销大总统秘书厅，公布省官制、道官制、县官制，即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观察使为道尹；成立参政院，院长为黎元洪，陆徵祥等73人为参政。

公布大总统公文呈式令，规定大总统命令分为策令、申令、告令、批令四种。当袁世凯下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时，黎元洪便难逃一劫。这位半年前曾拥兵一隅，顾盼自雄的民国副总统被袁世凯以霸王请客的硬功，连拉带拽请到北京，做了参政院长。在汉口挂了两年的"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招牌终于被摘下来了。

袁世凯终于"搞定了共和"。严修做归国临行前的参观访问。往牛津，参观各学校、藏书楼、博物馆、教堂、礼堂等。抵巴黎，胡公使、李石曾、王劼孚俱来迎，当日即乘夜车前往罗马。

离开巴黎后，致信王劼孚，自谓曾给友人一札，语多不检，批评有加，但不愿持以示人，不意函件竟被披露，登于报纸供人指摘。遂

叹曰：修既无朋党之私，亦无官职荣誉缠身，故不畏指摘。但至此国难当头，列强环伺，犹如激流失船，吴越一心，尚犹恐不济，何来余力相互攻击？对于国事，人之意见，原本各有异同，难于强合。但为报国一念，各行其是，有何不可？彼此极力妒怨，而忘刀俎之苦，修诚私心痛之。

入罗马城，参观教皇宫博物馆，仅十余分钟闭馆，所见不及十分之一，但辉煌壮丽已见一斑。又参观彼得、保罗教堂和画院，其规模壮丽竟可与罗马教廷相媲美。到维也纳，游览皇家墓地、大学、议院、美术学校、音乐学校、博物馆等，抬头观皇城门额上，嵌一铜炮弹，系当年土耳其军逼临城下的纪念物。至莫斯科，观光结束，转乘回国车，穿行欧亚大陆，原始寂寞、冰冷而又充满流放罪恶的西伯利亚渐渐被列车甩掉。

车过赤塔。达满洲里，又见中华风物，触景生情，诗从中来：

东风着意助花开，柯叶新鲜似剪裁。
不问园亭谁是主，纷纷蜂蝶过墙来。《南满道中》

西来层叠渡关津，此是穷关异国邻。
余子军逢三楚户，众咻果遇一齐人。
但闻往复交征苦，未必商量互惠均。
犹有差强人意事，风前五色国旗新。《满洲里》

列车过哈尔滨，至长春换乘新车。从莫斯科起身，十余日颠沛于狭小车厢内，积尘寸许，物件凌乱，空气污浊不堪。骤换新车，严修顿觉爽气袭人，精神振作起来。

车抵天津老站，亲友及族人来迎者百数十人，家人自嫂以下悉来，警察厅长杨以德率军乐队来迎接。先生一一酬应后返宅。

2. 国殇：袁氏“搞共和”

(1)《大总统选举法》——王权借尸还魂

在津应酬完毕，严修即刻进京，于前门站下车，袁氏次子袁克文来车站迎接。饭后，总统府派汽车接严修进府，入新华门，换人力车至门下，承宣官导入，见袁总统。谈约三小时出，无非欧洲见闻、诸子读书及辞职辞薪等二三事。辞别袁氏，即往政事堂见国务卿徐菊老，谈约三刻钟，因天色已晚辞出。

次日，又赴教育部会见汤化龙总长、梁善济次长，言及三日前教育部曾发令通饬各学校及各书坊：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规。以政府行政命令行之于学校，严修不以为然。

不数日，袁氏又派人来津，函聘严修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来者持总统亲函，严修也决定亲自入京晋见袁总统辞之。严修亲谒面辞，袁氏无奈，只好作罢。

兄嫂突然头晕吐血，延医诊治无效，病故。其时，严修方谒周玉山师，师生不见有三十六年。惊闻噩耗，急急归来，奔嫂之丧。守七之日，袁氏派人送祭“礼”——祭席一桌，奠份千元慰问。丧事开吊，朱巡按使一早来吊，午袁遣次子克文、六子克桓代吊。严修立灵前陪吊如仪。

丧礼毕，严修同智崇晋京。

清史馆馆长赵尔巽闻严修在京，遂派人送聘书，敦请严修任清史馆纂修兼总撰，又附赵尔巽馆长信一件及知会一纸。

严修婉辞，赵尔巽只好改为名誉总纂。

袁又请严修入总统府，原定傍晚七钟，但汽车五时便来迎接。因袁氏每日傍晚六钟游园，园内即戒严出入，所以请严修于戒严前入总统府。见袁氏，谈约六刻钟，商量三位公子读书事。

改日，又往总统府贺袁克端婚，并晤袁氏长子袁克定，谈约四小时，方告辞。

袁氏撤销国务院，改设议事堂，即参政院。命黎元洪兼院长，满清贝子溥伦任副职，又亲自选定参政70名，多为清末督抚、民国都督、民政长、各地名流等。严修读报得知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后，即致信菊人，请婉辞参政。徐认为不辞不就，最为得当，亦不必形诸笔牍作辞职声明，免落寻常窠臼。如得便，徐将为其禀明。因为参政毕竟闲散无职守，不便开罪于袁氏过甚。

严修与智崇再入总统府，见袁氏兄弟四人，一同往北海看新塾，途遇仲仁，亦同往，至静心斋，此即新塾所在地，周视一遭，确为读书养性之好地方。进福华门时，遇菊人相国，立谈数语而别，又回到万字廊，袁氏有约，谈一小时离去，匆匆返津。

周恩来至严宅，请严修为《敬业》刚创刊题写封面，即书。

袁氏率百官在北京孔庙举行盛大祭孔活动，严修敬而远之。然而国庆日，严修穿西服，焕然一新，表明他亲近共和的态度。

黄炎培来访严修，严修久闻其名，却未曾谋面，两人一见如故，交谈融洽。

10月16日，严修赴京，为袁氏祝寿。祝寿毕，即日返津。

17日，南开中学十周年纪念日，严修应邀前往观礼。有张伯苓校长和老毕业生梅贻琦演讲。又观剧，剧名《恩怨缘》，凡八幕，可歌可泣，入理入情，严修以为虽西洋剧本，亦未能远过也。他欣慰的是，新剧之蓓蕾，灿然花开矣。

校庆活动热闹，数日之后，严修到总统府视察袁氏子弟课业。

闻蔡锷移居护国寺街棉花胡同，遂前往拜访，可惜未遇，留信而去。蔡锷居京，乃袁氏调虎离山，将其软困京城，严修焉然不知？知而往，斯人之大勇也！当年对袁如此，今日对蔡亦如此。

转道访同乡汪大燮，二人对袁氏一忧一望。忧其一意孤行，与共和背道而驰；望其不负众望，将共和进行到底。

然而袁氏"搞共和"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袁氏下令，重申"民主共和，载在约法"，如有邪说，紊乱国宪，即照内乱严办。其时，倡议清帝复辟之举，时有发生，袁遂命内务部查禁主张变更国体，还政清室之谬说。严修认为，袁氏如过河卒，只能一步一步将共和进行到底。对于袁氏"搞共和"，他虽不参与，不

过问，不以为然，但他没想到袁氏会过“帝制”之河拆“共和”之桥。

这一时期，他常在京津两地往来，曾至武英殿古物陈列所参观，又入太和门、中左门、保和殿，严修曾于保和殿应考试凡十次，壬午一次复试，癸未三次复试并朝考，戊子一次考试差，己丑一次考试差，辛卯一次考试差，癸巳一次考试差，甲午二次考试差又大考，最后一次距今亦有二十多年，重来有不胜今昔之感。

往瞻紫光阁，阁中悬古帝王像，远者尧舜，近者明代诸帝。帝像有冕旒者，有纱帽者，衣则有团龙者，有十二章者，貌以唐太宗为最伟，明太祖为最奇。尤可爱者明宣德行乐图。

年底，严修故地重游，在怀念中告别过去，然后整装前往南开中学参加毕业生毕业典礼。同一天，袁氏于天坛举行空前的祭天大典，俨然已行皇帝祭天之礼。

不久，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闭会，《大总统选举法》修订完毕。修正案规定：总统改任七十年，连任亦无限制；总统继承人，应由现总统推举于选举会，其名额以三人为限，被推荐者由总统亲书置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室，届时选举，方可取出交与选举会。根据此法，大总统不仅实际成为终身职务，而且还使家族世袭成为可能。尤为可笑的是，清代的立储制度在中华民国又借尸还魂。

袁氏得寸进尺，当真利令智昏了？非也！乃整个社会的“绥靖”气氛将袁的野心推到了帝制的界点。从二次革命结束后到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出台，仅一年多时间，袁氏就从一个内阁制虚位总统变成了一个集权的终身制元首。期间，只有孙中山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反袁。

国内政治精英们还在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争论不休。而平民百姓由于对民主陌生，足以使他们希望有一个铁腕人物出现，迅速稳定局势，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也许严修有同感：无论如何，袁氏仍在努力做总统状，即便是终身的，因为中国的确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稳定大局。他在“就此而止”的祈愿中返回天津。

回顾这一年，他说：今年又过矣，藐躬言行，无一可纪。可纪者，

游莎士比亚故居，览旁贝古城，登火山耳。世界大事，则欧陆之战，前古未有；吾国大事，则青岛租地由德转日，日之权力伸张可畏哉！

幸运的是，严修一行于欧战爆发之前，安然回国。

(2)严修明志：千金买山和万里云游

1915 年，严修 56 岁。

袁氏快马加鞭，集权速度惊人！作为总统，其权限已登峰造极，国民的忍耐也到此为止了。然而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越雷池一步"的危险，其势如箭，一发而不可收。

1 月 1 日，西历元旦。共和国改元西历还不到四年，政府庆贺元旦以示民主之新气象已成惯例。严修赴京，到总统府向袁总统贺新年，寓尊共和之深意也。袁氏并不在乎元旦寓意，竟在这一天大肆封赏旧制官爵。授徐世昌为上卿，赵尔巽等为中卿，章宗祥等为少卿。接受旧官职者均为严修旧识好友。严修时在总统府，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在中卿之列。新年伊始，这的确不是一个好开头。

6 日，严修更换午礼服，赴怀仁堂公宴，袁克权等兄弟执弟子礼，乘汽车专程迎接老师，至来薰门外下车，入怀仁堂之东厢小憩。十二钟，随国务卿及文武各官至怀仁堂谒见大总统，行一鞠躬礼，退入席。严修坐在总统左侧第一席，首席为国务卿，入席时，众人齐向总统一鞠躬；饭罢时，总统退，众人又齐向总统一鞠躬。这一天，袁氏批准教育部所拟提倡忠、孝、节、义施行办法，并将《论语》、《孟子》定为小学教材。

袁氏正当用人之际，以严修之人望，闲而不用于心不甘。趁严修在京，他再一次授意管家袁仲仁探严修真意。于是，仲仁以老友身份来看望严修。

仲仁言，袁氏在河南辉县有山一段，长十余里，阔约七里，有老松八十余株，有橡、柿等树，有地二顷余，售价九百两，问严修可有意购留否？严修当即出价千元，以示此生无意政治，仲仁知几而去。

袁氏欲在河南辉县苏门建大学，请严修考察，张伯苓陪同前往。先至彰德，一行人就住在袁氏养寿园里。

严修于庚戌正月初莅此园，壬子再临，如今三至矣，园中花木

每盛其昔。次日，宿于辉县西关外大街袁氏老宅。

早，步行至苏门山，经梅溪村，过马家桥，便望见隐于山腰的吕祖阁飞檐闪金，及近有水光粼粼，为百泉汇流之处。浮藻纵横，鱼游其间。进苏门山，拾级而上，有振衣亭、孔子庙，至山顶，右看有一安乐窝，蔽庐三楹，土垣环之；左看有一饿夫墓，为明末彭了凡埋幽之所。山下旧宫已瓦砾一片，地约十五六亩，不够建一所大学。

严修惜之，归来，大学之议，已萌生于胸，遂与张伯苓等由津浦路南下考察。至浦口，侄婿金邦正来迎，转江新轮往安庆。

途中遇"乞儿船"，男掌舵，妇孺则高呼求赏，并举起长竹篙，将系有网兜一头伸到轮船船舷边，等待施者投钱物。至安庆，住近圣街金邦正宅。访故友，叙话，得知皖省教育每况愈下。

自倪嗣冲来皖，惟以扩军为己任，遂以筹办团防为借口，饬令各学校停学一学期，挪办学款扩军。严修闻之惊叹："学务因之不能复振，款已动不可回，学生已散不可聚矣。"并愤而斥之曰："武人之谋国，其谬如此！"然而袁氏也是行武出身，此语一出，可谓物伤其类。

路过浙江，浙江将军朱瑞、巡按使屈映光来访。晚，赴宴。

据屈巡按介绍：浙江省行政费用开支后所谓平余者，共分十份，教育得其四，警察得其三，公益得其二，剩余一份造林，仅造林一项费具百万以上。造林办法注重实施：每县至少三处，每处至少五十亩，在官者官经理之，在民者劝民经理之；民不能自理，则官代理之，而平分所得之利。严修以为，屈君注重实业，可谓知本。若以此一省气象，推扩全国，中国兴旺指日可待。

随后，参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子渊陪同。观后，叹曰：大抵江浙之学生，气宇之清，精神之足，非北省所及，而书画秀润，尤其特长。

车抵上海，登大和船转赴南通。大和船特等舱每人价十五角，次十二角五分，其次十角，最次五角。揭贴明示，广而告之，无公司任意增减之弊。船泊南通，由张謇陪同，参观博物苑：苑内楼、池、亭、阜，互为扶衬，各得其宜；其内则有动物、植物、历史、美术诸多收藏；有测候仪，有自来水柜等。以严修法眼鉴之，苑中古物，至可

宝贵，美苑藏宝，名副其实。

参观师范学校。有学生200人，分6班，经费每年约3万元。皆“啬翁”于实业所得余利中支付，不仰给于官府，亦不仰给于地方。凡南通各项教育、慈善、实业皆如此。严修叹服，以为“此其所以不可及也”。“啬翁”乃张謇之名号，“啬”于己，而裕于民也。

又参观附属小学、农学校、试验场、养蚕所、医学校、医院、图书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养老院，该院乃“啬翁”以60寿辰时同仁馈赠之资捐建，有男女老人120人，均在60岁以上，各有与之年龄相应的手工业。严修感张謇之所为，捐资五百金。

张謇致函，谢曰：前辱惠临，诸承教益，下走受赐多矣。复蒙慨赠养老院五百金，以菩萨慈信，发罗汉宏愿。老老及于东海，善善既于南州。敢不拜受，以彰大惠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

严修一行返沪，赴无锡，参观竞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为著名教育家侯鸿鉴。侯独立捐资办学十几年，不敢稍有松懈。其捐资来源为他任省视学的薪水1200元，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兼职薪俸800元，书法作文的润笔费及版权税数百元或千元不等。以上各项收入悉数捐给学校，加学费收入1600元、省补助费1200元，尚亏2000元之多。严修赞曰：“可谓急公兴学有毅力者矣。”

严修还参观了荣氏家族设在无锡的九丰面粉公司和乾甡丝厂。荣德生对实业与教育所持的看法，与严修一致，他说：“实业之战必以人材为始基也”，“而人材之造就，端赖学校之培育，故兴学实为建设之本”。为此，荣氏先后开设了八所小学，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

归来途中，与张伯苓等由南京返津，路过济南，山东巡按使蔡儒楷乘肩舆来迎接。泛舟于济南泉城，珍珠泉、金线泉，数处泉涡齐涌，荡漾灿烂，金光耀眼；趵突泉，泉涌呈漩涡形奔突不已，水声饱满欢快；大明湖更是风过水面，送宜人之爽。

随后，参观英人怀牧师等所设广智院。该院占地80亩，所设图书标本齐备，且多为中国工人仿制而成，工艺精湛。其种类如天文、地理，如各国风俗，如卫生体育，如动植物，皆清爽豁目。

门墙四围无不挂图，赫然令人注目者，有山东黄河大桥之模

型，山东治河之办法，有树之山与无树之山蓄水难易之比较，模范树之配置，皆足以启发神智，促进文明。又有各国贸易输入输出数之比较，识字人多寡之比较，电路多少之比较，矿产多少之比较诸图。严修观后，感慨不已，以为此"尤我国人所当知也"。

返回天津，于居宅对门，盖平房8间，设南开贫民义塾。

又为南开中学学生拟作文竞赛题为《诚能格物论》，亲自阅卷选拔。周恩来考全校第一，其所在班丁二班为班级第一。严修亲题"含英咀华"四字，作为丁二班在全校举行的国文比赛中荣获第一名的奖状。对于周恩来，严修格外赏识，观其貌，阅其文，赞曰：此人有宰相才。

(3)《二十一条》：日胯之下的国运

某日读报，发现袁氏任命中卿以下数十人，其中又有自己的名字。他立即写信给徐世昌，商议是否写辞呈，或如去年，不辞不就，颇费踌躇。徐深知其自处闲云之意，便回信给他，主张"仍循不辞不就之故套"，不必形诸笔牍，惹人不快。严修也因袁氏潜伏其意，不好说破，便静观待变。

严修一推再推，一辞再辞，时人疑其涉遗老之嫌，他自辩之曰：夫遗老何谓乎？眷恋故主，腹诽新朝，自首阳蕨薇，以至顾宁人，黄太冲之属皆是也。而今之世，因与易姓受命者不同也。他说自己之去位乃在宣统纪元之岁，而非共和宣布之年也，固不能于二年以前即逆知有革命之事也。

或曰对总统感情冷淡，严修辩解之：受总统之知遇，虽已十年有余，爱戴之诚，尤莫如共和宣布之后。私以为世之真知大总统，真信大总统者，虽不敢谓惟某一人，而某必居最优等。诚以为世无其人，则神州四万万人早不知身列何籍，命归何所？如此之辩解，可谓感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于袁氏的野心，他并非视而不见，却总是加以最善意的理解，甚至不惜用历史的必然性来做注脚。

日本人从袁氏的野心里，找到了入侵的缝隙。驻华公使日置益单刀直入，至怀仁堂直面袁氏，当场递交"二十一条"，还要求袁氏严加保密。袁氏措手不及，不啻当头一棒。

就在两天前，他还命外交部照会日使，中国有单独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之权，希望日本顾全国际信义，保全东亚和平。日本不但不理会，反而提出“二十一条”。

袁氏警觉道：依外交惯例，贵国文书应直接呈送外交部，凡外交部事务，本人不能干涉。自料理朝鲜事务以来，袁对日本人了解颇深，警惕有加。他寸步不让，不接受呈文。可狡猾的日置益将文书放在袁的办公桌上，转身告辞了。

袁氏匆匆一览，不禁额生冷津，脚透凉气。我们不妨再看看日本人的野心：要求承认德国人在山东的利益由日本人继承，要求在南满东蒙享有优越地位，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福建沿岸港湾和岛屿不得租于他国，中国政府聘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中日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同用一种之军械，聘用日本人为主要城市警察之教官，中国小学聘日本教员，日本僧人可在内地传教。

欧战使欧美无暇顾及中国，日本人乘机想把中国东北满蒙、山东沿海、东南沿海甚至长江流域作为囊中私物来探取；把袁世凯作为傀儡来整治。袁氏深知日本人的用心。当年在朝鲜问题上，袁的强硬立场使日本人恨之入骨，甚至决定暗杀他，亏他多加防范和唐绍仪星夜驰护，方得安全归国。如今日本人逼他卖国，日使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二十一条”。

孙宝琦主持外交、交通两部部长联席会议讨论“二十一条”。孙认为：来者不善。日本居然不顾外交礼序，直接敲诈中国元首，这轻蔑的背后，必继以武力，而欧战方酣，列强无法顾及，所以只有接受条件。外交次长曹汝霖随声附和。总统府顾问官陆徵祥、交通部长梁士诒表示反对：不谈判就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可谓史无前例。袁表示支持谈判，正式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开始与日本讨价还价以拖延时间。

严修日记曰：“闻日本要约条件，今日在外交部开议。”即指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使日置益举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首次会议。日外相加藤高明警告驻日公使陆宗舆，日方所提要求，绝无让步余地，并盼中国当局与日本具结。英国记者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将“二十一条”原件发出，首先中国留日

学生3000余人在日本东京集会，反对“二十一条”。

驻日公使陆宗舆会晤日外相，谓中国愿就第一至第四号进行商谈，惟第五号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谈判。同时中国驻美公使将“二十一条”全文通知美国国务院。其实日本已工作在先，早已将“二十一条”一至四号通知美国，并保证不触犯美国在华利益；得到美国的谅解后，又向英国投以利益互保的“媚眼”，英遂回媚；只要日本尊重英国在华既得利益及中国独立，英国即保持中立。

关于“二十一条”的马拉松谈判，使日本终于恼羞成怒。日置益威胁曹汝霖再拖延下去，即以武力相加。中国开始退让，在中日第八次会议上，中国对安奉南满铁路、满蒙杂居等问题做出重大让步。而日本则以换防名义，向东北及山东增兵。

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揭露中日谈判真相，号召党员讨袁。上海各界在张园开会，议决排斥日货，储金救国；并电袁氏要求终止谈判。汉阳发生排日风潮，汉口日本三菱支店被焚掠。

此时严修正参观杭州九成织绸厂，该厂为表弟严渔三创办。专织纱缎，与日本竞争。机四十五张，资本五万元。每人每日可织五尺，每织一尺付工钱一角二分，毛利可得二分，开销占一分，实利可得一分上下。严修鼓励表弟以实业与日本竞争。

而袁氏则会见美国大使，希望美国出面调停。同时申令民间禁止排斥日货，敦睦中日友好。又命外交部不允将东蒙与南满相提并论，会谈停顿。日本向中国提出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修正案，严修日记曰：“日人递最后通牒于我。”袁氏接受，只是提出第五项各条，允以后再行协商，继续拖延。

英使朱尔典会晤外交总长陆徵祥，劝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朱云：目前中国局势至危，各国无暇东顾，只有忍辱负重，接受条件，万不可轻启衅端。从此卧薪尝胆，埋头修整备战十年，或可有望抬头与日本再见。听说陆军总长段祺瑞已备战几个星期了，我不愿见贵国再遭惨运，袁大总统必明白此大势，希望贵总长力排众议，辅佑总统，以支大局。

朱尔典的态度，令袁氏彻底失望，他表示：看来只有接受日本的要求了，不过我将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陆徵祥《我经手

签订的二十一条》，台湾《春秋杂志》卷一。紧急国务会议上，段祺瑞则主张坚决抵抗，但无济于事。最后决定由陆徵祥签字。陆无可奈何说：我签字，就等于签了我的死刑。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除第五号中五项内容"以后再行协商"外，第一、二、三、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即行应诺。

因北洋政府正式承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遂遍及全国。

(4)断袍绝交：严修护国失败

老子奸雄儿亦盗，父子窃国各有谋。

当袁氏老子被"二十一条"纠缠不清时，袁氏长子袁克定却仍在为国体变更四处活动，奔走不休。

年初，严修约梁启超与张伯苓相聚于醒春居。梁此番匆匆来津，与严修等相聚是有缘由的。前些天他曾受袁氏父子之约，于京郊汤山会面，并有杨度作陪。在探讨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国情之后，袁克定迫不及待向梁启超征求变更国体的意见。突兀的提问，使梁启超不知所措。吞吐道：我平生之研究政体而很少涉猎国体，不过值此内忧外患之际，贸然变更国体，恐非易事。

第二天，梁便携一家老小前往天津租界，自己则借故去了广州。而袁克定也从梁启超的闪烁其辞中，放弃了利用除国民党外的第二大党——进步党的希望，转而向"梁财神"——梁士诒和他的交通系下手。

袁克定的手段十分简单，送走梁启超后，仍在汤山接见梁士诒。与对待梁启超的拐弯抹角的办法不同，他开门见山，直问梁士诒是否肯协助他改行帝制，报酬是帮他缓解交通系的"五路大参案"的危机。所谓"五路大参案"，即本年6月间连续发生的"三次长参案"、"交通系参案"以及京绥、京汉、津浦等五铁路局长同时受弹劾。此案波及交通系，梁本人亦受牵连。

事关交通系的存亡，梁士诒当然不敢异议。当即在寓内召开交通系会议，声明：赞成帝制则不要脸，反对则不要头，何去何从？全体表决后，一边倒向袁克定。

袁克定大喜过望，有了财神的支持，立即着手第二步谋划。当

袁世凯授意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其政治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在袁克定的授意下著《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君主政体优于民主政体。古德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兼法学博士，本年来京，由袁克定接待。也许基于共同的认识和政治立场，两人私交甚笃。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让洋人来念帝王经，正中袁氏下怀，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

袁克定不失时机敦促古德诺将关于中国国体的观点发表出来。《共和君主论》不足5000字，该文在《亚细亚报》上一发表，中国哗然。虽然古德诺一再声明，并没有煽动中国人变更国体之意，但这篇文章确实成为复辟帝制的先声。

严修预感袁氏将变更国体，立即筹划进言书。

与此同时，杨度在北京发起组织筹安会，盛称袁克定是当代秦王李世民，而他就是房玄龄、杜如晦了。袁氏父子也确实看中他，不仅授予他勋四位，而且还赠匾额一副，上题"旷代逸才"。

筹安会宣言以议决君主民主，何种政体更适合中国国情，而"筹一国之治安"。又，通电各省长官，请速派代表入京议决国体。杨度还公开发表《君宪救国论》，鼓吹：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行君主。

帝制进程由此而公开化；袁氏亦由过去严禁帝制言论转而为表示理解了：这些言论，耳闻早熟，以我所居地位，只知有民主政体，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恋，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的人，作何主张，我并无嫌疑可虑，我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成族，人人都要谋求个永保安全之法，这也是人情所应有的。

北洋实力派人物江苏将军冯国璋偕参政梁启超入京谒见。

袁氏对二人来意洞若观火：二人必是来谏我袁某不可做皇帝的。我问二位，你们看我是要做一代皇帝就绝种吗？冯、梁二人愕然不知所答。袁氏喋喋不休：任公，你最善观人，鄙有犬子二十，都叫出来你看看，有谁能继我为帝，不败我家业，不累我祖坟者？若有，我一定称帝，还可延至二代。

冯、梁四目相对，怀中早已准备好的反帝万言书拿不出来。

袁又转向冯：华甫，我今天的权力，即使皇帝也未必及此。我大

儿克定是个瘸子，二儿克文志在名士，三儿克良绝难当事，其余诸儿皆幼稚，天下之重何以托付？自古皇帝世袭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我又何苦将祸患加诸他们头上呢？

冯仍不放心：届时天与人归，恐怕大总统虽欲逊位，也不可能了。袁不依不饶：华甫，听这话，你还是在打我的注意。我四儿克端、五儿克金在英国读书，我已命他们在英国购得少许田产，要日后有此相逼，必漂泊外邦以终老。袁氏所言，如出肺腑，冯为之感动，梁半信半疑。

严修经过数日准备，进言书斟就，急函总统秘书张一麐，托其向袁氏进言：

> 公于变更国体一事，颇有诤言，爱国者不当如是耶？弟于八日进谒一次，略陈鄙见，极峰似持冷静态度，以为此特学理上之研究耳。一月以来，都下热中之士，并日进行，不惜以私立团体，少数心理，代表全国。反对之论，报纸摈而不登，赞成之说，闻亦不无润色。名为研究，实执行耳。弟不知极峰之宗旨毕竟如何，将欲进谒，而际兹纷纭之秋，雅不欲入都门一步。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且国之亡不亡，视乎政治之进退，宪法之良否，人才之消长。今之议者，欲以无信立国，以无耻导人，金钱诱其前，斧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悉为诳语。如此而欲有良好宪法之产生，清白人才之出现，此必不可得之数矣。以我大总统之明哲，断不能不虑及此。特以夙受总统恩遇之隆，罔有伦比，爱之诚不觉忱之切，敢求乘间为我言之。词不宣意，当待垂察。《信草》

仲仁回复，言回天无术，欲使袁纳言，难矣！

严修决定立即进京，亲自谏阻。家人惶骇，恐有不测。严修坦然，云："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生死无惧矣！

"只身晋京，住北海，晚饭后，一灯独对，万籁俱寂，远寺钟声，

悠然入听，忽不禁百感集也”。袁氏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如复辟帝制，彼将避往异域，绝不背弃誓言。

严修见袁氏，果然话不投机：“余论筹安会，总统意不谓然。”

袁氏对帝制示以模棱两可态度，而严修则旗帜鲜明：若行帝制，则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为之则各派人士，相率解体矣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

袁氏根本听不进去，暗示严修退隐。据《蟫香馆别记》载：公以故人谊，力阻项城洪宪称帝，袁不听，并改公所居曰“先生乡”，意犹光武之于严子陵也。严修亦不妥协，遂断袍绝交，挥手而去，与袁不复通问。

告别袁氏，严修先去看望了他的学生克金、克桓、克齐，嘱别之语自不待言。然后又去看望相兄徐世昌，徐“以所拓自制砚铭”赠严修，无言亦无奈。严修惆怅，北京酷热，智崇儿来，为父亲准备好马车。严修开始一一拜别北京诸友，自旷生、芸生、筑笙、金子诚、筱庄等依次下来，然后返津。

由惆怅而悲怆，严修以传统士人气节捍卫自由民主尊严。

梁启超终于发言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斯文一出，各报转载，世人竞相传诵。严修读之，颇为感动。

袁氏一意孤行，“筹安会”正式成立，以研讨“共和政治得失”为名，行复辟帝制之实。筹安会通电各省，谓我国拨乱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并请各省将军巡按使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

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正式发出帝制信号。

袁的亲信段芝贵、梁士诒等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帝制沸沸扬扬。他们密电各省将军、巡抚使，以各省公民名义上改变国体请愿书，十九省将军闻风而动，纷纷呈请总统舍民主而改君主。

但袁氏还是心有余悸，严修苦言相劝尚在耳际盘桓，他还要投石问路。于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至参政院，声明改革国体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议。并表示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孔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骤行改变，不合时宜耳！然而峰回路转，又云：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

征求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

大公子袁克定对老爷子的“不合时宜”的试探性宣言极为不满。当杨度急急忙忙赶到汤山向他汇报是严修作怪时，他气急败坏，迁怒严修。“皇大储君”的金印早都刻出来了，怎能让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头给搅和了。严修得知后，却气沉志定，无论袁氏如何一次又一次具书邀其入京，他就是不来。

严修不来，袁克定放心了。至少老爷子身边少了一位能够“耳谏”之人。此时连他的兄弟们也不敢多嘴。为敦促老爷子快下决心，他居然放出极臭的“胜负手”。

北京有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于 1901 年创办的汉文报纸。基本反映日本对华立场，“二十一条”以后，成为袁氏每天必读的报纸。袁克定纠集一班文人，每天编制一份假版《顺天时报》，按时送给袁世凯。袁家其他儿子虽知此事，或因不关心政治，或惧大哥威慑，都装作没看见。袁氏做梦也没有想到，从 8、9 月间开始，他看的《顺天时报》都是假的。

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袁批令内务部关于君主民主的议论应具有界说，明定范围，以示限制。于是政事堂知照内务部，筹安会只限于国体讨论，不得涉及其他。

而袁克定的帝制步伐，也由“国民公议”进入“国民公意”阶段。

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梁士诒，民意代表有人力车夫、乞丐等。随后陆军总长王士珍、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等呈请袁氏，谓中央及各省军界一致拥护君主立宪；朱家宝等各省巡抚联名电请改变国体；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及各地警察厅长联名电请改行君主立宪。参政院将第一次、第二次请愿人数汇总送总统秘书处，共 83 件，3530 人签名。并发表变更国体请愿书目录，以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日本首相大隈也公开发表谈话，声称以今日中国民情，实未达到共和的程度，国体还以君主立宪为宜，袁氏为中国皇帝当之无愧，日本愿助一臂之力。英使朱尔典会晤袁氏，谓英国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表示欢迎：中国现时政府，一人之政，仅系于大总统一身。现行之共和，即非共和，亦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此种特别政体，

断难永远持久。若早日议决正当君主立宪政体，则与中国人民思想习惯相符。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欢迎。

然而袁氏却搔首弄姿，惺惺作态：我曾发誓维持共和，如今一变君宪，岂不出尔反尔？朱极力劝进：国民议决共和，选举你为大总统，当然发誓维持共和，倘国民议决君主立宪，再举你为皇帝，发誓维持君宪，不仍然是顺从民意吗？袁仍谦谦：即使改君主立宪，也须另选皇帝才行啊！朱表示别无选择：再选满人为皇帝，除大总统外，各国必不承认。

袁似乎被说服了：唉，当时提倡共和，不知共和为何物，如今不知君宪为何物，又要改立君宪。不过，这个问题仍得移归各省议决，方合正轨，若有人决于武力，余必以武力制之张维翰《民初文献一束·袁世凯与朱尔典讨论君主立宪之笔录》。

袁氏深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他要等，等"民意"推他做皇帝。他立即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欲行"国体投票"，制造所谓"民意"。又申令遵照约法，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并命京外文武官吏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

奉袁氏之命，朱启钤、周自齐密电各省长官：

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需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并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对初选之当选人需用种种方法，示以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总以必达目的为止；国民代表大会为决定国体请愿事件而设，不能不密筹操纵之方。并一再告诫，往来协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务派亲信严密保管。

朱、周再次密电各省长官，国民推戴书中须有"谨以国民大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字样，万勿丝毫更改为要。

徐世昌以患头晕症引疾辞职，袁准假一月，命陆徵祥暂时代理国务卿。袁又命外交部密告各国公使，不料，各国公使同至外交部劝阻袁氏。袁拒绝劝告，表示国体依民意决定，各省均能确保治安。朱、周密电各省：日、英、俄劝告乃干涉内政，改建帝制绝无缓办之理，请速推戴，以示决心。

帝制犹在弦之箭，不能不发，可发出的后果，已不堪设想。

大典筹备处在天安门内成立，严修从三河赴北京访张一麐。为行帝制方便，袁氏特任张为教育总长，让他暂时离开总统府。回到住所，客人济济一堂，希望与严修谈谈，严修却率大家去看南开在京上演的新剧。接着，他又拜访了袁氏管家袁仲仁及其他在袁幕工作的老友。

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通电宣布各省决定国体投票结果："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准备得轰轰烈烈的"国体投票"，却如此简单地结束了，多少有些令人扫兴。

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全体劝进上推戴书，袁氏退复推戴书，参政院再上推戴书，乞速正位登基。几个回合下来，袁氏终于接受了。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同时通知各省，将有关改革国体电文一律烧毁！因为函电中"不免有出于法律之外"的东西，"倘为外人所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称流传遂留开国缺点"黄毅《袁氏盗国记》上。

次日，袁氏于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申令改变国体，乃"出于民意"，若有"好乱"之徒生事，严惩不贷！又令参政院荐通达之士起草君宪宪法，并指示各部院筹备改行帝制事宜。为笼络人心，袁氏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不受。

将军拔剑，蔡锷在云南起义！梁启超潜赴上海，参加倒袁运动。为护国，严修致函梁启超，对其好赌甚为忧虑与惋惜，劝其戒赌，语重心长。他说，北京是一大赌场，元勋、伟人中之赌魁，不可一一胜数。这些人，即庄子所谓心死，或孔子所谓无所不至者。为再造共和计，严修直言不讳：若先生则独清独醒之人也。《大中华》第八期所载之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比于朝阳鸿凤，泰西之人，交相赞颂，至谓为中国第一人文字，非过誉也。

侧闻先生有樗蒲打麻将赌博之好，修窃以为不可。吾国人崇拜先生者众矣。言而以为仿，行而以为表，所系甚钜也。十年来，赌之流毒遍中国，明令不能禁，法语不能改。知文章志节如先生者，亦复为之，后生小子将何惮而不为耶？先生即不暇救国，宁不当修已；先生即不能改革政治，宁不欲变易风俗；先生即不欲造就国民，宁不

肯防闲子弟？岂有智如先生而不能自察，勇如先生而不能自克之理耶？

梁与蔡锷，师生也，一枝笔，一柄剑，掀天揭地，救国护国，他呵护有加，爱之深，故责之切也；眼看袁氏自取灭亡，自己却无能为力，他痛心疾首，爱之深，故决裂矣。

于式枚师逝世，严修往悼之。癸未春，严修赴京应会试，于师时任襄校，评阅严修文章，有评语："俯仰揖让，欧阳子之文也。"因取严修文为第一。直到二十五六年以后，严修与同僚闲语，才知评语出自于师之手。逢辛亥国变，于师遗恨出京，诀别严修，书末自署"未亡人"，凄寂清然，此亦一师生也。

严修书两联以吊挽恩师，两代伤心人，皆别有其怀抱。

其一：

文学大类元裕之，一事胜古人，东方寄，西方巂，行九万里者再；

志节尤肖陶徵士，两贤同命运，丑年生，卯年殁，寿六十三而终。

其二：

刮目赏吾文，十字荣褒，知己感遇门下士；

洁身见公志，一函诀别，题名惨署未亡人。

55岁生日，严修讽诗自贺：五十五年两万日，蹉跎不进奈余何？此生莫信无功过，但坐无功过已多。护国无功，以此自责耶？

3. 共和涅槃之一：家与国的轮回

(1)西南共和之剑

1916年，严修57岁。

1月1日，袁氏登基，改元洪宪，总统府改称新华宫。

同日，中华民国护国军云南军政府成立，发表讨袁檄文。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兵分三路，从四川、贵州、两广向北进军。

袁氏始料未及，各国公使团拒收加盖“洪宪元年”和皇帝印玺的公文，只好下令：对外仍称民国，对内则书“洪宪”，暂时不加“帝国”字样。好不尴尬！

袁氏仍不死心，对信誓旦旦的日本政府，他还抱有希望。于是，派周自齐为特使出使日本。此前日本是惟一通过官方途径向袁氏称帝表示支持的国家，然而，彼一时此一时也，就在周自齐还未抵达日本时，日本政府就发出拒绝入境的照会。理由是：中国帝制妨碍了东亚的和平，如果接受特使，就等于承认帝制。袁氏自取其辱，周也自认倒霉。帝制变成了刍狗。

严修仍按民国惯例祝贺新岁，并接到老友赵幼梅、范旭东、张一麐、袁仲仁以及学生袁克权等人贺年片。

帝制开业没几天，新华宫就发现一枚炸弹，主谋竟是本家袁乃宽的儿子袁英时任京师警察厅督察长，号称十三太保之一，同时被捕的还有内史沈祖宪、内尉瞿克明等。

随后，袁氏弟、妹联名在京津登报，声明与袁脱离关系。二公子袁克文著诗暗谏其父：“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最令袁氏揪心撕肺的是，袁军开始失利，并时有倒戈发生；日本内阁出尔反尔，警告袁氏延缓帝制，公然声称要以武力干涉。迫于内外压力，袁氏申令缓正大位。

梁启超乘船离沪，绕香港，经越南，抵达广西南宁。广西将军陆荣廷在得到袁氏提供的 100 万元军费和 5000 条枪后，与梁启超等联名通电，请袁氏即日辞职。陆被推为广西都督，梁启超佐之，宣布广西独立。

日本内阁议决，为促袁氏下台，默许日本民间资助南军。岑春煊、张耀曾代表云南军政府与日本人竹内维彦签约，借日币 100 万元，作为反袁经费。

徐世昌也致函袁氏，劝其撤消帝制：“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直隶按察使朱家宝转来冯国璋、张勋、李纯、靳云鹏、朱瑞五将军联合各省请速取消帝制之密电，看来北洋军人并不像杨度所说的那样，为子孙富贵会积极拥护帝制。

筹安会还在酝酿之时，段祺瑞便辞了陆军总长一职，跑到西山

做寓公。冯国璋一开始就对袁氏不满。鞍前马后扶袁氏做了元首后，风闻帝制流传，又与梁启超赴京询问，居然得不到一句真话。袁氏帝制，传子不传贤。冯国璋根本没把袁克定放在眼里，指斥其像曹丕。因此，冯国璋早已倾向南方。至于吴佩孚、曹锟等对段、冯的态度更是心知肚明，于是按兵不动，以观后变。前线的情形，越来越令袁氏沮丧。于是，他召见梁士诒，商议取消帝制。

3月20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袁克定捶胸顿足，苦苦哀求：陛下，自筹安会至今七月，呕如此心血脑力，耗如此生命金钱，千回百折，始达成帝制，如今南面一独立，便自行撤消，前功尽弃，谁能保他们不会得寸进尺再要求陛下取消总统，为臣之计……还没等说完，袁已怒不可遏。他把两份同日但内容不同的《顺天时报》摔在这个误己误国的不孝子面前，袁克定登时面若死灰，原来真的《顺天时报》是宫里一小丫头在外买蚕豆时包蚕豆包回来的。

智崇从北京回来，父子二人谈至深夜，听说"明日有取消帝制之发表"。果然，袁氏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发还各省推戴书，停止所有筹备事宜。到此为止，袁氏像小孩玩过家家一样，做了83天的闭门皇帝，既未行称帝大典，亦未发一道"圣旨"，帝制之饼尚未画圆，便匆匆忙忙结束了。严修阅报，"知昨日宣布取消帝制之命令"。张一麐来访，曰：总统亦不必自责，都为小人蒙蔽。儿子尚且骗他，小人当然翻云覆雨。

四川将军陈宧，这位曾经跪着哭求袁氏早正大位的陈二庵陈宧字致电蔡锷，赞成讨袁，而且一不做二不休，致电袁氏宣布独立，劝其退位，并与他断绝关系。袁氏握电报的手在颤抖：二庵厚爱我如此，夫复何言？他决定退位，焚毁帝制文书840件。又急电蔡锷，请罢兵息民。

仿效陈宧，各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袁氏众叛亲离，大势已去。

(2)袁氏之死与严修善后

严修早六点钟起床，外面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他乘上马车载上老友言仲远赴天津车站，乘火车前往北京，至前门站时已近中午十一点了。智崇接站引至北海，袁氏昆弟五人及其族人等俱在此

恭迎。严修决定不畏人言，捐弃前嫌，赴北海会晤袁氏父子。

次日，往中南海见袁氏，绝后重聚。随后，又往延庆楼与袁克定会晤。两人因帝制而反目，如今尽释前嫌。以严修为人，不外乎多安慰而少指责；略以往而重前瞻。因此，严修再尽朋友之道，劝袁氏为国家计、为个人名利计，应辞去总统一职，发表宣言，以谢天下。他一向认为袁氏不宜于做总统，不如就此顺水推舟，交了总统的差，向国人表明自己没有个人野心。

但袁氏仍抱有幻想，以为取消帝制，他还能继续做总统。他的老部下冯国璋通电宣布调停时局办法八条，以袁氏仍居总统之位为头条。因此，他再一次拒绝了严修的忠告，一意孤行，将大错铸成到底。

不出严修所料，就在他力劝袁氏引退的同时，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也电复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力主袁氏引退，以熄战火。滇、桂、黔、粤四省都督发表通电宣布袁世凯已丧失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护国军为谋统一指挥，设两广都司令部于肇庆，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开府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处死袁派驻粤省之亲信蔡乃煌，从速实行北伐。

袁氏宣布恢复责任内阁制，还想着大总统做不成，做个小总统也行。然而，袁氏大势已去，已无讨价还价的本钱，他越是贪栈恋位，就越被人看不起，连他的老部下也觉得他不识时务，丢人现眼。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发表宣言拥黎为总统。

徐世昌旋应对策，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取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及总理名称。这些措施根本救不了遍及全国的战火。

袁氏密电冯国璋等尽力挽回局面，冯致电段祺瑞、徐世昌，劝袁氏"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做一作壁上观姿态，令袁彻底绝望。

袁氏一再延赖，实是自取其辱。还有一个要复辟帝制的人，不过他要复辟的是满清，而非袁氏。他的复辟主张，刚一浮出水面，立即遭到迎头痛击。这个人就是康有为，他发表《中国今后筹安定策》，倡议复辟，他当年的弟子梁启超立即起而反驳，发表《辟复辟论》，檄文如刀，将老师一"劈"了之。

孙中山在沪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蔡锷提出袁立即退位、黎元洪继任解决时局的四项议案。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主张袁世凯退位。陕西、四川、东北先后宣布与袁世凯划清界限，脱离关系。护国军通电，袁不退位，绝无调停可言，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军北伐。

而袁此时已病入膏肓。他召集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口述遗嘱：总统应该是黎宋卿。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6月6日，袁氏在中南海居仁堂病亡。

严修于是日日记云："晚传闻袁总统薨逝，余谓必无其事。又接智怡电话，智怡亲从公署见国务通令，更确实矣。十一钟邓子安自京来电，言京师平静，袁总统实于本日十钟一刻去世。"

按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

严修赴京吊殓袁氏，上午"十一钟抵京，哭项城于居仁堂，犹未殓也。公子十二人（十三至十七，太幼，未与）环跪号泣，惨不忍睹"。

对今后的政治，他已不再抱有期望，惟求不再有烽烟突起。他以为"项城此去，可谓大解脱。黄陂黎元洪继位，南方固表同情，外人亦无异议，但求不另生枝节，或可免于战祸"。

北京政府公祭袁世凯，由段祺瑞主祭。

黎元洪继任总统，电召严修面商国是。严修电复黎元洪，称"里居已久，与政治情形一切隔膜，实无以仰赞高深"。

袁世凯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送灵专车由前门车站出发远赴河南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太平庄。严修与徐世昌、言仲远等由北京赴河南彰德，往袁宅吊祭。

送袁氏灵柩下葬，观灵柩入穴，严修与徐世昌等行三鞠躬礼。一代枭雄叱咤风云，如今悄然入土。惟二三知己，风尘仆仆，吊祭故人。曾经趋炎附势之徒早已改换门庭，散作他客。而严修依然故我，避其炙手可热之时，趋其门庭冷落之际。

严修挂念袁氏弟子，致信袁克权，言自己失一友则"居常惘惘，如堕云雾"，但每念袁家事，则"尤刻不能忘"，来日方长，不知其兄弟何以打算？袁氏兄弟袁克权、袁克齐来津，与严修相会于小白楼袁宅。又与智崇商量接济袁克定款项以及为他安排工作一事。

袁氏死后，并无多少家产留给子孙，然而他给子孙留下了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无比的财富。人生在世，得此一友足矣！袁氏九泉有知，可以安息了。

(3)从塞外到江南：严修伤感之旅

严修由张伯苓陪同游八达岭，在南口遇一美洲人，言其幼时曾听父云，世间名胜有二，一是英国伦敦桥，另一便是中国万里长城。严修听后，触景生情，即兴赋诗一首：

雄关万里捍天骄，仅抵英京建一桥。
不是祖龙曾好事，更无名迹属中朝。

又乘肩舆游明十三陵，仅游三陵，便夕阳西下，有诗三首：

天寿诸峰接太行，一身吉壤盛铺张。
长陵若与长城比，未免文皇胜始皇。

祖训煌煌侈靡惩，盛朝家法谨相承。
焉知一百馀年后，更有金楹起后陵。

思陵宫殿昼沉沉，塞径蓬蒿一尺深。
读遍昌平山水记，亭林此地最伤心。

文皇能胜始皇么？中国帝王何其每况愈下耶?！清高宗至泰陵而思勤俭，然其生前挥金如土，死后金楹裹尸，又何其言不由衷耶?！国破家亡，顾氏云游至此，亡帝陵前，见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凭之，吊之，古今伤心人又何其相似耶?！

抵张家口，游塞外赐儿山。赐儿山，因奶奶庙而得名，每年庙会时，迷信妇女由此庙抱泥娃娃，谓可以生子，故名赐儿山。不过该山亦因有两洞而远近闻名，两洞相隔仅数尺，一洞为水，一洞为冰，常年如此，故名水洞和冰洞。

北行，经繁盛街市，出大镜门，到达元宝山，为蒙汉交易之地。此处设有警署、洋行、俄国邮局等，招牌多蒙汉文合璧。

严修特意参观张家口电话局，司机二人，接线机二百多号，现用户百九十余。用日本式机者，每月五元；用西洋式机者六元，有案

上者七元。该局去年得利约每股一分四厘。创始人沈虎臣，集股二万二千元，自为经理，月薪五十元；郭靳为司事，月薪约三十元。每月局费不过三百元。

经张家口，抵宣化，住宣化中学校内观学。

返津后，又与王少泉乘津浦火车南游，先抵济南，次至泰安，乘山轿登泰山。山轿用粗麻绳编成网兜形，铺之以棉毡毯。人委身其中，安适异常。

由秦始皇当年封禅之路，一步一步往上爬，上天梯，登十八盘，攀南天门，过碧霞宫，阅泰山铭，晚宿玉皇顶，待翌日，观云海日出。

日出，叹为观止！与亡陵前、夕阳下迥异……

由泰安前往曲阜，游孔庙、周公庙、孔林、颜子庙、少昊陵、子思墓等。此时，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正上书参众两院，再次提出在宪法上应"明定孔教为国教"。严修尊孔学，而不言孔教，对于以孔子为教祖，以孔教为国教的尊孔活动，他素来持不闻不问态度。

离开曲阜，乘火车经南京、上海前往杭州。

游西湖，雇船每日二元；雇向导一人一元。游西湖饶有兴味，但向导之油滑却倒人胃口，"吾见西洋人之充向导者矣，周详恳至，步步追随，始终不懈。今此向导，有名无实，但多索一元之价耳"。

船到湖心，至壶春楼用午饭，酒菜价格一一细录之：白兰地三角，瓜子花生八分，干饭二分（众吃六角三分，船人三角二分），堂彩三角一分，醋鱼二角八分，蘑菇莼菜三角二分，栗羹三角八分，虾仁二角六分，炒面二角八分。总计三元三角一分，又给酒资四角。

西湖美景，一言难尽，何况伤心之人，心不在焉！严修顾左右而言他曰："各山乞丐甚多，与泰岱同。余谓行乞也，烧香也，赌钱也，同一心理也。心理为何？以小劳望大酬，以小费图大利也。"游西湖而言乞丐，可谓绝无仅有之文也，妙哉，伤心人之笔也！

观钱塘潮后，参观了杭州图书馆馆藏图书，有文渊阁书九十四橱，《图书集成》、《全唐文》、《粤匪纪略》十六橱，还有明版书等，总计藏书三十余万卷。又漫游市郊名胜，走马观花一路，即由沪返津。

此次出游共花费一百八十五元。智崇孝纳五十元，智怡孝纳三十元，严修自出九十元，差额十五元，由严修从严氏账房借款，随后

还清。

(4)黎、段府院之争与严修社会改良

袁氏已入土,在北京,段祺瑞成为左右时局的人物。参议院刚刚通过段为国务总理,手中握有兵权的段又能风云多久呢?唐继尧向黎元洪提出惩办帝制祸首13人。

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等以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宣布撤消护国军军务院。黎政府特授孙中山以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以勋一位,均为护国大英雄。

10月10日,民国国庆。国难之后,北京举行国庆大阅兵典礼。

严修与对门南开贫民义塾学生31人、教师2人,同往天津公署庆贺。然而共和国劫运已开,苦难还未到头。

军阀群龙无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副总统冯国璋信誓旦旦,致电国务院,表示誓尊国宪,永励共和精神。而孔教也要靠枪杆子撑腰,张勋等十三省区督军、省长电黎元洪,请"提议于国会,照旧定孔教为国教"。尊孔议员百余人,在京成立国教维持会,掀起国教请愿运动。孔学为帝王学,孔教为帝王教,尊孔者,欲复辟帝制也!

共和国祸起萧墙,总统府与国务院势不两立。府院之争的导火索是孙洪伊,国务总理段祺瑞面请黎元洪免内务总长孙洪伊职,被拒绝,但黎答应劝孙洪伊辞职。冯国璋闻讯,即函告黎元洪,应调停府院之争,勿更动孙洪伊职。智崇来电话,转告严修,黎总统希望严修赶赴辉县,劝菊老徐世昌来京助政,严修立谢不能。其时,交通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谷钟秀等,均面见黎元洪,表示不愿与孙洪伊同居内阁,这些人都是严修的朋友。

于是,黎元洪免孙洪伊内务总长,由次长谢远涵代理;免徐树铮国务院秘书长,由张国淦继任,府院之争暂告平息,黎与段各折一条手臂,打成平局。

黎与段皆为严修之友,严修不问政治,更不介入府院之争,却参加社会改良会。他写信给朋友,言其入会动机:该会于纳妾一事,亟呼痛诋,不遗馀力。弟因其宗旨与己同也,已入该会为会员。同时指出:夫礼也,严于女子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

凡有会党之事，严修无不退避三舍，此次竟主动参与，足见其对妇女问题之重视。他反对女子缠足，反对男子纳妾，积极倡导女学，也算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吧。

不久前，他将严氏女学一分为二，一为严氏高等女子小学，一为严氏女中。开学之际，他特设家宴，宴请严氏女学男女教习，男教习8人，女教习4人。自女学成立以来，修改女学学生国文作业，成了严修每晚的固定工作，有时他还代生病或有事的教员上国文课。女学扩建以后，他忙得更加不亦乐乎。他还热心于妇女医疗保健问题，与友人共同创办女医局，为女医局募款。

对于中国妇女传统美德，他也大力弘扬。为广征懿范，垂延母教，他出资重印《博野尹太夫人年谱》，亲自校订，奔波于商务印书馆。

其时，新文化运动才兴起，他不是运动的推动者，也不是赞助者，更不是运动中的风流人物，但他却与运动俱进。他特别强调汉语拼音在普及教育和社会改良中的作用，他说：当先使国人知拼音之利，可为汉字之辅助，中等以下之社会，得此足以通信札、阅书报。在这方面，他不是《新青年》式的风头十足的旗手，而更像一个埋头苦干的劳工。

据吴敬恒先生《三十五年之音符运动》一文说：第一位实行宣传官话字母的，是天津严修，他家里人人都练习得很熟。而汉语拼音，不仅为社会启蒙之利器，亦为新文化运动之原点。不久，《新青年》便刊登胡适致陈独秀书，论文学革命，需从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八事入手，而其根柢便在汉语拼音。

南开学校第九次毕业式，严修与熊希龄等出席，颁发文凭及奖状。为扩大南开学校，严修支持并赞助购买学校西南比邻土地60亩。徐世昌来南开学校参观，严修请他担任校董。至此，南开第一届董事会成立。张伯苓发表演讲，批评当局的教育政策，并谓教育事业，乃强国之最善股票。

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任命竟开出中国文化新纪元。蔡以学术立校，张以实业办学，乾天坤地，各有千秋。

4. 共和涅槃之二：新文化运动

(1)北大精神与南开实学

1917 年，严修 58 岁。

新年伊始，《新青年》光芒四射！

1 月 1 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是社会敏感的神经，此文一出，即风行一时。文学改良不仅是社会改良的一部分，而且充当了社会改良的先导。

而严修对此未置可否，他的社会改良仍然落实在教育和实业上。王蕴山作《新式旗语》一书，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

序中，他慨叹华人心思之巧不亚于西人，却不能表现为文化价值。慨叹作者“虽有精心创造之力与有助文化之事”，却不受重于政府和社会。在严修的支持下，王蕴山在天津各公、私立小学校推广拼音字母教学，严修也经常亲临现场观摩拼音教学。在严修看来，推广拼音字母，显然比文学改良更重要。

然而胡适大名鼎鼎，王蕴山却默默无闻。他带王蕴山去拜访梁启超，王为梁启超演习讲解拼音字母。一贯维新的梁启超，像严修一样，对拼音字母感兴趣，对于胡适的“刍议”，却置若罔闻。梁的老师康有为，对尊孔情有独钟，鼓吹复辟不遗余力，师生俩口诛笔伐，唇枪舌剑，亦为当时之一大文化景观。

对于康的复辟言论，严修从不以为然。对于国学与西学之价值，他自有其不变的立场和一贯的看法：

> 惟修愚见，以为周、孔之尊，自有其不可磨灭者在，不必事事与西学相吻合而后得称为圣人之言。群经中惟《周官》一书，其粲然者多与西政相近，其他诸经不谋而合者，亦时时有之。必谓凡东西国之新政、新艺，靡不包孕于某经某经之中，将不免穿凿附会之嫌，修则期期以为不可也。《严修信草》

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从来就执两端而用其中。无论中

学与西学，在他看来，关键都不在于“论”，而在于“用”。

蔡元培莅临南开，严修听蔡公演说，周翔宇恩来笔录：蔡先生取思想自由为题，名言宏论，娓娓动人《敬业学报》第六期。蔡元培治校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为北大精神。

谈到南开，他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贵校于斯殊于异于众。贵校董严先生于旧道德素称高贵，校长张先生又属基督徒，但二先生不因己之信仰强诸君以为从。校中各会会章不一，入会纯属自由，此种自由足为新道德开一新径。

陈独秀接踵而来，演讲“近代西洋教育”，激情弥漫，感染了在座师生。他主张中国教育“舍旧维新”，直取西方，而非借鉴日本，给张伯苓以启发。他决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研修教育，同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进而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学校，中学效法日本，大学直取欧美。

值南开中学创办十三周年之际，本届毕业生周恩来盛赞严修创建南开：

> 夫大雅扶轮，端资哲匠；中流砥柱，良赖宗工。吾南开学校创立以来，达今十有三载。津沽文望，学林夙树新标；教术纲维，作育蔚成杞梓。理事者苦心综核，岂徒标榜乎虚名；实力弥纶，亦冀昌明乎教化。《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序》，见《周恩来青年时代》

南开学校学生人数已超过千人，除边远地区，生源几乎遍及全国各地23个省市，甚至包括东南亚及朝鲜等地。南开的学生在许多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南开学校本身，也成为生长新文化和实施教育产业化的源头活水。

(2)共和之鹿，鹿死谁手？

1)天津“寓公”政治文化

文化虽有新气象，政治却还是老样子。

军阀的枪，政客的不烂之舌，搞乱了中国。

张勋联合十六省区督军、省长发出通电，要求国会速议国教。公民尊孔会在上海成立，他拉了康有为一起来做名誉会长，并派代

表赴京请愿。有了康有为作军师，拉出孔教大旗来做复辟的虎皮，张勋跃跃欲试。他想比袁氏走得更远，他要抬出清室，留住辫子——那是帝制的根。刚好美国的引诱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

美国照会中国外交部，如中国与德国绝交，美将予中国以财政援助。钱能通神，何况蝇营狗苟之政客？当然见钱眼开。

总统府马上开会，段祺瑞、梁启超等主张对德绝交。随后，参众两院很快就通过了对德绝交议案，中国政府也趁机向协约国要求增加关税，缓付庚款。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黎元洪反对，府院之争又起。国会议员在北京发起成立"外交商榷会"，以研究外交利害，调查外交事实，匡助政府，指导舆论为宗旨。

段祺瑞主持国务会，全体通过对德绝交，并请黎元洪发通电。黎坚持必须通过国会，段拂袖而去，辞职赴津。黎无奈，只好请冯国璋北上赴津挽段，并应允不干涉对德外交，段方回京供职。中国决定对德绝交，并采取参战行动。

直隶特派员及中国巡警接收天津德租界，中国陆军部决定绝交后德国财产处理办法。德人经办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为法租界封闭，中国趁机收回自办，在吴淞开辟新址，是为同济大学前身。

与其针锋相对，孙中山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章炳麟响应。国会议员马君武以梁启超干预外交，陷中国于危险地位，向政府提出质问。冯国璋返回南京，声称在京时赞成绝交，是为调停府院之争，非出自本心。段毫不示弱，即电召各省督军来京开会，商定外交大计。督军团会议主张对德宣战，向黎元洪及国会施加压力。

面对压力，黎拍案而起，破罐子破摔。他先是任命李经羲为财政总长，对倪嗣冲等督军团代表要求对德宣战大加申斥，接着又免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段被免职后，回到天津，鼓动北方军阀独立，逼黎退位。

严修记曰："是日直隶督军、省长电告独立。"

张作霖、倪嗣冲等逼黎元洪退位。王士珍、李纯、曹锟等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电请倪嗣冲等人和平解决时局。

脱离中央的各省督军，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

天津遂因其租界林立，而成了军阀们安身立命的风水宝地。他们纷至沓来，驻足天津，得陇望蜀。先是黎元洪在天津英租界建楼宇，安顿其家属，作未雨绸缪之举。军阀们纷纷效法，冯国璋迅速北上，携眷属及仆人百余人住进奥租界；曹锟不甘落后，将其家属从保定抢运到天津租界；张勋也毫不费力地将姨太太及子女连同两车皮的财产，由徐州运往天津；徐世昌迁眷属于旧德租界东营门外。

这些军阀们，前台极尽争权夺利之能事，后院则努力经营退路，开始了北洋军阀进驻天津，追逐"寓公"生活的第一次浪潮。他们带来了巨额财产，使天津的地脉浮动着前所未有的繁荣。

当然他们也仰慕严修德高望重，而与之往来频繁。

2）江上风雨和心中风雨

置身于天津这样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严修自觉无聊。遂登津浦车，转乘沪甬线，南下游春去。一路上，有江南细雨洗尘，有弥望不尽、新绿可人之田野悦目。而此时京津一带，正风沙弥漫。

满是直隶尘垢的心境为江南春雨一洗，顿时豁然。

游杭州西湖。苏堤柳岸，新绿间，时有桃、李吐芳，清香四溢。天色渐暗，虽有眷恋，也难于流连。严修此后一连三天，沉迷于山水间。第一天游九溪十八涧，水色清透，曲折深邃；水声玲珑，蜿蜒清幽；溪岸山坡，杜鹃映水，绚烂夺目。第二天游白沙堤，一堤横卧，平分水色。第三天因雨不能践游山之约，凭栏远眺，东望江，烟雨茫茫；西望湖，水雾朦胧；风景这边亦独好。

由杭州乘船前往富阳，达桐庐，宿迎春旅馆。食阁临窗，品嚼白鱼珍馓，沐浴江南四月山风水雾，送目远眺，桐君山与富春山隔江相望，翠凝云飞，春波醉人。

主仆六人乘乌篷船，游严濑钓台古迹。江水曲折几十里，船儿蜿蜒数道弯，两岸青山雾重重，一江轻舟风习习。

早晨六点出发，下午一点到钓台下。

严家祖谱可追溯至东汉严子陵，严修偕亲家卢木斋登五十三阶至严先生祠拜祭。祠外有碑亭，书大字两行："汉严子陵先生钓台"，"宋谢皋羽先生西台"。门正中额："严先生祠"，祠正中有严子

陵塑像，严修与卢行三鞠躬礼。东西两壁前，左祀欧阳文忠、范文正位，右祀谢皋羽及唐处士方元英位。行礼完毕，从祠之角门出，又西登台阶一百八九十级，才最终到严子陵钓台。台前有一方亭，站立亭上，四顾茫茫，云涌峰动，神情俱爽。

当年严子陵稳坐台前，鸟瞰天下，垂钓四海，上下与天地同流，可谓万物皆备于我。心无他物，意无杂念，更无名利缠情扰性，即庄子所谓"心斋"，陆子所谓"吾心"也。

严修得此心斋，而能以平常心进取，更为难得。

由桐庐乘船往富阳，登恒济坛。此处又立一严子陵垂钓碑及严子陵祠，高不及严濑钓台之半，亦不大，止三间一进，但其精神却融于当地淳风厚俗及青山秀水中。祠中，供严子陵牌位，严修等行礼恭拜。登高怀祖，严修赋《登钓台》：

> 吾家支祖宗八公，当明之世家慈东。五传至我迁津祖，时在昭代康熙中。天津是时号曰卫，卫城西有文昌宫。宫之迤西来卜宅，更传七叶逮我躬。浙东燕南久隔绝，曾无一纸通邮筒。慈溪县有马鞍山，我识此语方幼冲。马鞍究是何状态？每涉冥想心憧憧。光绪禄载丁戌间，吾父半百吾成童。浙有族父宦畿辅，小长芦馆主人翁。二者相逢证谱牒，南北自此初沟通。留车河畔起祠宇，二老斥金完巨工。迨余使黔还渡海，遂诣桑梓修敬恭。冠带谒祠且展墓，马鞍山下马鬣封。童时耳详今目见，此时此乐真融融。或言追远当上溯，祖无远近尊则同。严滩旧有垂钓处，至今名并崇台崇。希文昔撰祠堂记，异姓犹慕先生风。矧余小子好搜访，焉可数典忘祖功？今年览胜来西湖，恰有富阳章子从。伴我舟行溯江上，由钱之富而之桐。富春桐庐两齐绝，环山一色皆青葱。诘朝买舟趋严濑，江流曲曲山重重。钓台临江高百丈，石壁峻削仍玲珑。褰衣直造台绝顶，茫茫西顾皆危峰。静如太古罕人迹，江名曰富山则穷。当年若非处穷山，难免矰缴随飞鸿。嗟余及身逢丧乱，未能避地逃虚空！今日登高怀祖德，但有慨慕难希踪。此意难为外人道，可与言者惟吾宗。吾宗孰最可与言？慈湖渔隐字辟庸。据《诗存稿》

赋毕，返回杭州。张伯苓到上海参加全国教会学校教育会，会后他还要作为总领队，率领中国运动员赴日本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他先到杭州看望严修，然后赴上海会见大会名誉会长大隈重信及会长嘉纳五治郎，他们也都是严修的老朋友。

晤别伯苓，又赴绍兴。绍兴城内有一片200余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波光山色，浩淼动人，人称镜湖。晋人叹"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当指从城常禧门沿湖到会稽山一路山水相映之景色。宋代以后，改称鉴湖，绍兴因鉴湖所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

乘兜轿，游兰亭，如《兰亭序》云，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而流觞曲水，为后人造作，难免不类。但兰亭园后，山麓之畔，有溪水不耐山寂，绕园而过，却有古越西子之韵，撩人怦然心动。

返回上海，又游苏州。先往留园盛家祠观拜，祭盛杏师，后游太湖、木犊。荡舟枫桥，入寒山寺。寺院系程德全督抚江苏时重修，并添建楼观及回廊。寺之左偏，有古近碑刻数种；寺门内有御碑亭，刻高宗御制诗；前后有大钟两具，一为日本人所赠，一为我国新置。闻昔年此寺古钟（即"夜半钟声到客船"之钟）发见于上海，为日本人所得，见有"寒山寺"刻字，遂携归本国，而以新钟还赠，未知确否，然古钟何以流落上海；大可置疑也。游毕，遂归上海。

路上，徐世昌寄来诗函《余至天津，严范孙南游西湖天台未归，作诗寄之》：我来津海上，君入湖山深。待君久不归，烟树莽沉沉。江上风雨急，倦鸟争投林。筑庐市尘外，晨夕共清吟。春风几十度，微凉透衣襟。好花开自落，结交无古今。迢迢双鲤书，聊寄一存心。《水竹邨人诗集》卷6

严、徐之交，可称知己，但不可谓同志。此时，徐在天津运筹帷幄，正等着张勋北上复辟，他好与段祺瑞、梁启超等再造共和，"江上风雨急"，怎比他心中风雨！中原逐鹿，逐共和之鹿。共和之鹿，鹿死谁手？国有病，天知否？仰首问天，天何言哉?!扪心自问，还不是一任花自飘零水自流……不如去做实业！

3）国体"剪辫"与文化"剪辫"

由沪返津，先访徐世昌。徐对政治爱不释手。可不，再造共和，

舍我其谁也！他感觉好极了。

督军团拟在天津废除约法，逼黎退位，组织军政府，以徐世昌为大元帅，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选举总统。

辫帅张勋以为时机成熟，遂引兵北上。

不久前，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将宪法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条删去。辫帅恼羞成怒，矛头直指国会。张勋率辫子兵抵津，限黎元洪三日内解散国会；又派遣定武军先头部队火速进京驻守天坛一带。黎引狼入室，本为拒虎，谁知拒虎不成反噬己，不得已逃之夭夭。

康有为偕沈曾植乔装进京，助张勋在北京拥立溥仪复辟帝制。

梁启超通电反对复辟，严修于此日日记特记："七月一日即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 星期日"。因身体不适，他闭门读《汉书》，一连几日，足不出户。黎元洪如丧家犬，避居日本使馆，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又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遂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

张勋通电声称：复辟之事徐世昌、冯国璋均赞许，徐州会议曾商定。事已至此，还有谁来听辫帅解释？冯老谋深算，早就觊觎着徐州地盘，支持张勋复辟，意在调虎离山，待其引兵北上，好放手来抢他的地盘。而徐则诱其北上，待其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再来从头收拾旧山河，重新缔造共和国。因战事紧张，京津铁路不通，严修日记载"廊坊以北有战事"。张勋在廊坊战败，退至丰台。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飞机轰炸清宫乾清殿及丰台张勋军驻地，复辟重臣张镇芳在丰台被俘。

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召徐世昌商议善后办法。

几位朋友来严修住所，各以家书相示，探讨时局，难免忧心。

马相伯与陆军次长徐树铮携段总理亲笔信函来，请严修任参议院议长。严修回信：前陈君陈宝泉来津，具述盛意，当属代达下忱。昨马、徐两先生又携尊函，专诚枉顾。闻命之余，惭悚兼至。敬念匹夫有责之义，宁敢与世相忘，惟是才力既限于天，兼之学无根柢，新政纲要，茫乎未闻，实无可以自效。自段主政，提出国会改选问题。研究系梁启超等献计，另行组临时参议院，遂引起南北分裂

的护法战争。与此同时马相伯承旨派陈宝泉专程赴津，邀严修出任临时参议院院长，遭婉拒。后又屡次派人游说，均辞未就。

徐世昌来信，信中请严修代为联络熊希龄。严修回信：弟与诸要津，日久隔阂，虽寻常通候之书信，亦已断绝，请托更不必论。熊君踪迹尤疏，尤不愿于彼记室中搁置一不答之废札也。

严修归津，非做寓公，待价而沽，待时而起，急急乎游走宦门，斡旋上下，朝野遥相呼应。相反与诸公相忘于江湖，惟叙友情人情，不亦乐乎。他到黎元洪宅见黎之令郎，为其请家馆教师。智崇以快信附黎馆课程表三章寄来。朋友有难，他必挺身而出，但不助其纷纷扰扰之国事，而助其麻麻烦烦之家事。

黎得到冯国璋、段祺瑞同意，携家眷出京返天津英租界自家公寓，声明不南下、不见客、不预闻政治。智崇陪黎赴津寓居。同时，段祺瑞信使持其亲笔信函来津，敦促严修晋京面商国事。严修婉拒并留信使午饭，陪话至下午四点钟，适智崇返回北京，陪同父亲将信使送至新站一同返京。

黎元洪副官唐宾如来找严修商议黎宅书房以及为黎公子请英文教员等事宜。其时，黎已去职，请严修午饭，表示今后像严修一样不入党争，一心实业和教育。说说而已，严修也不当真，天津离政治中心太近，政治风云说来便来。果不其然，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请他襄助护法运动，他有言在先，不好表态。

严修赴北京，住智怡住所红庙豆芽菜胡同，段祺瑞亲信徐树铮来拜访严修。次日，上午段祺瑞、金邦正、范源濂等来访严修，下午严修动身回访段祺瑞。段于其家宴请严修等，同坐还有徐世昌、梁启超、汤化龙、范源濂、张国淦、林长民、曹汝霖等人，他们都是严修的老朋友。高朋满座，段很高兴。

的确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协约国为拉拢中国，允许庚子赔款延缓五年交付，并承认关税切实值百抽五原则，为监视德国人，中国军队暂得出入天津附近 20 里内。

晚八点，诸公尽兴而归，段祺瑞以汽车送严修回寓所。

又专派汽车送严修赴沙河（昌平），行程 25 里，只用 30 分钟，其速如飞，所过之处，驴马奔窜，践踏稼禾，蚩蚩者氓，敢怒而不敢

言。乘摩托车出行，严修在英国时曾有过一次。国内已是第二次，感觉大不相同。同是乡间奔驰，这种肆无忌惮地践踏民生，使他既内疚，又无奈。也许他对《诗经》中像"氓之蚩蚩"这种平民所谓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怒而不反的国风无能为力。

只有通过教育，使"氓"觉悟为"人"，才有平等的世界。

(3)洪水与政治中的一个预言

进入8月以来，天津大雨不断，河水已浸漫堤堰，几与马路平行。天津为九河下梢之地，大水又将泛滥。严修一边奔走于女医局、劝学所、俱乐部等事务，一边与众人商议抗洪之事，并多次带孙儿辈亲临洼地看河水涨落行情。9月中旬，近畿一带永定河、南运河决口，天津、保定低洼处尽成泽国，被灾数十州县。洪水进入天津时，南开洼的南开学校首当其冲，水深三尺。

严修到女子师范学校开会，散会后返家路上听说西方已决口，马路上水深盈尺，人摩肩、车相击。一进门先打电话问南开学校如何，报之大水靠近，不消一两小时便至门前。一刻钟后再打电话，报之水已破门而入矣，且水深盈尺。严修又连忙打电话到公署，商议筹集防水物资，并决定出资购麻袋。

24日这一天，水淹南开洼，张伯苓在美国荣获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荣誉奖学金。严修一大早先遣人接其家眷到严宅避水，时张伯苓家眷已避至租界西人朋友家。

严修于是日，四散麻袋，以助固堤挡水。次日，严修凌晨十二钟睡，四钟便醒。雨声凄惨，水势更凶。英、法、日、德租界也遭恣肆，深者四五尺，浅亦一两尺。派仆人打探水情，言与昨日同，时子周来向严修汇报南开学校水况，严修心中稍安。朋友三四家人移居严宅。严修又派人购买100条麻袋，托公署分发。严修全力救灾，而段的信使又从北京赶来，携段总理公函，聘严修为国务院顾问，严修数恳其代辞，信使表示为难，匆匆离去。严修即刻写信，答复段祺瑞。然后乘马车到城东南至西南观察水情，路滑难行，臭气熏天。车子艰难前行，到宣讲所门前，再也挪不动了，只好打道回府。

晚上，孟琴襄来与严修商议南开学校借教室开学一事。

27日，严修一大早便到青年会，与张一麐商借地方，为南开学生游说开学计划。南开学校停课三天后，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房舍继续开课。然后他又到法租界瑞丰银行见周学熙世兄。道路泥泞，在租界之间兜车，艰难行至西门，见难民日食一餐，捐银十元，托时子周买玉米面蒸馍捐助难民。

28日，又到浙江会馆为南开学生借宿舍。再往南开学校亲自看水情，遂乘人力车涉浅水行数十丈，水渐深，必乘船。经南市大街牌坊下穿过，折西南经华园会宾楼等处，又折西经第一饭店天源楼等，以上水深四五尺。再往荣业大街至南开学校一段，深处已有一丈三四尺深。南开学校大门石阶被水淹三级，约有四尺深。

严修进校看望留守学校教员及工友，学校土房均坍塌，惟瓦舍尚存。留守人员都住在东楼高处，此处远望一片汪洋，幸存者只剩八里台高凸处。

严修请随行李道衡摄影数张，然后登船东南行，过宁宅围墙数十丈掩映水中，门泊一只小船。大门上有一机械装置，自门内舀水往墙外排，只听院内水声滔滔然。请李摄影两张。又经兴隆桥东局过老西开后再折西东至黎元洪宅门前，请李摄影两张。

北行过津绅张安圃等诸老门前均为水屯，留守人都在楼上张望。北过梨栈西折再东过而北行至旭街大公报馆门前，一路行船自如，拍照数十张。折回原地弃舟登车，至东南城角造胰公司下车，换乘己车，到青年会馆。待坐定稍息，恍若梦境。

若抛却水灾之忌讳，则有泛舟游览街衢之妙。细雨登舟，如置身于江南水乡之苏州、绍兴。然而苏俗浙风乃小桥流水人家之境，水曲徘徊，亭台楼榭，悠然相处。如若比之游意大利威尼斯水城，然而水地气质又大不相同。威尼斯人的轻浮浪漫，就像凝聚在水城上空的轻薄雾气。看得出，两岸色彩纷繁的市民楼阁离不开水中厚厚的铜臭滋养。然而遍布大街小巷的桥梁，却使人不禁产生崇高的联想，在此岸与彼岸的相连中，浓浓的教堂气息弥浮不已。

从南开学校往东南行，洪波浩淼，远楼接天，严修不由自主有一种游西湖而非西湖之感。西湖之滨，飞檐瓦顶，绿丛掩映；而眼前水屯之处，各式洋楼点点。严修还游过瑞士百湖，其美景历历，更令

人惨绝于心。惜乎！千万家财产付之东流，惨目哀号，前所未有。

水深处，有漫及屋檐，居顶观水若浮筏者；有砖墙仅露尺许，边若养花池之饰缘者。无船之家，或以木条扎筏，或以木箱、木盆充筏，卖简陋筏者比比皆是。水浅处，有寒衣徒涉者，有乘人车或驿车者，怨声载道，仅求食耳。

严修回到家时，严太太已偕仆婢蒸馍千计，由南开学校师生领取馒头再分头散发。散发地点为：河东山西会馆、河东菜市场、城隍庙、小刘家胡同、广东会馆。

津绅开会，商议筑堤筹款等救灾事宜。此前严修与津绅诸公力购麻袋修埝筑堤，堵塞城内部分地区，未遭水害。但地区广大，不可遍及。连日来，城内水退仅一二寸，应尽快排水以防瘟疫流行。于是，严修发函冯恕字公度，直隶同乡会有公款，由冯等经营，请求拨款2万元修理并加高河堤。

智崇从北京回来，在造胰公司与父亲碰面，陪同父亲步行至荣业大街。登船过英租界至黎宅，智崇下船；严修则独自去袁宅，袁宅内院进水，船大不得入，克金、克桓、克齐以小船将严修接入宅内。

30日，严修为纪念结婚四十周年作诗16首。其中一首：

仕非于进隐非高，五十悬车亦自豪。
偕老有人助家政，不将箕帚强儿曹。

严修认为西方有金婚银婚之俗非常可喜，但也不必拘泥。故决定“自今伊始，每阅十年，则为一次之纪念”。

随后，又作《题阳明象拓本》七绝三首：

利欲驱人陷溺深，遑言唯物与唯心。
当年抵死争朱陆，却任中原遂陆沉。

姚江学派入东瀛，半部居然致太平。
偏是神州先进国，渐无人识本心明。

轺车问俗廿年前，每过龙场亦爽然。
吾党今多济时彦，可能功德比先贤。

洪水滔滔，国破家亡，还争什么朱、陆同异！无论主义之争，还

是权力之争，此时此刻都毫无意义。北京政府通缉孙中山，孙中山通令缉拿段祺瑞，洪水并不因此而退，还不如严修乘船到灾民区去发馍馍。除了发馍馍，严修还研究直隶水系图，点读《畿辅通志·治河说》，参与直隶河工研究会，似乎成了个像模像样的水利专家。

为商量天津筑埝领款及城西南推广排水界限等事，他去拜访熊希龄时任京东河道督办。熊表示为难，云：前许八万之数，已属至多，今年灾区有百余县，势难偏厚一方，诸君可另行筹措，如不足，我可代借一款，由本地筹还。

十月中旬，地面的大水终于退却，可严修的心中又掀起了大波大澜！他在家读《新青年》，感受着新文化的狂飙；又听人讲解旧约全书，还到青年会听"基督教青年会与时局之关系"的演讲，一只宗教的触角开始触及他的灵魂。这样的感觉，此前他从未有过，难道它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即将来临？

还有一个更加敏感的人，表达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感受，他在古史研究《殷周制度论》中预言了新文化的来临，他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个预言家，就是王国维。

八、教育产业化与政治化

1. 严修新私学的自由主义来源

(1)立共和之心与美国之行

1918年,严修59岁。

1月1日,为民国六年元旦,劫余之共和国,国人倍加珍惜。严修与袁世凯六位公子欢聚一堂,同庆共和,具有特别意义。历尽劫难,严修深深感到,共和之国已立,而共和之心未立。

茫茫中国,"搞共和"者多,或以共和之名,行帝制之实;或借共和之口,唱革命高调,在共和的名义下,五花八门的政治算盘,将中国算了个底朝天。

也有痴心如严修者,其始则存疑,疑释则坚信。万钝庵,前清法部主事,民国以后,曾襄助河南民政,洪宪时代,愤欲投海,以此有声于时。严修敬之,非敬前清之遗臣,而敬共和之公民也。惺惺相惜,相惜者何?英雄主义也!心心相印,相印者何?共和之心也!

立共和之心,根柢于教育:中国新教育最要之目的,即为训练青年人的社会服务心。此为张伯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语发表之演说。社会服务心,即是公民之心,共和之心。

英雄所见略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进共和之“德”也。张君劢、蒋方震等发起组织松社，“读书善性”，善共和之“性”也。严修等与时俱进，但节奏还是慢了半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钟情于西学的激进分子，开始投入另一种西学——马列主义的怀抱。

当马列主义在中国如雷贯耳时，严修的思想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何况他的身体出现了肿瘤。由四子智钟陪同，严修赴京入日华同仁医院，日本医生平生主刀手术，割去右足瘤子。

住院期间，读梁漱溟著作。梁在大学教佛学，鼓吹息兵。

期间，严修闻有废小学之说，当即致书陈宝泉：修曾间接言之不止一次，果欲实行，虽在局外，必力争也！

废小学之说如何而起，不得而知。但这一套阶梯式的教育体系，是经过他们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移植过来的，轻言废举，恐怕就不是严修一个人要“力争”的问题了。

何况十几年来南开中学名声远播，他开始酝酿南开大学了。严修久蓄游美之志，并为赴美国参观做准备。他开始温习《英文小史》，该书为严修欧游时房东所赠，并由房东一课一课讲解过，可惜未讲完，严修便回国。又至同仁医院，作美国行前体检。

梁巨川请往北京广德楼观新剧，剧名为《好逑金鉴》，编剧梁巨川，同时结识巨川次公子梁漱溟，已读其书而始识其人也。

不久，严修一行从北京出发，取道朝鲜、日本，赴美国。此行费用，以半年计，约须美金 3000 元，由长公子智崇、次公子智怡分担。

范源濂后走一步，从上海前往日本与严修会合。范源濂自去年辞去教育总长一职后，就动游美之念，原本约定与伯苓同行，船票已买好，却因政局动荡终未成行。严修欧游时，也曾游说范源濂同行，但因范当时主持中华书局亦未能成。事不过三，这次终于成行，严修高兴有老友同伴，遂言“润及余身”。

严修亲戚张信天、王素愿伉俪新婚伊始，愿与严修同行度蜜月。直隶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多次向财政厅申请旅费，直至临行前省长批准方有着落。因补买船票与严修行程的日期路线均不同，遂由天津直接乘邮船赴神户，在日本与严修聚齐。

1)赴美路线:北京—朝鲜—日本—加拿大—美国

严修乘京奉直通车出发,抵奉天,因兵车所阻,夜半方至安奉车站,只好投宿大和旅馆,只有一间寝室,给张信天夫妇,严修等只能在客厅的沙发椅上过夜。

未明即起,匆匆上车,车晚点,次日凌晨,到朝鲜京城平壤。其时,朝鲜国王已虚位,日本人派总督掌管朝政。给李王岁费150万,以40万归老王。但用度不能自由,由日本人监视管理出纳。王宫已让出,不日将费700万扩建为总督府。

老王有一妃,曰闵氏,情向中国,被日本人抓去,以油浇其身而焚之,极其惨烈。从此,禁朝鲜人阅读中国报。

游览博物院,该院陈列,以瓦器居多。观行政殿,殿上陈列西域古物,乃日本人从新疆采集来,寄赠于此。勤政殿龙凤屏风旁,有一长方卧石,其上刻大楷,文曰:"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十二字。下注小字一行曰:"戒我万世子孙"。走廊下多战具,有康熙年造的炮,还有光绪年金陵机局造的炮。

行于大街上,见朝鲜妇人,非得夫主之允许,不得开窗,行于路必蒙其面,夜行虽电灯之下,亦必秉烛,据说是沿袭古意。领事馆附近有一条大街,当地人谓之袁大人街。行于陌街,凭吊故人,严修遂叹:鸭绿江边春水愁,凤凰城外暮云羞。

凤凰城,古来战场也,中东之战,日俄之战,此处俱为要道。而今老大中国,兵家内阋,诗人羞言,已不知凤凰城为何地,更不知闵妃为何人。可怜闵妃,如火烈烈,不惜一死。拟往吊其陵,终因天雨路滑,没能行成。转道拜祭吴长庆祠。祠进狭小,民国元年,袁世凯题赠匾额"怆怀袍泽",悬于祠正中。

从京城出发,往釜山,登新罗丸,至日本马关,转抵东京。四公子智钟来迎接。一路辛苦,智开感冒,严修疲惫却无恙。

周恩来来访,一同到上野公园赏樱花。樱花烂漫,忘年情深。赏花之后,各归其所。翌日,严修等乘车登箱根山顶,宿于松坂屋。

由屋之后窗观芦湖,湖对岸矗立富士屋,晴日,两屋可于水中互映。然而严修此来适逢阴天,富士山渺不可见,水中倩姿遂杳杳。不过雾霭喷薄,山湖蒸腾,云气缭绕,松林苍然,万籁俱寂之境,尤

能洗练精神，沉郁心境，提撕纵浪大化之胸襟。

下山来，观光电气博览会，严修最喜欢观赏各种科技发明。会场分东西南北四馆，有各种电气新发明，如电灯、电话、无线电气烹饪、电气机械及各种战时用具等。一进门处，悬挂一张中国电器学现状图。电灯、电话普及率极低，电车又少。

小日本时时与大中国相比，日本虽小，其近代文明却有体有用；中国虽大，其近代化却大而无当，体用皆亏。两相对比，正如严修所言"足使我国之愧奋"。

又偕周恩来等游浅草公园，樱花虽谢，游人尚众，尽兴而归。周恩来下厨烹肴，请严修便饭。严修笑曰：醋溜白菜真不错。东京南开同学会设宴，为校父接风，与宴者济济一堂，二十多人。

孙子文、范源濂分别到达，又有新任驻巴西公使夏诒霆字挺斋及其秘书吴勤训及夫人法国籍、顾维钧夫人时顾任驻美公使，其夫人即元配唐宝玥，唐绍仪之女也皆预定乘亚细亚皇后号船，与严修同赴美国新大陆。至横滨登船，周恩来等请假来送。

一行人多，船驶十日，并不寂寞。船行至公海时，颠簸剧烈，严修呕吐不止，不能进食。至天气转好，身体渐次复原，每日除赴餐厅就餐外，还时常登甲板眺望，或入体操室运动，或到阅览室读书，或与诸君聊天。一日到舞厅观交谊舞，见一白发老翁，与一有须之少妇跳舞，甚为惊奇。孙凤藻戏为联语云"白发老翁青须少妇"。翌日于食堂又相见，二人相对共食，原来是一对夫妇。一路趣事连连，抵达加拿大之温哥华。

参观温哥华大学，与该校校长交谈。校长谈起英式教育与德式教育的不同。德国学者平日皆与政府联络，一旦有事，深得其力。英则不能，应于今后逐渐改变其宗旨。

参观当地博物馆，馆中陈品非印第安土著人物事即动物标本。加为殖民地国家，历史较短暂，故陈品亦乏。

登轮赴美，抵西雅图。星期日，店铺皆不开张。街道行人稀少，清静空旷。严修倦极，因时差缘故，昏昏欲睡。商于范、孙两公，歇一日。

行至圣保罗，新闻记者采访范源濂，因知严修此行为考察美国

教育。遂电话当地教育局主任，陪同参观圣保罗大学，校长巴登(Burten)亲自接待。因时间关系，严修只看了医科及医院，其设备之完善，出乎意料。农科主任自觉未尽东道主之谊，甚为遗憾，亲自驾车陪严修走马观花兽医部、牧畜部及养鱼池等。

火车离开圣保罗，抵芝加哥，观林肯博物馆。出馆，见一小河，清澈无比，两岸青草连连，严修遂于河边小坐。极目眺望米西坎(Michigan)湖，淡碧溶溶，水天一色，疲惫顿释，徘徊久久，不忍离去。

2)美式自由教育法："自动"与"自治"

中国驻芝加哥青年会总干事为严修介绍当地教育局，教育局秘书又为严修开具若干介绍信，可持赴各校参观。

参观芝加哥塔里逊学校(Tarrison High School)。该校属于高中学校，学生有2500人，有速记、化学、打字机、缝纫、纺织、家政、房屋及外国语等科。又参观工业学校，校长坎蒙(Carmon)导观全校，该校有铁工、木工及补习医科等。分昼夜两班上课，昼班有千余人，夜班二千余人。

校长大谈自由教育法："自动"，"不一致"，"不限毕业期"等。

由芝加哥前往巴菲楼(Buffalo)，赴尼亚加拉观赏大瀑布。

先踏雪至最高处，季春的尼亚加拉山，残雪仍固守着寒意，送行人过对岸的升降机孤处山顶。待游客涌至，传送带开始缓缓转动，送人到对岸。岸边并排停放汽船若干，严修等人雇妥船，船主给每人发一套雨衣帽，开船靠近瀑布。瞬间瀑声轰鸣，水珠喷溅；相语不闻，相视朦胧。调转船头，拉远距离，又是另一番气象。瀑布纵横之势赫然眼前，其宽横跨美、加两国之境。当年严修曾观贵州黄果树瀑布，哪有这等惊心动魄！

渐行渐远，车抵纽约，张伯苓来迎，寓西116街420号房3楼22号。安顿完毕，先周览纽约市况，考察市政文明；然后到葛兰德墓地瞻仰，此处有李鸿章所植树，铁栅环之；树前有卧碑，刻英文和华文，是出使大臣杨儒所立。

欧战方酣，严修一路过来，从温哥华到纽约，所至各校，无论大中小各班，无不言战事。参观林肯学校，校长谈教育法及该校宗旨，

一再强调“自动”。有一艘德国潜艇击沉美国船九艘，该校商科教员即以考察这九艘船只为题，要求学生写论文。

在纽约拜会各有关人士后，赴巴尔第摩，参观该地一乡村农校。美国小学学制八年，此为惯例，但该地则规定七年，中学四年。男生除学英语、历史外，主修农业；女生则学习烹饪，然后稍习农业。学生归家实习时，教师时常视察。因美国地贱工贵，若一家之田种植一种农作物，便会闲时闲，忙时忙，大不经济。所以学校多教以参差种植的各种技术，以便时不旷废。在工贵之国，虽为不得不然，然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实为“自动”教育之法门。

离开巴尔第摩，与范源濂等前往华盛顿，至使馆茶话。

顾公使来，与严修同乘一辆汽车往法尔斯小学(Farce School)参观。然后一同登华盛顿纪念塔，乘电梯到顶。顶上八面，每面有窗，可见城市全貌。第二十二层壁间刻有中文徐继畬《瀛环志略》序一段，纪年系咸丰三年。中文左边，有日本人草书三行，题嘉永甲寅，当为我国咸丰四年。

由顾公使引导，严修目睹了华盛顿上下议院的开会场景，感受了美国民主自由的政治文化。上议院设议席一百左右，缺席者不少。议会主席及议员多为老者，议员发言、辩论、表决，半个小时，议决四个议案。下院秩序不整，人皆“自动”，孙子文欲拍照，范源濂记手札，均遭禁止。一刻钟散会。

拜谒华盛顿故居，故居保存很好而不奢华，各室皆备但朴实俭素，面对这位共和之父，严修肃然起敬。回眸国内政界，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惟有慨叹而已。

顾公使为严修介绍华盛顿教育局局长，局长云：美国全国人口中，入中学者占 27%，能毕业者占其中的 40%；教育最好的州，入学者和毕业者均超过半数以上；政府每年补助各州小学费用，除地方税外，还有现款 300 多万；目前美国文盲有 1000 多万人，其中年轻人占一半。

参观华盛顿图书馆。该馆藏书楼分十级二十层。适江西留学生万兆芝字沅甫，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秘书、律师等在暑假中来此服务管理中日图书。中文书籍约有 8 万卷，仍沿四部分类之

旧法。听万同学介绍，日本人来翻阅中国书者颇不乏人，甚至有穷日之力在楼上翻览者。严修劝万将中文书籍特别编目，译成英文，不惟发扬国学，亦省阅者检查之力。万深以为是。

范源濂决定留在华盛顿学习英语，严修与孙子文前往圣路易。在美国中部的火车上，人们随地吐痰、扔垃圾，其脏乱差比我国有甚之。在美国一般大旅馆，每每设有两种饭厅。一种豪华阔大，价亦奇昂；一种为寻常便饭，速战速决。严修等初到美国勃提摩旅馆时，不知其妙，每至晚饭，盛装严整，用餐持久，且价格奇贵，实在让严修心疼不已。后经人指点，方知其妙，就餐往往避大就小，无需晚装，爽速而且公道。

日转星移，昨天还在美国中部星空下用餐，今天已在圣保罗晨曦中与孙子文泛舟密西西比河。密西西比河右岸，纵峰横岭，绵延无际；山脚下，工厂林立，烟雾弥漫。

河的壮阔，山的静默，工厂的喧嚣，都能使他沉醉。他说："得在世界最大之河中，泛舟一次，亦算不虚此行。"逛圣保罗公园，园中设置许多游戏器具，无风景可赏。严修对此毫无兴趣，即登车前往麻省。东方人对游戏漫不经心，而对自然山水却情有独钟，大概这也是东西文化迥异之处吧。

火车下午开，严、孙俩人行李大小各二。严修提两小件，力犹不胜。上车后，腰疼难俯，疾呼"甚矣吾衰也！"雪上加霜，该车不能直达麻省，夜半至哥伦布下车，劳顿疲惫，鸡鸣已闻。然而严修却为之一振，谓其"大有山庄风味"，倦意全无，非误车不能领略此种风情也。清晨至麻省，参观该地专门制蛤钮之机器厂，即巴雷机器厂。

子文电话约定总经理巴雷。下午巴雷兄弟共同接待了严修与子文，星期六工人不做工，二人驱车，载严修、子文参观养蛤场。过密西西比大桥，桥名泰尔(Tall Bridge)，子文以步量之，桥长约三里之多，桥上观月，月已将满，微风徐徐，心旷神怡。

翌日，听卖蛤坯之经纪人言，日本人声称，中国产蛤，但归日本人专卖。子文急争之，力辩其妄。又听另一家制蛤钮厂人言，该厂曾打算到华采买蛤坯，为日人所阻，还曾致函中国天津港口两商会，商买蛤材并附有蛤样，但至今未见回信。子文解释邮件不能如

此迅速，严修则劝其不如直接与实业厅联系，并告之地址。

二人又返回巴雷机器厂，与之商定购买机器之办法及索要价目表。晚上，严修写信给智崇、智怡，嘱其联系养蛤厂，切切！

回芝加哥，参观渔业公司，有从日本进口的海蟹，有美国本邦对虾，冷藏库库存除海鲜外，还有水果、鸡蛋等。鸡蛋皆盛以木箱，箱上有天津字样。严修大为惊讶，在天津时听说鸡蛋出口必碎其壳，现看到整只鸡蛋装木箱，问及冷藏库的工作人员，人曰食者不可碎其壳，碎者或许用作化学也。

更为惊讶的是，路经一机器饭馆，里面设一自动售餐机和自动冷饮机。一路上，严修开始琢磨美国人：美国人心思精细，做事敏速，诚不可及。然有时近于粗暴，一侍女收拾碗盘，往往抛掷于旁，其声甚巨，多其败裂者；一火车接站时，抵触之力甚大，震荡可畏。一起卸箱只，随手摔掷，伤损与否，不问也。是故游美之箱只，不可不十分坚固。

到底特律，观光汽车城。当时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因战事谢绝参观，仅赠严修说明书一本。该厂有工人33000之多，职员1000多。日产汽车3866辆，战时法国所用兵车，均由福特公司供给。该公司还有5000多人从军参战。

底特律与加拿大只一河之隔，福特公司在对岸设有分厂，产出汽车就地销售，省入口税。由于福特公司的带动，底特律市居民有100多万人，且多为富户。城市房舍错落有致，玻璃大窗鳞次栉比，街道整洁安静，为圣路易和芝加哥所不及。

车到伊里城，严修等住第二街瓦雨(Waywe)旅馆。登汽船观光伊里湖，极目舒朗，其爽宜人。归途遇雨，烟水迷茫。

瓦雨旅馆对面，有一家日本茶叶公司，旗帜高扬，惹人注目。在美国华茶虽名世已久，但经营不善，此后权利，渐为日本夺矣！

重返巴菲楼，再观大瀑布，因风浪太大无法靠近，严修的帽子被吹落数次，奔湍之声，震天动地。远远凭栏眺望，又是一番气象。良久，循岸左行，森林茂密，神秘幽深，人迹罕至，如有灯火点缀其间及飞瀑两岸，夜晚景色想必尤为迷人。

然今日无灯——因战事灯火管制，严修等悻悻而归。

返回纽约，伯苓来，讨论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并就南开大学办学宗旨进行讨论。其时，哥大师范部已通知张伯苓，再次给予他荣誉奖学金，支持他继续研修。但张伯苓已与严修商定11月回国创办南开大学，于是婉辞奖学金。此番来美国考察教育，严修、张伯苓深感美人素重公共道德，个人财产不尽遗之后嗣，而以公诸国人，集群力以经营，是以培养一国之人才。

访哥大教授凯尔鲍德里(Kelpafric)，凯氏谈了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此时应以共和教育人民，以具体引导，如少数服从多数，渐变家族主义，教导儿童参与集体游戏等，训练共和公民。至于教育方面，凯认为考察美国教育尤应注重三点：一就教育本身而言之，如建校筹款之来源，学生独立自主等；二就教育借鉴而言之，不要放弃中国自己的优秀传统而学美国劣点；三就教育功能而言之，以教育改造社会需历经二三世之久，故不能太急。

观摩自治课。假设某班为一城市，由学生自治，一学生自任市长，童龄十岁，已经熟悉自治程序。市长出席组织委员会，并指定一女生为议长，女议长就席，市长即退回议员席位，是日议案为预算案和本会规则案。观毕，又与凯氏座谈，凯氏认为：中国人宜从自治做起，如兴学、修路等事，不要依赖政府，各村原有首事，即可由彼倡议，以固有之机关，行文明之事实。

以菲律宾言之，美国治理菲律宾十八年，初始派教员近千人，如今只剩七八百人，而菲律宾本地教员已达四五万人，最初入学者不过百分之二，如今已达百分之十。美国教育普及也就百分之二十，菲律宾及美国之半，进步不可谓不速也。

进步之速，在于自治；教育如此，实业也如此，需要“自动”和自治。受美国教育影响，国人也颇有“自动”和自治者。

任嗣达君来访任，云南人，省公费留学美国，时近五年半，芝加哥大学毕业，又在美工作一年，时在纽约研究商业，成绩尤著，为中国近代商业奇才。其时，任君在美组织中国商业公司，招股美金5万元，50元为一股。主营业务为贸易，致力于直接将中国货销往美国，不经过在华美国人或日本人之手，其意甚善。

任君言：中国丧失了许多贸易机会，非常可惜。自去年内战愈

演愈烈以来，国人已无暇问及实业。即便如此，去年一年，我国出口货比去年增加三倍，入口货增一倍，出入足以相抵，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倘使乘此机会，政府提倡鼓吹，民间社会倾力，其成效又当如何？

他还告诉严修，张謇送公子来美留学商业，行前一再告诫，务必考察纽约商况。张謇打算在纽约设分号，销售本厂生产的丝绸、绣货、花边三类。张公子到美国后，听说任君有组织商业公司之举，遂拟合办，待回国与尊父计议。而中国商业公司亦设分号于上海福州路，携去股票，销售甚速。

美国需要中国产品甚多，如丝茶，如油类，如羊毛，如鸡卵，如丝绸，均为大宗；其次，如绣货，如花边，云南之锡、山东之绸和花生、湖南之桐油等土特产，亦皆为美国所欢迎，可惜无机关通销路而遗恨，而中国商业公司因此"自动"而生。

日本人则不然，他们在美国设此类公司凡十二处，仅纽约城一处，就有商务人员三百多人，内分八部，如采卖部、营业部、运送部等等，全力以谋商业之流通。

中日商战方酣，而国内诸公浑然，闻借日债2000万元，北京政府遂允日本在中国设机关稽查出入口货物，已于昨日在北京签字云云。严修扼腕而叹：若此事果确，我国商业之振兴将无望矣！因此感怀，作《和槐亭寄诗原韵》两首：

几番回首望中华，万里舟边万里车。
稍悟文章经国事，悔从故纸觅生涯。

左右均能望故乡，东瞻西顾思茫茫。
如今万里犹庭户，别意何须算短长。

3）战争、瘟疫、国民性

严修在美国考察，以居纽约时日最长。在此，每晚必听张伯苓讲教育学或美国的教育现状。张伯苓每日往哥大听讲两次，晚上即为严修概述大意，张信天夫妇旁听。有时严修自己也到大学听讲教育学课。其余时间，也到街上走走，看看，他发现：纽约街头不见电线杆；游泳池内，泳者极多，男女同池，男者仅一短裤，女者衣裙鞋

袜俱全；广东人不许中国他省人在纽约开饭馆，而一家日本太平洋轮船会社却能与英国一家太平洋轮船公司通寓办公；雨天，过唐人街，街洁净，胜过犹太街和意大利街，观之有所慰藉。期间，于《日记》中又记有三事：

其一，纽约第177街雇用中国人扮演中国丑态。留学生闻之大愤，向中国领事馆要求禁止华人受雇，领事交涉月余，却无结果，准备上报公使设法，未知后果。

其二，美国征兵自21岁以上31岁以下者必须报名。袁复礼、张信天、智开均已报名，报名后凡应免兵役者皆给予执照。本年又推广自18至45岁。因之，范源濂、张伯苓、孙凤藻皆在报名之列。凡出门无免兵役执照者即被拘捕，留学生朱秉炎，虽已取得免役照，出门未带，竟被拘捕一日。

其三，在美华侨亦有堂斗，即黑社会帮派。仅纽约一地就有致公堂、安良堂等称，皆属帮派斗争，已觉奇异；而留学生中亦有此象，如诚社、雅党清华留美同学，雅者，鸭之谐音也及其他以英文命名者甚多。派别既异，暗潮时起。

祸不单行，瘟疫随之而来：英国使馆死武官二人，日本留学生死两人，中国公使顾维钧夫人、王一之夫人、伍廷芳公子及留学生两人均染疫病故。严修一行为考察教育，东奔西走却能幸免于难，实在是天佑南开，必成大学。

11月4日，在范源濂、张伯苓陪同下离开纽约，启程归国。开车前，顾公使请求美政府派干练警探瓦屑(Washer)同行，以免再发生汤化龙被刺事件。

行色匆匆，至格林奈尔城(Grinnell lowa)，市长怀特(White)率士绅五六人驱车前来迎接。晚上，举行盛宴欢迎会。应格林奈尔大学校长Steiner博士邀请，张伯苓发表演说约一小时之多，题目“中国学制之变迁及其将来与中美关系”。

次日，参观格林奈尔中学和大学。该校为教会募捐所建，有中国留学生八人，校长一般不在学校，累日在外奔波，募集资金。随后，访法国哲学家司徒博士。司徒博士对美国极端发达的个人主义有看法，以为个人主义流弊甚多，如离婚者居七分之一，犯法者得

以贿免无罪，子不顾父，女不嫁夫等等。

辞别格林奈尔，行至盐湖城，传来大战结束、德国投降的消息，严修一行走上街头，加入狂欢的人群——但愿战争从此结束。

距盐湖城 20 英里有座铜矿山，每日可开采矿石 4 万吨，每周可获利百万元。为方便开采，矿主决定修铁路环山而上，从山麓到山顶，层次分明，共有 17 环。因矿山带动，当地经济发达，大学亦以矿科最为著名，尤为显赫者为摩门教派。

70 年前，盐湖为一片荒凉之地，摩门教徒一百余人从东部迁徙此地，拓荒淘金，为首者 Brigham Young 拥妻 19，生儿育女 58 人。20 年前终于 70 寿。摩门教派由耶稣教分化出来，主张多妻，但禁烟酒茶，在 125000 居民中有其半，因此，盐城的繁华与摩门教密不可分。严修决定在离开此城前参观摩门教堂。

严修对宗教的态度一如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亦取“祭如在”和敬而远之的态度。摩门教堂规模宏大，建 40 年方始完工，可同时容纳万人做礼拜。礼拜堂有一架世界最大的风琴，演奏起来，其声浪如潮如海，如丝如缕，严修于其中听之“抑扬沉坠，有时如巨浪，有时如细丝，皆清澈圆美，闻之心静”。

然而瘟疫禁令还未解除，行至旧金山，凡进城者必带口罩。

经人介绍，严修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韦廉士相识。韦廉士曾任中国驻天津领事，署驻华公使，汉语娴熟，与严修交谈甚畅。

参观加大图书馆，馆中藏书 38 万册；加大校园有白观塔，乘电梯可达九层塔顶，俯瞰校园，远眺四周。校园有一古希腊式戏院，略似古罗马斗兽场，可坐万人。

访傅兰雅。傅在中国 35 年，译书甚多，以《格致汇编》为最著名。严修弱冠时即读其书，闻其名，今得晤谈，快慰生平。

夏去冬来，天有寒意，转眼严修居美已近五个月。离开美境，船行公海 20 多日，严修到阅报室消遣，其中有日本出版的英文杂志，内容多夸大日本人之长，嘲弄中国人之短，严修愤而无奈。

船行至夏威夷檀香山，严修等下船登岸，雇汽车周览市容。

船上作《游美竹枝词》，将一战时游美观感一一道出：

慈母深宵睡不成，两军连日正争城。
朝来速取新闻看，先检沙场死姓名。

壮士从戎誓不回，就中亦有不材材。
颇闻入境欧西客，为避征兵渡海来。

琴瑟和谐是正声，双双携手不胜情。
近来少壮从军去，只见翁偕媪并行。

母在高堂，儿在战场，每日醒来，先问存亡，何其悲也！还有贪生怕死的“欧西客”，为逃兵役，渡海而来，而美国壮士，却自告奋勇，渡海而去，相去何止千里也！琴瑟和谐，难闻少年多情，花丛柳荫，只见翁媪并行。

另一诗云：伯夷耻与乡人并，乡人亦畏伯夷圣。彼如轩冕遇缁尘，此似嫫盐对明镜。不如劳燕各西东，各遂其天适天性。

在中国文化中，伯夷教化乡人，可谓天经地义，伯夷不教，便是失职，而诗中严修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为人皆自由，何必教化，各遂其性而已！该诗可见严修受美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已脱了中国传统“圣化”藩篱，放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情怀，遂归宿于自由平等之个人本位矣。

4）诗谶与文学预言

船过东经 180 度，因时差之故减少一日行期，虽路线长短无变，但严修心里便觉快意。此次游美，严修增加了不少旅行阅历，他总结为“五宜”：宜多带里衣，虽冬令亦宜预备夏衣，宜备晚餐服，宜携囚水衣，宜多携喜看之书。

船抵横滨，九时登岸，众人来迎，不见智崇，心觉诧异。

驱车至东京，寓车站旅店。伯苓从容告以智崇病故之耗，且以章公使之外交部两电报示之：一报崇病重，一报崇病故，闻之嗒然久之。闻崇儿死状，并不痛苦，因之恸念稍减。智崇友朱君来，告以智崇得病前后情状，闻之不禁悔意绵绵。

原来智崇 40 岁生日时，严修人在纽约，遂遥寄诗一首，其中有一句云：“儿事双亲到四旬”，智崇读到此句，突然对朱君说，“此语不妙，吾寿竟止于是也？”严修顿悟，他在纽约成此句时，心亦怦然

一动：古有诗谶之说，果有之耶？

智崇使馆同事金铮君亦来拜晤严修，谈到智崇之病，实在是用功太过所致。智崇在使馆工作，一人兼英文、日文两种翻译，而又事事认真，一丝不苟，故积劳成疾。观智崇儿生前居所，几案上书报信札有序，床榻上衣服被褥整洁。凡遗物一一触睹，伤心难以自持，严修徘徊久久，不愿离去。

由东京启程返津，于横滨登船，一路送人不断。至朝鲜釜山换船，在朝鲜旅馆看电影，电影专门上演日本治韩成绩，结论是：中国不振，当由日本代为治理朝鲜。

两天后，火车终于抵达中国境内——奉天南满站。严修终因旅途劳顿，加丧子之痛，住进大和旅馆暂息一日。阔别故土数月，眷恋而返，可故土仍似异域，充满了日本侵略者的气息。

火车缓缓驶进天津站，还未停稳，严修已见亲友数十人，还有南开全体学生及公子智怡、侄孙仁曾等都来迎接，老友赵幼梅、林墨青等一直伴送严修归宅，恐怕严修返家触动痛子之念。

经过几天休整，严修赴京，会见徐世昌总统。总统十钟半会见，谈话约一小时。“公游美归，或询以印象如何？公曰：彼邦为事择人，故无废人，亦无废事；我邦则为人择事，易言之，因废人斯事无不废也”《蟫香馆别记》。

南京和平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徐世昌辞职，以为和会之成铺平道路。严修得知后，本其“为事择人”的原则，认为如为国家社稷，徐是可以辞职的。为徐世昌祝寿，作诗一首：昔我初识公，公年三十二；今年复寿公，公年六十四。无端增一倍，老至岂不易？再经如许时，百岁亦已至。古人固有言，三十为一世；惟此一世间，不啻千万祀，未知百岁前，更有何等事？严修一直期待老友做些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事，可他除了在空中楼阁上当他的总统，他还能干什么呢？有人能做官，但不能成事，徐世昌就是这种人。可严修仍在期待：未知百岁前，更有何等事？答曰：无所事事。

严修是个痴心汉，他痴于袁，又痴于徐，他始终不明白：做惯了官的人为什么不能做事？其实李鸿章早已一语道破：连官都不会做，还能做什么事！下面有一句潜台词：既能做了官，还做个鸟事！

回来读《新青年》，鲁迅《狂人日记》不啻当头一棒！如果说王国维以《殷周制度论》预言了革命时代的到来，那么鲁迅的《狂人日记》则预言了一代病态而觉悟的革命者——狂人的到来。

2. 南开大学与五四运动

(1)实用主义滥觞与南开大学兴起

1919年，严修60岁。

严修不是狂人，他要一点一滴的做事。

为筹建南开大学，他又开始东奔西走。

黎元洪请午餐，严修欣然赴约，谈游美见闻，谈南开大学。次日，曹锐请午宴，张伯苓等坐陪，席间，再谈南开大学。两天后，学界俱乐部设欢迎午宴，席上二百多人，严修大谈南开大学。晚上，智怡请父亲听梅兰芳主演《天女散花》。

严修像天女散花一样，传播着南开大学即将来临的信息。

说做就做，他与伯苓赴教育部拜会教育总长傅增湘，为南开大学立案。又同见徐世昌总统，畅谈南开大学约两小时，徐表示支持，并慨允捐款。

赴陶孟和约，往北京六味斋，与蔡元培、胡适等谈南开大学。蔡、胡二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此二人者，自由主义之导师也！

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自由主义两先生民主与科学，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年届花甲，不知老之将至，而与《新青年》为伍者，严修是也！何况陈独秀是他的老朋友呢！当年在日本时，两人便相识，不过他没有想到，当时并不起眼的陈独秀，后来竟以一本《新青年》掀天揭地。当然，陈更没有想到，自由主义新私学，在中国的始作俑者，竟是一位清末翰林，一个从科举制里脱胎换骨，由立宪而渐进于共和，而终以共和安身立命的旧派人物。

蔡元培函《公言报》及林纾，言北大对于各种学说，实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此一原则和主义，亦是严修做人做事的

准则，同样贯穿在南开精神里。

胡适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独幕剧《终身大事》，做白话文学的试验；又在《新青年》六卷四号发表《实验主义》一文，介绍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此，胡适对中国的影响，几乎等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在胡适的推动下，杜威的实用主义风靡中国。杜威因势利导，来中国讲学，游历十一省。《新教育》一卷三号就此刊出"杜威专号"，载胡适、蒋梦麟等人文章，介绍杜威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思想。杜威主张中国"旧"文化和美国"新"文化相结合，教育与实业相结合，如果说胡适是他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人，那么张伯苓便是他实用主义教育学在中国的传人，他在天津讲学时，张伯苓亲自任翻译。

在一次演讲中，张伯苓提出筹建南开大学的教育方针：一切均以切于现在生活为准，谋全社会的进步，勿仅求理论，更当于己身所在之社会，实在有所效用。他把培育实学与实业作为办学方向：以前有思想的人，多半不想实业；而办实业的人，又多半无思想，这样如何不贫?! 他希望有思想的人去办中国的实业。

其实，这也就是南开的教育方针。就实用主义的实践而言，张伯苓无疑比胡适更为出色，在宣传和开风气方面，胡适则独占鳌头。严修对于胡适有着很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胡适的履历，说明他对胡适及其思想的重视：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年二十三四。中国公学学生。教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习哲学科，民国二年毕业。入研究部，民国五年毕业。英文、汉文俱优。考游美学生时，汉文百分，在美国大学得诗奖，有才。

胡适对严修也推崇备至，他在撰写《张伯苓传》时提到：严修字范孙，为北方学术界重镇，竭诚提供新思潮新说学，不遗余力，而且德高望重，极受津人的景仰，伯苓得其臂助，为南开奠定巩固的始基。

南开大学便在这样的学术与文化氛围中酝酿着。连日来，严修到南开开会，为筹建南开大学，南开学校成立董事会，最初称董事

部。学校为严修收拾一室，名曰校董室，严修致信智开，言其不日即迁往长住，以为筹备南开大学之便。

(2)“耳顺”——革命莅临中国

1)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

匆忙中，闻袁夫人袁克定母急病，请女医局曹佩云女医士到袁宅诊视。翌日，袁夫人逝。严修前往吊唁，随行送灵至老车站，步行约4里多路。天寒路滑，众人小心，如履薄冰，严修安步当车。

送灵队伍庞大，一路所闻所见，使严修再一次体会到人心复杂、炎凉变幻之种种世态。袁克定欲将母亲归葬原籍，请长辈严修主持。严修遂经由北京赴河南彰德。到彰德洹上村站下车，袁宅派肩舆迎至养寿园，住养寿台袁克定居所。路途劳顿，加上在造胰公司吃烧鸭，腹泻发作，袁克定不时来探望。

晨起，赵尔巽随乘段祺瑞汽车同来，傅增湘亦来。于袁夫人灵前行礼，送棺椁至墓地。凌晨四点，举行下葬殡礼。由赵尔巽主持下葬、安神牌、上香、奠酒等仪式，完毕，赵尔巽即专车返京。严修返回养寿园，抚今追昔，作《第五次至养寿园》诗：

燕南残雪尚缤纷，洹上青青麦陇云。
花信觉迟缘岁闰，风光暖欲入春分。
故园柳色依依认，隔园鸠声续续闻。
忽忆当年旧宾主，仰天无语立斜曛。

众人离去，独自小憩。回首燕南，残雪纷纷；眺望洹上，麦陇青青；花信觉迟，而鸠声依旧；柳色虽新，却依依故人；夕阳西下，斯人已逝；仰天无语，此悲何极！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告别袁氏兄弟，告慰故人在天之灵，他返回天津。

在天津，他接到张謇来信，就中国商贸问题，他再次致信张謇，提出商战强国：

欧战以来吾国出口之货，悉供东邻操纵，我所沾溉者，残膏剩馥耳！据言，一九一七年海关贸易所册载出口之货，竟与入口相抵，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可见吾国物产之丰，愈惜吾国

商术之拙。世兄秉承家学，毅力经营，强国之图，孰大于是？

但是，对于张謇欲令公子急于在美国寻求贸易伙伴一事，他认为不妥：吾国线毯，美国虽欢迎，一两万元之资本凑集，似亦不难，然所虑者，关税太重（少不过百之三十），估价太昂（每方英尺少不过美金三元）。单就一件论之，成本已属不资；况非多备件数，不足应人之求。资本太少，难敷分布。若再有来往川资、房饭销费，悉出其中，即令获利颇丰，恐亦不禁销耗。为此，他现身说法：弟于庚戌、辛亥之间，曾与三五友人集资七八千元，运国货赴欧洲销售，货已销完，本亦耗尽。前电所谓失败一次者是也。商战之理想主义，要与商业利润相结合，严修是实用主义者。

年初，严修赴塘沽，参观久大精盐公司。该公司为范源濂弟范旭东创建。范氏兄弟，幼年失怙，家境贫寒，随姑母学诗书。长兄范源濂与蔡锷同时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并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1900 年偕弟同赴日本求学。旭东在日本先学医，后在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应用化学，1912 年学成回国。曾应梁启超之请，任财政部职，参与整顿造币厂工作，两月后辞职。时兄任教育总长，提供机会让旭东赴欧洲考察盐政和工业用盐问题。

一年后回国，提出盐政改革设想，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1915 年在兄长、师友的支持下，募集股金 5 万元在盛产长芦盐的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工厂，年底即投产出成品。由于盐商反对，北洋政府只允许精盐在天津设店行销。

范旭东曾请严修从中斡旋，由于严修因袁氏称帝而与之绝交，又转而请炙手可热的杨度出面，使袁世凯准许久大精盐在长江流域湘、鄂、皖、赣口岸销售。淮扬盐商以武力威胁，他我行我素，毫不屈服。当时久大精盐公司，日产精盐 5 万吨，年利 56 万元。

1918 年，严修与范源濂在美国时，范旭东正筹建永利制碱厂，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工博士学位的侯德榜为其精神所感动，在美国便开始了设计和筹建工作。侯在美国多次拜访严修，得到严修的鼓励，回国后他一直与范旭东合作，成为中国著名的制碱专家，

在他的主持下，永利碱厂开始动工。天津三大宝：南开、永利、大公报。其中有两宝，在这一年里应运而生。

2）“耳顺”之年的亡国之音

花甲之年，耳听天命。王国维的“革命”预言，正悄悄莅临中国。一群病态而敏感的“革命者”——狂人走上街头，用标语和口号救国。对此，严修似乎浑然未觉。

范源濂送来两本书：《中国人口》、《革命心理》。“人口”与“革命”，实为中国社会两大根本问题。在这两大问题的推动下，国事纷纷，如何能“耳顺”？

先是巴黎和会开幕，开了中国闰年之劫。继而北京《晨报》刊出林长民之《外交问题警告国人》，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之音，铺天盖地而来，巴黎和约成了中国革命的导火索。

六十大寿，为求“耳顺”，严修独自一人到日租界裕通饭店晚饭，自我贺寿，免去许多麻烦。又去南开听演讲，晚上十点钟回家，贺寿之人仍未离去。一早起来，作《六十自述》七律四首：

岁逢己未月逢春，遏密期中度五旬。
转盼又经十年历，冥心遂作两朝人。
翻新疏仳循蜚纪，垂老无怀混沌民。
百感余生由自取，不应享受过吾亲。

昔日宁馨去渺然，今伤家督及黄泉。
丁多难免期功戚，命短翻增子侄贤。
季札何因轻去国，卜商有恨敢尤天。
独怜无父诸儿女，未到加笄赞冠年。

心死明知事可哀，聊凭天地寄形骸。
诗兼游记题无择，酒代医方戒惯开。
履适便矜腰脚健，镜清未显鬓毛摧。
不知留此残年在，更阅人间几劫灰。

比岁从人汗漫游，客中闲度几春秋。
茫无畔岸身家国，富有河山亚美欧。

与我相亲仍禹域，教人最忆是杭州。
眼前又数番风信，准备两湖十日留。

诗尾自注云：此十年中，庚游汴汉浔沪杭苏，登焦山，出榆关，至奉天。壬游日本。癸甲游欧洲，循西比利亚铁路归国。乙游安庆、江宁、无锡、南通、济南，再到西湖。丙出居庸关，游明陵、张垣，又登岱谒孔林，观浙潮，三到西湖。再游苏州，泛太湖。戊游美国及檀香山，往返经日本。十年游历两件事，教育和实业。

这四首诗，或怀旧，自命"两朝人"；或念智崇儿，"独怜无父诸儿女"；或放下自我，"留此残年"，聊以自慰；或言其漫游世界，而"相亲仍禹域，最忆是杭州"，忽又精神抖擞，还要再次出行，"准备两湖十日留"。

章珏祝寿诗云：国以吾道存，道必斯人寄。"斯人"者，严修也。又言：一言群为宗，一动众为式。"为宗、为式"者，亦严修也。

华世奎祝寿诗：少小知交老更亲，更投林下齿齐民。我无远志甘藏拙，君有胸怀勇作新。足迹遍经中外海，心传奚指万千人。但期天不斯文丧，珍重期颐百岁身据王芸生《严修与清末学制改革》，《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君有胸怀勇作新"，一语道尽严修；"但期天不斯文丧，珍重期颐百岁身"，斯人存而斯文存也，期望高而寄托深也，虽为祝寿，实相勉也。

3）募捐之旅：从中原到江南

花甲之后精神倍增，寿毕，即与伯苓商量南开大学募捐册写仪格式，与杨敬林谈筹建期派警员入地服务事，与金城银行经理谈建南开大学账号事，与范源濂、张伯苓等共同宴请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等，为南开大学募捐，三人共认捐40万元，并表示还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地位分头"劝募"。

梁士诒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周自齐任币制局总裁。梁表示：南开学校募捐事，他们三人可认筹40万之公债票，年可得六厘之现金利息，合24000元，并将其他拟捐款人之姓名、机关列一清单给严修。又赴总统府，拜谒徐世昌，仍谈募捐事。到尚志学社稍息，饭后登车，赴太原，一来参加全国运动会，二来为南开大学募捐。同

行者还有范源濂、张伯苓及教育部司长张继煦等。

早晨六时，车到石家庄，下午，换乘正太车。车至阳泉关，停车时间较长，孔祥熙来车上拜见严修。其时，孔祥熙任阳泉太谷明贤学校校长，兼营祥记公司。

下午五时，车到太原府，阎锡山宴请，并介绍本省学务计划。

饭后参加运动会开幕式，阎督军等俱已先到，与客人延坐。次日，在运动会现场，会晤英、美驻华公使二位。二位在山西参观，顺便观看运动会。在看台上午餐，忽然大风扬沙，瞬间尘羹土饭，尝到餐风饮沙滋味。然地主盛情，风尘中益见其真挚，故客在黄沙中，不怨天，不尤人，尽欢而已。

悬瓮山下，一祠巍峨，名曰晋祠，原为纪念晋之开国者唐叔虞而建。祠中，圣母殿左右各一数千年周柏，依然苍翠如新，生生不已；还有晋水源头的难老泉，汹涌若雷，湍激之声，犹鸣鼓击筑，鼓舞着严修疲惫的脚步；登望川亭，东望汾川，如掌伸诸指，分流而去，滋润中原大地，严修兴起，勃勃然跃跃欲试。

回太原城，学界同人在山西大学礼堂为严修一行开欢迎会，阎督军率僚属到会，崔议长致开会词。为宣传南开大学，严修破例演讲，阎督军热烈响应。两天后，严修启程，由太原东归，车过阳泉时，孔祥熙又派祥记公司经理王畏三随车照料，兼送菜饭，招待甚为丰厚。下午五时到石家庄，严修便宿祥记公司。

至保定下车，曹锟遣副官以马车来迎，直奔督军府，与曹锟谈筹款事宜。时曹任川粤湘赣经略使、直隶督军。

回到天津，歇息两日，便到南开学校开校董会，与范源濂、孙子文、张伯苓商量借款建筑学校一事，商定严修偕伯苓南下募捐，遂乘津浦车赴宁。

车行一日，抵达浦口，江苏督军李纯、省长齐耀珊，派人来迎接。晚宿造币厂内花园，陶知行来谈；次日参观南京高师陶任该校代理教务主任。

给侄孙仁曾写信，表示：大学矿科一定成立，其余尚在筹议中。

信里谈到他与伯苓在南京募捐艰难。为筹款一事，张伯苓在南京与温世霖因议论不合，发生争执，张愤甚，将温按倒于地，经人劝

开。事后，张悔恨自责，温则积愤难消，始而登报诉冤，继而登报痛诋，题曰张某之丑历史，所举皆无中生有，望而知为挟嫌诬罔，严修劝张伯苓不必与之计较。

雨过天晴，否极泰来，秀帅李纯来看望严修，慨允捐款 20 万，还派一等秘书杨某赴湖北、江西两省，接洽王占元、陈光远二位督军，为南开大学募捐。严、张二人开心去游雨花台。

旧历三月小阳天，寒气逼人，严修棉衣外加棉氅犹不胜寒。登台四顾，风乍起，麦浪翻飞连草浪。风中，听人讲述辛亥年官军和革命军战状，述者绘声绘色，听者惊心动魄，犹如亲历一般。

游过雨花台，再游清凉寺。素斋后，众人同到造币厂，商量筹款事宜，决定伯苓先回天津筹建大学，严修则一路前行，如和尚化缘。

前往镇江，乘肩舆游览金山江天寺，结识方丈梅村和尚，无独有偶，其姓为严，其名为修，其年六十，居然与严修同名同庚。寺内还藏有一座周鼎，为镇寺之宝。游竹林寺，观昭明太子读书台，已荒芜，闻集资重修，严修认捐 100 元。又登北固山，临甘露寺，俯瞰江山，山遥迤而水悠悠。

闻南开成立大学部，徐世昌首捐 10 万元，严修感慨系之。毕竟是菊人大哥！知我，助我。一时兴起，好不得意，顺风扬帆，下那扬州去。先去拜谒史可法祠、欧阳修祠，然后回舟小金山旁，泛流于五亭桥下，流连忘返，晚霞红了镇江。

4）蔡元培辞职南下与西湖学潮兴起

读报，触目惊心，始知“北京大学学生因青岛约失败，聚众至曹润田居宅，火其居并殴伤袁仲和甚重，为之骇愕”。

前往上海，婿卞俶成、女智蠲夫妇来迎接，乘车至威海路 35 号卞宅。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沈信卿来访，将教育部袁希涛次长来电出示严修。谓因五四风潮，深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地位动摇，严修德高望重，故欲请其速返北京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帮助政府维持局面。

阅后，严修请沈信卿复电袁希涛，谓蔡元培地位不至动摇，自己一时也不能入京，婉拒政府请托，支持蔡元培。当时内阁有免蔡之议，但因教育总长傅增湘不肯副署，终未成议。傅因此辞职，袁希

涛亦受牵累，而蔡元培则留下辞职信远走南方。

其实，他并没有走远，他走到西子湖畔，走进湖光山色中。

行前，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提醒学生该回学校上课了。作为教育家，他倡导学术救国，教育救国。他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知教育之必要。他强调，学生救国在课堂，不在街头，救国要凭真才实学，而非贴标语，喊口号，作政治的工具。

婉拒之后，严修致电徐世昌总统，吁请释放学生，以顺舆情。电毕，率婿及两外孙女再赴杭州，重游苏堤。

观而叹曰：东坡守杭，筑苏堤以惠后人，不仅勾留湖山风月而已。同行因请益，曰：因势利导，使泄之得其通，则泽物矣。因叹后世文人，惟赏其湖山风月，得先贤风流遗韵，而不知其利用厚生之苦心；惟以舞文弄墨为能事，为雅事，而不以国计民生为重。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也。西子湖畔，风云骤起，风月失色。杭州各校学生齐集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集合点恰好在严修下榻的杭州清泰第二旅馆楼前。旗幅林立，黑字白布云“还我青岛”，“无忘国耻”等。严修“在楼上历历见之。闻是日各小学生皆不听校长训令，径自出校”。

杭州甲种工校校长缄甫一向治校严谨，学风正直，师生宜洽。近日学生浮动，不尊校规，缄甫动气，来找严修理论许久。严修劝导曰：学生之举动虽逾轨范，然其意不恶，宜引之入于正规，使为有益之事。并向他介绍美国教育法，缄甫气渐平。

访清涟寺弘一法师，“即吾友李叔同也”。严修慕其学识，欲请其出山，任职南开大学，云和尚未尝不能任教员。法师云，尚需稍待，并非无此意。又观佛经要目，拟选读数种，法师劝严修以其声望提倡儒学。严修叹曰：“较之一入耶教，即讥讪洙泗者不可同日而语矣。”

辞别弘一法师，登雄国寺山顶，观湖山全景，顿时诗灵泉涌。雨后登山，云雾缥缈，似仙似佛，如诗如禅，如无轿夫在旁，真不知天上人间！其诗云：

雨后登攀跬步难，喁于直送上云端；
吾侪一寄平生快，知否舆人力已殚？

路经一庙，香市初过，人散庙寒，严修等由仙境入市井。正所谓"归装载去知何物？十个铜钱豆腐干"。又慨叹国难不已，军阀政客蝇营狗苟，仍将自由民主之"共和国"，当作君主独裁之"旧日堂"，因赋一诗云：王谢今非旧日堂，香泥点点积空梁。不知危幕时长短，犹自营巢日夜忙。

学潮方兴，孕育着新的国运，严修有所感而无所知。有所感而激动，无所知而后怕，正所谓"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遇老友喻志韶先生，兴之所至，畅谈至深夜。知其现借居友庄已两年，每日出入图书馆，过眼书籍已数千卷。论及时事，则太息不已，拳拳有思旧君之情。

返沪，时势扑面而来。直皖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南北打打停停，议和难成。张元济请严修与张謇联名通电，呼吁弭兵。严修辞曰："平日笑人好发电报皆空论，不愿效为之。"

与其空言弭兵，还不如去观学。上海陆家浜职业学校，成立才半年，校长顾荫庭治校颇有西方民主之风。学科分砝琅、钮扣、铁工、木工四科。学校不收学费，只收膳费，一年 30 元。学校仿西方市政之制，分学生为若干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自治。学校还设有储蓄银行及售品所，不设校役及勤杂工等，诸事皆由学生亲为。

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多多益善，而北京政府有一个就已经够了，甚至连一个也觉得多余。除了严修敬而远之，连徐世昌也要辞职了，他真的要辞了总统？严修无话可说，匆匆返津，致信徐总统："菊生我兄：学界风潮，遂至此极。因由党人、教士推波助澜，亦由应付失策，举棋不定，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学界风潮愈演愈烈，教育部长袁希涛被免职，外交上亦毫无进展与补救的希望，严修甚为忧虑，担心"教育有根本推翻"之危险，而"始倡者安知结果竟至于此"。

(3)南开大学——“立人”与“立国”

1)盗泉、粪水之喻与问题、主义之辨

严修终不能置身事外,尤其是面对学生,他又开始周旋。

他约胡适之从北京来,与张伯苓等讨论解决学生罢课问题。

留日南开同学会致函留美南开同学会,批评校方拿校董去募捐;并要求海外各同学会一致敦促学校,将曹汝霖、杨以德等从校董会中除名,否则有损南开名声。

对此,严修表示:盗泉之水,虽不能饮,洗洗脚还是可以的。张伯苓也认为: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他就是“粪夫”。将军阀、政客的钱,比做盗泉、粪水,实在有欠公允,亦非严、张二人之本意,可面对激进的学生,他们也就只能这样解释了。

他们到南开学校,与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对话,决定暑假后上课。又召集全体教员会议,提出此次学生奔走呼号,纯系爱国,期考一项,准予免除。

曹汝霖、杨以德虽没有当上校董,但募捐依旧,很快便筹到建校款8万多元。《南开日刊》发布消息,拟在南开中学南端建筑大学校舍,名曰南楼。同一天,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首次将这场学生运动定名为“五四运动”。作为自由主义新私学象征的南楼,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开工了。

面对严修慨叹“学校失其中心,法律失其效力”的时局,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南楼开工了,是“问题”,还是“主义”?当然不言而喻。严修是“问题”派,谈“问题”,他津津乐道;谈“主义”,请免开尊口。他最喜欢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将“主义”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他致电曹锟、李纯二督军,是要解决南开大学筹建的资金“问题”。张伯苓带凌冰夫妇拜访严修,是要为即将开学的南开大学解决师资“问题”。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终止罢课宣言》,是要解决经久不息的学界风潮“问题”。

2)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

局势稍稳,筹建南开大学初步就绪,又值盛夏来临,严修到北

戴河避暑。严家在北戴河有地产16亩半，距海不过里许。一座漂亮的西式别墅矗立海边，窗前，可以终日观海之变色，听海之啸声，人称之为"东山"或"老龙潭"别墅。老龙潭距严家别墅百余步，园径丈许，泉水自东隅入海，当地人言，往年苦旱，此潭不竭，故有龙潭之名。每来度假，严修诸孙经常牧鸭于此，野趣无限。

严家别墅周围，还有许多别样的琼楼玉宇，星罗棋布。卢木斋的别墅距严修最近，约有两里地，三面环海，视野极佳，苍茫海景，一览无余，占地约40余亩。他们又是亲家，所以经常往来。

周学熙来北戴河，与严修会晤。周氏别墅在西莲峰山，地名叫河东寨太平石。河东寨是庄名，因在北戴河东，故名；太平石又名大平石，石面平阔有万千丈，故名。周氏以为镇宅石。

陶孟和来电言陈独秀被捕及营救事。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先知，除了写文章、演讲，还上街头散发传单。

在当局看来，写文章和演讲，还是教授分内的事，上街去散发传单，就有些过分了。他的被捕，就是因为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纪游艺场五楼散发传单。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要以"违警律处置"，而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统领王怀庆却要求"绳以军法"，双方争执不下，并报徐世昌总统，徐交法庭处理。

严修闻讯，即修书一封，命时任直隶实业厅厅长的智怡亲赴北京，面呈徐世昌总统，起初，徐推说是司法部的事，后来，智怡破釜沉舟，以"文字狱"将他一军，言者动情，闻者也"颇动容"，徐遂承诺"维持"，先不作结论。救完了朋友，还要救学生，听说南开学校学生赴京请愿代表四人被拘留，严修赶回天津，据理力争，要求释放学生。然后，按部就班推进南开大学的筹建工作。

9月5日，南开大学举行首次入学考试，招生90多人，周恩来被免试录取。设文、理、商三科，伯苓曰：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是为南开大学。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发起组织觉悟社，将文以治国，变成了文以革命。

25日，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两位创始人——严修与张伯苓并肩而坐，与师生合影，留下一幅历史巨照。一位朝鲜志士，长途跋涉，慕名而来，要求入学，

学校“壮其志而怜其清贫”，哀其国之不幸，而留此亡国之人，特许免费入学，开学典礼进入高潮。

3）敬告南开：以真理“立人”

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如日中天，而严修却对国民党所作所为颇为不满。他指出：不管国民党怎样唱“共和”高调，旧君虽废，但专制心态依旧。

他告诫张伯苓：他人反对我校，苟无正当理由，均可不必措意。若因言语失检，招人疑忌，则不可不自检。姑举数例，如反对祀孔，信教本属自由，敬耶有敬耶之仪式，敬孔有敬孔之仪式，两不相妨。前年孔教专制，强非孔教者拜孔，今日耶教大行，乃欲禁孔教者之祀孔，均失之。国民党论调何等之高，一入政府，成绩一无可观。不揣本末之议论，不负责任之议评，徒招忌恨，无补实际。不但招忌，使少年仿效，尤为无益。

进入10月，全国学生运动渐次平静，独天津仍嚣然不靖。

而天津学生运动又以南开为马首，思之，夜不能寐。“夜半梦醒，思及学界风潮，忧悸之甚，拟撰一宣言书，遂不成寐。”随即撰就《敬告南开学校学生书》：

> 南开学校学生诸君：今年学界风潮，发起京师，激荡全国，众流所趋，轩然并起。范围愈廓愈大，题目愈缩愈小。天津之不能独免，南开学校不能独异，犹可言也。旬月以来，自京师以及各省、皆已平静，惟我天津，仍复嚣然不靖，进行不已，于是全国视线遂集于天津。天津学校，不止南开一校也。因南开学校之门外，有各校公共之大操场，于是集会必南开，出发必南开，地名、校名混合莫辨。兼之南开学校，本有一二激烈之教员，及公举会长之学生，于是南开一校，遂为天津学界之代表，人人皆知与南开学校有密切关系。鄙人诚亦尽心力，为谋南开大学之进行。今年第一次罢课，校长愤然出校。当时之时，鄙人之意，未尝少沮。一时之事不足为病。又以为有此爱国之诚，正宜增长学识，引入正轨，以储异日之用。六月□日，教职员、学生邀鄙人到校谈论，鄙人曾对学生代表声明，此后学生能信

仰校长，则校务可以进行，修仍愿充当南开学校校董。如其不能，则请告罪于同学诸君之前，即日与南开学校脱离关系。惟诸君教之。

又致信时子周，对社会风传严修为杨以德说项一事，予以澄清："昨接南开学校学生匿名两信，以风传弟为杨敬林作书晋京运动。不但诘责，而且谩骂，殊为骇怪。杨敬林势力何如？鄙人势力何如？若杨敬林待援于鄙人，其地盘尚能到今日耶？学生年幼，无名学知识，固不足怪，似闻吾兄亦轻信其说，此鄙人所以不能无郁郁也。自揣对南开学校略有感情，即令见疑，不难当面盘问。乃一闻蜚语，不察虚实，遽以恶声相向，岂不令人心寒？"

针对来函提出好汉做事好汉当，他撰文公告南开学生——严修白："昨日某报要闻栏内，有严修又为人说项一段谓数日前与杨以德持函往见徐总统。初以为报纸所载，难免虚诬，辩不胜辩。乃闻我校通告亦信此说为然。若仍嘿尔，是承认实有其事。应请言者将真实凭据明白指出，果不虚诬，鄙人当受攻击。如将随声附和，但据报纸为凭，则非所望于夙有价值之我校学生也。究竟如何，伫候明教。"

"伫候"归"伫候"，"明教"者，却销声匿迹了。捕风捉影之虚声，遂以不了了之。以严修之涵养，在其他场合，他不会如此认真追究，但他既以南开安身立命，就不会任流言蜚语横行，不为自己计，也要为学生考虑，为南开教育之根本考虑。对于流言，严修表示气愤，他挺身而出，拨乱反正，不光是为自己正名，更要以真理"立人"。教育的根柢在于"立人"，以真理"立人"，还是以流言"立人"，关系到教育方针，在这一点上，他没有矫揉造作，装出"有则改正，无则加勉"的伪雅量。

气愤归气愤，严修对南开却更加一往情深。他致信中国实业银行，为南开大学贷款作担保；捐助 2000 美金购置外文书籍，并从自家书架上检重复之汉文书籍数百册 30 余种，赠南开大学；又与张伯苓一起定 10 月 17 日为南开大学校庆日。

严修气愤，颇有爱之深、责之切的味道，而他的愤怒就截然不同了，他听说安徽蚕桑女校受军人蹂躏一事，即拍案而起，致信总

统徐世昌，开门见山：皖省蚕桑女校受军人蹂躏事，全国公愤，不独外人讥笑而已。此端一开，何所不至？弟以为宜震雷霆之威，以慰海内之望，所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其时也。

本想在直、皖两系中间"执两用中"的徐世昌，此时如同烧饼，两面都被火烤着，他哪里还能"怒"得起来？加上五四运动这一把火，更烧得他焦头烂额。"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这样的"梦"，他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做了。当然，他还会恼羞成怒。他原来主张中体西用，不仅鼓励子弟到新式学校读书，还热情捐助各种新式私立学堂。但本年学生运动以后，他改变了看法，从此不许儿孙进新学校。助学热情虽然依旧，而宗旨却迥异其趣。

为自家子弟求学，亦为匡正风俗，他在政治中心北京创办四存（存人、存性、存礼、存治）学会及附设之四存中学，与"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他打着"颜元李塨之学"的旗帜，刻意标榜"周孔正学"，专门与新式教育和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而严修却与时俱"通"，以新私学传承孔孟，兼容中西，会通古今。在他看来，"立人"，忠孝仁义；"立国"，自由民主；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4）"立人"之一例：周恩来留学

1920年，严修61岁。

1月20日，周恩来在南开主编的《觉悟》出版。

天津警察厅开始逮捕学生，南开学校十几名师生被投入监狱。

天津学联发表宣言，号召"继续散学，决不上课"。不得已，张伯苓登报通知开学，并开除罢课学生首领前后达26名，周恩来也在被开除之列。南开校园，气氛异常；整个天津，舆论大哗。张伯苓的妹夫马千里一出狱，便愤然离张而去，但严修支持张伯苓。

对于"只以手持旗帜游行于街市为爱国"，他认为"亦不免于肤浅"。无休止的罢课，连国立北大都无法承受，更何况私立南开？诚如蔡元培所言，"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他主张"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

南开大学刚成立时，校董只有严修、范源濂等几人，严修因年老多病，遂与伯苓商议，改组并扩充南开大学董事会，邀请严智怡、范源濂、孙子文、李琴湘、蒋梦麟、王浚明、陶孟和、刘芸生和卞俶成

等九人为南开大学校董。

张伯苓来，汇报南开大学董事会开会决定。严修又与张伯苓商定，在已录取的南开大学学生中选派周恩来、李福景二人出国留学。周恩来出狱后，失学，失业。严修惜才，挂念不已，小女智安尤爱慕之，被恩来婉拒，致终身未嫁。留学此举，实为恩来谋一出路也。李福景是严修老友李琴湘之子。据李福景之子李竟口述：

对于应派谁出国，首先是严老先生和张校长商量的。随后又在南开校董会上研究，征得大家的同意。到国外之后，进哪所学校由自己联系决定。他们两人先到法国，然后我父亲去英国，周总理留在法国。由于总理住址不固定，所以以后三年的学费都是由我父亲转给总理的，每学期领一次。后来父亲考取了一个奖学金，而总理的开支又大，于是就把两份奖学金都转给了总理。

周恩来 1962 年时提到过此事，他在法国不是勤工俭学，靠的是严范孙奖学金。埃德加·斯诺在改版的《西行漫记》中，亦有此类记载：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以后，即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又对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了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

严修对于“党”本无兴趣，无论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抑或其他政党也好，他都不闻不问，敬而远之，他关心的是“人”，无论何党何派，皆一视同仁，当他听说周恩来热衷于共产主义运动时，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人各有志”，依然赞助。

李福景与周恩来的交情一直延续下来，据严仁曾回忆，“总理和南开同学李福景交谊最厚，求学时期即订为刎颈之交”。1919 年至 1920 年赴欧前，周一直住在李家。1927 年白色恐怖以后，周来天津时也住在李家，李家人均称其为“王先生”。

“李福景曾和总理戏言我两人志不相同，你将为振兴汉室的光武，我为严光。总理称善。此后总理和李秘密通信，即称李为‘子陵兄鉴’。”《周恩来青年时代》第 4 期，《周恩来同志中学时代事迹采访纪实》

临行前，周恩来、李福景来告别，感谢严修。因身体缘故，“陪话

略久，坐不安帖”，严修自觉身体渐不如昔。别后，周恩来又致信严修，再次表示感谢，严修复书，并附致驻英公使顾维钧信，拜托顾公使关照南开大学赴欧留学生周、李二人。

5）严修养病与李纯自杀

退出校董，严修偕林墨青入京，前往汤山别墅作温泉浴，以治顽疾。逗留17天，每天洗温泉浴1至2次，但治疗无效，遂返回天津，请法国医生到家延诊。

探索全身，结瘤甚多，而最为害者，肠后之一瘤。医生讲：其他诸瘤，尽可割取，惟此肿块，难以割舍，须以最新之X光镜照射，使之逐渐缩小。但中国医院目前尚无此镜，海军医校已向西洋购取，四个月后才能寄到，严修只能等待，遂由津赴北戴河别墅，消暑养病。

因直、皖混战，奉军乘机运兵入关，快车被征用，慢车亦停运。

严修一家只能乘坐由快车改成的慢车。十一时四十五分开车，每站辄停，到北戴河站已是下午七时，至海滨车站已近晚八点，当地保安队长派五名保安护送至别墅。

严修肿瘤疼痛略减，适友来北戴河别墅避暑，谈徐世昌目前处境，欲严修晋京面陈，严修则以为不如开门见山，在报上发表。对于徐，严修仍以为与其无兵权而空居一总统之位，做一尸位素餐之傀儡，还不如退而求其次，亲履实事。徐标榜“颜李之学”，然而实未入颜李“三实”实学、实习、实用之法门。

接上海族亲严渔三、严子均来信，并附致府院电报稿，请严修为李赞仆被通缉一事向府院疏通。严修回信，宽慰诸公不必多虑，谈到时局动荡，却也心灰意冷：“吾国政变，几于无岁无之。赞公李赞仆适当其冲，可谓无妄之祸。同乡诸君仗义执言，足彰公道。但魁柄未知何属，中央几无主权，而今兹所称国民舆论，大都推波助澜，甚且投井下石，不若暂避风头，待其少定。民国以来，通缉之案，不啻四五，今何如乎？兄自去年学界风潮，已不理于众口，甚不愿以空文招报纸上之抨击也。”

严修多病，诸公子又均有公职在身，只好将严家账目交与小女智安来管理。8月底，返津，居家养病，袁克定来信：“其弟四人出

洋，需款孔亟。”愿在天津学费项下挂借 1 万元，希望严修筹措，严修即派管家蓝浦赴京造胰公司取款。

身体稍安，他便开始工作起来，先写信给蔡虎臣都统，蔡原来答应为南开大学捐款 5000 元，现已捐 3000 元，严修催其将剩余 2000 元补齐；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年捐 3 万元，创办矿科之款已到，欣慰之余，忽闻噩耗。

本年 10 月 11 日，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并留下遗嘱，以全部财产约 200 多万元的四分之一捐作南开大学基本金。

李纯为何自杀？原因尚不清楚也有说为齐燮元枪杀者。这个忧郁的将军，本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以他为首，长江三督发起南北和谈，曾经风云一时，牵动全局。对于严修兴学，他更是义无反顾，大包大揽，毫不犹豫。古人云，一诺千金。其一诺也，岂止千金、万金？又何止数十万金？真是重如泰山，信如长江也！

严修得知消息，是在第三天。一大早，严修阅读《河北日报》，始惊悉李纯于 11 日自戕。同时，《华北明星报》载，秀山遗嘱，以财产四分之一捐办教育。严修立即打电话，嘱托张伯苓，代他吊唁，并商照秀山遗嘱，设南开大学基金。严修于当日收到李纯寄来的谢寿信，乃 12 日发出，真伤心人也！次日，《河北日报》又载，李纯遗嘱以财产总数二百数十万元四分之一捐作南开大学基本金，李纯弟李桂山到津，严修托张伯苓与之接洽基金事宜。

诸事稍息，家人又将严修送入海军医院等待手术。手术割去两瘤。术后精神良好，友人探望，门庭若市。疗病之余，严修以信与友人联系，其所言者，无非教育。

在一封信中他指出，普及教育、强迫义务教育，于国人耳熟能详近二十年，政府规划、专署讨论、报纸宣传、文人呼吁，莫不沸沸扬扬。但效果如何？天津为兴学之模范省，但至今官私学校加起来，能入学者不过十之三四。念之，忧心忡忡，曰：

> 余每行过衢巷，惟见顽童三五，跳踉叫号，争斗诟詈，头面垢敝，种种恶劣，不可名状，未尝不怒然忧之。以为苟有术焉，得一公共处所，聚若辈于其中，用最少之时间，施以少许之训

练，使得少许之知识，明少许之道理，或不至是。

并此而不能，尚何强迫敢言，普及之敢望耶？凡有教育之责者当引为内咎也。

6)社会主义论战与五四运动赢家

在严修为教育及社会问题忧虑时，他的朋友们正口诛笔伐，进行着激烈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讲学，受罗影响，连续发文，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实业、教育救国，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与杜威一样，英国哲学大师伯特兰·罗素来华作了五大演讲，即《数理逻辑》、《物之分析》、《心之分析》、《哲学问题》、《社会构造论》。足迹所至，影响剧烈。陈独秀将各派言论汇编成《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新青年》八卷四号。论战中，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表示，根本放弃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开始反对社会主义。

罗素在长沙演讲，毛泽东听了，觉得"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他认为，"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俄国式的革命，是试行了各种主义，山穷水尽之后，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当时毛泽东正面对两条路，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条是萧子升提出的，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做一个有根柢的学者；另一条路是蔡和森提出来的，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共产党。毛选择了蔡的主张。萧和蔡都在欧洲勤工俭学，与周恩来也有往来。

诚如毛所言，其时，论战各方分为两派，一是改造派，以陈独秀为代表，要对中国和世界作根本改造；另一为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从一点一滴的改良入手。毛认为，改良是给千疮百孔的中国打补丁，他主张大规模的改造，相信"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李鹏程著《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第177—179页。

严修觉得这样论战，与他关心的实际问题距离还很远，而且根本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古人有清谈误国，党争误国，现在则有主义误国。何谓主义误国？胡适在《三谈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

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人类受这种劣根性的遗毒，也尽够了。

对此，严修早就够了，可胡适还在喋喋不休，还要去“打破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不久，皖系就被雄赳赳的“爱国主义的抽象名词”打败，背着“卖国主义抽象名词”黑锅的段祺瑞只好下台，吴佩孚用“爱国主义的抽象名词”控制了北京政府。

吴佩孚是个善于玩“主义”的人物，他的“主义”多，“主意”也多。五四运动中，他异常活跃，“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凡所通电，皆中肯要”。一方面，他表示支持学生运动，抗日救国“愿效前驱”；另一方面，他主张因势利导，借助民意，不惜一战，打倒皖系政府。当时，上海《时事新报》评论指出：于此之际，苟有人焉，起而代为国民为之，国民无不乐而赞成。吴氏一战而胜，皖系一败涂地，吴氏自谓：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对于吴氏的胜利，中共早期人物也有评论，陈独秀肯定吴佩孚的胜利“是一种革命行动”，李大钊指出：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面前。吴氏踌躇满志，成了“中国当代第一号人物”，在西方观察家的眼里，吴氏是“保障人权之伟人”，其“诚实和勇气是毋庸置疑的”，真是“主义”使人昏昏！

然而吴毕竟是军阀，他一上来，便向徐世昌开出清单，要徐照办。徐阳奉阴违，软磨软拖，半推半就，吴氏决心倒徐，将“爱国主义”进行到底，徐则不得不为“卖国主义”反复地解释，结果当然是吴赢徐败。吴赢，赢在“主义”——“爱国主义”；徐输，也输在“主义”——卖国主义。呜呼！政党有政党之主义，军阀亦有军阀之主义，“主义”之误国也，于此为甚焉。

(4)“通人”视野中的文化与政治

1)周恩来来信：谈勤工俭学

1921 年，严修 62 岁。

1 月 5 日，阅读《政学丛报》第一卷第四期之《俄国劳农政府之

组织》一文。同日，收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所言，颇令严修担忧：

> 留法中国学生，合勤工与俭学生约在两千人以上，与留日学生数目差相近矣。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而办事之人亦苦无办法。缘勤工同学来法时，国内方面并未经严格的审查，法语未谙，技能未具，而身体复不强壮，法国工人也不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
>
> 今蔡元培校长已抵达法国，对此事亦苦无相当办法。华法教育会诸干事，均因办事棘手而辞职。蔡先生以会长名义出通告，令勤工生与俭学生各自组织自行管理，教育会今后将居于辅助地位。今海外大学里昂部行将开办，闻主其事者如吴稚晖、李石曾诸先生言，将以低费用吸收国内贫寒学子来法接受欧洲文化，是固为诸先生提倡留欧大规模之一道，但对于已来法之勤工学生，则殊有置之不问之嫌。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因办里昂大学者既思以校款补助由国内来之贫寒学生，减低其自费额，莫若以此款救济国外勤工生也。即使校款不甚充裕，勤工生程度太低，则又何妨为之立补习班，补习应习学科及应习之技能？
>
> 兹事所关甚大，故不惮烦为长者陈之。倘蒙嘉许或视为应当讨论之事，固甚盼先生能为言之诸大教育家之前，而有所论列也。
>
> 至英法情状，除受欧战之影响外，或与长者昔日居欧时无大异。惟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英俄通商条约，伦敦报纸今日已宣布其内容，是固不啻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也。在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虽在巴黎、伦敦亦可征得，而生活程度之高，伦敦又在巴黎两倍上矣。
>
> 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散居各地，在巴黎不过数人。季冲（智开）与李麟玉君均曾数见。季冲在此甚好，体亦较

居日时为健，闻彼云明暑可归国也。恩来、福景入学事，已决定往英国北部，各大学一切入学手续已办完，惟俟学校回信至，便将递往。景或往曼策斯特(Man—che-ster)，来或往爱丁堡(Edinburgh)也。

顾公使尚在瑞士日尼瓦，国际联盟事甚忙，一时或不易来英，致长者函亦未由以达。官费事，须进入正式学校后方能着手进行。而英国生活程度之高，金镑价格之长，竟超过留美费用以上。倘官费不成，自费求学固甚难维持也。来现已着手翻译书报，能成与否尚未敢必，但总期奋勉达之耳！据《周恩来书信选集》

周恩来恳请严修为留法勤工生说项于海外大学里昂部主事者吴稚晖、李石曾等。湖南、四川等17省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经费断绝，北京政府教育部通知各省予以接济。张玺如来找严修，商议以新中公司的名义向大生银行息借3000元钱，请严修担保，用以暂解童冠贤等南开出国留学生学费告急之危，严修同意。新中公司主营食品，经理乃直隶水产学校毕业生杨甫青，留学日本七年，归国后与张玺如共同经营该公司，请严修做董事。

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便下令劝阻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学生400多人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要求解决入学和救济金问题，法国军警干涉，发生冲突。法华教育会无力承担，遂改变该会性质，宣布与留法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于是，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发起入校运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和驻法公使陈箓请求法国政府帮助，将蔡和森、陈毅等104人押送回国。法国政府采取让步政策，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以充中国留法学生的教育经费。

而周恩来则要幸运得多。李琴湘来拜访严修，严修顺便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华币800元，交给他转寄。给福景那一份，其实也归恩来使用。李琴湘将福景家信给严修看，英伦物价奇贵，福景与恩来准备先到法国寻求读书机会。严修即给智开写信，云：计算此时他二人到法已久，汝必与之相见。若有答彼二人之函，望即转交。闻留学官费亦多次发，汝现在费用短绌否？

拳拳慈父心，岂止对智开而言？也对恩来而言也！恩来来信，言其在英国正与爱丁堡大学交涉免考事宜及其学习英文及法文等。但申请官费留学一事，仍需严修帮忙。其申请官费留学"已呈禀于留欧学生监督及浙江省教育厅长。盖请省费较部费略易也。省教育厅方面，来已托人为之，能成与否殊不敢必。尚祈长者向范总长处进一言，能于便中为致一函于浙省教育厅长邪，固不胜其翘盼之至"《周恩来书信选集》。

严修自然有求必应，为其谋官费留学，同时自己出资，源源不断资助恩来。这一年，两人书信来往频繁，恩来尚未加入中共。

2）南开大学奠基：实学与实业

国内军阀混战，使灾民飚升，病疫肆虐于天津。

南开大学不得不提前放假，与灾疫丛生的天津相比，北京香山可称天堂。那里有现任南开校董会董事长范源濂创办的慈幼院，于是严修出面联系，张伯苓召集南开师生代表 20 人，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开会，讨论私立南开管理事宜。

会议确立办校方针：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

灾民遣散完毕，南开学校重新开学，张伯苓在南开全体教职员会上，仍在追问：学校之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于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求？造就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南开精神，便在这不断的追问中确立。

李桂山致函严修：

范翁乡长史席：兹者先兄遗嘱，捐助南开学校基本金洋五十五万，理拟奉交，以凭发商生息。惟思此款既为基本金，当以生息为切要，拟此款购买国内元年公债股票，似较他项利息为甚厚。讵料前数月，元年公债票市价一五（按即每元一角五分）有零，按传闻该票有不稳之说，未便孟浪，致受损失，是以迟迟。

近闻各银行团共同维持元年国内公债，不至失其效果。其将来办法，尚可换四成现金之公债票八十七万五千有奇，十年抽还原本。惟刻下价值，已增加至二二八五之数，究之价值虽增，殊觉孚贴。是以照市价二二八五之数，以五十万现洋，买到申付息元年国内公债股票二百一十八万八千元，余剩现洋四十八元整。现按所买

股票数目，每年以六厘周息计之，统共可得利洋十三万一千有奇。

此股票现存敝处。相应函请乡长查照，迅予示知股票存储何处，以便拨交。然此款既为学费之基本金，必期永久存储，发商生息，以资利用，无论关于何项，不得擅自动用。盖以此款所生之息，自当敷用；基本金不动，则学费自然不绌；学费不绌，源源挹注，其造就人才，前途正未可量也。如有关于校务有得应用时，亦必须乡长认可，方能生效。至于校内每月应行支销若干，并请饬知该校按月报告，送示晚处一份，以期明了而重学务，不胜盼切之至！据《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接到信，严修立即通知张伯苓校长及主管诸君。

次日，智怡向严修汇报南开大学董事决议：南开在城南八里台租购公地700余亩，筹建南开大学校舍，并建"秀山堂"以纪念李纯，董事会推李为南开大学创办人。

严修召集伯苓、武问泉商量在懋业银行接收捐助款项手续。李纯弟李馨根据李纯遗嘱捐增50万元所转换的民国元年公债券218.3万元，并存于懋业银行。南开大学基金部分有了着落。严修因病未能出门，由张伯苓等赴懋业银行接受捐款。

南开学校经营状况开始稍有转机，经费第一次有了结余。

4月2日，严修61岁寿辰。今日第一件事，去视察南开学校及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筹款资金到位，家人为之庆贺，在新罩棚下演电影，颇为新鲜。

本年，严修、张伯苓邀请梁启超担任南开大学中国历史课程，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文、理、商三科必修课。受严修影响，张伯苓特重外语和历史。对于外语，严修可谓活到老，学到老，可一直没学好；对于历史，严修受张佩纶影响，以为通经致用，不如通史致用，六经皆史，经以史为本也。而张伯苓则言简意赅：外语，洋为中用；历史，古为今用。

于是，梁启超来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南开问世；接着，蒋廷黻来了，第一本《中国近代史》也在南开问世。南开历史学遂根深蒂固矣。南开大学不设中文系，北大诸先生，遂以伯苓为无趣、无识也，孰知其文史不分家耶？南开无名士，少逸事，竞趋于实学与实

业，文学而求其实，则入于史矣。

南大与北大不同，北大以欧洲为模式，以艺术与科学为核心，培养思想家；而南大以美国为模式，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培养各行各业的实业家，而趋于教育产业化。以南大商科和矿科为例，商科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个方向，都是面向社会实用的，而矿科则更是直接面向厂矿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

严修坚持要开矿科，其大前提是开滦矿务局，其小前提是李组绅捐款的河南矿，皆以产业化的需求为动力。相比之下，南大是商业化的，而北大是贵族化的。

然而生逢乱世，贵族的日子也不好过。南开刚刚站稳脚跟，而此时以国立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京八校教职员，却因政府积欠薪资及停拨经费而举行同盟罢课罢工。

学潮刚过，教潮又起。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王章祜因无法维持，先后提出辞职，八校校长也向北京政府教育部递交辞呈，孙中山遂电邀北京国立八校教员南下。此后，愈演愈烈，八校教员及学生请愿，被总统府卫兵击伤数十人，史称"六三事件"；北京政府教育部员工因欠薪甚久，催促无效，一律停止办公。

3)"求通"之学术及其文化视野

花甲以来，严修因患肿瘤，身体一直不好。一年来，他每日点读古籍，热衷编辑刊印国学书籍及友人著述，很少出门。

开滦矿务局在安徽会馆请戏，梅兰芳、杨小楼、王凤卿、余叔岩、陈德霖等名伶汇聚，闻戏价一日 7000 元，严修叹曰："可谓侈矣。"遂将入场卷一张赠与尹澄兄前往观之。严修自从有留声机以来，基本在家听戏，很少外出观戏。

胡适来探望严修，请严修校读其新著《红楼梦考证》。读罢，致信胡适，谈到《红楼梦》版本与续作者高鹗身世：

> 历科题名录系国子监木刻本……中式之人可领一部……敝处所存至光绪癸未科止，以后续至何年，则不得而知矣。……顷于此录载：高鹗系乾隆乙卯科三甲第一名进士，汉军镶黄旗内务府人，与来示殆合，并闻。公正证明在前，似宜将推测

语气改过。

胡适尝谓严修为北方学术重镇，良非虚言也。连胡适的著作都请他校读，其他人便更是纷至沓来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泰棻著《中国史纲》，请严修校读，严修为之校正若干条；南开学生蒋善国著《新诗源》，以稿呈严修审阅，严修甚赞许。

另外，图书局送来《唐人说粹》，请他审阅；他自己检旧题团扇，拟编成册；同时，排定《四部丛刊》第一、二期次序；又为《上海时报》纪念册作序；检四部丛刊集部数种刊误和四库提要别集类书序，并审阅明诗纪事等，忙个不亦乐乎。

他审读《三朝北盟会要》、《东京梦华录》，因《广雅诗》中有"道君至押埋胡沙"句，章式之云出自《三朝北盟会要》，然通读终卷"竟无所得"，看到"徽钦二帝及郑、朱两后北狩之苦为之愤懑"，因而自注《广雅诗》。

北京直隶书局寄来《张文襄公全集》，请严修校勘。又校《张文襄骈文注》样本，并撰《张文襄骈文笺注序》。或问曰：子不尝赞成白话文乎？骈文与白话益远矣，是奚为者？则应之曰：白话文荒年谷也，骈体文丰年玉也；谷固不可无，玉亦不妨有。楷行而八体之书未尝亡，韩文出而八代之文依然在也。且中国之人众矣，程度好尚至不齐，宜各投其所嗜，各应其所需。

新文化运动起，不破不立，难免矫枉过正。而严修于文化建设一事，求"立"而不言"破"，求"通"而不言"斥"也。古文排斥骈文，前车之鉴也，白话排斥古文，势所必然也。然而，严修不以为然也。在他看来，白话不但可与古文"通"，与骈文亦无不"通"也。其时，并世而有此"通"人之雅量者，为南开之严修与北大之蔡元培也。而严修尤甚也。

居家养病，撰写《子女唯心法序》：余深疾吾国纳妾之习，私以为从一之义，男女所同。吕新吾先生曰：严于女子之守贞，而宽于男子之纵欲，此圣人之偏也。莲池大师云：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不娶者言之耳。娶而无后奚罪焉。斯二说也，皆发前人所未发，余平日恒诵之。又云：修平日持论，以女重贞节，男子亦然，若男

子不入妓院，与女子不倚门卖俏，其事相类。今守此戒者不过我辈三数人，中国之男子不如女子远矣。其言与《红楼梦》相似，真贾宝玉之新论也！

著《张明山泥人张事略》，由林墨青登载《星期报》上。

严修早年便认识泥人张，陈奉周曾偕严修入泥人张工作室。观其"丸泥入握，谈笑间搏捻为颅形"，奉周一看便大叫："大仓。"大仓为当时戏剧名丑。严修感佩，曰其"像随心造，触手成趣"。遂颇有往来。庚子年奉周逝，吊奉周时，二人立谈多时，其后不通音讯数年，原来泥人张君亦已逝矣。

天津民间艺人，脍炙人口者有数"张"，除"泥人张"外，尚有张伯苓父"琵琶张"及"果仁张"等。严修凭吊"泥人张"，除了朝花夕拾，借题悼念老友陈奉周，亦欲以之"会通"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通雅俗"矣。

严修先师尹琅若夫人由子叔翰陪同返鲁过津，住泰安客栈。严修闻讯，即刻亲迎师母归宅，上房款待。每日必侍师母恳谈，亦与叔翰叙话。方闻江苏徐姓欠尹家债至今未还，遂专函江苏省长王瑚托索，并请其为叔翰谋事。居月余，转年初，母子二人返鲁，严修亲送尹师母南归。又撰写《尹琅若师墓志铭》，出钱重印尹师所著《敦睦恒言》。

本年，严修因抱病，居家时多，可与诸孙尽享天伦之乐。在自家罩棚下看电影、听留声机、观昆曲，邀请在津亲友作定时聚餐，人数由十几人达到三十余人，次数有十六次之多，诗友墨客，觞咏毕集，评诗选冠，其乐融融。

吟坛济济，严修颇有兴致，发起城南诗社。初起十余人，后来陆续加入者达百余人，有在野名流、地方缙绅、京津任官等，严修为"祭酒"。诗社年有常期，月有集吟，饮酒会友，飞笺走笔，可谓暂忘清流梦，伤心人奈何。严修《社集用俊甫侣伊两先生唱和原韵》流露出这种浓浓的无奈情调：

日日东园载酒过，域中今日事如何？
凶年吉梦全无验，浊世清名岂足多？

赤县河山伤破碎，黄金岁月认蹉跎。
冯欢不为无鱼叹，偶遇周郎一放歌。

酒醉英雄汉，英雄能醉否？冯欢不叹，英雄无为也！老而放歌，从心所欲，孔颜之乐也！是年，作古近体诗有61首之多，其中一首《友人多以余拟南通张季直先生，毋乃不伦，拈此示之》，以"无盐"自喻，以"西施"喻张謇：

我羡南通张啬庵，孔颜乐趣老犹酣。爱兄不愧端明马退翁长啬翁两岁，兄弟怡怡，教子还同太史谈哲嗣孝若归自美洲，热心公益，绰有父风。一国文明聚江北，半生事业在濠南君所居曰濠南别业，无盐不耻来唐突，只恐西施意未甘。

孔颜之乐，本与政治无关。对于政治，严修敬而远之，但政治对于严修，却像个不速之客，时不时地找上门来，有时友谊的驱动，也使他主动过问政治。

4）严修"担保"：劝总统"表示"

孙中山函徐世昌，劝他引退，严修亦敦其辞职。其言曰："日来政躬想益健康，事愈纠纷，心愈镇定。"其实他何定之有？以不定为定，无为而无不为也。又言徐氏曰："此关平日学养，断非他人所能，有敝履千乘之心，斯有磐石天下之力。"徐氏放不下也。而严修却自以为是，劝徐"表示"："弟之游美洲也，归过日本，晤彼已故外长小村之弟，时则我国方开上海和会，小村曰：'东海能牺牲此座，则事可立平。'弟答曰：'东海之出，原非本心，何不可牺牲之？此吾敢担保者也。'由今思之，岂惟弟敢担保，国人殆亦深信。所惜者，无痛快之宣言，明确之表示耳。""昔以此意进言于项城，而项城不决，窃惜之。"

徐在总统之位也，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一会儿学潮，一会儿教潮，一会儿直、皖党争和战争，他甘愿如木偶一般，任人摆布，严修惜之：何苦也！徐氏放不下也。严修所谓"担保"者，是为"知己"之言，而非"知彼"之言也。要徐作"痛快之宣言，明确之表示"，无异于与虎谋皮也，严修是智者，亦痴人也。

吴佩孚授意张绍曾提议于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并电告严修，

征求意见。严修回电：

> 张敬翁、张仲翁、吴玉帅、陈秀帅、萧督军并杨、杜、孙诸先生均鉴：奉敬公张绍曾函电，至再至三，又承诸公之教，深愧无所发明。私尝怪叹吾国人才非不多而务欲寡之，幅员非不广而务欲狭之。由前之说，如近年死于兵，死于刑，死于暗杀者皆是也；由后之说，如近年省自为治，即某省人治某省是也。人未驱除，己先行之；人未割裂，己先倡之。惟兹会之成，全视各当局者有无舍己从人之公心，与改过不吝之勇气。又必握大权者，抛弃其权；攘大利者，退让其利；党人不为违心之论，政客不起兴戎之口，然后会议可得而言；否则议必不决，决亦不行。下走所知，如是而已。据《蟫香馆别记》

基于其威望及与徐之关系，各方都希望他对时局说几句话，张绍曾主张请孙中山入京协商，亦与他商量。严修既严申了自己的观点，又婉谢作为会议发起人。他认为，此次庐山会议与去年之国民大会之说正同，题目虽正，实行却难。难，首先就难在徐世昌。他致信徐之亲信杨冠儒"请乘间为我一申前说"：

> 然非元首徐世昌表示大让，则议者必以为此事阻力首在中央，此兄之意一也。方今魁柄下移，中外皆知，无可讳言。彼操纵政权者，方自居拥戴之功，为所欲为。如非元首表示不屑不与之意，则横恣日甚一日。发一令必征意见，用一人必求赞同，而谤丛怨府，悉归元首。所谓责任内阁，岂若是耶？此兄之意二也。由前之说，则表示服从民意，有天下而不与，不必以非法总统相诟讥。由后之说，则去留在我，遇事可以己意行之，而不必以定策之公相挟制。至于如何措词，如何手续，则非兄智力所及也。此中表示，在庐山会议初发起时最为适宜，今则稍嫌后时矣。然鄙意以为此中表示终不可无。

然而徐不仅终无表示，反而以大总统的名义，电劝吴氏"要慎重进行，勿为政客所操纵"，并采取"扶奉压吴"政策，联合张作霖，策划梁士诒组阁。徐纵横捭阖，自以为游刃有余，而不知适足以引火烧身。年底，他在总统府宴请严修，两人谈了很久，徐顾左右而言

他，一字不提“大让”，没有丝毫“表示”。

10月10日，共和纪念日。南开学校邀请黎元洪到校发表演说，严修前往陪同。下午，黎宅演戏以示庆贺，敦请严修必往听戏，严修疲极而往。

1921年，是大变革之年，可严修却垂垂老矣。这一年，先父忌日，他独自一人，乘马车到福寿宫严家坟茔来行礼；又在智崇、智惺、智庸、仁芝等坟前徘徊不已。小草青青，大树郁郁，万籁无声，惟严修之叹息兮，吐百感之交集矣。

于无声处听惊雷，大革命已然来临。纷纷扰扰中，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党的总书记，就是他早年在日本结识的朋友，被胡适称之为“终生反对派”的陈独秀。先知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发表《阿Q正传》。前者是文化革命的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的传奇；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新的革命悄然来临。

新的革命，不再由传统士人来发动，也不再由新式学生来发动，而是由农民来发动。农民革命将主宰历史，什么中体西用、科学玄学、问题主义，都要在农民的赤脚下踏成泥巴。当真正的革命来临之时，另一位革命的先知王国维却悄悄自杀。

对此，严修显然还没有思想准备和深刻的感受，但他为活着的老友徐世昌担忧，为刚刚死去的老友严复凭吊，他仿佛听到了两千年前老子的叹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听到了“天放之民”庄子的放歌：寿者多辱，久忧不死，何苦也！

九、严修新私学与文化个体性

1. 战争·国学·南开园

(1)直奉战争与"好人政府"

1922年,严修63岁。

1月1日,天津5万群众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举行升旗典礼,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

中国政治渐趋多元化,有宫廷政治、府院政治,还有割据政治、讲坛政治和街头政治。宫廷有遗老遗少叹息,府院有各党各派政客喧嚣,割据更有各系军阀剑拔弩张,而中国共产党则依靠讲坛和街头进行革命,他们在讲坛上宣传主义,上街头去发动群众。

军阀们依然热衷于争夺、把持府院地盘。徐世昌以梁内阁制约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作梁内阁的后台老板,因此,当吴通电指斥梁士诒在胶济线问题上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要求,并掀起倒梁内阁风波时,张作霖则致电徐世昌,望其设法维护梁内阁,并声称若有人敢反对内阁,奉天可以流血为后盾。

吴则更加强硬,他一再通电,广告天下,矛头直指梁士诒: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并痛斥梁: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表示:祛害除奸,义无反顾。若有袒护梁氏者,即吾人之公敌,当誓死

杀尽，以除国奸。吴还指名徐世昌，要他表明态度：或保护梁士诒，或俯从民意；或力罢梁士诒以谢天下，或请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徐不得不有所"表示"：若使大局及我身而破裂，国家及我身而沦亡，我何以对袍泽、对我人民，自惟有退让贤能，以谢天下。

迫于压力，他同意胶济铁路由人民筹款赎回，永属民业。而奉张却乘机引兵入关，曹、吴也采取非常手段进行备战。

先是曹锟指使军队截留中国银行运往天津的盐税 14.8 万两、银元万枚，继而吴佩孚亦强行提取中国、交通两银行 280 万元，令京汉路顺德以南之货车一律备用，并提取京汉路收入款项 328 万元，以充军饷，直奉战争一触即发。吴佩孚要求奉军一律退出关外，冯玉祥亦通电反奉，并率部进驻郑州、洛阳。

严修洞悉，即致信徐世昌，以危言力谏，望其当机立断：

> 时局危险，遂至于此，每为钧座设想，针毡不足以喻之。相交四十年，视逾同气，而临时不能急难，愧恨奚如？为今日计，既无制正之势力，不得不有简质之宣言。大总统应向天下宣誓：公等如为我战，则我请避位以苏民命。若言而效，可以救一时；言而不效，亦足以谢天下。愚见如此，以备采摘。

徐虽同感，却有心恋"栈"。他草草发布直奉双方撤兵令，直奉双方皆置若罔闻。不日，奉军便到军粮城。

自奉直备战开始，严修增订报纸两份，每日必阅数报，以观时局演变。虽不觉恐怖，而神智终不宁贴，看书写字，都无兴趣。

天津河东居民为避战乱，开始迁移，严修观之，担忧不已。曹氏虽为亲家，但严修却无力阻止战争。不时有朋友来打探战事消息。听到西北枪炮声，直奉两军终于开战。

严修嫌送报时间太迟，早上六点半，便命仆人袁泰直接到车站去买报，却迟迟不见买报来。到九点钟，袁泰才气喘吁吁地回来。原来买报的人太多，须排长队等候。严修急忙看报，又堕云雾，报上或云奉军胜，或云直军胜，"使人眩惑"。

奉军入关，孙中山下令北伐，兵分三路向江西进攻，被吴军阻击。战前，孙中山认为，奉直必因权力而冲突，而决裂；而皖系之余

烬，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于是，采取联段、张以制曹、吴的战略。

皖段向孙表示“悔祸”，孙则以段“再造共和”有功，表示“当引为同志”。梁士诒赴粤，向孙表示：他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使孙、段、张结成“三角联盟”。为“报聘”奉张，孙特派伍朝枢赴奉，许诺：粤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依山据险，以战以守。奉张然之，遂据关陈兵，虚张声势，以逸待劳。不料，吴联手陈炯明，抄了孙的后路。当孙北伐至韶关时，湘赵赵恒惕阻击在前，粤陈陈炯明反击在后，孙遂仓皇而逃，自称“干戈起于肺腑”。

北方战事，奉军更是一败涂地，一番激战后，奉军从丰台败退至军粮城，然后逃之夭夭。奉军战败，徐世昌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梁士诒等交法庭讯办。奉军且战且退，溃至天津北仓郊区，直军勒令奉军缴械，奉军抵抗，因而开战。北仓一带百姓四处奔逃，夜半纷纷涌进市区。吴佩孚连夜赶至天津，但未下车。

严修夜闻枪声，至旦未眠，听说冯俊甫暂居云贵会馆，前往探望，才知昨日有奉军散兵30余人闯入其家，家人逃往租界，不及携带衣物等，均被抢夺瓜分。

严修立即前往拜访杨敬林，请其设法保护人身财产安全。

天津罹兵事，人心惶惶。严修终日未出门，在家校看陆游诗集。

而他的朋友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李大钊等16名北大教授、教员在《努力周报》上，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要求成立好人政府，以“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最低限度的要求”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福利；第二点，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两点，与其说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而毋宁说是基本要求，是民主社会的关键和要害，其实是最难点。

在“好人政府”的口号下，曹、吴电请“好好先生”黎元洪复职，直系各省督军、省长纷纷响应。黎元洪在津通电各省，以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曹、吴表示，愿先废督裁兵，请黎早日复职。黎入京就职，任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吴又电邀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等人北上，共商国是。他当然不会放过徐世昌。在一次宴会上，徐正与同

僚弹冠相庆，忽接一电，顿时黯然神伤，吴在他的兴头上，给他当头一棒——命他立即下野！他以矜持而略带哽咽的语气说道：此次宴会，一则为顾公顾维钧洗尘，二则向诸君辞行。吴仍咄咄逼人，迭电徐：快快搬出总统府！徐黯然回津，车过杨村时，他悲从中来，放声而泣。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曹与徐为北洋同僚，皆严修挚友，如今反目成仇，真是祸兮福兮，从何说起。严修在日记里轻描淡写一笔："徐菊兄退位来津。"第二天，严修便去拜访徐世昌。不久，南开就上演了直奉战争的电影，严修偕孙辈前往观看。

(2)新文化反刍与国学复兴

今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反刍，透出一股陈年老醋的芬芳。

早在1920年，胡适就批评"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新名词运动"，北大虽然挂着"新思潮先驱"、"新文化中心"两块牌子，其实"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连朱自清也感慨：近几年来的趋向，总名之曰："杂志之学！"

当时东南大学公然树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与北大分庭抗礼，欲扭转"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年初，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南京创办《学衡》双月刊杂志，称"学衡派"，南北学风之争因之而起。"学衡派"主张以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相抗衡，不问华夷，不分今古，求欧西文化之真精神，求东西圣人之同然，求宇宙间确然之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

眼界如此之高，"学衡派"自然要"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了。北大早已不放在眼里了，梁启超来东南大学讲国学，也被他们信手拈来便批评。梁尝言及《老子》，即被斥为"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以上见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二章"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上海古籍出版社。"学衡派"以国学挑战北大，颇似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北大国学多出于太炎门下，"学衡派"同人实在望尘莫及。鲁迅小试牛刀，作《估"学衡"》一文，只寥寥数语，便将"学衡派"的学术根柢揭露无遗。到晚年，吴宓依然服膺鲁迅，谓鲁迅所言，实甚公允。而对被鲁迅所揭露之邵祖平，他也一直很反感，

认为邵过分出头，“斯乃胡先骕之过”。

新文化反刍而有《学衡》问世，然而刚一问世，便有了裂缝。吴宓先是对胡先骕拉同乡、搞江西诗派不满；后来又对梅光迪逢人便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不满。《学衡》杂志本无经费，社员亦毫无捐助，自始至终，杂志所需费用，全由吴宓出钱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出版。

借了《学衡》杂志的影响，东南大学扶摇直上。而南开大学的国学运动，似乎刚刚开了一个头，便中途而废。南开大学新学期开学典礼，严修到南开听梁启超演说。演说完毕，陪任公闲谈，任公还招大学学生蒋、黄、王、陈四人讨论学术研究方法。

饭后，又听任公述戊戌、丙辰两次出京脱险事。

梁此番来南开，欲借南开之地，倡导国学研究之先声，得到严修的支持。《南开周刊》发表消息：自梁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一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

其时，梁正值韬光养晦之际，欲隐大志于学界，故积极奔走呼吁：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收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启超确信当现在全世界怀疑沉闷时代，我国人对于人类宜有精神的贡献，即知识方面，亦宜有所持，以与人交换，实吾侪对世界应负之义务。启超确信现在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欲培养多数青年其成兹业，其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书院。

院舍就设在南开园内，研究并传承国学，学员分“本班”和“研究班”，全部费用约需 10 万元。为此，梁启超特撰《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诸同志》，表示“以极诚恳的意思及积极负责任的精神，敬求海内同志予以乐赞”。原以为任公振臂一呼，“同志们”便纷纷解囊，结果却出乎预料，应者寥寥，大跌任公眼镜。个中缘由，素未深究，今试言其一二。

其一，以南大为例，赞助者多军阀、政客也，任公卷入政治太深，与之或结怨也，或树敌也，或不无过节也，故其大声疾呼以求助，反不如无党无派严修之一默也。

其二，再以南大为例，严修创办南大，首先捐钱捐地，以为抛砖引玉也，梁借南开之地办文化学院，自己不先解囊，而劝他人解囊，谁来听他呼吁？

其三，南开经费悉出于军阀、政客之赞助，各有专项，岂容任公染指？任公聪明人，此中深浅，焉然不知？然任公一贯作风，好谋事，而成事则顺其自然也。

梁在南开园讲学不辍，其讲稿结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严修先睹为快；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其《欧游心影录》，以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一片凄惨衰败，重申科学和物质文明并非福音，而古老的中国文明则可以拯救欧洲。

无独有偶，梁漱溟来津，寓居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严修去看望这位老友之子，梁赠其新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返家后即刻阅读。该书出版后，一纸风行，一版再版，至本年10月份，已经出了第三版。如大匠之握鬼斧，运神功，他为世界文明开辟出三条大道，提出中国、西洋、印度三种文化路向递进，大有"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的意味。

梁亦因之而自诩曰：斯人不出，奈苍生何！他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则苍生在。此种抱负，在个人主义的立场看来，为不可理喻，然而用民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则为理所当然：我在圣化中化为无我，无我之我，与苍生融为一体，如月印万川。

严修治学，一如其办教育和实业，从一点一滴做起。他的思想，没有梁启超电火行空般的敏捷，也没有梁漱溟那经天纬地的魄力，而是在不断的读书中慢慢积累。

本年，他重温《庄子》、《晋书》、《明史》、《初唐四家诗集》、《六一诗话》、《谢山诗话》、《渔洋诗话》、《全唐诗》等，又读《李义山诗》、《温飞卿集》、《韩诗外传》、《墨海金壶》、《能改斋漫录》、《高斋漫录》、《菽园杂记》、《南斋笔记》、《瀛舟笔谈》、《焦氏笔乘》、《国史补》、《亭林诗文集》、《大唐创业起居注》、《齐东野语》、《儒林外史》、

《粤雅堂丛书》及林译外国小说等23种。

他还为其业师张佩纶遗著《涧于诗集》作注解，为张之洞《广雅堂诗》作注，并向高步瀛等质疑多次，更据《四部丛刊》补《书目答问》，可惜书稿均未刊印。又校高彤皆《天津县志稿》科举类、物产类、旧迹类等，校张鲁严《所学集》，作《文安县志序》、《王紫翔同年文集序》、《题张锦波竹兰立幅图》。

他不仅像饕餮一样读书，还常去买书。这一年，他到鼓楼北文育书局买《张文襄诗集》两部，一石印，一木刻；又买《雨当轩集》、《王益吾集》；到鼓楼东文林阁买《研精经室集》一部，《温飞卿诗集》一部，《皇清经解编目》四本。

某日，请伉乃如代买英金120英镑，寄于李福景转交周恩来；路经西马路小书店一逛，买到《咸丰癸丑年晋绅》一部，晚阅读，凡与师友有关系者，均以朱笔记之。徐世昌来请，云：有稀世墨宝，要他鉴赏。遂前往徐宅，观之，果如其言，乃七八年前淘来之东坡西楼帖，共五本，乾、道年石拓本，有许多文人收藏印。

年末，贺李嗣香老人寿，老人劝他读佛经，语重心长：吾辈年已老大，世事都已经过，不曾寻一安心之法耶！遂以《维摩诘经解义》自著赠与严修，严修读之，不知得何心法。

(3)南开学园及其"剥皮主义"

南开大学建成，严修邀请学界士绅乘舟泛游。

彼时南开大学，可谓水上学园，水渠环绕，水洼相连，蜿蜒曲折，与比邻之湖今"水上公园"相通。一眼望去，青草绿树，因地制宜；更有风生水面，令人心旷神怡；兼之书声朗朗，透出无限生机。在此野餐闲谈，诗词唱和，远胜于公园西餐馆。此后城南诗社经常来此地聚会。柳无忌来校，盛赞此地乃一世外桃源。

得此佳处，严修自觉美不胜收，遂呼朋唤友，恨不得日日做东。陶行知从南方来，一番演讲之后，自然要去泛游，严修设家宴款待；顾维钧公使百忙之中，专程而来，严修亲至车站迎接，自有一番风声、雨声、读书声为他接风；老舍也来了，范文澜也来了，悠悠南开园，一时群贤毕至，高朋满座，文采风流。

胡适亦从北京来，在南开园讲“国语文学史”、“国文源流”。据《胡适日记》云：“张伯苓、凌冰诸君留我吃饭。谈甚久。饭后伯苓带我去看南开学生的自修室。学生都在室用功，精神极好。南开近年进步很快，是一件可喜的事。”

然而南开能有今日，谈何容易！想当年南开学校成立之初，天津中等学校同时而起者不下七八处，如官中、新学、长芦、明德、私二、私三皆争于时，而至今存者已无几，惟南开中学蒸蒸日上；与南开大学同时而起的东北、东南、河北、鄂大、厦大等，至本年亦纷纷落马，只剩东南、厦大、南开还在并驾齐驱。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远东办学处副主任格林(Greene)也来了。他来南开，商谈为南开大学建筑科学馆捐款事宜。洛氏基金会要在中国选两所私立大学作为捐助对象，几番考察比较之后，他们选择了南开和东南大学。各捐美金 25 万元，但必以本国配捐一半为条件。此举，旨在促使该受惠国的社会游资流向教育，这实在是教育大国带动教育落后地区的好办法。袁世凯堂弟袁述之先生禀慈命，慨捐 7 万元。当年为促成南开大学的建立，述之先生便曾奉母命捐金 1000 镑。徐世昌派人来访严修，送来徐捐助南开大学之震义银行存款票据 8 万元，请严修转交南开大学，严修即携往大学，面交伯苓校长。

格林走了，推士又来了；前者来捐款，后者来讲学，讲《科学教授法》。推士倡导自由问答式、启发式教学法，这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学者一以贯之的方法，是一种民主教学法，而中国学者在课堂上已习惯于一言堂，独享话语权，多少有些专制色彩。在批评的同时，他又强调取长补短：诸君勿谓欧美物质文明尽可采择，须知其物质文明亦有其弊，若能将中国教育之文明扩充而广大之，一面采西方物质之长而去其短，则中国之强可立而待《南开周刊》，第 46 期，转引自《南开大学校史》，第 192 页。

严修深以为然。不仅中西文明如此，新学与旧学，文言与语体，都是如此。不同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人类应学会从不同文明中各取所需；新学也好，旧学也好，新、旧两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

林墨青60大寿，严修作五言古诗一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新学与旧学，交攻如对垒。
我思不必然，实事但求是。
上者撷菁英，次亦采葑菲。
末流各有失，要贵穷原委。
论文更聚讼，文言或语体，
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诋。
藉曰废文言，四部当尽毁。
数十圣留贻，数千年积累，
外人且探讨，谓中多要旨。
岂有吾国人，反弃同敝屣，
语体为通俗，补助功亦伟。
香山所为诗，可以喻灶婢；
宋儒著语录，后人谁敢訾？
曾侯亦设譬，江塔与罗李；
我有浅近喻，食事差可拟。
或者喜啜茶，或者但饮水，
或者屡酒食，或者急盐米；
富则啖精细，贫则甘康秕；
究胜绝食人，饥饥呼庚癸。
此谊尝质君，君则曰唯唯。

这思想，多少有些保守主义味道，但今天看来，它依然那么有历史深度，同时又平易得与现实生活相通，它不是那种已经倒了胃口的文化反刍，要品它的味道，多少得有点“食不厌精”的真功夫——用胡适的话来说，叫做“剥皮主义”，如剥芭蕉一样，一层层剥去观念的包装，越剥进去，越到中心，于是真理显现出来。

2. 从整理国故到阶级斗争

(1)国故"三明治"与孔子真面目

1923 年，严修 64 岁。

天寒地冻，严修偕诸孙，张伯苓陪同，观南开雪景。

一行人乘坐冰床，且行且观，雪中之南开，另有一番风味。

南开园，没有围墙，也不设篱笆，门前有一条小河，通青龙潭，冬天坐冰床子，可以从八里台顺道而下，一直滑到城里，畅通无阻，可谓过瘾。园内，一条大中路由东而西，贯穿校区，两旁溪水环绕。路中段，有分支，连着两个南北对称的马蹄形莲湖，湖中各有一岛，北岛上，坐落着飞檐翘角的赏莲亭；南岛上，矗立着李秀山的铜像。从校门口乘船，入莲花池，进芦苇塘，放舟青龙潭，人在水乡中。不过，连日来，水域冰封雪冻，枯树染霜，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

陶行知来，讲《大学教育的二要素》。"二要素"，一关于思想，一关于情操；一为科学问题，一为人生问题。严修恭听，似冰雪中梅花两枝，暗香浮动……胡适亦以国故之宴飨严修，或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学如做"三明治"耶?! 他用"假设"的方法和"求证"的材料，烹制了《国学季刊》这块国学"三明治"。"整理国故"之三大策略：其一，用历史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范围；其二，用系统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资料；其三，用比较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理解。

当《国学季刊》西装革履登场时，南方《华国月刊》也穿着长袍马褂崭露头角：章太炎亲自出马，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号召天下。作发刊词，开宗明义曰：国粹沦亡，国于何有？故曰哀莫大于心死，可为长惧深戚者也。国粹为皮，新文化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太炎先生因此而批评胡适"还历史本来面目"，为直窃康长素之唾余，但可哗世，本无实证，长素以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书》。

更有甚者，如章士钊之流，公然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认为"文

化”无共相，“新旧”不可分；提倡“文化运动”是方式上的错误，运动者“如饮狂泉”，神魂颠倒——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于古于今，狗屁不通。

“整理国故”与“发扬国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立场，前者以科学为本位，将国故置于科学的平台上来整理；后者以国学为本位，将新文化纳入国粹来解读。

对于各种批评，胡适则不以为然，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当他的乐观主义眼光，透过国故的故纸堆，一瞥作悲天悯人状的梁漱溟时，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弊病，那就是喜欢脱离常识，故弄玄虚。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认为梁的“三条路向”指西洋、中国、印度的文化学说便是故弄玄虚，他的看法是“各民族文化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中国、印度文化远远落后于欧洲文化”。

对此，梁反唇相讥，他在北大讲《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说：我读适之先生和其他各位的批评，感觉着大家的心理与我相反。大家读我的书，大概都像看新闻纸一样，五分钟便看完了。作者下过一番心的地方，他并不往心里去。其弦外之音是，胡适等人尚未明白，便来指手画脚，胡批一气。

论战期间，梁氏来南开，讲“孔子真面目”，畅谈“我的人生观”：昔者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呜呼！是吾道也！吾将以是道昭苏天下垂死之人而复活之！见李渊庭、阎秉华编《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2页。

此为梁氏自道。梁氏风华正茂，其言不知老之将至，颇有几分强说愁的味道。在胡适看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有“大胆假设”，没有“小心求证”，因而不可信，梁氏所谓“孔子真面目”，是否真的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需要“小心求证”。孔子也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谈孔子也要“拿出证据来”。

(2)科玄论战与严修实事求“是”

“不可信”引出了关于科学性的话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追

捧的科学，到了中西文化论战时反而成了问题。

先是梁启超揭竿而起，造科学的反，他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欧游心影录》。他还以不知老之将至的青春期笔法，煽动青年：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等着你来超拔他呢！在这样一种自恋和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文化情结里，科学变成了灰姑娘。拿什么"来超拔他"呢？当然是我们的国学。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讲演，指出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和重建取决于"人生观"，人生观与科学观各解决各的问题，不让科学掺乎文化。张的朋友丁文江，借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说："玄学的鬼"，在欧洲鬼混了两千多年，混到现在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了，便打着"人生观"的幌子到中国来混，中国文化重建，应该驱逐"玄学鬼"，请来"科学神"参见（美）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新思想和后来的争论"，岳麓书社出版。

这样便发动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一方，丁文江、胡适等为另一方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论战历时一年，问题涉及科学之社会效果、科学价值、科学与哲学、科学与宗教、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方方面面。在严修看来，对立双方其实是以合力来做文化建设工作，在"正—反—合"的逻辑中，他不做正题，也不做反题，而选了合题。

"合"，要兼容对立双方。没有对立，文化建设便会偏于一端——或趋于文化激进主义，专以革命为能事；或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抱着国粹守节而终。严修治学，实事求是，使学理不离常识，他认为实事之"是"，常在"合"中，"合"就是"执两用中"，而"用"，就是要一点一滴的做事——实用，着眼于解决一个个"问题"。

年初，他致信黄炎培，将中华实业银行捐助职业教育社 200 元钱，以及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共捐 500 元，通过大生银行汇寄，扣除汇费共得 693.07 元。并附寄捐助单位支持教育的两封原信，这些捐助单位都有严修的股份。

他帮助老友徐世昌，在天津发起组织"四存分会"，还亲自起草"四存分会"缘起及章程各一份，并为"四存分会"筹措款项。为募款

事，他又去拜访周学熙、言仲远及立兴洋行等。

为修整文庙、扩建私一小学事，他与林墨青等地方士绅成立文庙岁修办事处，筹款重修文庙，并赞助林墨青筹办广智馆；他还热心支持高凌雯重修天津县志，与他共同剔抉爬梳，斟酌取裁，并尽出自己藏书，以资参考；福寿宫要修纬道，他慨允捐资，亲率儿孙数人，乘人力车到福寿宫省视，丈量所修纬道之长短。

如此等等，几日日不断，但他的工作重点，还是在为南开募捐。

他到南开大学去，与华午晴商借南开园，搞一次城南诗社聚会。为此，他又开始张罗起来。到大胡同稻香村买酒，到中华售品所买食品，然后放舟八里台，泛游南开园，在望海寺、宁家大桥先后登岸，“终日唱和联句，诸公系不停发挥”。如此募捐，可谓“春风潜入，润物无声”，也可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耶？中华友爱会捐款交于严修，由严修转交南开；老友言仲远夫人去世，拟将其夫人遗资助公益，严修亲往南开大学会见张伯苓，商议捐款用途。此外，潘馨航捐洋槐、杏树 1300 株，王益孙捐碧桃、榆叶梅 200 株。

募捐之余，他依然按部就班地读书，写字，访友。

这一年，他重温《易经》最力，读《维摩诘经解义》次之。老而好读《易》，乃儒家之传统，孔子开了一个头，严修也不例外。读《易》以求“知命”，“知命”而能“耳顺”，“耳顺”便能“从心所欲”。

生日，他还真的“从心所欲”了一回。他不愿烦扰亲友，一个人跑到北京，观梅兰芳演《红线盗盒》一出戏，因数年之久不观夜剧，此日破例，反不成寐。

自李嗣香老人劝读佛经，他便日日点读《维摩诘经解义》，后来又有人劝他研究基督教，遂作《有人劝研耶教》一诗以明志：

吾道衰微彼教兴，此读十诫彼三乘。
平生心契河间语，颇敬如来不信僧。

此外，他还选温《左传》、《史记》、《汉书》、《晋书》、《全唐文纪事》、《经义述闻》等，新读《宋诗纪事》、《云麓漫钞》、《涵芬楼文谈》；暇时阅《不忍》及《学衡》。《不忍》是康有为主编的杂志，值此军阀耀武扬威，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康欲以其“不忍人之心”号召天下耶？

"不忍"而欲"有为"——甚矣，康衰也！

听说康有为来津，严修前往拜访，就中国政体问题，相谈了一小时左右。康回访，仍接着上次的话题，滔滔不绝讲了一小时，"仍申复辟之说，但主虚君共和"。有趣的是，严修虽然很有耐心地听他唠叨，却并没有请他去南开演讲。而此时，康的学生梁启超却在南开传道授业，忙得不亦乐乎。

是年，严修重临《曹全碑》、《玄秘塔》，成古、近体诗50余首，均见于《诗存稿》。其中《伏处既久，忽蒙勋章之宠，矍然有作》诗云：

脱却朝簪春复春，不夷不惠等闲身。
犹闻此日呼参政，难免他年诔大臣。
妄拟遗民原不敢，谬加新宠太无因。
极知名器无轻重，只是何须及此人？

"不夷不惠等闲身"，严修自谓也；乱世而能"闲"者，舍严修其谁也?!其闲也，非"以不仕为隐，以不事事为高"，而在于从容乱世，有自知之明。他说：巢、许洗耳，后世艳称，以修论之，殊无足取，假使在位，溺职无疑。盖不能皋陶，始不得不巢、许，既适懒散之性，复攘高洁之名，此修所至不屑也！

他既不愿蝇营狗苟空耗于官场，亦不屑装腔作势虚度于隐者之林。世利非不营也，投资开平矿、启新洋灰公司、北京电灯公司、制胰公司等，一以实业强国，二以取利兴学；时政非不问也，终日矻矻、孜孜以求者为何？育才救国，此乃大时政也！

屡征不仕，盖不以利禄为荣耳；审视度势，而不愿为反复无常之一政客也。袁氏行帝制，乃断袍绝交于中南海；袁氏孑然去世，则不畏人言，赴京吊唁，送葬至彰德。如此为人，见道义不避斧钺，洁身自好不违世情，决非古之独善其身者之流。

是年，来南开考察、演讲之各界名流络绎不绝，严修择其要者，一一接待。日本学者长井江来津游学，专访严修，二人笔谈六刻钟。此人深于经学，尤熟训诂，于易、诗、春秋、周礼等均有著述，并有诗稿传世。泰戈尔将访华，其使者先至，严修接见，记曰："至南开大学，有英人某君自印度来华，代表英著名诗家塔戈(Tagore)考察

中国教育。塔戈在印度办一大学，注重职业实习，某君携其大学之活动电影，在南开学校开演。”

校董范源濂演讲“第一次大战后欧美教育及其特点”，严修前往听之。广州市长孙科来南开演讲“广州市政”，市政问题，是严修最感兴趣的话题。中共创始人之一、北大教授李大钊来南开演讲，严修因病未至。孙中山北上抵津，南开邀之，孙病笃，遣秘书黄昌谷讲“中国工业化之现状”。

(3)学人、政客、阶级斗争

南开日见起色，而北大事犹未了。本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布，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羞与为伍，辞职出京。北大学生掀起挽蔡驱彭运动。

蔡拍案而起，缘于北京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罗为北大兼职教员，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时为“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因卷入直系内部矛盾，而被诬入狱。不久，案清，罗被无罪释放。而教育总长彭允彝竟向军阀献计，要求复议，使罗再次蒙冤入狱。蔡深信罗之为人，不平则鸣，遂愤然辞职：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转引自张晓唯著《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第117页。

随即发表《不合作宣言》，向世人表明心迹：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痛苦极了《蔡元培评传》。

相比之下，严修幸运多了，他身无官差，没有那么多的“不愿意”，虽未能“从心所欲”，却还算“耳顺”，除了“耳听天命”——服从自然规律之外，主要便是听从内心的指令——道德律令；如果说蔡元培还在必然王国里忍受煎熬，那么严修已进入一个他能游刃有余的相对自由的王国。

严修不仅放得下名利，而且斩得断政治；蔡元培虽然放得下名利，却斩不断与政治千丝万缕的因缘，这因缘使他痛苦万分，而又不能自已，只见他们一天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力。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他实在不能再受了。

"不能忍受"的岂止是腐败？更有着来自朋友的误解。

章太炎主张联省自治，以浙江督军卢永祥为北人而欲驱逐之，蔡却主张南北停战息兵，章氏即斥之曰："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蔡即以"南人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来为自己辩解。而小人的诬陷，更令他百口莫辩，一筹莫展。有人断定，他是南方的奸细，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借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我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见罗志田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何况北大毕竟是官学，办官学者如何能自由！然而北大又究竟是北大，叫蔡如何放得下！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举行"五四"纪念游行，捣毁教育总长彭允彝住宅。这一次，南开大学安然无恙，连严修也前往南开大学买入场券观看华北运动会。近代以来，像严修那样，既能坚持政治原则，又能划清与政治界线的人物，可谓绝无仅有。胡适曾自称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是话音刚落，他又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政治来。好在他只是谈谈而已，还不至于去做实际政治的傀儡；他偶尔也到政治舞台上去跑跑龙套，但还不至于被肮脏的政治泼得狗血淋头。

做实际政治的傀儡是很可怜的，他被人操纵，被人玩弄，然后便如刍狗一般被人抛弃。黎元洪就是一只不识时务的刍狗，他的日子比徐世昌更难过。

北京政府各驻外公使因使馆经费积欠多月，联合向外交部总辞职，并提出警告，若再不给经费，将于7月1日一起下国旗回国。随后，接连发生冯玉祥率百名军警保卫国务院索饷、北京警察全体

罢岗索饷威逼黎元洪事件。曹锟在天津收买无业游民组成"公民团"，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黎元洪退位。

黎被逼，弃职出京，逃往天津。临行前，将总统印信藏法国医院。车至天津，为直隶省长王承斌扣押，黎被迫交出总统印信。冯玉祥通电维持北京治安。严修闻讯，往见黎元洪，询问情况，安慰片刻即出。而此时北京国务院高凌霨等宣告代行总统职，黎元洪在天津租界通电声明，予以否认。黎元洪如丧家之犬，由津抵沪，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决定不予理会。

旧国会参、众两院，凡拥曹驱黎有功之议员，均收到曹锟所赠500元。北京甘石桥俱乐部为曹锟贿选发支票600余张，每名议员一张5000元。于是，召开国会，选举总统，590名议员到会，曹锟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曹锟自保定入京，宣誓就职。

曹锐在津宅为其兄举行庆宴，庆祝曹锟当选总统。出于礼节，严修前往道贺，并看望六妹曹锐之妻，叙叙家常。

曹锟就职，当务之急，先要解决黎政府留下的两笔积欠问题，一笔是政府对于北京国立八校的积欠，另一笔是政府对于驻外各使领馆的积欠。教育部全体职员因经费积欠已久，决定定期拍卖书籍物品。

北京国立八校因经费无着，校务无法维持，一致议决，实行停课，以示抗议。恰逢苏联外交代表照会北京政府，表示愿放弃俄国庚款，用为北京国立八校经费，曹即移花接木，以俄国庚款为基金，发行库券500万，先解决驻外各使领馆的积欠。

此举，不仅引起学界的反对，而且苏联代表团也向北京外交部抗议，反对以庚款充库券基金。北京学界根据苏联代表关于以庚子赔款充教育基金宣言，反对财政部用该款为库券基金。顾维钧遂宴请教育、银行两界，允另拨教育费。

这一年，苏俄在华活动引起各国关注，还在年初时，苏俄代表越飞曾由北京南下抵上海，与孙中山首次会晤。会谈之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从此，孙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接着，孙又发表《和平统一宣言》。

人同此心，严修夜不能寐，遂成“弭兵”诗一首：

朝菌蜉蝣度此生，每逢改岁辄心惊。
积薪厝火空长叹，残烛当风剩小明。
阳九于人少情愫，大千何世是升平？
望梅聊止斯须渴，向戍居然议弭兵。

和平当然要“弭兵”，可统一呢？难免要用兵，和平统一作为口号可行，而实际上自相矛盾；武力统一一时虽然甚嚣尘上，但用兵有余，扰民有余，统一还是画饼充饥，何况时人对统一的要求并不高，“使段家将而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矣”，人民反对的是那种“既不能战，又欲强战”的“武力解决”。

当严修喟叹“弭兵”时，一场更为深刻、更加剧烈的社会革命已然来临。是年，周恩来在法国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而陈独秀则宣传阶级斗争。在陈看来，胡适整理国故显然已经落伍，那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的无聊把戏。放在社会革命的大盘子里，整理国故不过小菜一碟，惟有阶级斗争能拯救中国。

严修虽然通古今之变，但他无论如何也“通”不到阶级斗争的逻辑上来。还是张伯苓理解他，在南开中学开学典礼上，张伯苓还在一如既往地作“老生常谈”：要培养学生自主、独立、负责任；做主人，不做奴隶；奴隶好做，主人难当。

3.“中国文艺复兴”与民族主义觉醒

(1)“中国文艺复兴”：国粹与革命

1924 年，严修 65 岁。

孙中山联俄、联共，联出了新的历史契机——北伐。

联俄是大势所趋，刚过完旧历年，得风气先的学界就开始行动起来。先是北大教授 47 人致函外长顾维钧，请速恢复中苏邦交；接着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无条件承认苏联；北京 9 个教育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抗议他国干涉中俄邦交。

国民党因势利导，在广州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廖仲恺主持，孙中山主祭，并手书“国友人师”祭幛。国民党亲苏，开始引进苏联的组织方法及体制。对此，胡适评价颇高，他说，孙中山“以俄为师”，符合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方向，国民党从俄国学到的组织方法，是中国自向西方学习以来的第一个认真成果。

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游离在运动之外，其个别党员投入运动，如蔡元培等，是以个体的方式，而非以集体的方式；他们所表现的，是文化的个体性，而非党性；作为一个党派，国民党缺乏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胡适给国民党补了新文化一课。他以国民党1923年的联俄、联共为标志，将“中国文艺复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西化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是以北伐为代表的国民革命；联俄是西化的结果，而联共则是北伐的需要。在联俄、联共的旗帜下，“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见罗志田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在胡适的视野里，无论整理国故也好，国民革命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只是路径不同，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前者缓进，后者激进；前者深入传统，后者开辟未来，在未来的某一点上，两者殊途同归。胡适主张缓进与激进并举，整理国故与国民革命双管齐下；陈独秀早已舍弃缓进立场，而专恃激进；严修则恰恰相反，依然偏于缓进一路，在一点一滴的建设上下功夫，因而以65岁之高龄，且以多病之身，而有“崇化学会”之动议。

“崇化学会”之议，亦“中国文艺复兴”之一部分耶？该会之名，虽取汉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之意，有“鉴于国学日微，将有道丧文敝之惧”，但其总的价值取向，似与胡适整理国故、章太炎之发扬国光大同小异。不同在于胡、章二人重在倡导，而严修则力行。

对于联俄、联共，严修未置可否，对于国民革命，他也只能听之任之。可他的学生周恩来，却成了当时联俄、联共的活跃人物，国民党人对他评价甚高：本其过去工作，判断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精卫、胡汉民诸老同志之下。旅欧中共组织也认为他“对主义有深刻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

周恩来归国后，没有去看望一直资助他，并对他抱有殷殷期望的严修，而是直奔广州，一头扎进黄埔军校，参与北伐策划工作。从此，直到严修逝世，两人都不曾相见。多少年以后，他在谈到严修时说：他是个旧社会的好人，曾经帮助过我。

近来，严修身体有些好转，一连几天，将藏书加盖蟫香馆印章，并登记在册。可不久肿瘤又起，时常夜半疼醒，醒来时，以背诵杜诗来分散注意力，淡忘疼痛。又命孙仁泽率仆人将“九通”、“二十四史”及其他书整理出来，捐赠南开大学。其时，段祺瑞下野，与严修来往颇多，托人送严修“返老还童法”一册，又赠云南棋子木匣、矿泉水、葡萄汁、茶叶等，还派人送来中医偏方。

宋则久来探望严修，严修即兴作诗一首，《山有蝉，其声如弹棉。宋则久云，他山无此蝉，蝉亦不他往，闻而豪之，为赋一绝》：

千山五月竞鸣蜩，一壑能专亦足豪。
暂过别枝良自便，不须更羡彼山高。

主义如蝉，争鸣不已；蝉鸣主义，闻新则喜；严修如蝉，自有主义，然“一壑能专”，教育救国而已；于此千山主义，万壑蝉鸣之时，他“自鸣得意”——“不须更羡彼山高”，守定根柢，便能自了。

病中，温《老子》、《后汉书》、《先正事略》，读《诗学问难》、《南部新书》、《程春海先生集》、《方朴山古文》、《纪文达集》、《钱竹汀集》、《翁覃溪集》、《朱石君集》、《钱香树集》，有时对照译文，看英文小说十余种，自吟诗三十多首。诗云：

陌上花开缓缓归，眼前浊酒待君挥。
法官今代无诛赏，悖史他年有是非。
寂寞村墟鸡犬尽，纵横城社鼠狐肥。
斯须未遣惊魂定，闻道南山又合围。

病夫之悲怆，何其悲也！惊魂未定看神州，但见“寂寞村墟鸡犬尽，纵横城社鼠狐肥”。“鸡犬尽”，则民不畏死矣；“鼠狐肥”，则军阀将为财死，为食亡也。

妖星起灭遍神州，炊浙家家迹剑矛。

垂死鹿犹天下逐，将烹鱼且釜中游。
等闲辇路生秋草，见惯降幡出石头。
绝口不应谈世事，屠苏一酌散千忧。

老人之愤世也，曾经沧海，岂是为赋新辞耶？所谓民国，如"垂死鹿"，如"将烹鱼"。逐之，猎之，不如放之；水煮之，火烤之，不如使游之。统一一旦成为大众话题，北洋政府"武力解决"方案便一一破产，国人遂将目光转向南方，对"北伐"拭目以待。

(2)严修论战："佳兵总不祥"

不久，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严修关注战事，每日均有日记记载战况。而孙中山却决定乘江浙战争爆发之机督师北伐，发布《讨伐曹吴告军民文》。南北遥相呼应，张作霖派兵15万分六路向直系进攻，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兵分三路进攻奉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在热河和冀东一线爆发。

严修日记记曰："北京下讨伐令"，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

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规定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建国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县为自治单位，由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把"主义"拿定之后，孙中山在韶关大本营接见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又派徐谦为冯玉祥军慰问使，直系将领冯玉祥在滦平召集部将密定班师回京计划、准备反戈一击。接着，冯部由热河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改组内阁，通电和平，直系战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并撤吴佩孚职。冯在北苑召开会议，正式组织国民军联军，并提出"建国大纲"，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又请段祺瑞任国民军大元帅，出山维持大局。冯的安排是：孙主政，段主军。

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段祺瑞，允即北上；张作霖、卢永祥等联名通电，推段祺瑞为联军统帅。吴佩孚亦回师来津与冯部决战，两军在廊坊、杨村一带激战，天津局势紧张。

严氏女学、蒙养园暂时停课，子女孙辈亦分赴安全地带避难，

严修留守。战事吃紧，严修无事，点看《汉书》之"帝纪"、"后纪"，又派仆人到三河打探战事消息。闻"曹仲珊曹锟通电退位"，"吴佩孚退至塘沽"，又率残部自塘沽登舰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天津城门外有溃兵骚扰，严修安然，点看《李文忠集》之"朋僚函稿"。

冯玉祥派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迁醇王府，并资遣太监宫女。严修阅报，"知昨日宣统皇帝被迫迁德胜桥醇王府，并由国务院发表修正优待条件。此次直奉之战结果，使国民党势焰增长而清室危矣"。遂赋《感事》诗一首：

翠辇仓皇出上阑，池殃奚恤旧盟寒。
辟人铁骑排关入，委地铜驼忍泪看。
扃镝重重九天阊，觚稜黯黯五云端。
可怜日下黄金阙，独照宵深白玉盘。

早七点钟，忽闻枪声起，人心大慌。原来是火药车失慎爆炸，由军队救止。严修收到冯玉祥来电。同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查封宫殿。据《民国日报》载，经清点，清室共有古玩、金钱、玉石、字画等30余万件，价值10亿元。孙中山电告张作霖，发表北上宣言。严修记曰："冯玉祥自京来津，张作霖自奉来津。"三方合作，结局如何，严修没有信心。撰《病小愈寄诸同社》：

病床五十日，况味百千尝。孰使命重续，平添梦一场。
急峰森血刃，残叶战秋霜。决胜归天幸，佳兵总不祥。

兵者不祥之器，不管以什么名义用兵，严修都反对；佳兵也好，恶兵也罢，总之都是杀人如麻，他开始看《曾文正书札》。

先是反对后来又转而支持北伐的陈独秀认为，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开明的军事独裁虽然"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统一的中国"可为"民主的中国"打下基础。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以恶破恶，终归于恶；以战去战，必然导致专制。"佳兵总不祥"，乃老成之见，非书生之论也。

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推举段祺瑞为"中

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北京临时执政府举行首次国务会议，决定取消总统府、国务院。随后，提出维护不平等条约、取缔废约运动、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等，并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以抵制国民会议。值此孙中山北上之际，可谓登屋抽梯。

冯玉祥的国民军，亦被奉张步步挤压，而不得不退避三舍。终于战事再起，“传闻冯军退至廊坊”。混战之中，孙中山抵达天津，受到两万人的欢迎。民心所向，归于北伐，然而此时北伐之始作俑者，已是抱病之躯。战事稍息，天气甚寒，严修前往刚刚开学的女学、蒙养园，忽感风寒，大病。

(3)中国教育精神的独立：“崇化”与“土货化”

北京事变后，张伯苓认为，国人素有不问国事的毛病，经此次大乱，当亦有所改正。内乱纷纭，虽非国家之好现象，但一班醉生梦死之国民，当可由此而醒悟。这也是对国民革命的一种同情的理解，由革命而醒悟，以革命改造国民性。

本年张伯苓曾发表演讲，再次强调南开教育宗旨在于“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惟一方法，厥在教育”。而教育之重点，已悄然转向民族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大势所趋，另一方也是由于南开教育趋于成熟。

民族主义表现在教育方面，首先便是所谓教育主权问题。中华教育改进社倡议收回教育权，严格外人在华办学的注册办法。随后，在广州、芜湖、长沙、南京、上海等南方城市的教会学校，一共发生了 20 余起旨在收回教育权的大规模学潮。

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北京学联等 50 余团体组织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并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接着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发表宣言：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关税、司法、教育三权，反对专制复古教育。

如果说以整理国故为代表的国学改造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中，以其多少有些“收放心”的味道，而表现出某种深沉含蓄的民族主义的立场，那么在国民革命的风暴中，民族主义的情绪则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打倒列强，除军阀”代替“打倒孔家店”，成为

时代最强音而执中国政治文化之牛耳。

相比之下，严修的“崇化学会”的动议，还那么循规蹈矩，思不出其位，采取了低调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仍在胡适画的整理国故的大圈圈里面，而张伯苓则从教育的实际出发，在南开大学发起了一场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教育改革。

早在当年5月份，北大、清华、南开等六大学国语演讲比赛在北大举行，南开代表潘景武以《中国大学学生之新使命》为题作演说，这篇获得第一名的演说，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激情，他大力抨击现行教育，指出：“现在大学教育的去向，似乎是要造成欧美的的国民、西洋的博士，进一步说，就是中国的教育精神还不能独立。”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国的教育，“以前专抄袭日本，现在转过头来，又专迷信欧美。这种盲从的办法，和教育的原则真是背道而驰！”他还质问那些出洋博士，“有几个能把他们在课本上学的一点外国死东西，适用到中国社会？”

这话好像是专门针对南开来说的，南开中学引进的是日本模式，南开大学学的是美国模式，后来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将这两种教育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与中国需要最宜之教育制度”有两种：一则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前者专为计划个人之发达，后者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敝校南开，多半以二者为圭臬。此二者，一为自由化教育，一为纪律性教育，本相抵牾，而南开则双管齐下，并于不同阶段有所侧重，中学侧重日德式，大学侧重英美式。但有一个问题南开还没有解决，那就是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化的问题不解决，教育救国从何谈起？

潘的演讲，涉及南开教育的根本精神，但尚未引起校方高度重视，待到一篇惊世骇俗的奇文——“轮回教育”出来时，遂在校内引起轩然大波。该文作者是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化名“笑萍”在《南大周刊》上发表的。

所谓“轮回教育”，就是在教育的怪圈里转圈圈，转来转去，转出两个圈圈。一个在国内打转转，即从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后再回去教中学；另一个则转到国外，即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留学归来又再教大学，如此循环不已，误己误人。

大学毕业教中学，不过用些半中半英的话来唬学生；留学生回来教大学，便完全用美国话来唬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什么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教育，好像美国传教士一般，喋喋不休的美国……美国……美国……

于是，作者诘问道：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这样就算是救国？！这还不够，作者还要进一步追问下去：最后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逃出这轮回呢？果如佛家的轮回，人人不能逃吗？再重说一遍，"轮回教育"能救国吗？

不久，英文《华北明星报》将文章译成英文，京沪各报也竞相转载。以美国留学生为主的教师阵容，对此反应强烈，一致议决，并致函校长，表示此类不满言论，若果出于多数学生之意见，他们即引咎辞职。张伯苓招来学生会会长和《南大周刊》出版股股长询问，二人表示"一切言论均由全体学生负责"。

伯苓无奈，对于学生的意见，他表示同情和理解；而老师的抗议，在他看来，更属于正当要求，对立的双方，其实是互补的，只是需要沟通和谅解。为此，他请出了校董会的校董们，范源濂、胡适、丁文江等，个个都是学贯中西的大人物，他们不仅可为学生师表，也可为南开教师师表，由他们出来调解，风波渐渐平息下来。

然而此次风波却启发了张伯苓的一个伟大思想："土货化"。此后南开教育便循着这一方针前进。严修"崇化"，虽不如"土货化"那么直截了当，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他们在经历了自由主义的洗礼后，又都回到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一个要回到国学的老路子，以求"返本开新"；一个要回到中国的现实，建立教育独立的基础。两条道路不同，而大方向则一致，都是要寻求中国教育精神的独立。这是一种兼容了自由主义观点，并受着自由主义引导和驱动的民族主义立场。

本年，南开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是1545名，其中出身商人之家的占45.6%，出身实业家庭的占13.9%，出身政界家庭的占26.7%，当时就有人称南开为贵胄学校，这样一所学校，其实是偏于保守的，保守的酒药子，有时反而容易发酵出新民族主义。

南开学校越办越好，政府也开始给予部分补助。从去年到今年，政府共补助南开各校经费382000元。对于南开来说，真可谓雪里送炭。因为今年"最大难关临头，即本校经费是矣"。学校三部均有亏空，得此补助，南开学校又渡过了一个难关。

严修也在渡难关。住院期间，燕京大学聘他为名誉董事，他欣然接受，致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被聘为燕京大学名誉董事表示感谢，信文如下：司徒校长阁下，顷由津舍转到惠书，敬悉一是。贵校落成在迩，极佩卓筹，承示以鄙人附入名誉董事之列，尤为荣幸。但衰老且病，不能效劳为可愧耳。严修老矣，能无恙乎？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然而，人有病，天知否？

4. 病夫之忧——民国招牌下的党和军

(1)病夫之忧一：民与国有病，谁治？

1925年，严修66岁。

除夕，严修与儿孙共度春节，在家中听留声机，并与智怡儿及孙辈一起高唱皮簧。智怡先唱"黄金台前"，严修自唱"盘关"一段。除夕夜，爆竹之声甚稀。听够了枪炮声，难得苟延残喘数日，能清静一时算一时，鞭爆不放也罢。

段祺瑞上台，沐猴而冠。这个早已过时的人物，又煞有介事地执起政来。他电邀孙中山、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邀唐绍仪、梁启超等30人列席，严修亦在被邀之列。同时发布大赦令，除曹锟与贿选议员及强盗等案情较重者，余皆赦免。

然而，孙已病入膏肓，入协和医院手术，确诊为肝癌晚期，治疗无效逝世。严修记曰："南开学校追悼孙文放假一日"；临时执政府全体阁员悼祭。前仆后继，刚过66寿，严修就赴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肾病，子孙16人随侍，还有诸多朋友伴送。

入院治疗，病情稍缓，又收到上海商界在京七人请帖。上海商界虞洽卿、严子均等人在聚贤堂宴客、请戏，严修率诸孙赴宴，往观程砚秋《骂曹》，杨小楼、梅兰芳《霸王别姬》，老人嗜戏，不亦乐乎。

车过教育部门前，见车马塞途，遂有感而赋曰：

只道门前雀可罗，依然毂击复肩摩。
纷纭朝局浮云幻，沉滞郎曹旧雨多。
九食三旬官俸禄，十寒一曝士弦歌。
街头卖饼师应记，又见高轩换几何？

严修自注云："壬子、癸丑间，袁树谷尝谓人曰，学部、教育部、尚、侍、总、次长一迄参、佥，十年以来，殆百数十易，惟门外卖汤面饺者，尚是旧人。今又隔十余年，个中人不止百数十易矣，而卖汤面人故当如旧也。"

自京返津，勉强支撑病体，乘人力车至江南第一楼，参加城南诗社集会；又赴南开大学，宴请诗社同仁，饭后乘船游览，待兴尽而归时，他已准备再次晋京就医。严修肾病愈重，再赴协和医院洗治尿道。不久出院，兴致颇高，拜亲访友，阅梁启超、胡适两君所著国学书目，津津有味，自得其乐。返津，不数日，梁漱溟来信，请严修为其父梁巨川遗书之封面题字。梁氏将父亲生前著述，辑为遗书六卷：《遗笔汇存》、《感劬山房日记》、《侍疾日记》、《辛壬类稿》、《伏卯录》、《别竹辞花记》，自己还作《思亲记》一文。

梁巨川生前为严修好友，1918 年自沉于北京净业湖今积水潭。梁氏悼曰："先父已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

致信南开矿学会，并附赠款。忙了几日，身体不适，即赴协和医院治病，稍愈，又返津，阅南开大学 1925 年毕业班全体来信，事毕，再次晋京治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会议，严修因病未与会，张伯苓当选副董事长；原贵州门生姚华、毛邦伟等宴约严修于北京中央公园水榭厅，赴约。

精神略见好，即返津拜访徐世昌、范源濂，到江南第一楼城南诗社聚会。晚，写答梁任公信。两周以后，严修本年第五次入京治病，再赴协和医院洗治尿道。病中，致信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司徒雷登来看望严修。病情不见好转，家人劝至西山卧佛寺避暑，住卞婿别墅，在京子、女、媳、婿轮流探侍，于天伦之乐中常至寺院附近散步。宋则久来访，廊下长谈，在一棵松树下，宋为严修画地图，

言经营地产之利。肾痛减轻，游玉泉山和万寿山。玉泉山距卧佛寺8里，距万寿山6里。下山，返协和医院洗治膀胱，稍感舒适。

数日后，返津，收到《梁巨川遗书》印行本及《中华民国省署全志》。更有喜事临门，侄孙仁曾生子，适为白露节，严修为之取乳名谐音"百禄"，谱名"文禄"，在家静养，享弄孙之乐。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陶行知等到南开大学调查。认为南开大学"办理适宜，教授得法，成绩卓著"，遂给予巨额助款。随后，南开大学正式在教育部立案，学科有文、理、商、矿四种。标志着南开大学已初具规模，严修又一喜也。

而章士钊又委托陈仲骞持亲笔函来访。其时，章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陈以教育部参事兼署次长。仲骞请严修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而令陶孟和代表任事。严修一如既往，婉辞之。北京政府两次欲以严修替代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均被严修拒绝。拒绝一切任命，是严修一贯立场；与蔡为同道之人，自然惺惺相惜。蔡自与北京政府决裂以来，已不复任校事，校长一职，早已有名无实，但蔡的影响无人可以替代。而章此时已声名狼藉，他先是在北师大学潮中，支持校长杨荫榆镇压学生，继而又支持以暴力手段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至酿成流血惨案。

静养数日，严修又赴京，但不是进京受命，而是去洗治膀胱。看了两天病，返回天津。此次往返北京，总算有点欣慰："近来京奉路诸事整顿，自吾国有铁路以来所未见也。"京奉铁路定了新章程，规定凡乘客行李，俱拴牌另存，有专门侍者负责管理运送，到站凭牌领取，不须有人照管。故严修此次出行未携男仆，甚为方便。对于这些琐事，他看得比政府任命、军阀通电还重要，正是这些琐事，使文明一点一滴的积累着，中国亦因此而进化。

他在家养病，偶尔也出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南开大学科学馆竣工，题名"思源堂"，举行落成典礼，袁述之及洛克菲勒基金代表团代表莅会演讲，严修与会。

来访者亦络绎不绝，令严修惊奇者为冯玉祥。冯与严修有一面之识，并无深交，却差人送来食品六种，每种为数至多，受两色；固请，又受两色。严修自问：厚馈之来，不知何意？果然，礼下于人，必

有所求，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博物馆，欲推严修为董事，严修以其一贯态度，一口谢绝。

双十节之夜，严修率诸孙前往南开学校看电影，看完电影，又参加"双十节"游戏会。对于"双十节"，严修的态度起了变化："民国初年，每遇所谓'双十节'者，余亦觉有兴会。今数年来，观念大改矣。"这表达了一种对于民国的失望情绪。

失望，主要是对于"民"的失望。人民，人民，多少罪行假汝之名！国家犯罪，政党犯罪，团体犯罪，军阀犯罪……等等，等等，无一例外，皆以民为本。人民二字，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中，有着一种特殊的阴柔美，它非常漂亮，又无比开放，稍有野心者，都想去占有它，哪怕只生一夜情。政客摇唇鼓舌，用口舌去占有它；文人舞文弄墨，用笔墨去占有它；军阀直来直去，用枪杆子去占有它，当然，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只有作为个体的老百姓，不知人民为何物，所谓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好像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过得去就行。

党，是国民党；军，是国民军；在国与民的招牌下，卖的都是党和军的私货。连军阀也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军，真是千言万语从何说起？人有病，医治；国有病，谁治？

(2)病夫之忧二：家与国有难，谁管？

还是说说爱国主义吧！反正爱国主义是一团泥，可以揉来揉去。

受北京协和医学院之邀，张伯苓去演讲"基督教与爱国"，他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实发生于我的爱国心；守教的真义，并非仅仅的演讲神灵，祷告上帝。我们还用这宗教的能力，改造社会，使国家的地位不在外国之下。可军阀也有军阀的爱国主义，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厮杀不已。

严修记曰："浙江孙传芳有军事行动。"奉张起而应战，连直隶图书馆也驻扎了军队。"吕镜宇(吕海寰)来，要余列名发和平电，明知无益。不得已许之。"于是，和平共进会成立，严修被列33位发起人之中，该会设在英租界。

智怡回家，告知严修，奉军有变故，郭松龄反戈，要求张作霖下野，倡导和平。冯玉祥遥相呼应，通电倒奉，并电告严修。与此同时，北京爆发以“打倒段政府”、“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首都革命”。严修记曰：“李文卿自京来，受段合肥委托，邀余晋京，维持大局。余已命怡儿婉辞之矣。今早文卿来访，仍命怡儿见之。”此前，严修曾封还国务院顾问聘函。又，“连接郭松龄告捷之电，余与郭素不相识，告余何为？大奇大奇！”

天津为奉军控制，“马路上兵已满，每巷口皆有宪兵把守，禁人往来。家中长幼未免惊慌，商略戒备之法，继而知交通复旧矣。倾闻盖过兵矣”。枪炮声越来越近，天津各学校均放假，严家妇雏入租界，暂避卢宅。子孙辈不肯离去，遂在院中堆积石块、麻袋封堵大门。突然，散兵两人，欲闯入严修家，推其大门，为警士所阻，离去。

据报载，有兵警检查私藏枪支者，严修以为如此，便命仆人带他的名片，往见署员问明原委。答曰：若收枪支必有巡警跟随，此非也，或为流寇，当加防范。战乱中，直隶警厅商请法、意、日三国派兵维持租界治安，租界之外，依然枪炮声不断。

天阴有雪意，严修照常点读《南史》，张伯苓来，谈南开防备措施。警署来电话，知照严修，西边已见败兵进城，务将门户闭好。于是，仆辈争相将土囊堆于大门内。仁荫、仁赓、仁绪、仁统从南开学校归来，均于后门入。李琴湘来电话，告知宇维路以北有兵约两万人。严修立刻电话探询，答曰洋兵防护系统一概撤退。仁统将此消息告知其母刘氏，刘氏甚惧，劝严修夫妇暂避，严修不肯，遂自请暂避租界，严修允之，并劝智钟妻携覃孙同往。钟妻初不肯，后允惟婆母之行止为行止。严修遂决定让老伴同儿妇暂避租界亲家。欲雇马车，车夫云，马车不得入租界，于是请李家于租界内代雇汽车。车至日租界，不准通过，只好绕行意租界，过法国桥，至英租界李宅，然后分住李宅和卢宅。严修与仁曾、仁绪、仁远、仁赓、仁荫祖孙六人留守家园。

次日，早六点半，枪炮声大作，冯玉祥国民军占领天津，李景林逃匿英租界。严修正点读《南史》，忽闻枪声降临家门口。询问之，原来是败兵四处掠取衣服易平民装逃遁。败兵挨户叩门，门开则索

取衣服。路遇行人则强使其脱衣服，人力车夫亦不得免。居民及店铺同时闭门，如临大敌。严氏女学大门被撞击三次，皆不能开，又一次鸣枪示威乃去。枪炮声犹不止。

幼梅来电话，嘱严修亲电丁厅长借洋兵；璧臣来电话索要严修名片，以备迎接国民军；郭云夫来电话言南关一带败兵成群骚扰，请严修电警察厅派警察弹压。严修一一照办。

下午，听闻冯军到公园、大胡同等地收败兵枪械。警署又来电话，言本区某客店有败兵四五十人不肯缴械，署员意欲以价收买，求绅商捐助，严修捐50元。

仁绪从南开学校归，谈及南开学校警备情形，又言南开学生组织救济队赴北仓、杨村一带，进行战事调查与救济。张校长也来电话，表扬仁绪有胆识。

教育部派人来南开学校视察，并再次给予高度评价："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对南开学校的经费来源也调查得清清楚楚："该校开办二十余年，经费多系私人捐赠，省署及财厅每年亦有津贴，另有地租及息金两项收入。现中学部每年能收学费10万元，大学部及女子中学部尚未统计。以入抵出，每年约6万余元。至于基金系由秀山堂（李纯）、思源堂（袁太夫人及洛克菲乐）所捐赠。"北京《晨报》很快就转载了教育部对南开学校视察的评价。

但因战乱，李组绅迫不得已，停止了捐款，南开大学矿科停办。本年，严氏幼稚园和女子小学也同时停办，原因也是因为严修晚年身体不好，长期受神经纤维瘤的折磨，非常痛苦，手术治疗后体力更弱，没有精力过问学校事务；加以本市陆续增办了一些女子学校及幼稚园，南开学校业已增设了女中部，小学部也在筹建中，故严修认为，严氏家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尽管精力不济，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助林墨青，建成天津广智馆。该馆，仿济南广智院，因规模较小，类似一个小型博物馆，故名馆。该馆的作用主要是展出天津土特产品、工农业生产程序、科学常识图解、风俗习惯介绍等，以开启民智。

病中，他仍读书写诗不辍，温《后汉书》、《南史》、《文心雕龙》、

《历代诗话》、《皎然诗式》、《白香山诗集》、《渔洋诗话》、《瓯北诗话》、《寒庄文集》、《读书敏求记较证补辑类记》、《西周史徵》等，更手钞《古诗十九首》、《文选》及其他古诗，以及《瀛奎律髓》250首，间亦临帖，为人书联及匾额多起。一年来，因病缠身，会客极少；入京七次，全为治病。避暑西山月余，往来亦多故旧亲友，如徐世昌、范源濂、梁漱溟、王静安、王劼孚等。

年初，清逊帝溥仪即潜至天津，避居张园日本租界，托庇于日人，做起第一号寓公。清室遗老遗少竞为寓公而来津者络绎不绝。庆亲王载振、曾任驻德公使的载涛、奕劻之子载伦、溥仪之父载沣、户部侍郎及练兵大臣铁良、军机大臣及阅兵大臣那桐、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天津海关道蔡绍基、两广总督张鸣岐、原直隶提督马玉昆、工部右侍郎张翼、清宫大总管"小德张"张兰德等，先后皆来天津做寓公，虽为旧识，而严修迄未一往。尝语家人曰：日人居心叵测，逊帝一入牢笼，终难摆脱。日后必有意外演变。

严修预言屡中，其言袁氏不宜任总统，又言帝制必败；见周恩来，而曰此人有宰相貌；言溥仪寄人篱下，终为日本之傀儡。历史证明，无不一一应验。

5. 据乱世——"严修记曰"

(1)乱世绘之一："枪"与"抢"

1926年，严修67岁。

战火纷飞，各路军阀纵横捭阖，结成新的攻守同盟。

直鲁联军组成，总司令张宗昌，前敌司令李景林，总指挥褚玉璞，兵锋直指冯玉祥。冯玉祥欲与吴佩孚联合抗奉，电段祺瑞，辞本兼各职。吴佩孚不买账，反以冯为头号敌人。

直隶风云又起，督办孙岳来访，因严修身体欠安，孙快快而归。

军阀翻云覆雨，严修司空见惯，居家静养，读诗，读史，悠然兴会。范文澜来信，与严修讨论历史问题，《日记》载："收范仲沄信。"又阅读孟威宇著《中国近世史》，以过来人眼光读史，历史栩栩如

生。

数日后，严修回拜直隶督办孙岳，以及政务厅长、警察厅长、警察处长、财政厅长、教育厅长等，各家小庙，各路神仙，一一拜到。

不久，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联名通电，誓师讨伐冯玉祥。

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以山海关、秦皇岛为界，布置防线。

陷于奉直联军夹击，冯玉祥节节败退，一时谣言四起。传言南开大学及八里台一带有溃兵，人群纷纷迁逃；又传孙岳离职，城内发生乱兵抢劫住户，有居民中流弹而死者。严修正焦急，孙辈仁远、仁叶、仁驹赴校未久即归。他们告诉严修，因国民军撤退，人心惶惶，学校暂时停课。天津警视厅也来电话，请严修出面，率津绅维持地面，绅商之意，请租界出兵，协助治安。

冯军退，张、褚军入境。严修往见褚玉璞，褚避而不见。奔走于各军阀之间，终无善法。天津狼藉一片，一会儿某家被抢，一会儿某某被害，某某中弹身亡。

严修居家，本欲静养，然而兵荒马乱，友人纷纷告急。蔡清臣来信，津浦路局已久不发薪，暂向严修告贷；不久，又再贷。华璧臣亦来告贷，以济燃眉之急，华家尚且如此，百姓更可想而知。宋则久派人送信来，言国货售品所被警察包围，请严修想法维护，严修力不从心，命怡儿前往处理；文庙岁修，催捐款到位，严修于次日送到；又捐红十字会 20 元。台孙来，欲借 30 元钱，以维持直隶图书馆门面，严修暂给予下半月费用。不久，台孙又来，严修因身体不适，未见，嘱家人将最近书联润笔费 30 元及书画、扇面费 5 元，给台孙作为维持津贴。“李善人”家子孙来求助严修代售家藏古书，因嘱家人先送 5 元钱接济，然后以博古斋古董目录来核定价格，费时颇久。

赫赫有名的天津“八大家”，此时已每况愈下，昔时盛况，早已成了昨日黄花。其实严修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相比之下，以往各路军阀多少要给严修一点面子，历次军阀混战，严家均安然无恙，所以严家的产业还能维持下去。可此次严家也被勒索，三河盐店来信，言城内驻兵一团，索供给万元，磋商至三千。严修亦无奈。军阀只要钱，只认枪，有了“枪”，就可以“抢”。

圈读《苏诗》，兴味正浓，璧臣来言，有人劝迎张、褚军入城，问

严修意下如何，严修不语。李某专程从北京来，乘汽车，奔波战途，与各方接洽，知均无和意，估计一两日内有大战，特来找严修商议，希望严修再出面劝各方停战。与此同时，严修收到19省国民代表会议呼吁和平的电报，在对和平的祈求和展望中，在津亲朋好友不顾兵荒马乱，纷纷来严家为严修祝寿。

奉直鲁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国民军驱逐段祺瑞后，离开北京，退往南口，撤向西北，奉直军阀入京，控制北京政权。京东杨各庄一带，尚有零星战事。奉直军阀以扑灭赤化为借口，查封报馆，搜查北京9所高校，诸校师生及文化人士纷纷南下。严修在天津看不到《晨报》，甚急。人告之曰，因战事汽车不通，故未到。实则亦由查封报馆，各种因素错综交织，严修深感局势严峻。

战乱未定，刀光剑影笼罩京津一带，数日来，忽起沙暴，大风扬尘继日。幼梅陪同刘桐轩司令来访严修，刘乃褚玉璞的代表。一周之后，严修、璧臣、幼梅等在明湖春饭庄宴请刘桐轩司令。垂垂老者，仆仆风尘，为刘接风，其心系者，乃百姓之安危；受人之托，为民请命，哪里顾得一己之荣辱。

孙女仁菊来信告知，津浦铁路局开始发半薪，发的都是军用票，到日租界兑换，又打七二折扣。奉直鲁军阀在直隶和东北地区滥发军用票，造成金融紊乱，商业萧条。

以往军阀要钱，都要以政府为中介，借助政府的金融管道，暗渡陈仓。现在竟赤裸裸地发军用票，真是直截了当，有了枪，就可以抢，还管什么国计民生。严修慨叹目下之中国，有党，有军，惟有国不成其为国，民不成其为民。党有主义，军有枪；以主义骗众生，以枪杆子治国民，共和二字从何谈起？

仁菊受房东之托，请严修换写房租折，将原租价年350元改成190元，并托警局更换备案，以应付片儿警的抽捐。严修以为军阀剥削民脂以祸国，欲民之甘心报效，其势不能。何况仁菊房东靠房租度日，抽去两月之租，等于减两月之食。避重就轻，可悯也可怜也！遂如其所请，改写之，并报警局备案。

(2)乱世绘之二：治病与治学

段祺瑞下台后，又回到天津日租界做寓公，严修欲访之，托人

先往通知，旋接电话，请即往。至段公寓，则阍者已候于门，延入谈刻许。不久，段回访严修。

询知严修病情，段谆荐滦州盲医罗朗斋86岁来为严修疗病。严修不忍令年老失明之人来就自己，遂往访之，至段公寓，闻知罗君已移他处，乃先见芝老段祺瑞，芝老坚决不让严修去，而遣人招罗来，亲为严修介绍，并照料诊脉，勤恳可感。罗君诊断后，以为严修腹有停滞，先令服泻药一剂。次日，至严家诊治。

一边治病，一边读书，《苏诗》圈毕，又读《苕溪渔隐丛话》和《汉书》。仅5月，严修就写信15件，写对联53幅，匾额1件，扇面12件，作诗七绝14首，七律3首，七言排律1首，严修的字和诗当时流传甚广。严修6岁入塾，7岁即随师执笔习字，至其终老凡六十余载几乎习碑帖以为日课。所习碑帖以汉唐为主，计有：《玄秘塔碑》、《城隍庙碑》、《圣教序》、《皇甫诞碑》、《史晨碑》、《韩勅碑》、《曹全碑》、《尹宙碑》、《书谱》等，然其致用，终归于唐。

正如其言政治不离实业，其言书法也不离实用二字。尝与智崇书曰：字则小楷最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故其虽习汉碑，而其书法之形仍未脱唐碑帖的范围。汉碑以隶书为主，从篆书中解放出来，自由奔放，气象开阔，脱了篆书的衙门气和贵族气，而颇有几分山野气和平民精神。唐碑帖的法度和汉碑的自由，构筑了严修书法的美学底蕴。清末民初之际，无意以书法名家的严修，竟插柳成荫，以其融会率性与朴厚之书法，与沽上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而为津门四大书家之一。

严修做诗，一如其习字，虽无意名家，然为之甚勤，功夫甚深。

早期诗风，步师门二张张之洞、张佩纶之后尘，为唐宋兼采派。该派主将为二张，严修为羽翼之一，其宗旨在以"宋意入唐格"，而于"宋意"中，又独取苏轼，称"江西诗派"为"魔"，一反当时流行的"同光体"诗风。其后兼采西学，自出杼机，诗风一变。有《自题》绝句一首为证：

五十为诗已最迟，况将六十始言诗。
此生此事知无分，聊学盲人打鼓词。

"五十为诗"，非闲言也，五十而知命，知命而革命，其诗之革命，正如曹聚仁先生所言：摄取新意境，遣使新词语，运用新语法，不受旧律的拘牵与旧意境的束缚；其《入美杂诗》，所用现代术语及外国人名地名之多，并不在后来著名的胡适《送梅覲庄往哈佛大学诗》之下见曹聚仁著《文思》，"严范孙诗"，三联书店。而其"聊学盲人打鼓词"，则渐与新诗合流，且与白话诗相吻合矣。他曾和诗友王守恂先生谈诗：今人尚新体诗，曾见有工新体者，谓我诗颇与新体近之，是何说也？守恂以杨万里诗解之。杨万里诗，乃宋诗向新体诗过渡之桥梁也。

《汉书》圈毕，又点读《南史》和吴梅村诗，补填《苕溪渔隐丛话》缺字，临《尹宙碑》、《书谱》及褚遂良书帖，作《曹恕伯诗稿序》、《郑万青墓志跋》、《金华经籍志序》等 7 篇，古、近体诗 70 余首，其"不知何处过明年"四首，可谓伤心人之绝唱：

不知何处过明年，天许遗黎喘暂延。
九达关河连壁垒，千村人畜化烽烟。
地荒那复容锥立，室毁遑知叹罄悬。
蛮邸槁街今乐土，望他篱下似神仙。

上将旌旗岁几迁，不知何处过明年。
陈余死友惟张耳，僧辩新姻即霸先。
被酒景宗诗草疾，飞书子孺笔花妍。
无人解备舟中敌，牧野前途古已然。

列侯策士久为缘，主是奴非任倒颠。
大似成功能克日，不知何处过明年。
苏张辩口都无赖，盎错亡驱亦可怜。
谋国非忠自谋拙，□臣教战罪弥天。

诵诗太息黍离篇，荆棘铜驼泣涕涟。
已信剖瓜谋渐协，犹闻煮豆急相煎。
虎狼岂肯忘吞噬，鹬蚌焉能独幸全？
横海楼船日游弋，不知何处过明年。

(3)乱世绘之三:“不知何处过明年”

好一个“不知何处过明年”,南开怎么过?张伯苓第一次感到无力回天。鉴于时局不靖,实业萧条,经营矿业艰难,李组绅表示,不得不停止对南开大学矿科的捐款,创办五年的矿科因此半途而废,矿科学生只好转学他系。南开女中以募款2万余元盖楼,楼建好后,入不敷出,亏空巨甚。

张伯苓无奈,写信求助于金城银行经理,云:该项工费结之目下,余尚亏欠3万余元未有着落,焦灼万分。顷因需用孔急,拟请将所集之数即日同捐册一并掷下,藉济燃眉。无论若干,均极感荷,伫盼速惠,不胜祷切,伏惟查鉴是幸。

又致信长芦盐运使言仲远,乞大力支持,于盐商同仁中代为一呼:窃念敝女中此次所成新校由何而能有今日?实自先生捐款提倡始。则即谓今日在校之女学生,皆受先生之广庇亦无不可。惟是春风发萌不限于一拂,雨露生物有赖于频滋,苓不揣冒昧,愿先生对敝女校始终成全之。

女校虽已完工,但亏款3万余元未有着落,言仲远是严修老友,故伯苓直言不讳,以捐启奉上,乞大力代为登高一呼。为此,他向言公表白:想急公好义如先生,自必不以无厌斥我也。

募捐如行乞,尽管伯苓先生一再表白“我不是乞丐”,但学校累计亏空12万元,这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在他头上,真是急急如律令!他致函张作霖,请其“代恳”财政总长潘馨航“设法维持”南开,拨发北洋政府扣押的南开大学债券利息。

而奉系军阀却提出南开赤化及反对日本支持奉军进攻国民军一事,张伯苓致函张学良,力陈南开对学生及其社团“向持严格主义”,以淡化“赤化”二字。同时,他又劝慰学生,对于军阀混战,言之无益,亦不必言,该烂的自然要烂,当死的必然要死,南开的使命,是以教育的伟力,来防止后来的种种变乱。

严修自觉身体渐衰,因病困扰,懒理杂事,日在院中走千余步便可欣慰,然而一闻南开中学遇资金短缺,即前往南开,与校长张伯苓商议筹款一事。当时“赤化”一词甚嚣尘上,军阀以此来定生死

予夺，事关南开安危，严修找来《什么叫赤化》一书，详细地读了一遍，以便于跟奉系军阀打交道。

本年大学方面颇有收获，各种捐款接踵而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再次捐助南开大学理科 2 万元，分 5 年拨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议，三年内补助南开大学 10.5 万元，专为扩充理科之用；教育基金董事会给予南开补助 1.5 万元。

但这些钱都是远水，解不了南开近渴，而且专款专用，救不了南开之急。

严修又约来南城诗社诗友 20 多人，在南开大学相聚，饭后，泛舟南开湖，诗词唱和，好不热闹。言仲远亦诗友之一，以诗助捐，可谓曲径通幽处。

南开校庆，又值女中开学，行交接钥匙礼，朋友们均来庆贺，黎元洪作了演讲，严修正式行聘仪，授予女中校长尹邵徇女士大门钥匙，并在门前照相合影留念。南开压力缓解，严修心旷神怡，遂率诸孙男女至八里台，伯苓亲自备船，呼朋唤友，泛舟游湖，一路行去，恍如世外，众人流连忘返，于湖边小亭野餐而归。

一回到城里，战争的气息便扑鼻而来。先是吴佩孚入京，与张作霖会晤，联名发表讨赤总攻击令；接着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挥师北伐。中原战事硝烟未散，烽烟滚滚又从南来。民国已开生死劫，鹿死谁手，严修能知否？

康有为来访严修，因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康“忧惧特甚”，前日晋京，系催促张宗昌出兵也。康一如往昔，指天划地，侃侃而谈，严修默默，洗耳恭听。

台孙来，告诉严修军阀欲驻军图书馆，严修请政务厅长阻止。言仲远、赵幼梅一同来访，因官产处以开滦矿务局及启新洋灰公司侵占官地罪名，勒罚开滦 500 万元，启新 100 万元。且开特别法庭，传总理、协理、董事及经理讯问。诸公连日奔走无效，请严修致函褚玉璞为之申辩。幼梅已代拟信稿。严修不忍违诸公之意，明知其不可为，而不能不为，并要求与华璧臣联名。诸公乃携信稿往华宅。其时，华璧臣借盛德钱庄款到期，欲延期，钱庄不答应，但允以严修名换券。严修闻讯，二话不说，遂为华氏作担保。

严修叹曰：军事一日不停，暴虐终不得免，且方兴未有艾也。军阀为刀俎，绅商为鱼肉，直隶地区金融与实业界人人自危。为求自保，他们发起产业协会，并派代表与南方金融、实业界人士联络，进行联合自卫运动。严修以垂暮之年，抱病之身，积极参加协会活动。可是一个噩耗传来，不啻如雷贯耳："张四先生张謇于昨日8月23日午时逝世。"张宅治丧处发来讣告，严修默然。

南张北严，并世而立，如今一柱已倾，严修独木能支否？张兄已去，上天乎？入地乎？思之，念之，"不知何处过明年"。风雨飘摇，大乱将至，思之，念之，"不知何处过明年"。

忧心忡忡，严修与夫人举行金婚式，纪念结婚五十年……

6. 严修新私学：南开与崇化学会

(1)乱世绘之四：南开柳暗花明

1927年，严修68岁。

北伐军节节胜利，奉直军阀以为乃主义所致，遂仿效之。孙传芳以"三爱主义"，来对抗"三民主义"；张作霖则在"三民主义"之上加了一个"民德主义"，变成"四民主义"，东施效颦，亦可笑也。

新年伊始，张作霖便发表宣言，要改革政治，"务使百物一新"。然其举措，不外设外交、政治、财政三个讨论会，聘孙宝琦、曹汝霖、梁士诒分任各会会长。此后一切重大问题，均由讨论会决策，内阁仅为执行机关。按以往老例，张另有聘书给严修，一方以礼聘之，一方以礼拒之，还是老一套。

不过，严修精力已明显不济，但诸事忙忙碌碌，还同往常一样。年初，他收到宋则久寄来的国货售品所改组章程，商议改组问题；又前往卢木斋家，与张家口电灯公司诸位董事商议开股东会，改选总理一事。

事未毕，闻华璧臣来，在严家焦急等待，故急急而归。原来华氏又要借钱5000元，来请严修与赵幼梅担保，并于是日立券生效。数日后，华氏又向卢木斋借3000元，还是严修与赵幼梅作为保人。其

时，严修德高望重，可谓一诺千金。

除夕日，严修、孙子文、范源濂、张伯苓相聚南开园，辞旧迎新，话别当年。梁启超以“弘毅”二字，恭贺南开。他以为全国教育破产，而南开岿然鲁殿灵光，靠的就是“弘毅”二字。这两字，伯苓可当之，严修虽老病，亦足以当之而无愧。

刚过完春节，严修偕伯苓赴卢木斋约，卢提出捐资 10 万元，建南开大学图书馆，伯苓喜出望外，在座无不感动。次日，伯苓便陪同卢木斋去勘察馆址。

天津富商王心容来，倡议继设南开女中后，增设南开小学。于是，由心容授意，严修出面，请纪锦斋、范竹斋、金小泉午餐，张伯苓、尹劭询、孟琴襄、卞俶成等作陪，商谈募款一事。严修开门见山，其意明了，席间，心容发言，谓竹斋曰：吾两人认一万何如？又曰：请纪锦翁合乔亦翁认一万金，金小翁合潘家认一万，则建筑费有着矣。所言诸人，皆为津籍富商，如：王心容系在沪经商致富，范竹斋则以经营纱厂起家，纪、乔两家为绸缎商，金、潘两家为棉纱商也。

奉系军阀无中生有，寻了一个校产由头，来找南开麻烦。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讲不清也要讲，不讲更不行。理要讲情理，不要讲真理，真理锁在抽屉里，情理不妨上饭局。

于是，严修在明湖春设午宴。礼请官产处总会办赵孝显，赵幼梅、张伯苓作陪，为南开永租地狮子林将受处分，磋商代迁事宜。赵总会办一点半才到，三点钟席散，到家四点，严修疲极。

次日，于明湖春饭庄赴赵总会办约，张伯苓、幼梅同往。市政局长何子敬在座，为南开学校狮子林租地事，谈定解决方案。第三天，与幼梅、璧臣再次合请有关人士，终于感动门神，晚上，接褚玉璞来电，允保留南开学校学产学款；第四天，张伯苓便将官产处正式函稿送来。于是，严修与墨青、幼梅继续在明湖春公请戒严司令谢益高，副司令周璧忱，财政厅长李奎五，警察处长常采圆，天津县长王圣容，官产处会办赵孝显、高云汀等。

严修表示，感谢诸位为保住南开学校校产所作的努力。强盗不抢了，他放下屠刀，饶你一命，你当然得表示感谢。否则，如张作霖在北京一般大动干戈，私立南开岂非要土崩瓦解？

张作霖放任北京警察厅大肆逮捕学生，声称各校有国民党约万人，共产党600余人，又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各国立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京师大学，刘哲任校长。

为南开，严修可以呕心沥血，不惜老命，可他收到张作霖的信及聘书，却淡然回绝，“收张作霖信（附聘书），次日复信”。即复辞信，无需再思。国务院、教育部再聘严修为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严修亦以“惟修病痿数年，已成废疾，欲如来命，力不从心”辞之。

自知时日无多，他有一心愿未了。

(2)崇化学会：从科学启蒙到文化自觉

崇化学会动议已久，然而尚未实施，他难免耿耿于怀，长叹天不我待！遂率先捐助200元，并代募300元，其《捐启》，劝募云：我国三代以来之文化，一线绵延，卒未中断。惟自海通以还，学人之聪明才力，群汲于外来科学之一途，固有文化反视为不急之务而漠置之。他人我先，已成事实，愈忘既久，陨越堪虞，及早补救，较易为功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

捐启名单如下：赵镜波、蔡虎臣、周熙民、杨临斋、赵聘卿、张聘三、王新农、李琴湘、徐友梅、杨韶九、华璧臣、胡树屏、金俊轩、刘子兰、卞星南、刘幼樵、高彤皆、言仲远、卢木斋、王仁安、赵幼梅。捐启一发，捐款者竟纷纷而来。

严修记曰：璧臣送来崇化学会捐款550元。华璧臣还打电话告知严修，他会晤了天津道吴道尹，吴“甚赞成崇化学会之举，并允先捐五百元”。他让严修再送《捐启》六份，他去劝募，严修即刻命人送去。不久，他又派人送来崇化学会捐款500元。

听说褚玉璞助捐，严修不辞辛苦，亲往取款。其实此款出自赵镜波，而让名于褚玉璞。共计钞票5000元，内除40元现金外，其余皆为省银行票。省银行近来又不兑现，因此，票之信用跌落。租界里的银行虽有收用者，但必须九折，非租界之银行又不肯收。以5000元计，亏折甚巨，但系捐助之款，未便挑剔，仍题5000元之数，“亦不得已而曲从也”。严乡嘱随从点收钞票，与璧臣商议换兑最佳之法。

华璧臣听到有人报告，有军队欲在文庙盖兵房，政务厅已经批准。甚急，匆匆找严修商议，又约几位士绅前往拜会政务厅吴蕴山厅长。厅长惊诧，言绝无此事，当即表示："有吴某在，决不至此。"诸位语塞，璧臣灵机一动，顺便请吴蕴山为崇化学会捐款，约定星期日城南诗社于明湖春早茶时，请吴厅长大驾务必光临，吴慨然应允。

然而文庙驻兵，依然未退，不仅未退，而且已开始画地筹建兵营。询问之，吴厅长亦无奈，只能说明日督办来津，可备一函上交。于是，璧臣执笔，严修、幼梅润饰，拟就致褚督函，反对将文庙改成兵房。

然后三人又为崇化学会选择会址，先看清修院的房子，又至学界俱乐部相地，一时难以定夺，再折回赵宅商议，最后决定以南开杜克臣所捐住房，作为开办处。学会又请赵聘卿担任募款主任，请章式之作主讲，并拟定章程。

没几天，聘卿已募得经费万余元，存于杜克臣平和西栈，月息1分。捐款陆续而来，银行公会捐175元，恒源公司捐1000元……学会如期成立。

崇化学会是与南开不同的另一所"学校"，学会以"延国学之坠绪，衍固有之文化"，"为童年储师资，为学子谋深造"，"讲求国学，补学校之不及"为宗旨，分"义理"程朱理学、"考据"古文经学派、"词章"桐城派古文三科，欲回归国学来探讨文化传承与中西会通。

当年，梁启超欲谋东方文化研究所于南开而未竟，如今崇化学会已经启动，可补当年南开之缺憾。

南开大学全盘西化，受到"轮回教育"学潮的冲击。事后，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始了新的"崇化"，这回"崇"的不是"西化"，而是"土货化"；如果说严修"崇化"是要回归传统，那么张伯苓"崇化"则要回到现实。无论回归传统，还是回到现实，两人的思想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寻求中国教育精神的自立。

严修不同于王国维，他没有那种叔本华和尼采式的悲剧性的文化情结，而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实业精神，来推动他的思想和事业。尽管党派林立，相煎太急，炮火纷飞，殖民蹂躏，都不会影响他

日夜奔走的进程。他乘车前往平和洋行见杜克臣，将周学熙所捐1000元、中华书局6000元以及华新厂4000股票过户收据并存该行，然后拜访蔡虎臣，转告学会进行情况，谈甚久。又与幼梅、璧臣一同到文美斋拜访章式之，郑重请他为崇化学会主讲。

次日，章式之携改定学会课程简章来与严修商议，议定先招收学员23人，暂借严修私宅上课，学员各发以札记本，逐日作自学笔记，每两周由主讲评阅，每月试文两次，成绩采积分法，每季酌给膏火之资，第二年开始分科学习。

又与璧臣亲往文美斋，向章式之面递聘书，并于明湖春公请章氏，传观呈文及简章，诸会员盖章。招考讲习科，分义理、训诂、掌故三门，招生简章见于《星期报》。严修即兴为崇化学会作楹联一幅："大哉言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学者效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通"与"圣"二字，可为严修盖棺论定。

捐款仍源源不断而来，蔡虎臣捐2000元，又捐《十三经注疏》一部、《五史》一部、《经苑》一部，倪幼丹捐1500元，胡楼屏捐145元，卢木斋捐赠图书若干……

9月11日，讲习科开考，严修五点钟便起，七点钟赶到考场私一小学。考生63人，学会董事及友人来助兴者20余人，严修备酒席两桌。次日，章式之携考卷来，与严修共同阅卷，定复试名单。一月后复试，考生35人，经章、严审阅，议定取士23名。

10月24日，严修一大早便忙乎起来，督促仆人打扫罩棚，安排桌椅，以备明日开学。午，备便饭，请学会董事诸人，并商议明日开学事宜，直至晚六点钟方散。

25日，崇化学会讲习科在严修私宅举行开学仪式，董事到者14人，学员21人齐集东罩棚下，拜谒主讲章式之三揖，董事见主讲一揖，学员见董事一揖。然后主讲入座训话，董事分发记札。下课后，董事陪主讲到西罩棚下闲话，至五点钟散。次日，与华璧臣拜访章式之，章免收"修敬"、"执敬"讲课费。

南开度过了难关，崇化学会开了个好头，严修本该心满意足。无奈国事、家事堪忧，午后风雷，暴雨数点，他在廊下圈注《汉书》。院中梨花盛开，廊下悠赏闲吟，惬意无限；不想夜来雨骤，纷笞落

花，情景惨目，痛不成寐，遂挑灯披衣，默展书卷。

黎明天晴，梨花重绽枝头，愈益繁茂……

(3)“党治”主义与文化个体性

赴京治病，春游北海，严修乘马车，孙女们乘人力车，孙子们骑脚踏车，沐浴春光，其乐融融。

赴协和医院，通尿道、洗膀胱后，顺便探视正在住院的范源濂。范源濂病于便血不止，暂无大碍。此为严、范二人最后一晤。

这一天，康有为病逝。康念念不忘复辟，临终前还上书清逊帝谢恩，与严修恰成反照。

严修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政治边缘，他几乎拒绝了所有政府的聘请，与近在咫尺的清室也老死不相往来，而他的朋友们，有的却在政治的漩涡中沉与浮，在政治的起落中上升与降，以至陷溺于宦游的沉浮升降之中，难以自拔而反目成仇。

蔡元培是他朋友，陈独秀是他朋友，蔡、陈二人曾经合作，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而今却因党争成为对手，蔡是“清党”运动的参与者，陈是“清党”首当其冲的中共领袖，学术可言“兼容”，政治却只能“兼并”！李石曾是他老友，周恩来是他小友，当年严修曾托老友照顾小友，而今老友与小友因党争而反目成仇，真是知有今日，何必当初！如此结局，严修能知否？

南方“清党”，北方“讨赤”，李大钊又成阶下囚，当年严修曾营救陈独秀，如今他已无能为力，张作霖毕竟不比徐世昌，对于“赤化”分子，二话不说，一毙了之。他救不了李大钊，却救了范文澜，天津警备司令部欲逮捕范文澜先生，严修闻讯，立即通知张伯苓，请范文澜马上离开天津。惟他不问党派，只管救人。

生日那天，他约了陶孟和兄妹及在京自家子女诸婿等 23 人，聚餐于北京集贤饭店。亲友之间，聊聊天，叙叙家常，于血雨腥风时，亦弥足珍贵。又作《盐税盐价纪略》一文，记近年苛捐杂税情况：

> 丙寅上半年以前，盐税每引十二元，盐价每斤四分四厘。其后加每引产地捐二元，销地捐四元，是为每引十八元，盐价

则加至每斤五分九厘。

丁卯夏，因维持省银行票，每引加四元，又因报效费一百四十万元，每引摊税二元五角，是为每引二十四元五角。盐价增至每斤七分六厘。

此后领引之家，随引先交十四元五角（但其中之二元五角摊至满足报效费一百四十万之数即截止），下余十元内销地捐四元，引地在京榆界者交饷捐局，产地捐二元交运司，维持省票之四元亦由运司交直督，此十元在领引后分期交纳。

报效之一百四十万，张作霖得五十万，褚玉璞得五十万。此外四十万为运动费，张、褚及盐务署之华洋人与运司朋分之。

由发军用票之明抢，转入借盐引而暗摊，土匪也装模作样玩起了经济杠杆，由豪夺变为巧取，此为张作霖"四民主义"政治改革之成效耶？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决裂。国民党内部也分裂，左派在汉口成立政府，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上海、北京银行界共同决定与汉口各银行暂停往来，实施金融封锁。

蒋介石一手抓"清党"，一手抓北伐，两手都很硬。奉军因豫、皖战事失利，决定放弃郑州、开封、徐州，退守山东、直隶，京津仍在奉军之手。严修记曰："是日消息，奉军弃郑州、鲁军弃徐州。"

"党化教育"也随"清党"和北伐接踵而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根据该党"党化教育"精神，议定《学校施行办法草案》，开始在各校推行。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决议，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以大学区取代各省区教育厅。在江、浙两省试行3个月以后，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

蔡就任后，提出教育化、劳动化和艺术化三项教育方针。其教育方针堪与"党化教育"并行不悖耶？笼而统之的"教育化"，是以"党化教育"为前提呢？还是其本身就包含着"党化教育"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离开了北大这方水土，蔡元培便黯然失

色，他的文化个体性，有了北大的人文背景相衬托，才光芒四射，光彩照人。蔡元培在南京革命，革命分裂了他的文化个体性；而他的朋友王国维却在北京自杀，以自杀来了结生命，以自杀来保全并高扬其生命的文化个体性。

6月2日，万寿山前，昆明湖畔，一书生踽踽独行，行至石舫，静坐吸烟，烟灭而一跃，纵身入湖中，呼声骤起，及往救之，其命已绝。自投湖至救起，前后不过两分钟，以其头朝下入水，致口鼻皆为泥土所塞，气窒而死，死时内衣犹未尽湿也。

于衣袋中得遗书一封，曰："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其遗嘱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时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寥寥数语，不为任何修饰解说之辞，其品格风度可想。"见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50页。

五十而知天命，他得到了什么启示？自杀是自由的，死亡是自然的，两者之间，他选择了自由。他的生命中有一道裂痕，他认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是个知真理而又爱谬误的人。在他的本性中，知与爱，理性与情感，岂止背道而驰，简直是两极分化，过于深刻的理性和过分沉郁的情感，从两个极端撕裂了他的本性。性之不存，命将安在？

他爱哲学，却非哲学家；他能洞察真理，却不会构造体系；他用生命去验证，却不懂得假设前提。他是那么简单，由简单而单纯，由单纯而纯粹，在纯粹中，他的文化个体性像水晶一样透明，生命像钨丝一样，既显示真理，也燃烧激情。

他死了以后，有好事者纷纷猜测死因，悠悠众口，何其纷纭？他曾在学部与严修共过事，可严修对于报刊沸沸扬扬的炒作却不置一辞，甚至在日记中也不曾提起。

本年，严修自觉病魔纠扰，寿将不永，因拟定家训八则：

一、全家均习早起；二、妇女宜少应酬；三、夜不出门；四、消遣之事宜分损益；五、少年人宜注重礼节；六、少年人应振刷精神；七、勿妄用钱；八、周恤亲友。

又以近世丧礼多悖古制，亲拟八则，以示子孙：

一、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二、孝子不必作哀启，如作，但述病状；三、不嗡经，不树帆竿，不糊冥器，不焚纸钱；四、乐但用鼓；五、首七日辰刻发引，即日安葬；六、发引前一日开吊；七、吊款客，不设酒，不茹荤；八、通知亲友，不受一切仪物，如以诗文联语相唁者，可书于素纸。见《蟫香馆别记》

家训拟就，豁然而行，会客访友，一切照旧，兴学益世之事，仍当仁不让。闻天津官产处有变卖天津全县学产之议，乃急电呼吁天津县当局，以为学产系教育存在之关键，不可轻易处置，促使原议取消，津门口碑高耸。

7.“其命维新”：中国公民和南开校父

(1)鸡鸣残梦：王国维之死一解

1928年，严修69岁。

1月1日，天津中原公司落成开业，严修接受邀请与会观礼。

手书“中原公司”四字牌匾，又“写中原公司新市八言联一”。

清逊帝溥仪亦应邀与会，严修寻机避开，终未谋面。翌日，津市各报纷纷报道开业盛况，并辟专条发布严修莅会消息，而且将严修的名字排在清逊帝溥仪的前面。

遗老遗少们愤愤不平，鸣之不已，而严修不置辞。

对于严修来说，怀旧是一种文化品位，而非政治选择，偶尔反刍一下生命历程中的老片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

他早已认定，清逊帝溥仪寄居日租界，必为日本人所用。清逊帝溥仪似乎也甘心作为日本人手里的一张“王”牌而东山再起，此

种抱负，除了与其共舞的政客，有识之士无不嗤之以鼻，连忠诚不二如王国维者，也不肯随他来天津，其寄人篱下之深意可想而知。政治破落户，连文化品位也不讲了。

王国维不肯同来，严修不愿相见，可谓无独有偶。

王国维所深切感受到的文化的沉沦和人格的破产，最直接的刺激便来自清逊帝溥仪的堕落。他在南书房任行走时，还兼着清逊帝溥仪的老师。他与清逊帝溥仪感情之深可谓相依为命，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个可以生死相托的亡国之君，正在无可挽救地堕落下去，落在黑暗的深渊里……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在绝望中，他的生命如日落江河，放出灿烂的余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时变，义无再辱。他宁死也不愿看到结局。

后来，日军乘机将废帝溥仪挟持而去，溥仪半推半就，果为严修料中。而其亲信郑孝胥则由天津东渡日本，为复辟帝制，向日本军部和黑龙会寻求支持。

所以，严修干脆不与清逊帝溥仪往来，以免有政治瓜葛和情感牵连。年老多梦，梦中得一诗句："残梦闻鸡醒，余程得骑回。""残梦"，晚清之梦耶？立宪之梦耶？"余程"，民国"余程"耶？共和"余程"耶？醒时不知作何解。

(2)"崇化"之乐与"土货化"之乐

崇化学会分科学习正式开始，严修安排西罩棚作讲舍，与学员一同听讲；又与章式之商议讲习科奖金名单，为学员选定书目，一如当年贵州劝学……每个星期日的上午，学会都要举行作文会试，严修亲临现场，批改作文，乐此不疲严修逝世后，林墨青仍坚持不懈。"七七"事变，学会受影响，直到1945年复兴。

"坐听弦歌，忘寒忘暑"，不知老之将至，是"从心所欲"之乐也；生逢乱世，朝不保夕，"人不堪其苦，而回也不改其乐"，是孔颜之乐也。其乐也，不仅有"崇化"之乐，更有"土货化"之乐。

入春以来，南开大学成立募款委员会，严修为会员。委员会提出：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张伯苓"因再申前旨，力行'土货化'南大"，在《南开大学发展

方案》中，他指出：以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学制、教授和教科书皆来自西洋，学术也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与教育救国南辕北辙。

“洋货化”之弊端，就社会科学论之，可不言而知；即以自然科学而论，亦不能以为洋货均能适用于中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也要求自然科学“土货化”。因此，他断言：今日国人思想之急需，莫过于科学精神和方法，“土货化”，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

按照“土货化”的发展方案，张伯苓大刀阔斧，改弦更张。一方面开设诸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社会学、乡村建设概论等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课程，另一方面增设与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系科，如电机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创设的东北研究会原名满蒙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当时开了我国大学教育与产业相结合的实学和实业化的先河。

年初，张伯苓致函张学良，邀请他为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名誉董事。函云：先从学术方面用教育的方法入手，研究我东三省及热、察、绥各特别区一切对内外问题，以求发达实业而保国土。张学良慷慨允任，并捐洋 500 元。于是，他派蒋廷黻、肖遽、张彭春、何廉、李继侗等赴东北考察研究。

接着来与严修商议，准备亲自前往实地考察。此前，他曾视察东北，目睹“日人经营满蒙之野心”，曰：“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严修也曾多次往来东北之地，早已洞察日人之居心，因此，他支持张校长的东北之行，并为“土货化”的第一步而欢欣，欢欣之余，他自叹老病，不能身体力行。

东北问题，内容包括：东北铁路系统及海港之研究、东北移民之研究及其运动、以满铁为中心的国际外交问题、我国所有研究东北问题诸团体之沿革及其现况等。

不顾东北战事频仍，张伯苓亲率南开大学师生到奉天、吉林、大连、哈尔滨等地考察，收集研究资料，他认为东北建设当务之急有二，“一修筑铁路，一奖励移民”。他们先后写出《东北经济资源与

发展》研究报告和《Wanchuria》(满洲)一书,"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之铁证",日人恼羞成怒,指斥南开"为排日之根据地"。

这"土货化"的第一步,连蔡元培也兴奋起来,他致函张伯苓,指出:研究日本问题与东北现状颇为重要。并请张伯苓指导编辑日本与东北问题丛书。当年,他曾以多少带有点轻视的口吻说道:此君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么……然而"土货化"一出手,终于折服了这位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校长。

经济研究所以民间私立机构,对中国经济作有组织的系统性研究,这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其开辟性的学术工作,如华北地区经济统计研究,天津地区工业化研究,山东、河北向东北地区移民研究等,令人刮目相看,有两点尤为出色:

一是进行物价调查,编制物价指数,并将他们分析的经济统计数字,在《大公报》上开专栏发表出来,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后来,他们又出版《南开指数》,成为经济统计学方面的权威刊物。二是深入天津静海、河北高阳、山东济宁等地,开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和乡村复兴运动,参与"定县实验区"的学术实验。

应用化学研究所则特别强调"应用"二字,本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问题,利用南开大学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从实效来看,天津成为华北乃至全国化工产业基地,其功不可没。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在天津利顺德饭店举行第四次年会,改选张伯苓为董事长,蔡元培、孟禄为副董事长。会议议决,补助南开大学图书馆2万元。张伯苓毕竟是张伯苓,以"土货化"三字为南开点睛。严修毕其一生孜孜以求实学与实业相结合,终于在南开"土货化"实验中得以如愿,其乐也可想而知。

(3)"党化"和"自由化":蔡元培两难

严修致信蔡元培,可蔡元培却乐不起来。被国民党的党务、政务纠缠着,蔡如坐针毡,似苦行僧一般;参与"清党",可又无法面对血雨腥风,对于来自舆论的批评,他无言以对,只好装聋作哑,连他的朋友周作人也忍不住撰文,对他口诛笔伐:"最奇怪的是智识阶

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

他像鸵鸟一样，对批评不闻不问不答，把头埋起来做他的大学区实验。大学区其实是一个教育乌托邦，他的根本点，在于从行政区划上将政教彻底分开，以免大学受到行政的干预，以大学院的学术化管理取代教育部的官僚化管理。

依靠政治势力，而又想摆脱政治的控制，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蒋介石北伐去了，留下教育任尔等折腾，北伐成功了，尔等折腾得也够了，他便回来收拾。

收拾残局，从收拾北大开始，国民政府决定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任命李石曾为校长。不久，又将中华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次年，恢复北京大学原名，由蒋梦麟任校长。北大是蔡的发祥地，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此举逼蔡挺身而出。

蔡要捍卫北大，就不得不与政府唱对台戏，就不能不辞职而去。蔡一去，大学院便随之而去，大学区便要解体，于是，教育部便理所当然要复辟了。其实当时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已不在教育部，亦非官僚化教育，而在新兴的苏俄式的“党化”和“主义化”教育，使教育适应国民党的“党治”和“主义”政治。

官僚化教育多少有些“公务”的色彩，还不至于非要“定于一”，因而还能兼容一下“自由化”，给自由主义留下一点地盘，而“党化”教育则有着鲜明的“党务”色彩，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定于一”，就是要彻底否定“自由化”。

作为党员和作为自由主义者是相矛盾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守住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而作为党员，他首先必须坚持党性，听从于党的绝对命令。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蔡元培，他安身立命于北大；作为党员的蔡元培，他还想在大学区的实验中留一根自由主义的尾巴。大学区收摊了，他将尾巴带到了中央研究院。

以大学区实验来续北大的自由主义，无疑是狗尾续貂，如果说北大以后的蔡元培还有点文化价值的话，那就是他还保留了来自北大的这根自由主义的尾巴。而严修从未标榜自由主义，也不自认

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却有始有终，完整地守住了自己的文化个体性，并以教育与实业来推进中国的自由化进程。我们没有必要去分析严修的文化个体性中，有多少民主性的成分，有多少封建性的成分，在党和枪、主义和强权的交错中，能完整地守住自己的文化个体性，本身就是个奇迹，它需要"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定力。

(4)北伐之一：金融战和主义战

内战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为争夺"控阁权"和地盘，而是为党和主义而战。国民党有三民主义，张作霖有四民主义，不管什么主义，打仗要花钱是天经地义。国民党想方设法搞钱，张作霖也想尽办法搞钱，甚至用刺刀借钱。

决定战争胜负有两要素，一是用兵，二是花钱。主义冠冕堂皇，属于精神胜利法，当然也不可或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言以蔽之曰：当然是钱。两军相争，多算胜，少算不胜，只要坐下来算算账，就知道谁胜谁负了。

决战前夕，东三省发生金融恐慌，奉票大跌价，波及京津，京津银行界在津议决，反对张作霖征收纸币计划，而国际联盟又向中国催索欠款，北京军政府无力支付。

于是，与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签订吉会铁路500万元借款合同，向中国、交通、劝业三银行借军费200万元，向开滦公司借款500万元。其借款，或以利权交换得之，或以刺刀勒索得之。

严修为此忧心忡忡，记曰：褚督办知事不可为，有意下野；而张宗昌不肯，必欲决一死战。直鲁军在天津四境尚有9万余人，欲筹给养，民穷至此，将从何出？不筹给养，则10万饥军，一旦哗溃，何堪设想，思之忧悸。严修以六九高龄与之周旋。

而国民党现辖16省，所收关税占全国的70%，又发行国库券、公债，财源滚滚。

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修正国民政府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卷烟税国库券条例》，分别发行总额为4000万元和1600万元的国库券。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盼联合承销二五库

券1000余万元。于是，上海商界成立劝募二五库券协会，不久，上海各商家所购二五库券便由军方押解到南京。

又颁布《财政部军需公债条例》，发行两期军需公债，发行额分别为1000万元和400万元。除了发行军需公债，还发行煤油特税短期公债4000万元。尤其是发行金融公债，更是堪称大手笔，短期公债30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宋子文理财，与蒋介石用兵如出一辙，将金融看得比军事还重。

以金融为后盾，蒋介石一手用兵，一手花钱，又打又拉，北洋军阀便土崩瓦解了。他与其说是军事家，还不如说是金融家，花钱收买，往往比用兵更有效。

梁启超说："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急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梁启超著《李鸿章传》，"兵家之李鸿章"，海南出版社出版，第49页。北洋军阀丢了武汉和江、浙，可谓大势已去。

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发兵，从津浦、京汉、正太三路攻击奉军，张宗昌命令鲁军总撤退，张作霖调吉林军入关助战，遭日满铁会社拒运，只好徒步南下。

蒋介石兵至曲阜，拜祭孔庙孔林，并接见孔子74代孙孔德成。

此时，严修已入京静养，寓武定侯胡同本宅，儿孙辈为他暖寿。做完寿，他参加孙女仁荷长子智崇之长女婚礼。婚礼在北京公理会礼堂举行，完全按照基督教婚仪进行，严修挽长孙女，在庄严的婚礼进行曲中，缓缓步入教堂，将新娘交给新郎，一牧师读《新约》，一牧师向新婚夫妇致训词。严修记曰："曹化一新郎家本耶教，仁荷亦信仰耶教。故婚礼如是，余不能置一词矣。"接下来，按中国仪式在隆福寺街福食馆举行婚宴，设宴款客，摆了11桌。

孙严仁荫邀吴清源来围棋，严修观棋，并留吴同饭。其时，吴天才已露，段祺瑞慧眼识之，拟遣往日本，以期深造。

回到天津，他先到南开看望张伯苓，商议南开学校经费事宜；接着，又到私一小学，与津绅商议保护校产问题；崇化学会讲期，他不顾大风扬沙，依旧轮值。

某日，晨起，五彩胡同有枪声，谣言四起，市上皆闭门近午。又

闻何旅长部下兵约500人，准备驻扎南开附属小学，来者问计，遂写信请来者交参谋长张用宾，又电告友人面见何旅长，劝说一番。何旅长同意不占用学校，但请务必为其弟兄找一驻地。

战事进展迅速，蒋、冯军抵徐州，决定兵分三路，直指京津。

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向他建议，由日本出兵，助退南军，成功后划江而守，分南北朝，他严词拒绝，声称没有商量余地。然后乘专车离京返奉，车至皇姑屯，被日人炸毁身亡。张学良潜离北京，急归奉天。严修记曰："张作霖回奉天"，"奉天发见炸弹。张作霖出关遇炸死"。无独有偶，"月食，黎前总统逝世"，北洋政府气数已尽，北洋时代亦将宣告终结。

(5)北伐之二："北平"与"东北易帜"

王县长致函严修，请他到天津县署开会，县长奉褚督办命，召集绅商为前线筹划给养，但参事会、议事会两会长久久不来，严修知难以实行，即辞出，忧心如焚，他怕百姓遭殃。

天津被蒋、冯军三面包围，市内纷乱，流言风行，人心惶惶。严修家人暂避于租界，寄宿于诸亲家中。章式之亦避乱至租界，故崇化学会讲课暂停。严修一家暂避卞宅，人多拥挤不堪。俶成患失眠症，外孙女学锦生病。严修希望内人携一孙女，前往女婿金宅金邦正家寄宿，内人不同意，只好将就。

又听说张宗昌、褚玉璞属下将领徐源泉有背离之意，据说是边洁卿城南诗社同仁为之策划，严修恐生兵乱。果然，直鲁联军将领徐源泉在《益世报》发公告，在津宣布反正，改悬国民党旗。严修奇怪，同俶成步行各处，探听消息。随后，各报均登徐源泉通电，张宗昌、褚玉璞仓皇离津。

严修在卞宅接家人电话，邻居刘伯年家被抢，诗友王仁安家被抢，仁安手受伤。西马路一带枪声大作，有军队架大炮，准备对付溃兵。居民纷纷前往社会教育办事处求救，严修、幼梅等电告徐源泉，请派军队弹压，制止溃兵抢劫伤人。

严修家门外，也有便衣队与蒋介石军队何绍南部开火，枪声终夜不止，严家未离开的家人及男女仆人均躲藏在地窖中，才幸免于

难。为天津市民安全问题，严修赴省署见傅作义，交谈之后，又与傅作义同见徐源泉，并晤孙殿英等。不久，清东陵被盗，主犯就是孙殿英，盗得珠宝价值1亿元左右。阎锡山令商震、张荫梧分派兵力保护东陵、西陵，从重惩办盗匪。

孙婿方遐周任教于东北大学偕孙女严仁菊及其女儿咸玲，由奉天辗转大连返回天津，直奔卞宅拜见严修，严修乍见惊喜，百感交集。仁菊与小女暂留卞宅，严修偕遐周乘仁曾汽车回家。仁庚、仁颖亦由南开返回，仁绪一直留守在家。众人听仁绪叙说历险情形，晚九点，严修又能卧于自己衾枕，"弥觉可亲"。为避战乱，几经颠沛，既逢外患，又遭内乱，如今近70高龄，还在辗转不已。遐周陪严修饮，多日疲累，严修午睡。傅作义来答拜，严修以疾辞未见。

国民政府宣布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划北平、天津为特别市，派何其巩、南桂馨分任平、津两特别市长。南桂馨一上任，便来拜访严修。国民党军驻津将领何绍南亦来拜访，严修一一回拜，谈甚欢。国民政府财政部致函严修，咨以财经问题，严修回函，命仁统誊清，又将财政部函附寄智怡。

河北省政府成立，商震任省政府主席，智怡随商震专车来津。

暑热将至，严修晋京避暑，赴西山卧佛寺清凉馆。适友人张玉裁赠诗，遂于西山次韵奉答一诗：

晚年事事不关心，犹念神州怕陆沉。
大地风云千浩劫，下泉歌笑几知音？
苦无人境栖神法，暂假僧寮抱膝吟。
却惜岩阿好松石，炊烟万灶亦来侵。

青松郁郁，凉风习习，难得一点好心情，然而"某军驻山寺数日，门外松荫埋锅造饭"，乌烟瘴气，未免煞风景，故有"却惜岩阿好松石，炊烟万灶亦来侵"之叹。"某军"，蒋介石之卫队也。其时，蒋介石在北平接见张学良的代表，亦至西山避暑。蒋提出东北易帜，实行三民主义。数日后，"蒋总司令警卫营全数开拔"。

终于清静了，晚饭后，严修散步，遇费正清，与之"立谈极久"。费君为汉学家，与亲家金宅为世交，并与智开交往颇多，在京有公

寓，此时也来西山一游。

避暑西山期间，智怡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及卞婿夫妇、华婿夫妇、孙婿曹化一夫妇，均来探视。严修一边同他们漫游西山，一边读“孙文演讲录”。严修对于君治和民治都曾有过研究，对于新兴的苏俄式的党治主义则知之甚少，读“孙文演讲录”，与其说是探讨三民主义，而毋宁说是了解党治主义。

其时，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通电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不久，张学良也表示服从国民政府，愿为蒋介石效力，北洋舰队遂亦如法炮制。张学良派何丰林赴滦河，敦促张宗昌、褚玉璞部接受改编，并派军队入关堵截。

张宗昌通电与奉军兵戎相见，奉军以直鲁军不听劝解发动攻击，两军正式开战，直鲁残部缴械投降，张、褚逃亡。据调查，近四年直鲁两省因军阀混战，减少壮丁 180 余万，饿死者逾 50 万，财产损失 2 亿元以上，牛马驴损失 20 余万头。

战争告一段落，国民党公布《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确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实行“以党治国”的方针，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通过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张学良等 16 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任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院院长。蒋介石率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国民党在全国开始训政。

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决定阎锡山、王正廷、冯玉祥、宋子文、王伯群、孙科、孔祥熙、易培基、蒋梦麟、薛笃弼分任内政、外交、军政、财政、交通、铁道、工商、农矿、教育、卫生部长；以梅花为国花，以三朵连枝象征三民主义，以五瓣象征五权。

(6)北伐之三：财阀北伐与“五纲总案”

璧臣来电话，如石破天惊，震撼了严修：市公安局得南京政府令，将盐商纲总五人拘走，未知何故。幼梅与公安局长曾君至稔，故急电幼梅，请他询问清楚。

“五纲总”即芦纲公所五位负责人：首席纲总李赞臣瑞昌店，纲总王君直宸章店、杨丹忱聚丰恒、郭少岚春晕店、李少舫谦吉店，盐商又称纲商，芦纲公所系长芦盐商自组办事机构。

晚，幼梅来电，云：原因不明，然五人已移至芦纲公所暂住。次日，严修即与诸商绅议定，由总商会银行团致电南京政府。然后，他赴李琴湘约，到热河兴业银行去，探寻纲总被捕事。

在座主客共12人，他拿出藏了40年的绍酒，而琴湘则拿出所藏100年绍酒。相形见绌，严修不觉多饮几杯；苍云白狗，以政治风云下酒。然而严修老矣，他刚刚熟悉了枪治，又来了党治。枪治没有主义，花了钱还可以商量，而党治主义已定，花了钱还没商量。

张作霖可以发行军用票，逼着盐商想法替他筹集军费，而蒋介石则干脆将他们都抓走，不惜竭泽而渔，以战养战，解决军费问题，同时釜底抽薪，彻底根除北洋军阀的金融基础，将金融中心完全转向上海，转入江浙财阀手中。

江浙财阀是党治的金融基础，军队北伐，财阀也要北伐，他们北伐的目标，首当其冲便是盐商，因为直隶盐商是惟一可与他们相抗衡的金融力量。严修未明乎此，仍循老例，汲汲奔走于人情与政府之间，疏通之，调解之。过了数日，有人来告知，南京又来电，欲解五纲总到南京，请严修阻止。严修立即电话智怡设法探询并疏通，智怡回电话，云五纲总一案已定在北方审理。

接到智怡自北京打来的电话后，严修前往热河兴业银行会见王、郭、杨三纲总，二李因戒烟大病，未得见。当时热河仍署张学良之奉系管辖。李赞臣之女三人来拜见严修，闻其父即将解往南京，请严修设法挽回。严修继续与智怡通电话商议对策。

后来，严修了解到，五纲总被拘，实因李廷玉即李宾臣告密，故特电李曰：五纲总被逮，全纲震动，银行界尤为恐慌。报纸宣传，谓由吾弟发难，如其然也，能转圜否？如非然也，能代疏解否？吾乡凋弊极矣，李氏破产，市面已甚动摇；私盐普销，纲商悉入绝地，万不宜再兴大狱也《蟫香馆别记》。据报载，纲总之案责办员尚式，请求调人犯卷宗解往南京审讯。尚为李宾臣弟子，推波助澜，严修记曰：“实其与宾臣一鼻孔出气也，为之愤懑竟日。”

国民党政府以五纲总之热河兴业银行与东北奉系的关系，下令将李赞臣、王君直等五纲总逮捕押解南京。王、郭、杨、二李家人，为父兄将解往南京事，特来拜见严修，并备打点之礼。严修一早，便乘马车往市政府去打听。位于天津八大家之首的"李善人"家，因此而破产，长芦盐商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天津往日风韵不再，衰运一发不可收拾，严修苦撑，然而大势已去。

一日之内，华璧臣两次打来电话，惊扰严修。第一次告知，五纲总即将被押解上船，旋又来电报告，谓有北京来电，暂缓南解。严修百思不得其解，记曰：数日以来，忽擒忽纵，不知是何用意？亦不知主权奚属？使人神魂颠倒。"忽擒忽纵"者，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南解，北京河北省政府方面则反对，言恐影响平津金融等各业，且不利辖境治安，故"五纲总案"终于虎头蛇尾。

其实国民党一上台，便开始搜刮资产，如将轮船招商局官办，将山东枣庄的中国最大的私营矿产收归国有等等，而"五纲总案"，则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但奉系张氏、晋系阎氏，与蒋氏貌合神离，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仍要勉力支撑平津地区的金融业，好与蒋氏维持一个均衡的局面。当时热河一带仍归奉系管辖，河北省主要是晋系的地盘，"五纲总案"置于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中，而不了了之。

(7)中国公民：从善如流与视死如归

由西山返津后，诸事纷至沓来。

先是中国实业银行储蓄部来函，询问严修是否愿意继续为袁克齐担保，严修随即复函，表示愿意继续担保。

又听闻友人中以北京夏润之、曹理斋为最困窘，二人皆追随徐世昌多年，"非东海不周恤而左右有出纳之吝"，遂往见徐世昌言之，徐慷慨解囊。子笏师之庶子穷困潦倒病逝，严修为其买棺木而葬之；璧臣来，呈示致傅作义信稿，请归还前垫徐源泉军给养款，严修电话邀请幼梅来商议此事。

致信李拱泰，接济 10 元，附章式之，亦接济 4 元；三河县赵老村公举王氏为公安局长，请他向陈县长举荐；国文观摩社考试，请

他批阅，一连数日，阅卷 50 本；高苏垣著《论衡集解》，请他题写封面，刘润之“条陈治河办法”，也来与他商讨。市民协会发难，波及幼梅，在大街上张贴标语，横加诋斥，严修前往听询化解。又致函国民政府财政部，对财政部新颁征收特别税条例提出请求收回成命事。

孔子诞祭日，严修至文庙行祭孔礼。祭礼完毕，归途遇交通堵塞。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原来北伐成功，又遇国庆，官方自然要大庆一番，一路紧锣密鼓，大肆宣传，庆贺革命胜利。

严修回到家来，见一青天白日旗挂于大门前。两天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北平，各委员专车北上，智怡随往，孙女婿方遐周则从南京政府迁往北平。

新市长崔文徵一上任，便来拜访严修。严修邀请崔市长参加南开大学校庆。校庆日，南开大学举行木斋图书馆开幕礼。来宾甚多，严修陪卢木斋、崔市长坐于主席台上。卢木斋、崔市长发表演说。随后，参观新建图书馆。津绅李典臣捐赠中文书籍 7 万册，卢木斋捐赠 2 万册，以及古籍、字画、西文图书等。

南开又购地 10 亩，开始建筑小学。小学校舍建在南开女中对面，教室内阳光充足，宽阔的操场任孩子们游戏，在礼堂里还有当时不多见的大平台及钢琴。学校设有种植园和畜养基地培养孩子们动手能力，设立储蓄所和小卖部训练孩子们实际生活能力。

点滴积累终成大业，至今南开在校学生已达 3000 多人，南开教育已经建立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系统化的完备体系。

抚今追昔，严修何等欣慰！伯苓校长将赴美国筹募办学经费，取道日本，乘京奉火车启程。严修与之话别，道一声珍重，这一对办学的老搭档，忘年之交，恐怕别后难逢。

伯苓赴美，路经沈阳，拜访张学良，“欢谈甚洽”。张学良慷慨认捐南开大学发展基金 20 万元，分 10 年交付，第一笔 2 万元，即刻支付。

严修老矣，仍然读书临帖不辍，临《书谱》，温《庄子》、《列子》、《汉书》、《五代史》、《先正事略》、《湘绮楼日记》，读《掌故丛编》、《李朴园诗钞》、《庸闲斋笔记》、《诸子平议》，阅《坦途杂志》、《孙中山讲演录》、小说《儿女英雄传》等。

崇化学会依然在严宅讲课，严修常会抽暇旁听之；诗社老友虽时有逝去，但也每每有新人加入，依旧于明湖春饭庄聚会，诗词唱和，多者三四十人，少者亦有十几人，散后书信往来，和诗砥励，他一直坚持下来。闻梁启超病故，记曰："梁卓如病殇。"悲恸之余，他自知病势，寿将不永，"试拟遗嘱一纸"。1929 年 2 月 16 日，病重，终于不能执笔，遂于本日终止《日记》。

他开始服用沈鸿翔医生开的药，精神稍好，又温《资治通鉴》，或与家人闲谈，或用无线电听京剧，或与诸孙下跳棋、围棋，并在罩棚下与家人会餐。城南诗社因严修有寿七十，拟以诗会寿。严修遂作避寿词曰："寿言之体，有文无质，言苦者药，言甘者疾。使人谀我，人我两失。便活百岁，不作生日。"又自知将死，乃视死如归，遂预作自挽诗曰：

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
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
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
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自注：戊戌失欢掌院，免于党人之祸；庚子避地未成，免于流离之祸；辛亥弃产，约已定矣，彼方中悔，反获保全。于人生关头，趋吉避凶事，皆以侥幸言之。然其好友陈宝泉云：先生为人，外宽厚而内精明，事变之来，往往触机于先，故数当危疑之局，而未与于难。其门人王文光亦云，先生多难，先知先觉。

因病不能会客，仅在上房见少数至亲好友。

1929 年 3 月 15 日晚，严修寿终正寝，享年 70 岁。

正在英国考察教育的张伯苓闻讯极其悲痛，称"严范孙先生是南开的校父"。

次日，天津《大公报》张季鸾写社评《悼严范孙先生》，云：

年来学界闻人如范静生、梁任公两氏，均先后逝世。今严氏又继之，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躬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然而他却不入唯物史观法眼，不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

命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旧世纪一代完人”非但没有落伍，反而“其命维新”。

他当年的思想与实验，今天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他的文化个体性，在今天亦“不失为一鲁殿灵光，足以风示末俗”；这个“旧世纪人物之最后模型”，其实有着永恒的文化价值。

张季鸾是报界大手笔，然其知人论世仍以新旧来划线，尚未通古今之变也。先生之死也，士辍于学，农辍于野，商辍于市，举殡之日，自发而来悼念者数千人也。4 月 21 日，为纪念先生，世界各地南开校友同时在这一天捐款，修建范孙楼。至今此楼尚在，历尽劫难而“其命维新”，栉风沐雨而益显其庄严……

参考书目

《严修年谱》，严修自订，齐鲁书社 1990 年出版。

《严修日记》，影印本，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严范孙先生信函底草(1888—1929)》，原稿本，二十三册(五函)藏者。

《影印蟫香馆手札》，严修著，1932 年，石印本，一册严仁庚先生藏。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王文俊等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李冬君等著，海南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梁吉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张伯苓传》，郑致光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崔国良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崔国良、张世甲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黄殿祺编，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曹禺早期改译剧本及创作》，崔国良编，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出版。

《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关文斌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尚克强、刘海岩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天津文化概况》，刘泽华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60 辑)，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档案馆指南》，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天津土地开发历史图说》，张树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近代天津知名企业经营管理》(1860—1949),蓝长云等编,天津市档案馆辑。
《津门旧事》,林希著文,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张洪祥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晚清经济史事编年》,李允俊主编,晚清学术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辛亥以来人物年里录》,邵延淼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中国文化史年表》,虞云国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一册,中国文化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美)陈锦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中外教育交流史》,卫道治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张彬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中国基督教史略》,(韩)李宽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陶飞亚、吴梓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曹增友著,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年 8 月出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出版。
《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出版。
《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孙尚扬、郭兰芳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中国经学史》,(日)本田成之著,上海书店 2001 年出版。
《科学与玄学》,罗志希著,商务印书馆 2000 年出版。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王汎森著,台湾学术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清初士人与西学》,徐海松著,东方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罗志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陈建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出版。
《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何兆武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著，三联书店 1997 年出版。
《吕著中国近代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晚清七十年》，(美)唐德刚著，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清代目录提要》，来新夏主编，齐鲁书社 1997 年出版。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李细珠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邹振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中国教育改造》，陶行知著，东方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著，东方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梁启超著，1999 年出版。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桑兵著，三联书店 1995 年出版。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桑兵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清代公羊学》，陈其泰著，东方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三联书店 1997 年出版。
《晚清政治与文化》，桑咸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政海轶闻》(民国史料笔记丛刊)，焦菊隐著，上海书店 1998 年出版。
《旅俄日记》(民国史料笔记丛刊)，蔡运辰著，上海书店 2000 年出版。
《石叟牌词》(民国史料笔记丛刊)，谭人凤著，饶怀民笺注，上海书店 2000 年出版。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岳麓书社 2000 年出版。
《西潮·新潮》，蒋梦麟著，岳麓书社 2000 年出版。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李鹏程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中国的王权主义》，刘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刘军宁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第一卷，单正平著，南海出版公司 2002 年出版。
《曾国藩的幕僚们》，成晓军著，东方出版中心 2000 年出版。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叶嘉莹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著》，邹振环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年出版。
《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刘善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点石斋画报选》，陈平原选编、导读，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点石斋画报——图像晚清》，陈平原、夏晓虹编注，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太平天国轶闻》，江苏古籍刻印社 1993 年出版。
《到北戴河看老别墅》，孙志升著，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丁文江传》，胡适著，海南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蔡元培评传》，张晓唯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支伟成著，岳麓书社 1998 年出版。
《胡适杂忆》，(美)唐德刚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曾国藩全集》，曾国藩著，岳麓书社 1994 年出版。
《王国维文集》，王国维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王国维之死》，罗继祖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6 月出版。
《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整理，三联书店 1998 年出版。
《陶行之年谱》，朱泽甫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章太炎学术年谱》，姚奠中、董国炎著，陕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王荆公年谱考略》，(清)蔡上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出版。
《王国维年谱长编》，袁英光、刘寅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商界旧踪》，朱英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瑰异总统——袁世凯》，郭剑林、纪能文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北洋灵魂——徐世昌》，郭剑林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教头总统——冯国璋》，潘荣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吴佩孚真传》，郭剑林著，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后　记

这是一部遵命之作，也是一部悼念之作。

两年前，当我们完成《思想者的产业》一书时，就感到在张伯苓的背后，站着一位更加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被张伯苓校长称之为“南开校父”的严范孙先生。

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也命我以《近代私学与自由主义》开题，将严范孙和南开新私学作为重点，在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立项，作深入的研究。

还有我的老同学严文蒲先生，当我们在中国证券委大楼里，谈起他的祖先严范孙时，他那忧郁的表情令我难忘，他说，我曾努力忘记他，而你竟然要写他……

他从美国回来，为国家起草证券法做顾问工作。他从办公桌前站起来，很感动的样子，说：“我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其中谈到严范孙先生，说严的子孙后来有成了强盗的……你如能将事实写出，我真的很感激，我将为你翻译成英文。”

因此，本书是遵了这三位先生之命——老校长之命、老同学之命和导师之命而作的。两年来，这个命令，仿佛一直就在我的耳边，不断催我完成。

起初，我曾邀二三学友来合作，他们是孟宪实、胡学常、杨阳、马克锋等，讨论了一些时日，后来由于孟宪实要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胡学常去了韩国访学，杨阳则忙于评聘教授，就都退出了，只有

马克锋完成了他那一部分。

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严修很难写，在尝试了几种写法之后，才摸索出本书的体例。因此，马克锋完成的那一部分，没有直接被采用，但其研究工作依然功不可没。大功不言谢，贵在心心相印，贵在共同使命，其余均可一笔带过。

我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可是为了查找资料我得常常到天津图书馆去，往返京津，来回奔波。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占鹏先生，在得知我的研究工作后，慨然曰：研究工作你做，史料出版工作我做。他说做就做，不久，《严修日记》便出版了。

为了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他让我的另一位好友单正平先生，特意为我送来一部刚出版的《严修日记》。正是这部《严修日记》，为我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还有范曾先生也曾给予我支持。记得2000年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和范曾先生顶风冒雪，赶火车前往天津，参加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由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系发起的南开大学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后代联谊会。

当时《思想者的产业》一书刚出版，范曾先生欣然命笔为该书题写书名并捐赠插图，插图是他画的一幅张伯苓校长的全身肖像，老校长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联谊会上，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提议再画一幅“南开校父”严范孙，范先生慨允。

会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和老同学严文蒲君一同去拜访范先生。至范宅，范先生热情接待，文蒲君奉上严修老照片，范先生表示：义不容辞。

从范宅出来，我和文蒲君告别。从此一别，人各天涯，通了两次电话，再也没有相见。临行前，他将一个胖乎乎的、极纯朴的女孩子介绍给我，她就是严知音，让她来协助我做一些联系工作。

后来，我们去看望了文蒲君父母，二老白发苍苍，极其慈祥。其父严仁覃，严修的孙子，他拿出文蒲君曾提到过的美国人写的那本

英文书，翻到谈论严修的那一页给我们看，说严修已经被人忘了，后人已经说不清了，并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

然后，他向我们介绍了曾任过北大教务长的严仁赓老先生。

严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严修的孙子中他年龄最长。当我们走进北大燕东园35号时，眼前是旧楼，疏竹，残雪，一位老人颤巍巍的来迎我们。

他就是年届90的严老先生。老先生研究经济学之余暇，便从事严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还发表了一些有关严修的研究和回忆文章。他说：对于严修的研究工作，周恩来总理一直很重视。

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就指示，要整理严修文集，编辑严修年谱，并让他的老同学严仁曾来做这项工作。后来，年谱编成了，周总理以为还需要修改。谁知"文革"一起，这项工作便搁下了，一搁就是十几年，成了周总理的一个遗愿……

严仁曾早已去世，我们找到他的儿子严文禅。他是一个胖乎乎的老头，满面红光，举止豪迈，颇有军人气概，谈到"严范老"，他滔滔不绝。告别时，他送了我们5本严修年谱，说：就这几本了，全给你们，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书稿完成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仁赓老先生。书稿一打印出来，便赶快给他送去。听说，最近有一件事令老人颇为愤慨，有一部电视剧又将严修写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持者，对此老人已经做了提醒，并提出抗议。

其实这样的误会经常发生在严修和严复之间，还在晚清学部时，邮差就总送错两人的邮件，有时他们自己也不经意地将邮件拆开，然后互相转给对方。

两人的关系很好，又都与袁世凯是朋友，袁氏复辟时，严修坚决反对，而严复则列名筹安会，等于默认，电视剧的作者显然又将这一史实搞错了。搞错了再改正，虽然麻烦，但总有解决的办法。问题是，为什么《天演论》的译者不会搞错，而筹安会的名单会搞错

呢？说到底，它还是含有某种价值取向。

90多岁的老人，用放大镜，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这部用五号字打印出来的30多万字的书稿，然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对书稿很满意，很感激，还提了一些意见，并纠正书中的一些错别字，令我感动了好几天。

我想，老人的责任心，不光是对家族的，还是对中国历史的。严修是公器，不仅属于严家，更属于中国，或许还属于世界，当年李提摩太编辑世界巨人画册，曾向严修索要照片，可惜的是此书尚未见到。

老人告诉我，他已将书稿转给他的妹妹严仁英女士去读……而本书的出版工作，我就全权委托给那些与我有着共同使命的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朋友们了，尤其是一开始就热情支持我的研究工作的肖占鹏先生、焦静宜老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对本书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确实使我获益匪浅。另：本书研究工作曾得到华银投资控股公司的支持，私学与私企，本来就是两兄弟，无需言谢，也不必致礼。但愿上帝保佑新私学，也保佑新私企。

2003年2月完稿于京郊负蜷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
作者=李冬君著
页数=370
SS号=12073568
出版日期=2004.4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
ISBN号=7-310-02065-0
中图法分类号=G40-092.6
原书定价=30.00
主题词=严修(学科：教育思想 学科：研究) 严修 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格式=李冬君著.中国私学百年祭　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04.
内容提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本书以个体为经、时代为纬，在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的“会通”中展示严修的文化个体性为宗旨，以严修新私学为主线，来贯通中国的近代史。